



安徽省文化精品工程项目

# 安徽考古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

主 编 陆勤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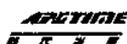
本卷主编 周崇云

ANHUI KAOGU

# 安徽考古



本卷主编 周崇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考古 / 周崇云主编.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7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  
ISBN 978-7-5396-3662-7

I. ①安… II. ①周… III. ①文物 - 考古 - 安徽省  
IV. ①K87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473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胡莉

总策划: 田海明  
装帧设计: 李昕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5859128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

主 编 陆勤毅

副 主 编 倪学鑫 计永超 沈 葵 周 玉

编 委 孙自铎 钱念孙 唐 伽 朱寒冬

李小群 周崇云 穆仲夏

本卷主编 周崇云

编写人员 周崇云 朱华东 王 菁

特约编辑 徐本纯

# 总序

安徽,清康熙六年(1667年)建省,省名取安庆府与徽州府名第一字为安徽。

安徽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繁昌县人字洞发现距今约250万年的人类活动遗址,在和县龙潭洞发掘的距今30至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县猿人”遗址,表明远古时期已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安徽这块土地上。在距今6000年的潜山县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在距今7000年分布于蚌埠、滁州一带双墩文化发现的刻画符号,不仅支持了华夏先祖在安徽这块土地上持续活动的证据,更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

安徽是中国古代文明发达最早地区之一。从经济发展史上追寻,由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到孙叔敖建安丰塘,水利灌溉从萌芽至兴盛,农业从此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由东夷活跃于淮河流域,到楚国迁都寿春,表明古代两淮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已趋于成熟。由曹魏屯田,到两宋修圩田,“江淮熟、天下足”的民谣,传递着古代安徽地区农业经济繁荣的信息。至明清两朝,徽州商帮走四方,芜湖米市润江南,古代安徽农业经济达至鼎盛。从文化嬗变中探究,由淮上老庄创立道家学说,至新安朱熹构建宋代理学,中国文化的灵魂得以延续、升华。由备受推崇的东汉建安文学,至独树一帜的清代桐城文派,中国文化的表达得以推展、绚丽。由先秦时期淮河流域民歌《周南》、《召南》,东汉时期的长篇五言诗《孔雀东南飞》,至清代皖人吴敬梓作《儒林外史》,中国文化的民间土壤得以肥沃、拓展。由商周开始皖铜矿的开采和冶炼,至西汉淮南王刘安著作《淮南子》,明清方以智研著《物理小识》,中国文化孕育

出的科学精神和技术能力得以发扬、提高。

安徽更是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先行地区之一。百余年来,近代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出自安庆工匠之手;当代中国的“两弹”制造与核物理学家怀宁人邓稼先息息相关。百余年来,安徽人探究现代科技、绘写现代文明的脚步未曾停止。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风气之先,引领近代思想狂飙突进;凤阳小岗的农民解放思想,大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掀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百余年来,现代文明和思想文化登上殿堂,走向大众,普惠城乡。清廷重臣合肥人李鸿章在混沌乱世另辟洋务运动;当代安徽敞开胸襟与世界沟通交流。百余年来,安徽与世界的空间距离未变,心理隔膜却日趋淡消,越来越多的安徽人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现代文明已经融入安徽社会,俨然成为安徽文化的主干。

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安徽文化,这就是安徽文化的神奇和魅力。

我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2009年奉调安徽省社科院工作。正值安徽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安徽省社科院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拥有各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理所当然地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建设文化强省”的实践。由此,我与社科院有关同志商议,组织编写、出版《安徽文化精要》丛书,一是使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与“建设文化强省”相结合,使研究成果能够更贴近社会、贴近人民大众;二是努力传播连绵不断的安徽文化,扩大安徽文化的影响力,增加人们的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按事类、学科分卷编写,独具安徽特征。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或起先导作用的事件、事物,亦单列成卷。丛书共26卷,包括《安徽哲学》、《安徽考古》、《安徽经济》、《安徽历史》、《安徽宗教》、《安徽建筑》、《安徽戏曲》、《安徽诗歌》、《安徽散文小说》、《安徽美术》、《安徽教育》、《安徽科学技术》、《安徽文化产业》、《安徽农村改革》、《安徽传媒》、《安徽风景名胜》、《安徽民俗》、《安徽名城》、《安徽名

镇名村》、《安徽中医中药》、《安徽人口姓氏》、《安徽学术》、《安徽体育》、《徽学》、《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徽民间工艺》等。丛书分辑组织编写、出版,每辑5至7卷,每年出版一辑,计划5年内完成丛书编写、出版。丛书取名“精要”,意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明快精当的叙述,把安徽文化中基本的、精华的内容,图文并茂地介绍给广大读者。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得到安徽省文化精品工程专项资金的资助,得到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陆勤毅

2010年12月



# 引言

安徽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早在北宋时期已有人关注。科学意义上的安徽境内的考古活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4年,原“中央博物院”在当涂县发掘一座西晋砖室墓;同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湘、李景聃等人在调查原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事件时,曾对寿县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发现龙山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12处及古墓葬8处。这些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揭开了安徽现代考古的序幕。

安徽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建国后至今的60年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的考古工作取得迅速的发展,先后发现4000多处古遗址和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取得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这60年中,安徽考古工作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属于起步时期。

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各地兴起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和鼓舞下,安徽省掀起了以治理淮河为中心的基本建设高潮,古代文物随之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这一时期,作为区域内考古骨干队伍的华东文物工作队及安徽省内的文物考古专业机构分赴各地,积极抢救和保护文物。1957年,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初步发现古遗址、古墓葬上千处,初步认识了境内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分布特点。在此阶段,重点发掘了寿县和淮南的蔡侯墓、屯溪飞机场土墩墓、寿县安丰塘汉代坝堰遗址、休宁南宋朱晞颜夫妇墓、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墓以及合肥的元代银器窖藏和明代瓷器窖藏。同时,调查发掘了芜湖蒋公山、亳

州青风岭、绩溪胡家村、临泉老邱堆、亳州钓鱼台及肥东大陈墩、大城头等一批古文化遗址，还对阜南润河、嘉山泊岗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进行了清理。其中，在寿县蔡侯墓的发掘中出土大批青铜器，这是中国继1923年河南新郑铜器群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成为研究春秋晚期铜器的重要标尺；屯溪土墩墓的发掘，首次揭示出江南地区吴越民族的葬俗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发掘，堪称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重要考古发现，为安徽考古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属缓慢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以配合基本建设和农田改造为主进行的发掘，对象多为古墓葬，而对古遗址的发掘相对较少，且基本属于探掘性质。20世纪60年代初，在萧县花家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代文化的三叠层，并首次在淮北地区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而舒城凤凰嘴等一批春秋墓的发掘，揭示了江淮地区群舒铜器的面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安徽的考古工作曾一度陷入停顿，至1972年以后才逐步复苏。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的考古发掘项目有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亳州曹氏宗族墓群、合肥北宋包拯家族墓地、天长北岗西汉墓群、蚌埠明汤和墓等，为安徽地区历代墓葬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肥西大墩孜、含山孙家岗等遗址的发掘以及肥西馆驿等地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丰富了江淮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内涵。此外，通过对具有显著地方特点的淮南寿州窑、萧县白土寨窑、繁昌柯家冲窑等瓷窑址的考古调查，初步认识了地方名窑的烧制年代和产品特点。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属于迅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安徽省的考古专业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同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等一些中央科研单位和高校也相继进入安徽开展考古研究和实习，从而大大推动了本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1984~1986年，安徽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文物大普查，共发现各类文物点17000多处，为深入开展考古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地层

学、类型学及区系类型等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日臻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逐步应用,进一步拓宽了考古研究的思路和领域。1979年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标志着安徽省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前期,考古工作者在江淮地区围绕古人类探索及薛家岗文化、夏商文化、楚文化等课题的研究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并重点发掘了和县龙潭洞、望江汪洋庙、宿松黄鳝嘴、含山大城墩、定远侯家寨、肥西古埂、霍邱红墩寺、寿县寿春城、长丰杨公楚墓等遗址和墓葬,取得了和县猿人、巢县智人等一系列考古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安徽省先后开展了苏鲁豫皖先秦考古学文化(淮北区)、皖鄂赣商周古铜矿(皖南区)以及水阳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等课题的研究,考古工作逐步扩大到淮北和皖南地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给考古研究带来了重要机遇,先后涌现出天长三角圩西汉墓、巢湖放王岗西汉墓、萧县汉墓群、潜山公山岗古墓群、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等一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与此同时,围绕重点学术课题,考古工作者也积极开展了一些主动发掘,主要包括蒙城尉迟寺、含山凌家滩、南陵牯牛山、望江黄家堰、繁昌人字洞等一批古遗址。其中,繁昌人字洞遗址则出土了距今200万~2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及大量动物化石,对探索早期人类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在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迄今为止保存完整的大汶口文化聚落形态;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史前祭坛和大批珍贵的玉、石器,为对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天长三角圩西汉墓群(1992年)、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1994年)、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1998年)、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1999年)等4项发掘分别获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巢湖放王岗西汉墓获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开展,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大局,积极开展配合重点建设工程的文物考古工作,安徽考古工作再上新台阶。其中2006

年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和王陵区的发现,揭开了西汉六安国的神秘面纱,对研究六安国的历史和西汉诸侯王陵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2008年,在蚌埠双墩一号墓,发现独特的圆形墓坑和复杂的遗迹现象,出土青铜器、玉器等400多件,这是我国古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固镇垓下遗址、怀宁孙家城城址、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等都以其重要内涵使世人瞩目,并分别入围了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

回顾近80年来安徽考古所走过的路,成绩是显著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在新世纪,安徽考古必将以全国考古学的发展为背景,立足安徽,围绕重大学术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努力把安徽考古推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果,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

# 目 录

引 言 .....	001
<b>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b>	<b>001</b>
1. 曙光初现——繁昌人字洞遗址 .....	003
2. 20 万年前的安徽人——和县猿人 .....	007
3. 银山上的智人——巢县人 .....	012
4. 水阳江畔的营地——宁国毛竹山遗址 .....	016
<b>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b>	<b>020</b>
1. 神秘的刻画符号——蚌埠双墩遗址 .....	022
2. 安徽首支考古学文化——潜山薛家岗文化 .....	030
3. 中华原始第一村——蒙城尉迟寺遗址 .....	037
4. 玉器的王国——含山凌家滩遗址 .....	045
5. 长江下游的古城——怀宁孙家城遗址 .....	058
6. 淮河流域首支史前城址——固镇垓下遗址 .....	065
<b>三、夏商周时代考古 .....</b>	<b>070</b>
1. 黄山脚下的西周贵族——屯溪土墩墓 .....	071
2. 江南水城和它的主人——南陵牯牛山遗址与千峰山土墩墓群 ..	078
3. 南方之金——皖南古矿冶遗址 .....	084
4. 消失的古国——蚌埠双墩一号墓 .....	093
5. 最后的楚都——寿春城遗址 .....	101
6. 王者归来——寿县、淮南蔡侯墓 .....	107

7. 楚王之陵——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	113
8. 艺术瑰宝——安徽出土的夏商周至战国青铜器·····	120
<b>四、秦汉时期考古·····</b>	<b>130</b>
1. 汉初诸侯陵——阜阳汝阴侯墓·····	131
2. 丰富的地下宝藏——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	139
3. “黄肠题凑”王陵——六安双墩汉墓·····	148
4. 乱世枭雄曹操故里——亳州曹氏宗族墓·····	157
5. 石刻汉画技艺绝世——宿州褚兰画像石墓·····	164
6. 西汉广陵国桓氏家族墓——天长三角圩汉墓群·····	173
<b>五、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考古·····</b>	<b>187</b>
1. 勇猛善战大都督——马鞍山朱然墓·····	188
2. 军事堡垒——合肥三国新城遗址·····	196
3. 运河考古的首次大发现——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	202
4. 唐代名窑——寿州窑遗址·····	210
<b>六、宋元明时期考古·····</b>	<b>217</b>
1. 包拯家族寻踪——合肥包拯家族墓·····	218
2. 北宋名门望族墓——合肥马绍庭夫妇墓·····	225
3. 长江下游龙窑——繁昌柯家冲窑址·····	229
4. 安徽元将——安庆范文虎夫妇墓·····	234
5. 最早的明皇城——明中都城遗址·····	239
6. 明朝开国元勋——蚌埠汤和墓·····	244
<b>参考资料·····</b>	<b>249</b>

##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安徽省位于中国东部低海拔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横贯省内,将全省自然划分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南山地三个区域。全省新近纪、第四纪覆盖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1/2,其中尤以第四纪河湖相沉积、洞穴和裂隙堆积十分发育,蕴藏着丰富的古人类、旧石器文化信息。建国以来,安徽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

1952 ~ 1954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杨钟键、周明镇教授等人,在皖北泗洪县(当时属安徽,现属江苏)下草湾引河岸及五河县进行第四纪地层古生物调查时,发现了一批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同时他们在下草湾还采集到了一段人类股骨化石;1955 年,吴汝康、贾兰坡教授将其鉴定为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定名“下草湾人”,进而指出:“这段股骨化石发现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其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在安徽的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可能找到原始人类的遗迹,这是我们在华南这一地区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因此为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提供了线索。”以上发现,首次向人们揭示了淮河流域第四纪古生物、古人类活动的踪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安徽地区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发现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辉煌成就。1980 年 11 月 4 日,由中国科学院与安徽省考古工作者联合组成的发掘队,在和县陶店镇汪家山龙潭洞,发现了一具相当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轰动了国际古人类学界。次年,又进行了两次系统发掘,获得了一些人类化石材料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年届 80 高龄的著名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亲临发掘现场指导工作,称上述发现为“科学上的珍贵”。继和县人被发现不久,1982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省地质局区域测量队,对巢县银屏区银山化石地点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块属于早期智人的枕骨化石,第二年又获得了一块人类上颌骨和几枚牙齿化石。上述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人类化石材料,同时由于这两处人类化石地点的古生态环境相似,生存地质年代相近,引起了有关学者对于和县直立人与巢县早期智人之间演化关系等问题的关注。

1987年10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皖南宁国县河沥溪镇发现了我省第一个旧石器地点,揭开了安徽旧石器发现与研究工作的序幕。以后10年间,在水阳江中下游的宣州市、宁国市、芜湖县相继发现旧石器地点30多处,由于石器地点均分布于水阳江两岸,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统称为“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时代由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中期。此外,又先后在长江两岸及皖南的铜陵、广德、巢湖、庐江、枞阳、怀宁、贵池、安庆、潜山、望江、繁昌等地,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材料,石器工业整体风格与水阳江一致,均属于华南砾石石器工业类型。1998年在五河县西尤窑厂发现了皖北迄今唯一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石器工业类型属北方小石器类型。

1998年5月,国家攀登专项安徽课题组成员金昌柱、郑龙亭等,在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因该地点堆积物地层剖面呈“人”字形,故取名为“人字洞”。人字洞遗址为迄今亚欧地区已知最早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它的发现是国家“九五”攀登专项的重大突破,为寻找早期人类化石提供了重要线索,将亚欧大陆人类生存的历史向前推至220万~250万年。

今天,安徽旧石器时代考古,无论是旧石器、古人类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还是对相关学科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安徽地区现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47处,其中古人类遗址2处,分别代表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阶段;旧石器地点45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中国南方和北方文化类型兼而有之。发现与研究表

明:安徽地区已成为研究早期人类起源、演化及其环境背景,探讨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传统起源、分布和交流等问题的重要地区之一。以下仅选取最为重要的几处发现介绍一下。

## 1. 曙光初现——繁昌人字洞遗址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经历了 80 多个春秋。在 1929 年 12 月 2 日裴文中先生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之后的 30 多年里,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并列为最早的人类祖先,东亚地区一直被视为人类起源之地。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后,非洲地区相继发现了大批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起源于东亚地区的认识。1959 年英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玛利·利基首先在坦桑尼亚中部的奥杜威峡谷发现了大批旧石器(钾氩法测定石器地层年代为大约 175 万年前)和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化石——东非人(后经研究改名为“南方古猿包氏种”);1960 年乔纳森(玛利·利基之子)又在距奥杜威峡谷“东非人”头骨不远处,发现了 190 万年前的一个“能人”小孩头骨;1972 年理查德·利基(玛利·利基次子)领导的考察队在肯尼亚又发现了“能人”成年人头骨;1974~1975 年,以美国科学家约翰逊和法国学者泰伊白为首的一支联合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 330 万~280 万年之间的“露西”骨架和大约 200 件人类碎骨和牙齿;尤其是 1994 年于埃塞俄比亚发现了 440 万年前的地猿始祖种。非洲地区一系列重要人类化石的发现,使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相信,人类可能最早起源于非洲。

在此期间,中国也陆续发现了蓝田人、元谋人、和县人、郧县人、南京人等一批重要的直立人化石,但它们的生存年代都没有超过 170 万年。直到 1995 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美国学者黄万波教授与美国学者罗瑟尔·石汉教授等联合撰写的《亚洲的早期人类及其工具》一文,首次向国际科学界揭示,在中国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发现了距今 200 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信息立即引

起了中国科学界最高层领导和权威人士的极大关注。国家旋即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立项,确定重点地区实施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与环境背景研究”,旨在于中国土地上寻找200万~4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人字洞遗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发现的。

**发掘经过** 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位于安徽省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东南坡,地理坐标为东经118°5'46",北纬31°5'23",海拔高度约为120米。1984年当地水泥厂在采石作业时,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并写信上报了县、省及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根据以上报告,1987年,有关专家对此地化石地点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并作了报道。1998年5月4日,根据以往的线索,金昌柱、郑龙亭等前往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进行地质古生物调查,在癞痢山1号采石塘口发现了一处第四纪洞穴堆积,采集到若干灵长类化石,因该地点堆积物地层剖面呈“人”字形,取名为“人字洞”,并根据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定人字洞堆积物的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之后的几日,又采集到了几件疑为人工制品的石英片麻岩、硅质灰岩标本,后经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张森水教授、黄慰文教授等分别观察,确定了其人工性质,该地点的重要意义得到了进一步显露。一时间国内外学者纷至沓来,对这里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德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堤埃姆博士说:“所看到出自繁昌遗址的文化遗物虽然只有数件,但很重要。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有关我们远古祖先的发现。”法国巴黎古人类研究所卡帕罗斯教授写道:“这个遗址为我们了解人类的进化提供了新线索,在此致以衷心感谢和良好祝愿。”这里俨然成为探索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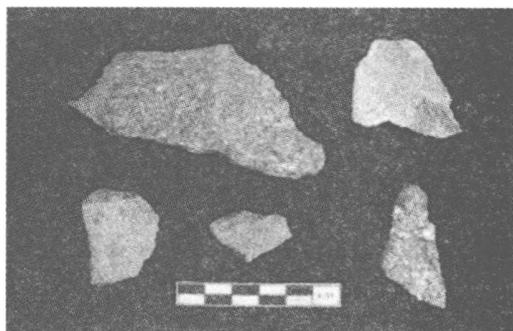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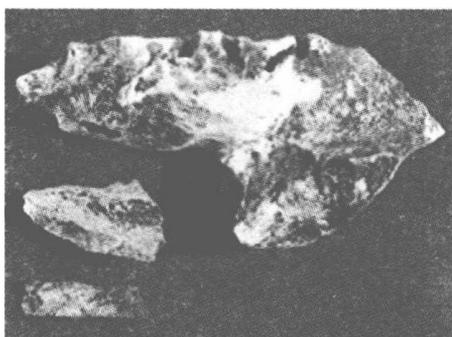
**主要发现** 人字洞堆积厚度约30米,宽8~12米。至今已进行了8次发掘,发掘深度达7米,获得人工制品100余件,其中石制品90余件、骨制品10余件。其中的一些重要遗迹现象及遗物显得尤为重要。



人字洞遗址原貌与现状

经鉴定,人字洞出土的石制品以小型居多,原料以铁矿石(曾见于北京人遗址)为主,兼有硅质泥岩、硅质灰岩、片麻岩、石英砂岩等,均非原产于洞中,可能采自洞外稍远山上的风化岩块,石制品原料具有多样性。石制品打片采用锤击法,打击台面清楚,在石核或石片上都可见到打击台面,表明古人类打片时曾用过转向打法,有些石核曾被几次使用转向打法。无论是石核或石片都缺乏相对稳定的形状;石器毛坯有石块、石核、石片和断块;基本类型是刮削器,还有雕刻器。刮削器中主要是边刃,严格的端刃不多。单刃、边刃石器多于复刃和端刃石器,刃口形态以直刃居多,次为凸刃,再次为凹刃。石器修理均采用锤击法,以向背面加工为主要方式,次为复向加工,再次是向破裂面和错相加工。石器修理相当粗糙,多为单层修疤,且以深宽型为主,刃缘很不平齐。仅在几件块状毛坯上可见有序加工,即先打出一个面,再在这个面上加以粗糙的修理。石制品表面未见长距离搬运或急流碰撞的痕迹,个别标本有较重的磨蚀痕迹,大多是轻度的,也有一定数量的标本无磨蚀痕迹,从表面磨蚀情况来看,有几件石制品可能曾经两度加工。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和一些小型石器,明显具有人工加工过的痕迹。

在人字洞遗址发现的大量的碎骨中,可认定为骨制品的有几十件,分为骨和象牙制品,两类中均有一定数量的工具。其中一件用犀牛下颌



人字洞遗址出土的骨器与石器



象牙墙

骨制成的砍砸器和用乳齿象门齿制成的骨铲制作精美。此外这里还发现了一种被称为“象牙墙”的遗迹现象,由若干根乳齿象象牙垒筑而成,错落有致,显然并非偶然因素形成,最有可能属于人工堆筑。

这些人工制品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十分相近;全部石制品缺乏相当稳定的形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无论从类型上还是技术上,都比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更新世早期的石制品显得粗糙、简单而原始。尽管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数量不多,但它表明了人类早期工具原料组分的多样性。

人字洞遗址尚有数十米堆积没有发掘,未来的田野工作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古人类活动信息。它的重要性逐步被认识,该遗址也已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2. 20万年前的安徽人——和县猿人

人类发展的历史目前可分为古猿(前800万~前700万)、南方古猿(前420万~前100万)、直立人(前200万~前20万)和智人(早期为前20万~前5万,晚期为前5万~前1万)四个阶段。直立人又可分为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他们已经具备了人的特征:能制造工具,能直立行走,但脑容量较少,头部还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质。生存年代大约在两三百万年到三四十万年前,属于地质学上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早期前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初期。直立人的脑子已经明显增大,早期成员的脑量就已经达到800毫升左右,晚期成员则上升为1200毫升左右。而且,脑子不仅仅是体积增大了,它的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并进行了重新改组,显示出直立人已经有了相当复杂的文化行为。大脑左、右两半球出现了不对称性,显示出直立人已经有了掌握有声语言的能力。直立人的牙齿也发生了变化。后部牙齿减小,使相应的牙床和支持面部及下颌骨的骨结构减小,这显然与直立人更多地和更经常地以肉食代替若干植物性食物有关。前部牙齿则扩大了,这似乎与并不直接咀嚼食物相关,而似乎与用嘴来咬紧和衔住物品有关,也可能与制备动物性食物有关,例如,用牙撕扯肉食以便将其分割成小块,或是为了小孩食用而撕碎肉食,等等。直立人面部比较平扁,身材明显增大,平均身高达到160厘米,体重达到约60公斤。直立人是最早会用火的人类物种,他们最早能够按照心想的某种模式来制造石器。在非洲,这种石器组合所代表的文化类型被称为“阿舍利文化”,它得名于也发现有这种类型石器文化的法国北部的圣阿舍利地点。阿舍利文化的代表工具是手斧,它由燧石结核打制而成,一端圆钝,是用手抓握的部分;另一端尖



利,可用来切割、砍砸和钻孔,也可对木料进行加工。

和县人属于晚期直立人,生活在 20 万年前。与上述的人字洞遗址相比,和县人活动的时间要晚得多,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的晚段。由于存在进化上以及地域和个体之间的差异,在中国境内的直立人还发现了一种“形态镶嵌”的现象,例如和县人头骨特征与一般直立人、智人较符合,而像广东马坝、广西大荔等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却有着见于直立人而罕见于智人的特征。

与“和县人”处于同一时期的、活动于中国大陆的古人类及文化主要有:北京人、湖北的郧县人、南京人、贵州观音洞文化、辽宁金牛山人等。

**发掘经过** 龙潭洞遗址位于安徽省和县陶店汪家山北坡,距和县县城西北约 48 公里,离长江北岸仅约 30 公里,南依山岭,北濒平原,海拔高度 23 米。龙潭洞一带地势起伏不大,多为低山丘陵。龙潭洞随着本区山体的抬升,一方面受地层形状的控制,洞穴沿地层走向延伸。另一方面因洞穴位置靠近山前凹地,地下水沿破碎带溶蚀形成了一个东西



和县猿人遗址

长、南北窄的裂隙。

1979年春,安徽省水文地质队在和县陶店进行水文地质普查时,获悉汪家山北坡有个洞穴出产“龙骨”,他们立即前往考察,并采集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带回,随后将含化石的洞穴及堆积情况函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要求派专业人员前来鉴定化石及地质时代。同年10月下旬,该所黄万波、谢树华应邀到达安徽,对化石作了初步鉴定,计有葛氏斑鹿、李氏野猪和犀牛等属种。尽管这些材料都是中国更新世中、晚期常见的种类,但他们注意到在100多件化石中,没有一件完整的标本,其中十几件葛氏斑鹿鹿角标本破碎得很有规律:鹿角的主枝和眉枝都在上端折断,基部均带有部分顶骨,用放大镜观察鹿角表面有很清楚的砍痕,显然鹿角并非自然脱落。此后,黄万波、谢树华等赴陶店汪家山化石地点进行了短期的实地考察。他们对化石地点周围的地层作了进一步了解,发现洞内堆积物十分丰富,哺乳动物化石随处可见,仅葛氏斑鹿鹿角就采集到了30多个,形态与水文队采集的标本基本一致,均只保留了部分主枝、眉枝的下端和顶骨部分,认为该地点值得做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因洞穴的下方有一个水潭,当地人称之为“龙潭”,黄万波将化石地点命名为“龙潭洞”。

1980年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省博物馆、和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发掘队,开始了对龙潭洞的科学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历时15天,采集到巨河狸、虎、狼、熊、中国鬣狗、剑齿象、中国犀、肿骨大角鹿、斑鹿、牛、猪等2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以葛氏斑鹿鹿角最多,数量超过了200件。在大量碎骨片中,还发现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如象、犀、鹿等的股骨、肱骨近端和远端被折断,骨骼表面有清楚的砍砸痕迹。这些信息预示着龙潭洞可能是史前古人类的活动场所。1980年国庆前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安徽省和县水利局秦万矩工程师寄来的哺乳动物化石邮件,经鉴定,其中有一枚人牙。这一发现,对深入开展龙潭洞发掘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当年10月至11月,发掘队再次对龙潭洞进行了历时

一个月的发掘。10月19日首次获得1枚直立人牙齿；10月21日又找到了2枚臼齿；10月23日再获得1枚人牙；11月1日发现了1段人类左侧下颌骨（带2枚臼齿）；11月4日下午4时35分，1具相当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出土。在此基础上，1981年5~6月，发掘队第三次进驻龙潭洞，经过60多天的大规模发掘，采集到包括1枚门齿、4枚臼齿、1块额骨眶上部残片及1块顶骨残片共7件人类化石，同时还发现了50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至此，龙潭洞遗址的发掘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重要发现** 1980年和1981年在龙潭洞遗址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材料包括：1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1块额骨眶上部、1块顶骨碎片、1块左侧下颌骨碎片（带有第二和第三臼齿）及10枚单个牙齿。

#### （1）头盖骨

和县人头盖骨出土时已自然破裂成20多块，经室内修复整理，除一小部分缺损外，其余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它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之一，因此其研究价值极高。头盖骨石化程度较高，呈土黄色。整个头骨显得粗壮而厚重，据一些特征判断该头骨为男性个体；



和县人化石

颅骨显得较宽,最宽处在颅基,颅骨的骨缝已基本愈合,这些特征显示属青年期,年龄在 20 岁左右;眉骨粗壮且向前突出连成一条横脊;头骨骨壁厚度没有超出北京人的变异范围,平均厚度大约是现代人的 3 倍;上颌向前突出,无论在形状和相对高度上都已接近智人的水平;和县人的脑量测定计算结果为 1025 毫升,比南方古猿脑量(440 毫升~520 毫升)大 1 倍,接近北京人脑量的平均值(1059 毫升),可见和县猿人脑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明显比现代人脑量(1400 毫升)低。

### (2) 下颌骨

下颌骨保存部分是 1 块左侧下颌体碎片,第一臼齿、第二臼齿仍在原位。臼齿齿冠磨损较重,估计为壮年个体;下颌体非常粗厚,厚度比现已发现的北京人和蓝田人的所有下颌骨都厚,明显大于北京人(男、女性)和爪哇人,也大于蓝田人(女性),表明可能是男性个体。

### (3) 牙齿

发掘和县人牙齿共 11 枚。其中门齿 2 枚、前臼齿 1 枚、上臼齿 4 枚、下臼齿 3 枚和 2/5 牙齿 1 枚。门齿均为右上内侧门齿,门齿特粗壮,尺寸大于所有直立人。门齿呈铲形,这些形态特征与北京人、郧县人及桐梓人(属早期智人)相同,而与元谋人有明显区别;下臼齿尺寸落入南方古猿变异范围,大于北京人和爪哇人。

和县人体质特征表明,其无疑属于直立人范畴。它在形态上和北京人较为相似,系统位置似应与较晚的北京人相当;和县人头骨具有若干较北京人为进步的特征,意味着它是一种进步类型的直立人。

### (4) 文化遗物与生活方式

和县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狩猎和采集。从遗址地层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来看,动物骨骼都很破碎,且许多动物骨骼上留有砍砸痕迹,可见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敲骨吸髓。伴生的 54 种哺乳动物中,一部分为和县人的狩猎对象,其中斑鹿是经常的捕获物,遗物中发现的斑鹿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和县猿人的生活环境中植物十分丰富,他们可以采集植物的果实、根茎作为食物。

根据研究资料,我国境内大约生活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已经掌握了用火本领,在以后发现的大多数直立人化石地点都曾发现用火痕迹。在和县人遗址含人化石的棕红色砂质黏土中,也发现了烧过的骨头、牙齿和灰烬等,说明和县人已会使用火。在遗址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发现最多的是葛氏斑鹿鹿角,大多数被从主枝和眉枝分叉的上端部位折断,鹿角底部往往都带有部分顶骨,显然不属于自然脱落。此外,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的管状骨一端较平而另一端破裂形成尖状,且往往有人工修理和使用的痕迹,这些现象说明和县人已能利用鹿角和大型哺乳动物的尺骨、桡骨、胫骨、肱骨等骨骼制造工具。研究人员在整理出土的哺乳动物零散牙齿标本时,还发现许多犀牛牙齿,尤其是前臼齿和臼齿,当齿冠外脊与牙本体分离后,在咀嚼一端形成锋利的波形刃口,可以用来切割食物。诸如此类牙齿外脊数量的不断增多,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不少标本咀嚼一端的波形刃口变得圆滑了,有的标本明显向刃口两侧和基部扩展。研究人员认为,和县人不仅用鹿角和大型哺乳动物管状骨制造骨器,而且知道利用犀牛臼齿上与本体分离的外脊作为工具,用来切割、刮削食物。这种牙制品工具在我国现已发现的其他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中尚不多见。

和县人遗址历次发掘都十分注意采集遗址中出现的各种石质标本。贾兰坡院士曾亲赴发掘工地,指导发掘、采集和石制品鉴定工作。但经过多年的观察、对比,至今没有发现具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石制品。对于和县人制造和使用骨制品、角制品、牙制品作为工具的问题,学术界意见已基本趋同。和县人能否制造和使用石器,从目前对遗址中发掘出土的石质标本的观察结果来看,尚难以断定。和县人遗址人工制品中,骨、角器发达,缺乏石器现象的原因,有待于发掘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综合研究工作的深入来解答。

### 3. 银山上的智人——巢县人

距今大约15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早期,人类文化进入了旧石器时

代中期,在体质形态上已由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发展成为早期智人(古人)。智人(homosapiens)即“智慧的人”,简称“智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阶段。其中又可分为早期智人(古人)和晚期智人(新人)两个发展阶段。世界上最早发现早期智人的化石地点有两个:一个在西班牙直布罗陀,发现于1848年;另一个于1856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但最早被人重视的是在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化石,所以欧洲古人类学界将早期智人统称为“尼安德特人”,将与尼安德特人时代相当的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统称为“莫斯特文化”。2003年6月11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在埃塞俄比亚发掘的一批约16万年前的人类骨骼化石,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类即智人的化石。这一发现填补了智人进化历程起点处的空白,并给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提供了证据。这些化石是1997年在埃塞俄比亚东部中阿瓦什地区一个干燥的山谷里找到的,其中包括一名成年人和一名儿童的相当完整的头骨以及另一名成年人头骨的部分碎片。这些头骨在解剖学意义上无疑属于智人,他们有着相当多的现代人特征,例如成年人头骨有较大的球形颅骨,面部扁平。但他们也有一些较为原始的特征,例如两眼距离稍远、眉脊突出等。此外,这些智人缺少尼安德特人的某些特征。这表明他们处在智人这个物种发展的起始阶段,介于更原始的人类与现代人之间。

早期智人的活动范围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扩散。在中国,早期智人和晚期直立人的分布范围大体一致,中国境内目前大约已经发现早期智人化石地点和旧石器中期遗址60余处,分布在辽宁、河北、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安徽、重庆、四川、贵州、福建、广东等地。在旧石器文化中期,旧石器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石器制作技术日趋进步,石器类型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这一时期的人类可能已经懂得人工取火。在欧洲,早期智人已懂得埋葬死者,并安放随葬品,原始宗教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人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不断增长,人类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早期智人体质特征已与现代人接近,脑量已达到现代人水平,平均脑量接近1400毫升,结构远比直立人的复杂。但早期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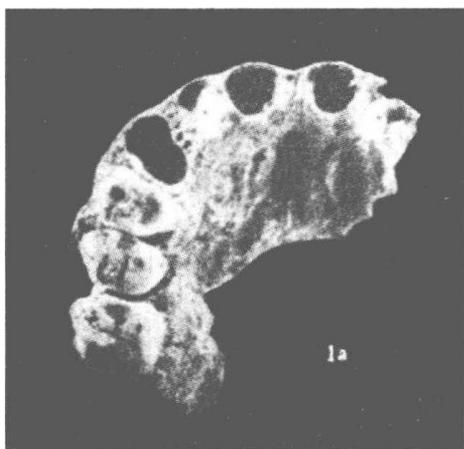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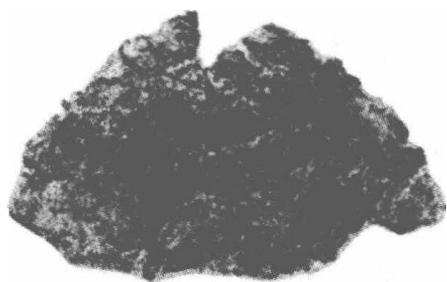
体质上也有许多部位还略显原始,如面部还向前突出,牙齿也较现代人粗壮。不过早期智人的手相当粗大,肌肉发达,掌骨关节较直立人灵活,说明早期智人的双手比直立人更能自由地从事劳动。

到了5万年后的晚更新世晚期,人类文化进入到了旧石器晚期,体质上则由早期智人进化到了晚期智人,或可称为新人,意思是和现代人体质上已基本相同了。迄今为止,在地球上,除南极洲外,其他各大洲均已发现晚期智人活动的遗迹。在我国,主要的新人化石有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等,至于晚期智人活动遗迹更是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了。

**发掘经过** 巢县人遗址位于安徽省巢湖市岱山乡银山村附近的山坡上,海拔高度25米。巢县人遗址地处江淮之间,与和县直立人同属于一个大的地貌单元,动物和植物区系基本相同。银山的西面和南面为低山丘陵地带,北部和东部是宽阔的平原。出土巢县人化石的银山为平原与山地交接的一个平顶喀斯特小残丘,海拔高度仅25米,相对高度约16米。银山巢县人遗址的沉积类型为洞穴(或裂隙)堆积,洞穴相对高度为10.5~13.5米。巢县人化石地点是由安徽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1981年在野外地质调查中发现的。

1982年4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省地质局区测队共同对含化石地点进行了发掘,发现了1块不太完整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1983年10~11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原含人类化石的层位中,又获得1块不太完整的人类上颌骨(含第一前臼齿、第二前臼齿)、4枚破碎牙齿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最初,发现者将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鉴定为直立人,后改定为早期智人,命名为“巢县人”(或称“银山人”)。1986年11~12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银山村人类化石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虽未发现人类化石,但获得一批保存较好的哺乳动物化石。

**重要发现** 1982年和1983年发现的巢县人化石材料计有:1块不太完整的枕骨、1块残缺的左上颌骨(含第一、第二前臼齿)及4颗破碎



巢县人枕骨与上颌骨化石

牙齿。

**枕骨** 巢县人的枕骨与直立人的相似。枕骨骨壁较薄,枕骨曲度角较北京猿人的为大,与早期智人形态接近。依据两侧星点间距和人字缝愈合状况,推断此枕骨应属成年人,估计小于26岁。根据枕骨面肌脊不发达特征,该枕骨应属于一女性个体。

**上颌骨** 巢县人上颌骨齿槽突颌稍显,其前缘轮廓线稍呈隆起,而不像现代人类那样呈平直状或下凹状。鼻骨很宽,鼻前棘很发育。梨状孔下缘呈线型,有较大的鼻阔。鼻腔底则呈椭圆形,与北京猿人的平坦状不同。上颌窦向前展伸,达到相当于第一前臼齿的位置,并向中矢方向展伸,可达上颌腭突。巢县人还有不发达的犬齿齿槽轭等特征。这些形态特征表明,上颌骨所代表的个体属早期智人。研究者推测该下颌骨可能为男性。

**牙齿** 巢县人牙齿的尺寸,都在直立人相应牙齿的变异范围内,无论齿冠还是齿根都比现代人的大而粗壮。牙齿咬合面有丰富的副脊,咬合面纹理比现代人的复杂,牙齿的基部有较发达的扣带。

巢县人的枕骨、上颌骨化石的基本形态具有早期智人的许多典型特征。例如,枕骨骨壁较薄、枕骨曲度较直立人为大、上颌骨鼻前棘发育、门齿孔的位置紧靠齿槽缘、有不发达的犬齿齿槽轭等,都与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的形态明显不同。因此,研究者将巢县人归属于早期智人。



根据巢县人化石地点动物化石种类,可断定巢县人的生存时代略晚于和县人和北京人地点第4层以下的时代,大致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第1~4层的时代或稍晚,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北京猿人地点1~4层的测年数据为距今约23万年。用铀系法测得巢县人生存年代为距今22万年,可见两者的同位素年代是比较吻合的。

巢县人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中,中国鬣狗常栖息于草原或沙漠,獾、犀、肿骨鹿习惯栖息于森林和多水地带,剑齿象、野猪、虎等栖息于森林。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南方种类有剑齿象、獾、犀和中国鬣狗;分布于寒冷地区的北方种类肿骨鹿适应性较强;分布范围广大的种类有猫、獾、豹、熊和野猪。可见,巢县人地点的动物化石中,生活于森林和多水地带的种类占大多数,而且以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动物为主,这反映出巢县人生活时期的气候温暖湿润,为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气温与现在巢县一带相当或稍高。在地理位置上银山一带为低山丘陵地带,有茂密的森林,银山东部和北部为宽阔的平地,银山东北部有裕溪河流经并汇入长江,裕溪河两岸是广阔的旷野,当时有广大的草原和湖泊沼泽。巢县人与和县猿人相距仅40公里,自然生态环境大体上没有多大的差别。

#### 4. 水阳江畔的营地——宁国毛竹山遗址

直立人阶段,人类居无定所,过着一种游动性的生活,当某一处动植物资源被消耗殆尽之时,这里的人类就会成群迁徙到别处生活。长期固定的居所在早期直立人阶段还不存在,晚期直立人则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当时的人类除了利用山洞和岩棚等自然庇护所外,也常在临近水源的地方露天临时生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在考古发掘中,除洞穴外,在河流湖泊的阶地也偶尔能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露天遗址,这些遗址有的较好地保存了当时古人类生活的痕迹,为了解早期人类的露天生活提供了重要信息。

这类遗址国外发现较多,如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的一个地点,在一个距今 180 万年前的人类居住地,发现了一个用玄武岩堆成的圆圈。石圈内空无一物,而圆圈外则布满了许多工具和食物碎屑。这可能是一种临时性栖身之所或是宰杀兽类的季节性居所。在石堆上可能还支撑着一个用树枝搭成的支架,顶部盖草或兽皮。法国地中海沿岸的特雷—阿马塔也发现了直立人搭建的小屋。这类遗址我国目前也有发现,如在湖北荆州的鸡公山遗址,在相当于旧石器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处面积较大的人类活动场所,遗址内旧石器及其加工残碎物比比皆是,其文化层厚达 1 米多。遗址周围系纯黏土层,没有岩石,可见其加工石料来自远处。遗址内不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打制石器、石核和石器废料,而且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在遗址中部有数个由大量石器围成的不规则形空地。鸡公山遗址是一处长期使用并保存完好的石器制作场,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平原居址的空白。在河南许昌的灵井遗址更是发现了一处以屠宰肢解动物为主进而加工使用骨器(含石器)的工作营地。这里出土的骨骼破碎比例在 90% 以上,头骨、趾骨等数量很少,长骨、肋骨等便于加工骨器的骨骼较多,说明制作骨器的骨骼有不少是有被选择地带入的。毛竹山遗址就是一处与鸡公山遗址等类似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遗址,不过时间却要早到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其意义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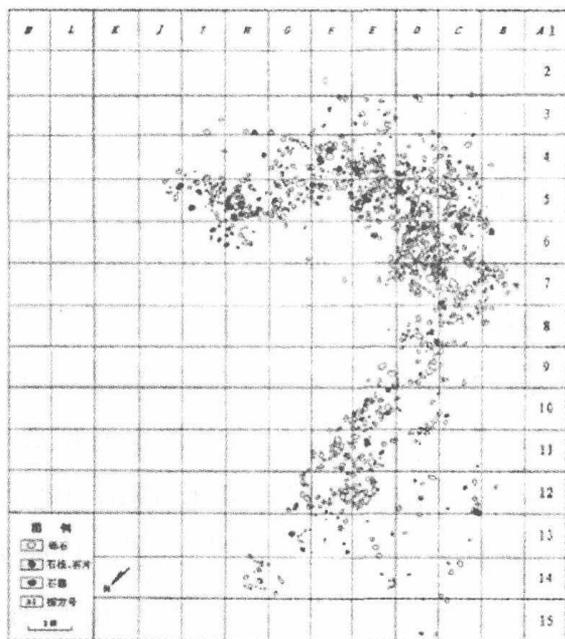
**发掘经过** 水阳江是长江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它发源于浙皖交界的天目山脉,在宁国市东南汇集成东津河、中津河与西津河三条河流,交汇于宁国河沥镇,向西北方向流去。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调查中,曾在水阳江中上游两岸的二级台地上发现数十个石器地点,采集石制品 2000 多件。阶地海拔 40~80 米,高出当地河面 20~30 米。考古学上将这些发现称为“水阳江旧石器文化”。自此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毛竹山遗址位于宁国城区西北 4.5 千米,属河沥溪镇罗溪行政村的桥门村,东距西津河 600 米,距皖赣铁路 150 米,东北距官山旧石器遗址 500 米,西北距宣州市陈山遗址 27 千米。



1996年12月,房迎三等学者在这一带调查时,在桥门窑厂的取土场地上残存的厚10~30厘米的网纹红土底部,看见埋藏着2件石制品和一些砾石,形成断续可见的“砾石层”,同时在场地上采集到几十件石制品。随即进行的勘探初步判断,这里可能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生活面。桥门窑厂取土场在毛竹山的山坡上,地貌部位稍高于西津河第二级阶地的砾石层。1997年11~12月,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宁国市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毛竹山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含旧石器遗迹的出露面积仅3000平方米,经勘探后决定在取土场中部布面积为1平方米的探方195个,结合发掘剖面和窑厂取土剖面将地层自上而下分为4层。野外工作持续了45天,发掘的最大厚度为50厘米。之后又于1998年10月再次对毛竹山遗址进行补充勘探和统计测量。

**主要发现** 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在第2层即网纹红土的底部发现一人类生活遗迹。遗迹大部分覆盖在第3层即灰白色砂质黏土的顶部,少部分直接覆盖砾石层。遗迹的平面形状略呈东西向稍长的半圆形,其长轴约10米、短轴约6米。遗迹中间有东西向4.7米、南北向4米的空白区。不过可惜的是,发掘前空白区范围内面积约1/2的第2层堆积物已被窑厂取土挖走,第3层堆积物已经暴露出来,其余部分经过考古发掘。据工人介绍,他们在空白区内取土时没有见到成堆的砾石。

环带开口稍呈喇叭状,从北向南视,翼稍长,约7.4米,左翼长3.3米。根据遗迹形



毛竹山遗址遗迹分布图

状,暂称之为“砾石环带”。环带体稍有起伏,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倾向与开口方向一致,推测环带的开口可能朝向河流。环带体宽2米左右,由1167件砾石和石制品构成。由于部分砾石风化严重,部分砾石被埋压而无法统计,因此标本的实际数量还应该多一些。环带砾石多数为单层平铺,也有少部分为双层叠置。

环带体上存在一批由砾石和石制品构成的小圈,直径20~40厘米,统计编号20个。半数小圈的内圈呈清晰的圆形,少数内圈不整齐。小圈外缘与其他砾石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直接构成小圈的标本中,9个小圈包含石制品,其中2个小圈各包含2件,其余7个各1件。目视圈内的土质土色与周围的土质土色基本一致,没有发现遗留的灰痕,亦无砾石和石制品发现。这些小圈当时是否被作为柱洞使用,目前已对小圈内土质做过检测,但未测出与圈外土质有成分上的异常,但考虑到这里的土壤为酸性,又经过几十万年的时间,各种成分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小圈的作用尚待讨论。

考虑到砾石环带的规模及其中包含的大量石制品,可以断定,这里应是一处人工堆积,是古人类从较大范围的下伏砾石层中挑选和有意识地堆积起来的。遗址的年代,用电子自旋共振法(ESR)进行了年代测定,距今约60万年。此类现象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尚属首次发现,可能属于储料场和石器制造场,也可能还有其他用途。毛竹山遗迹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露天生活的珍贵材料和重要信息。



##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迄今已有 70 年历史。70 年来,安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根据历年的考古调查,目前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400 余处,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发掘的近 50 处,其中潜山薛家岗、含山凌家滩、蒙城尉迟寺三处重要遗址先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有多处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重大发现又接踵而来,怀宁孙家城、蚌埠禹墟、固镇垓下遗址又先后入围或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苦工作,可以说,安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遍布全省各地。

就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而言,在 1979 年以前工作一直都限于零散的田野调查,经过发掘的面积总和不过百余平方米,田野发掘近乎空白,有关研究也十分薄弱。1979 年潜山薛家岗、含山大城墩等遗址的相继大规模发掘,才真正揭开了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篇章。

从 1979 年开始,以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发掘为起点,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尤其是田野发掘蓬勃开展,重要遗址相继发现。据粗略统计,已发掘面积超过了 20000 平方米。

在皖西南,1979 年春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是安徽大规模考古发掘之序幕。经过连续 4 年的发掘,到 1982 年共揭露面积约 2200 平方米,2000 年又经过了一次补充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 150 座,出土遗物约 1600 件,初步确立了这一区域自 6000 年前至龙山时代的年代标尺,并以此命名了安徽第一支史前文化——薛家岗文化。其后在周边地区发掘的一系列遗址,进一步充实了薛家岗文化的内涵,围绕着薛家岗文化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工作也开展起来。

1979 ~ 1984 年四次发掘含山大城墩遗址,面积达 960 平方米,陶器

具有地方特征。肥西古埂也发现以夹砂红陶为主的早期遗存和以黑陶为特点的晚期遗存。尤其重要的是1987、1998、2000年四次发掘的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60余座墓葬和1处大型祭坛,出土千余件珍贵的玉、石、玛瑙、水晶器,成为安徽乃至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发现使以巢湖为中心的环巢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逐渐显现出来,为探索环巢湖地区的文化变迁和文明演化的过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淮北和沿淮地区,1982年发掘亳县富庄遗址,发现1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包括4座合葬墓,它们与大汶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又具有自身的明显特点,是大汶口文化一种新的类型。1985~1986年发掘的定远侯家寨遗址,总体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1986~1992年又发掘了蚌埠双墩遗址,与侯家寨下层相似,并出土数百片带刻纹陶片,年代在距今7000年左右。从1987年开始,根据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苏鲁豫皖区域考古的指导思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淮北课题组,先后对萧县、泗县、灵璧、宿县、淮南、蚌埠等地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发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从1989年开始在淮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除田野调查外,还发掘了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蒙城尉迟寺。上述工作使得淮北和沿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特别是小山口、古台寺、双墩、石山子的发掘,为寻找安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而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完整聚落和大型排房的发现,也是安徽近年最重要的发掘成果之一。

在一直为人忽视的皖南地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也有所开展。据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四五十处。这一区域经过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集中在新安江流域和黄山附近。通过这些工作,发现了一批既有地方特色又具有少量良渚文化因素的器物群。沿江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几乎是空白,但2003年在马鞍山发掘的烟墩山遗址发现了一批年代上相当于崧泽时期的墓葬,为研究长江南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由于一系列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原先呈空白状态的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逐渐展现其轮廓,研究工作也随之深入。通过这些研究,安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已逐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 1. 神秘的刻画符号——蚌埠双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指的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除此之外,制陶业、农业、畜牧业也是考察一个地区是否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历中石器时代过渡而发展起来。世界各个区域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早晚不一,最早的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一般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西亚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之一,也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西亚地区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壕沟,墙内有石砌的瞭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

东亚的日本也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些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

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

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如湖南省道县玉蟾岩等遗址,年代均在距今1万年甚至更早,这里发现有原始陶器而无磨制石器。现已发现的有陶器和少量磨制石器的遗址,华北地区有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阳原县于家沟,华南地区有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这些新石器遗址年代一般在距今12000~8000年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些遗址的发现,为探讨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家畜的起源、制陶术的发明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蚌埠双墩遗址年代距今73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前7500~前5000)。这一时期的遗址在我国的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均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发现,如黄河中游地区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或可统称为“前仰韶文化”;长江流域以湖南的彭头山文化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石器已发展至以磨制石器为主,从局部磨光发展至通体磨光。陶器制作技术还稍显原始,器形不太规整,陶胎往往厚薄不均,这是由于慢轮制陶的技术尚未出现。新石器中期原始农业逐渐发展,黄河流域已普遍种植粟,长江流域以种植水稻为主。六畜,尤其是猪在这一时期已经较为普遍饲养,说明农业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在这一时期的几处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刻画符号。最早的莫过于河南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前。在贾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16例刻画而成的符号。这些符号分别刻于14件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其中龟甲符号9例、骨器符号2例、石器符号2例、陶器符号3例。有些从其形状看,具有多笔组成的结构,应承载契刻者的一定意图。如刻于龟下腹甲右侧的近似甲骨文的“目”字等。关于这些符号的性质,发掘者认为具有原始的性质,与商代甲骨文有某种联系,而且很有可能是汉字的滥觞。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甚至作出了“在中国河南贾湖发现的乌龟壳上的符号,很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的大胆评论。新石器晚期,刻画符号的发现更是屡见不鲜,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甚至出现了成组的刻画符号。

安徽蚌埠双墩、定远侯家寨等沿淮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也发现了刻画于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数量巨大,一经发现即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发掘经过** 双墩遗址所在地隶属蚌埠市小蚌埠镇双墩村,该村名的由来,是因村内有两座高出现在地表6米左右的古墓封土堆而得名,也即本书其后所述的钟离国墓葬。双墩遗址的地理位置在蚌埠市淮河北侧,向南直线距离淮河3.5千米,东北距北淝河2.5千米。遗址的具体位置在双墩村北侧的一个台地上。现在遗址保存范围大体上为南北长180米左右,东西宽140米左右,约25200平方米,而遗址台地的面积(也是遗址的中心区)约10000平方米。

1985年全国进行文物大普查,蚌埠市博物馆于当年11月份在市区双墩村进行实地文物调查,从采集到的陶片、石斧等文化遗物看,该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时,该遗址已经受到当地人们历代葬坟(即乱葬岗)、耕种、取土、整平做麦场等活动的破坏。1986年秋,蚌埠市博物馆高和平、郑保民等同志对双墩遗址进行了一次钻探及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首次发掘是从遗址的边缘地带开始的,遗址东南部有一个较大的凹沟,考古人员沿着这条由西北向东南延伸,宽40多米、深2.5米多的凹沟开始了发掘工作。铲去第一层耕土后,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一条条前后排列的不同土色带,从遗址表面上很难判断出土色带是灰坑



双墩遗址



发掘现场

还是地层。考古人员只好进行纵向解剖,从断面上能清晰地看到,凹沟是由早期居住在台地上的先民倾倒垃圾堆积而成的,共有 32 层,每层前后倾斜堆积,并非垂直上下叠压。在这些积层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活动遗迹,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文化遗物有陶片、残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红烧土建筑遗存、动物骨骼、大量的螺蚌壳等,种类繁多。在其后的整理工作中,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器底有刻画符号现象,经过将百余袋陶片翻检一遍后,共拣出带有刻画符号的器底 252 件,约占总数的 62.7%。

1991 年 5 月 1 日~9 月 3 日和 1992 年 10 月 10 日~12 月 7 日又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两次的发掘点均紧挨着 1986 年蚌埠市博物馆发掘的地方。通过发掘发现这里是一个较大的沟形洼地,文化层堆积呈斜坡状,虽然都是移动性堆积,但文化层的层次明显,内涵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1991 年的那次发掘工作遇上发大水,6 月 12 日上午结束野外发掘工作,下午就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暴雨和大雨,给淮河流域带来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发掘工地也被大水围困而停工,直至 2 个月后水退才再次进入工地进行初步发掘整理和探方小结工作。三次发掘均位于中心区的台地东南部,发掘结果证明,这里是遗址台地南缘的一条凹沟。2003 年蚌埠市博物馆又对双墩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钻探工作,基本弄清了该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情况。目前,双墩遗址已正式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要发现** 双墩遗址发现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既有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又有大批刻画符号和泥塑艺术品。陶器器形以炊器釜、支架、器座、罐、碗、钵等为主,流行红色彩绘和器底刻画符号。支架和器座是放置器皿的底座,在双墩遗址大量发现,这在其他同类遗址和其他文化中少见。红色彩陶在双墩遗址中普遍使用,主要是用在一种碗形钵上,一般都是在外面满施红彩,也有内外均满施的,也有内满施外不施彩的,也有在罐口、钵口部施彩的,几乎没有图案。陶制的网坠数量多,其形制与今相同,在其他遗址中有少量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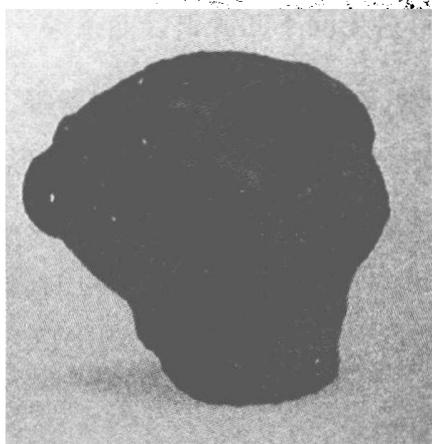
双墩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泥塑艺术品,其中一件人头像为夹蚌末红褐色粗陶,采用捏制、堆贴加刻画的方法,两颊各戳印着5个排列整齐的小圆窝,额头上刻画重圆纹,有人认为这是一幅渗透着稚嫩气息的纹面孩童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双墩遗址的骨器、角器多为小型工具、用具和少量饰件等,有锥、针、镞、标、鱼钩、鹿角钩形器等,比较精细的是骨针的磨制和穿孔技术。鹿角钩形器在遗址中大量出土,它的制作技术复杂,费时费力,在同类遗址中只有少量发现,其作用可能是采集的工具。

用水蚌壳制作的工具,也在双墩遗址大量发现,有些制作相当精细。特别是发现的一把带柄的方头锯,其通体磨光,长11.8厘米,锯身长6厘米,宽4.6厘米。锯子的发明充分体现了先人的聪明才智。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水生、陆生动物骨骼和介壳,充分反映了渔猎经济在双墩遗址时期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当时淮河流域气候的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

刻画符号是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中具有特殊特征的文化遗物。在发掘的3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617件刻画符号,这些器物不仅年代早、数量多,而且刻画的符号内容也非常丰富,这在目前国内是罕见



双墩遗址出土陶塑人面像



鹿角靴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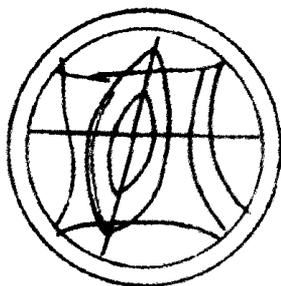
的。刻画符号的出土情况为：双墩遗址的三次发掘均位于现存遗址东侧的凹沟中，沟中填满了移动性文化废弃堆积物，地层堆积呈斜坡状。这些刻有符号的陶器就出土在这样的文化地层中，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废弃物堆积在一起。我们发现，这些刻画符号没有被当时人们作为特殊品保管起来或另行处理，而是随着其所依附的器物的破碎被扔掉了，混杂埋藏于各个文化地层中。

出土时，刻有这些符号的陶器，均因为损毁不能使用，而和其他破碎陶器扔在了一起，并且，因为当时人们对废弃物的移（翻）动，更增加了陶器的破碎程度。因此，刻在陶器上的符号随着器物的破碎除少数完整或基本完整外，大多数符号已经残缺不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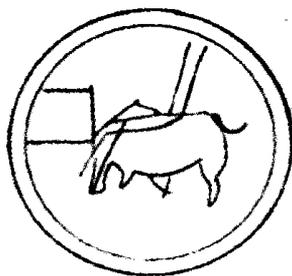
绝大多数符号是刻画或压画在一种钵形碗或碗的外底部圈足内，仅有极少数符号是刻画在缸底、钵底或豆圈足等器物的不同部位上的。而刻有各种符号的碗的外腹部都有从圈足向上的四道放射状刻道，从这个角度讲，碗底的刻画符号又都与这种腹部放射状刻道组成了组合符号。

从各种符号的形体和刻画手法可以看出，刻画者技法娴熟，对所刻画的单体、组合符号十分熟悉。刻画时起笔和收笔有一定的顺序和讲究，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运笔习惯，应该说是一种比较规范和成熟的刻法。其符号多为刻画或压画，呈阴文，还有一些拟用剔刻或用其他办法刻成的符号，为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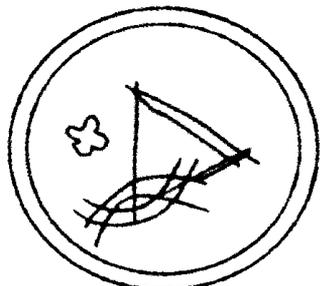
双墩遗址刻画符号不仅数量多，而且符号本身也非常复杂，有单体符号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重叠符号，还有两个以上的单体符号组成的组合符号等。从符号的形体看，有象形的猪、鱼、鹿等，有会意的花等组合，有指事的圆圈、方框、半框等等。刻符中的象形、表意、表事的符号特征比较明显，但是，还应该有更多的示意内容有待研究。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可分为植物类、动物类、几何类、自然类等。从双墩刻画符号的分类比例看，当时的主要经济形态中捕捞业约占 68%，狩猎业约 15%，采集与种植约占 7%，其他类约占 10%。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已经有了水稻种植、家畜饲养以及采集活动作为补充，但渔猎经济依然占绝对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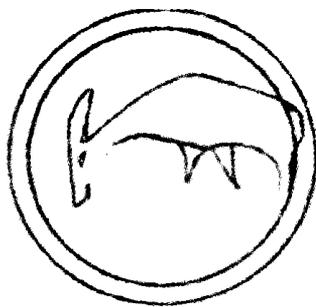
渔网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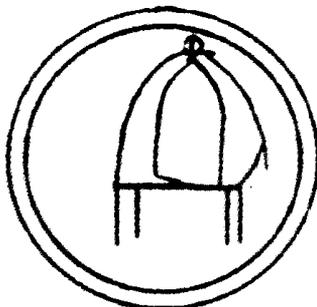
猎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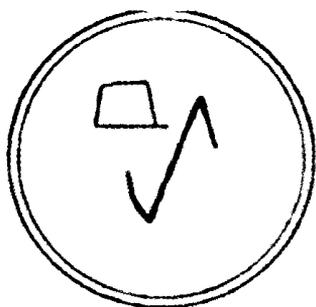
刺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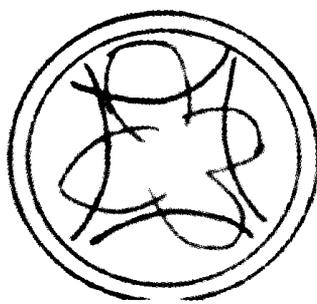
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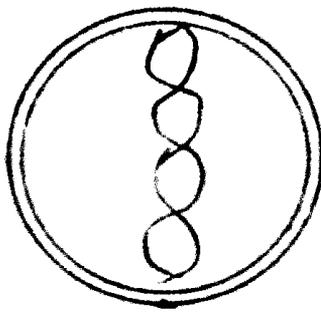
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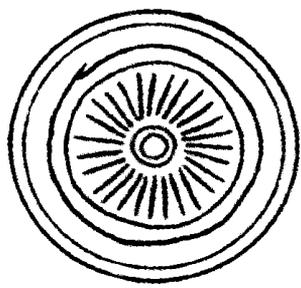
钩、框形



网与四叶花



丝束图



太阳纹

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所表现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经济生产密切相关,如捕鱼、猎野猪、网鸟、俘鹿、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等,还有与此相关联的各种渔猎工具,如陷阱、网具、矛、叉、弓箭等。这些刻画符号有写实、简化和抽象等表现形式。有一些符号分别表现狩猎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起到类似“连环画”的作用。还有一些符号反映了多种捕鱼和狩猎的方法。在蚕形刻画中表现了吐丝结茧、蚕茧上架、化蛹成蛾的过程。家猪的刻画形态准确,与野猪有明显的区别,说明家猪饲养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猪类与自然类刻画符号实物

另一部分刻画符号是表现地理位置、居住形式、自然现象、物候历法以及纪事、计数等内容,均与双墩先民的生产生活和原始崇拜有关,如山川、河流、太阳、房屋、四叶花和几何形符号等。像四叶花作为固定的符号分别与捕鱼、狩猎、养蚕等构图组合,具有物候历法的意义。而房屋刻画则反映了双墩先民居住的是“巢居”形的干栏式建筑。太阳纹的刻画有多种表现形式,有单圆圈形、同心圆形、半同心圆形等;太阳的光芒有射线形、三角形等。几何形刻画符号中有十字形、三角形、五角形、六角形、方框形、网格形和菱形网纹等,笔画有重复递增的现象。还有一些刻画符号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基本相似或完全相同,显示出它与汉文字的渊源关系。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内容之丰富是同时期任何遗址都无法相比的,它几乎涵盖了双墩先民生产、生活、精神方面的全部内容,构成了双墩文化极其重要的内涵。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大约可以形成一幅 7000 年前的双墩人生产生

活的场景。当时存在着以农业和渔猎为主,采集和饲养猪为辅的多种经济社会形态。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稻壳痕,经鉴定为栽培水稻,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些石制、骨制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

## 2. 安徽首支考古学文化——潜山薛家岗文化

距今约7000~5000年的人类文化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一时期的史前遗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发现,以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等最具代表性。

与前期文化相比,新石器晚期文化、经济更加繁荣。在制陶工艺上,已逐步从手制过渡到慢轮制作,陶器形制比较规整,胎壁厚薄均匀,器形也更加丰富多样,彩陶也在各种文化间普遍出现。由于窑炉结构的改善,烧窑温度提高明显,这一时期的陶器显得更加细密、精致。原始农业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农作物种类更加丰富,产量明显提高上,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都得到了改进。

房屋建造方式由半地穴式向地面式建筑发展,墙体多为木骨泥墙,后来开始出现土坯墙;居住面由硬土面、草拌泥进而再涂抹光洁的白灰面;房屋柱础为夯砸陶片垫底,置放础石或木板等;由于建筑技术的进步,房屋形制更加富有变化,间架形式有单间、套间甚至多间的排房。由于气候差异,各地建筑风格也不是完全一致,像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就是为了适应南方的潮湿天气而设计建筑的,而西部地区由于干燥少雨,也出现了和今天的窑洞类似的建筑。

这一时期的村庄规模日趋扩大,功能分区也更加细化,像仰韶文化的姜寨聚落(遗址)是由住区、窑厂和墓地组成,居住面积约1.9万平方米,有壕沟和小河环绕,共120座房屋。此外,在晚期的后段已经开始出现城址,这是史前聚落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考古学中所讲的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

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薛家岗文化就是这样一支位于皖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其主体时间上属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中晚段,距今 5500~4600 年,它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积极意义。从地理位置上看,皖西南区属于长江流域,是一片顺着长江的流向呈东北—西南向的长条区域,主要在长江北岸的大别山东南麓。区域内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为大别山区,东南为长江和其支流潜水、皖水等在这一带作用后形成的狭长的洪冲积平原,并有大别山的部分余脉点缀其间。这一带地势地平,河湖密布,属于较典型的浅水湖泊,沿湖的低地海拔一般仅 10 余米,习惯上称为圩畝地区。主要的河流有大沙河、皖河及其上游的潜水、皖水、长河,另外还有诸多小河流。这些河、湖基本上都通往长江。

该区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南北向看,这里处于自淮河中下游南下进入长江中游和赣江下游的交通走廊的位置;从东西向看,是湖北与安徽、江苏之间交通的咽喉要道。若从宏观角度观察,以长江为纽带,以安庆地区、九江地区为中心,可将整个长江中游、下游紧密地联系起来,也将淮河、赣江流域联系起来,因而形成了东西方向上可沟通江汉平原与宁镇丘陵、太湖平原,南北方向上可沟通黄淮平原与赣北盆地乃至广大的华南地区的一个十字轴心,按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的划分,它正处于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这样四个大的文化区系的中间地带,因此,它在原始文化交流中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薛家岗文化是分布于皖西南、鄂东、赣北鄱阳湖周围局部地区的一支原始文化,四至范围大体上可确定为北界基本上不出大沙河河流域,东界大体上应不超出菜籽湖、白荡湖一带,东南可能会分布到安庆对岸长江以南的沿江地带,南部可到长江以南的鄱阳湖周围,西部止于湖北蕲春县蕲水以东;其主体部分以皖河流域为中心,在西起蕲水以东、东至枞阳以西的长江两岸的平原和山前地带呈“V”字形分布,晚期则伸入到了

部分山区；其分布特点是基本上沿长江北岸分布在大别山东南麓的两翼，向南或可跨过长江，但也仅局限于沿江，最南不会超过鄱阳湖南岸一线。这样的分布形态颇异于全国其他新石器文化，或许可以说明它的分布既受大别山和长江的限制，也与长江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整个文化的形成和经济特点都与长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目前薛家岗文化已发现了几十处该文化的遗址，经过试掘或正式发掘的也有 10 余处。

**发掘经过** 薛家岗遗址属于皖西南地区，位于潜山县王河镇永岗村，遗址处在一条呈东西走向的狭长山冈上，海拔高度 20 米左右，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主要有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两个时期的堆积，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体，文化延续的时间较长，最早距今有 5500 多年。它是我省最早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之一，也是我省第一支经过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薛家岗文化的命名所在地（薛家岗遗址为这一支文化首次发现的地点）。1979 年以来，该遗址先后进行了 6 次发掘，揭露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出土文物近 3000 件。目前该遗址发掘区域属墓葬区。

1977 年 11 月，安徽省文物工作队为安庆地区文化局举办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参加培训的潜山县文化馆余本爱在培训结束后，回到潜山着手准备调查。他听说在利华村的古城山有一古洞，便随即前往，不过并未发现文物，后听说一农民家中有带圆孔的石头，就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薛家岗这个地点，并在取土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灰坑，内含陶片



1979 年薛家岗遗址发掘现场

和网坠,随后又在断面上掏出一件五孔石刀,当时调查者判断这是一处商代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返回县城后,余本爱给省文物队的专家发了一份电报,请求派人来调查。1978年5月,卢茂村、阚绪杭来到潜山,在当地工作者的陪同下,于11日来到薛家岗遗址,采集到较多的鼎足、鬲足和石器等,确认这是一处内涵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初步将此处定为一处面积约4.48万平方米的新石器至唐宋石器的遗址。由于遗址的重要性,省文物局决定任命具有一定发掘经验的杨德标负责薛家岗遗址的发掘工作。作为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大面积正式发掘,发掘工作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视。

除第六次发掘(2000年10~11月)时间较晚外,其余五次均在1976年至1982年间完成。第一次发掘从1979年3月开始,当时发掘队一行5人组成的考古队,住宿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晚上没有电灯,而煤油是计划供应,为了节约燃油,一间房屋也只能点一盏煤油灯。发掘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只能边干边学。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出现在4月9日,5号探方有人大叫一声:“快来呀,出宝了!”工地上所有人一下子都被吸引过去,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探方围得水泄不通。原来这里发掘出一件七孔石刀,下面还叠压着两件单孔石钺,旁边还有玉管、玉璜等器物,明显属于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所有。

第二次发掘始于同年9月,当时气温高达36度,工作条件相当艰苦,经过2个星期的发掘,收获超出预期。10月11日在相邻的两处探方内连续出土了一件十一孔石刀和十三孔石刀,器形硕大,上面的彩绘花纹还依稀可辨。大家的热情一下子被推向了一个高潮。薛家岗遗址的重大发现的消息犹如长了翅膀一样被传往县里、省里,来这里参观、指导的领导和媒体络绎不绝。这样也就促成了下几次发掘的开始。

第三次发掘工作开始于1980年春季,此次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重视,时任副局长的黄景略亲临遗址指导工作。此次工作的主要精力着眼于地层的变化、墓葬的形制和遗址遗物的分期。整个野外工作进行了2个多月,工作者个个脸上都被晒得黝黑,但大家都没有怨言,一心扑

在发掘上。1981年9月,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由于总结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发掘工作更加细致有效,生活上也略有改善。

第五次发掘是配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实习而进行的,于1982年9月开始,当时整个考古队30余人,加上50多名民工,犹如一处小型基建工地,场面颇为壮观。这次布方19个,工作的重点是找墓坑,围绕着这件事,当时发掘者还关注到当地奇特的葬俗。原来潜山一带,凡是正常生病死亡的人,尸体要停放在家中3天才能出殡。在出殡前一晚,村子里有几个人和道士一起深夜挨村游一趟,敲锣打鼓放鞭炮、散纸钱,以示向死者告别。第三天晚上,才能将棺材抬到薛家岗遗址的高地上,棺材下垫一层灰砖或土坯,将棺木放置于上,棺周围再用竹子一类的东西简单围一下,但棺材两头不能包裹。3年后,其家人将棺内骨头取走,用一个小棺材装好,再挖穴埋葬。但非正常死亡的人,必须即死即葬,不能进行二次葬。

**重要发现** 遗址经过六次发掘,实际总发掘面积达到2467.75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址3座、墓葬150座及其他遗迹,遗物1200件左右。墓葬排列有序,可分几个墓群和墓列,墓葬方向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多数墓葬未找到墓坑,有坑者均为长方形竖穴。

墓葬中出土了陶器、石器、玉器等器物。通过这些器物我们发现这里早期生活用具多,生产工具少,石器制作工艺粗劣,钻孔技术不发达。到了薛家岗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较大的改变: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数量增多,种类齐全且制作精美。

石质生产工具和玉饰切割工艺成熟。石器的打磨、抛光技术较为成熟,而钻孔定位技术则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玉石制造业是薛家岗遗址最主要的工业之一,在墓葬中数量占1/3之多,但种类并不丰富,石器主要为刀、钺、镞三类,其中石刀绝大多数为多孔,钻孔数量基本为奇数,以三至七孔多见,一孔、二孔及七孔以上数量较少。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同时发现4件多孔石刀,以一把十三孔石刀极为罕见,该刀刃长50厘米,两端宽分别为11厘米和9厘米,厚仅0.6厘米。制作工艺精美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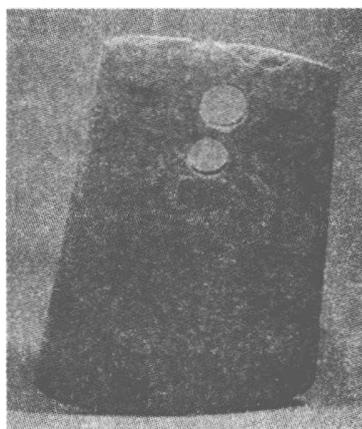
盘形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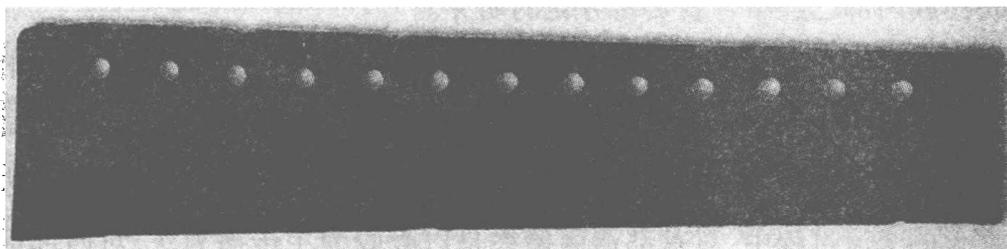
壶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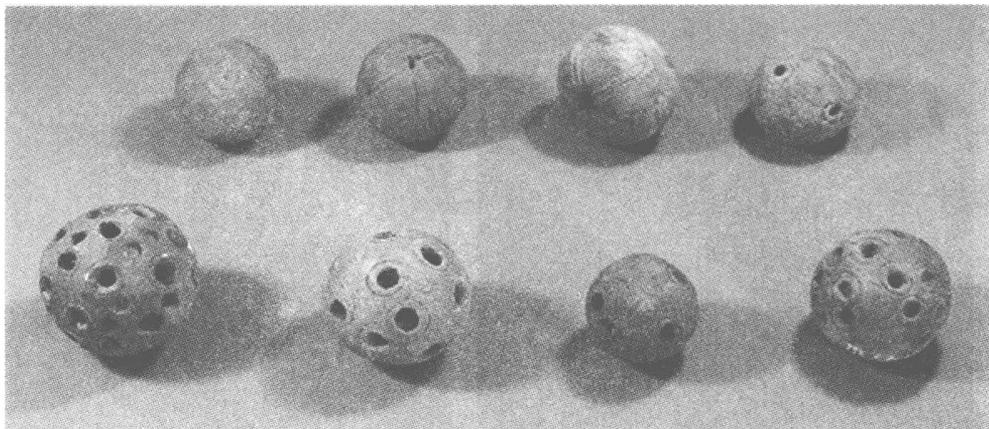
玉璜



彩绘石钺



十三孔石刀



陶球

玉器种类主要有钺、镯、璜、坠饰、管等,以器体较小的坠饰、管占大多数。

陶器手轮兼制,器形规整,厚薄均匀。器物组合以鼎、豆、壶、盆、纺轮、陶球为主,其中鼎、壶为最主要器类,碗的数量较少。鼎、豆、壶、盆、纺轮、陶球在墓葬中常有2件以上同类器一同随葬的现象。陶球是薛家岗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类之一。绝大多数体内中空,内有小陶丸,器表常镂孔或戳印盲孔,镂孔具有一定规律性,常表现为经纬线的形式,个别还有彩绘。其中最大的一件最大直径达到8.4厘米。

此外,薛家岗人有着较高的审美欣赏水平,如陶器造型优美,纹饰图案形式多样;石器尤以多孔石刀最具特色,穿孔周围绘有规整的花果形图案,这是目前国内外绝无仅有的。陶球也是发现较多的器物类型之一。有3座墓特意用猪下颌骨随葬,由民族学资料可知,此类做法是将猪下颌骨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物,以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地位。这反映氏族内部已经孕育着贫富分化的萌芽。

从薛家岗及其周边遗址的发现看,薛家岗文化在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一直与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与东部的太湖流域和宁镇地区的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对东部地区始终是以吸收为主传播为次,对西部地区是吸收与传播并重,对南部地区是以传播为主,对北部地区的交流则一直持续而零散,最终却可能因北部的大量文化因素南下兼因东、西两

地文化因素的进入而消亡。所以,薛家岗文化变迁的全过程始终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也是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三大文化圈之间大规模文化交流场景的缩写。

### 3. 中华原始第一村——蒙城尉迟寺遗址

尉迟寺遗址距今 4800 ~ 4300 年,为一处新石器晚期大型围壕聚落遗址。这一时期,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繁荣高涨,人类的聚居村落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分布密集,而且规模也很大,大型聚落有百万平方米以上,一般也有 10 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房屋数量众多,有的达几十座之多。

这一时期的聚落有一定的规划,像上篇提及的仰韶姜寨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 100 多座房屋,以遗址中心广场为中心,分为 5 组建筑群,每组中也是以一座大型房子为主体,其周围分布有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所有房屋均朝向中心广场。房屋面积差别很大,分为大、中、小三种,大者可达 90 平方米,小的还不到 10 平方米。每组房屋附近分布着成群的窖穴,先后埋有约 150 座儿童瓮棺葬。大房子附近设有牲畜圈栏和牲畜夜宿场各两处。村西河旁原有陶窑群,壕沟外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专设三片公共墓地,有 170 多座土坑墓(多属成人)和 50 多座儿童瓮棺葬。据分析,姜寨聚落是由若干家族组成的 5 个氏族公社,聚居一起又形成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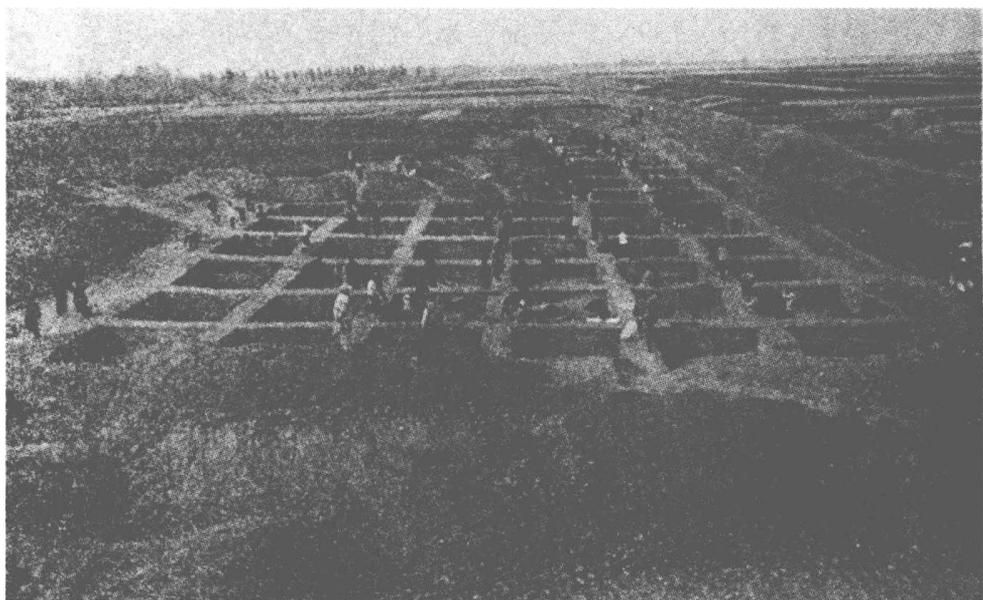
人类营造住室,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山洞到露天营造房屋,从地穴式到半地穴式直至地面式房屋,人类经过了漫长的摸索。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出现了较多连间式建筑,如在河南南阳八里岗遗址,发现了中国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排房式建筑基址 30 余座,每套房面积相若,陶器、石器等仍散布在部分室内。每套房屋通常是前后一大一小的两间,有的是一大二小的三间,大间面积 14 ~ 19 平方米,小间约 4 ~ 8 平方米,大小间均有门相通,各套一般都分别在南

北墙开门直通户外而别无门厅。这种大房子可能是居住着几对夫妻所组成的较大家族；在同一排房中生活的，大体是由几个家族所组成的同氏族公社成员。在陕西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上百座平地起建的单室中小型的长方形或方形房子，可分为若干群，门向东北或西北，面积多在20平方米左右。同时，存在着罕见的大型（F405）和特大型（F901）的宏伟建筑，F901雄踞遗址北部高处，由主室、后室和东西两侧室相连构成，占地总面积290多平方米。主室长方形，坐北朝南，室内面积126平方米，强烈显示出中心聚落的性质。

尉迟寺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年代较姜寨遗址晚数百年，这一时期的聚落布局乃至房屋建筑技术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尉迟寺遗址中，死去的婴儿或儿童，通常用瓮棺埋葬，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葬俗呢？瓮棺葬是出现于新石器时期时代，以瓮、罐一类陶器做葬具的墓葬形式，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一般用2件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居住面下，也有专门的儿童瓮棺墓地。这些陶瓮以及瓮盖通常不是专门烧制的，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储物器随机拿来用于埋葬之用。因此，出土的瓮棺规格不同，形状各异，其中瓮盖也是由陶片、陶钵以及陶盆等随机组成的。众多的儿童瓮棺墓，既显示出当时社会生活水平低下，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现象，也说明儿童受到了特别的照顾。此外，很多瓮棺底部或用做棺盖的盆上，大多有一个小孔，有的被钻成很规则的圆形，有的则是被敲击成不规则的形状，小孔上往往还加盖一块小陶片，其内表面还涂有红色颜料。婴幼儿瓮棺葬多出现在居住区，以防止野兽对小孩子尸体的伤害，体现当时人们对小孩子的体贴和爱护，再或是因小孩太小，未行“成丁礼”，故不能埋进本族成年人的公共墓地。也有研究者认为瓮棺是死者实现转生前所居的模拟“子宫”，成人瓮棺葬的墓主是某些原始氏族部落的精英人物，用瓮棺葬埋葬这些精英和夭折的儿童是为了加速死者的二次转生。

**发掘经过**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1986年蒙城县文物管理所调查发现。遗址处在黄河与淮河长期堆积泥沙形成



尉迟寺遗址发掘现场

的淮北平原上,现为高出地面 2~3 米的囤堆状堆积。由于当地村民常年取土,现整个遗址东西长约 350 米、南北宽约 250 米,总面积约 8 万平方米。囤堆顶部有一处寺庙建筑基址,相传是为了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尉迟寺”因此而得名。

1988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1989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再度调查,同年秋季开始对尉迟寺遗址进行发掘,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处堆积保存较好、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特征明显的遗存。到 1992 年扩大了发掘面积,并在该遗址中揭露出一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型排房基址,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并于 1994 年就第一阶段发掘成果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尉迟寺遗址的发掘意义非凡,它是研究大汶口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项重大突破,同时也是新石器聚落考古的重大突破,其发掘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几十年未见的完整聚落空白,而且还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遗址也是大汶口已发掘遗址中最南的一处,这也扩展了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的研究范围。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全面揭露尉迟寺遗址,以获得完整的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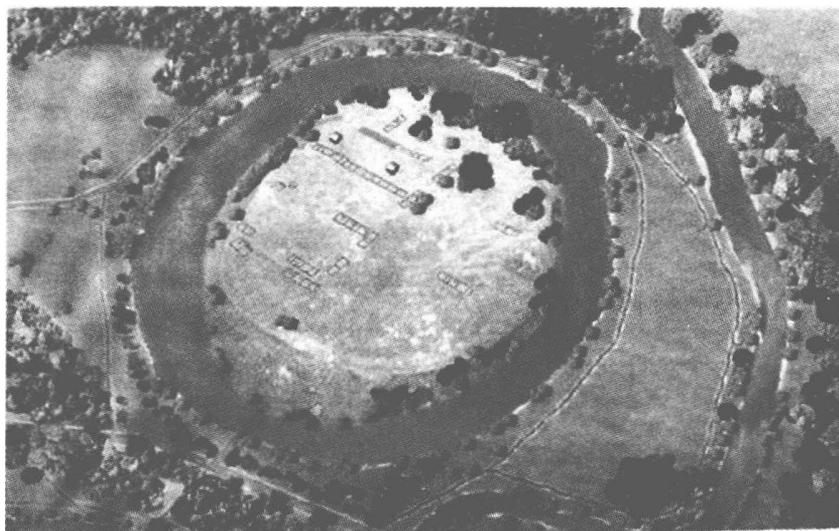
料。第一阶段(1989~1995)的发掘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2000年12月,著名相声艺术家牛群出任蒙城县副县长,身为文化人的他对文化事业格外关注。上任后第二天,他就到蒙城县文物局所在地文庙参观。在这里,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吸引了牛群的目光。在了解了遗址情况后,他表示出极大兴趣,说没想到蒙城还有这样一块宝贝疙瘩。次日,牛县长亲自带队前往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尉迟寺遗址考察。面对满地表的陶片,他感到很惊讶,并嘱咐当地领导说:“这是宝贝,咱们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地下全是宝。你们可要保护好,不能有任何破坏。”牛群的重视使得因为经费问题停顿了5年之久的尉迟寺遗址发掘工作有了转机。2001年,牛群代表蒙城县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签订了发掘协议书,并亲任组长,为发掘工作奠定了基础,使得这处近5000年的史前遗址得以再现昔日辉煌。

第二阶段的发掘共进行了四次,揭露面积3375平方米,清理出大汶口文化红烧土建筑5排8组32间、较大型红烧土广场2处、墓葬92座,龙山文化红烧土建筑1排4间、墓葬12座。其中大汶口文化长达近70米的13间排房、大型活动广场、多件大口瓮组合祭祀现象、鸟形神器、七足镂空器等皆为第一阶段所不见。

**重要发现** 尉迟寺遗址经过数次发掘,已经基本廓清其聚落的布局情况。主要遗迹有围沟、排房、广场、墓葬等,出土遗物有陶、石、蚌、骨等类。

通过调查发现,与尉迟寺遗址相距一二十公里的范围内,同属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址还有15处。按遗址面积大小,尉迟寺为唯一有10万平方米的一级中心聚落,其他分别为2.5万~3.5万平方米、1万平方米左右的第二、三级聚落。尉迟寺遗址周围有一条大型环形围沟,围沟近似椭圆形,南北跨度约230米、东西跨度为200米、沟宽约20米、深4.5米左右,紧紧围绕遗址中心区,经过清理发现,最深处达9.65米,宽一般为25~26米。据研究,它的形成时代当为大汶口文化晚期。根据其规模,它的性质及作用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起到界定范围的作用,另外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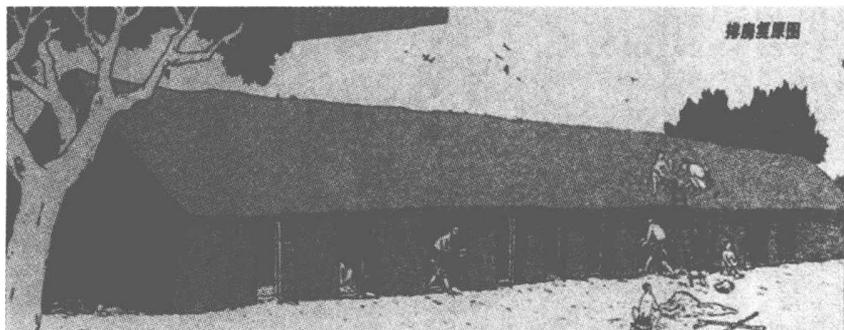
尉迟寺遗址复原图



红烧土排房

能也有防御的功能。围沟的工程量也大得惊人,如果把沟的宽度平均按25米计算,可知围壕的面积为10250平方米。如果再把沟的平均深度按4.5米计算,那么,围壕内的土方量为46125立方米,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如果不用现代的挖掘机,300人最少要干上一两年。尉迟寺遗址大型围沟的发现,在大汶口文化中属首次,填补了大汶口文化研究的空白,它为研究淮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性质、社会组





排房复原图

织结构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大型红烧土排房是该遗址一大特征,在古代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围壕内目前发现大型成组的红烧土房基 10 余排,规划合理,错落有致,这些房子都是两间以上的组合形式,最长的由 13 间构成一排,长度为 70 米。这些建筑在围壕之内组成了一个分布排列有序的红烧土建筑群。大部分基址门朝西南,朝着围沟出口方向,每排房由数量不等的房间组成,中有隔墙。各房间一般在 10 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近 20 平方米。墙体为木骨泥墙,房顶也是用木棍编扎糊泥而成,搭建完毕经火烧烤,通体呈红色。各房址由墙壁、门、居住面、灶、室内柱及屋顶六个部分构成。为了探明红烧土房的建造过程,人们曾进行过一次模拟考古实验,他们按照当年的“木骨泥墙”方法做了一个长、宽各 2 米,高 1.5 米的小房子,用木材烧四十几个小时。最后,房子是烧成了,但是硬度却远远不如 5000 年前的土房子坚硬,可想而知,当年的人们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留下了今天仍然让人叹服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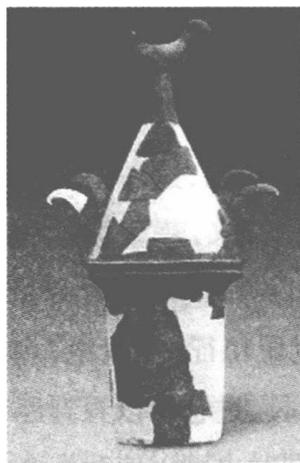
墙体分为主墙与隔墙两种,主墙指环绕建筑基址四周的外墙,是先在整個房基范围内挖出浅穴,再沿穴壁挖墙基槽,然后主柱、抹泥形成墙体并经烧烤。主墙为承重墙,厚一般为 35 厘米左右,现存高度从居住面往上为 30 ~ 50 厘米之间。墙里表面光平,经过烧烤穴壁形成红褐色硬土。在靠近墙壁的居住面上,常见有室内柱,起加固支撑作用。从倒塌的屋顶残块看,屋顶纵向敷设木棍,从室内外抹泥,形成平滑的一面坡室

顶。当时出现了较为“现代”的门,不仅有门槛还有门框,面积大的房子还设有双门。

室内居住面也经过烧烤,相当平整、坚硬。室内也注意装饰,部分内墙刷白灰面,经测量,白灰面仅为0.3厘米厚。有的墙体除涂白灰外,还涂有一层红彩,起到了一定的装饰效果。每间房子的中间偏后有方形室内平台,平台有的与后墙接触,多在前两角立有木柱;有的平台与后墙分开,多在四角立有木柱。红烧土的室内平台做灶址或是睡觉的地方,土台上及四周散布着日常生活用品,数量多寡不一,最多的达80多件,少的仅有一两件;有的房屋内陶器很少,但生产工具如石镰、石凿、骨镰、蚌铲、陶纺轮相对较多,陶铃、陶埙也有发现,并出土多块磨石,可能是房屋的主人所从事的劳动与其他人不同,房屋功能也有其不同之处。

这批房址应是一处建筑群体的一部分,其结构清晰、布局严谨合理,而且规划统一、因地制宜,为研究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聚落形态及建筑技艺提供了宝贵材料,也是研究中国史前建筑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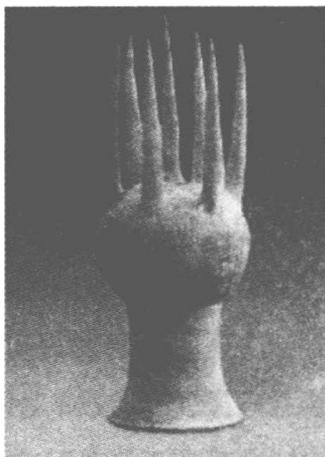
尉迟寺遗址墓葬以儿童瓮棺葬为特色,数量也最多。瓮棺葬葬具为日常生活用具,通常由两件大口陶器相扣而成,死者多为婴儿及幼童,年龄最小者不足周岁,一般为2~3岁。个体较大的幼儿则直接用打碎的



鸟形神器



瓮棺葬具及刻画符号



七足镂孔器

陶片铺盖。这里还出现了以大口尊为葬具的高规格瓮棺葬型制,在部分大口尊上发现了“日、月、山”形刻画符号。

在一排4间一组的建筑前面,有一处人工铺垫的大型广场,面积为1300多平方米,表面光滑、平整、坚硬,广场中央有一处直径为4米的火烧堆痕迹,这是原始人集会、祭祀和举行篝火晚会的地方。广场不仅烘托出了该聚落的等级,也说明了氏族成员在部落酋长的领导下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造型奇特的陶器,包括1件鸟型神器和7件七足镂空器。这件被称为“鸟形神器”的陶器共分三层,最底层为圆柱形,中间是圆锥形,圆锥大头向下反扣在圆柱上,同圆柱连为一体,在圆锥的两边还有两个酷似鸡冠的饰物,圆锥的顶端是一只像鸟一样的东西。据测算,整个器物高约60厘米、底径16厘米、上径20厘米,应该是一件象征性的器物,很可能是一种鸟图腾,这种图腾极有可能跟聚落有关系,是权威的象征。这种东西摆放在固定的神台上,以供村民敬仰和膜拜。七足镂空器出土于时间要晚于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的一处房基中。它高43厘米,长颈圆腹,顶上还附有七个锥形长足,造型古怪。

在尉迟寺遗址中,我们发现大量蚌刀、蚌铲、蚌镰等蚌制工具,这说明5000年前的尉迟寺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河流湖泊相连,水生植物茂盛。老虎和梅花鹿等动物骨骼的发现,说明这里曾经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有着具有温暖湿润气候的平原和沼泽地。在尉迟寺遗址发现了猪、狗、黄牛等家畜骨骼。家猪骨骼占目前发掘动物骨骼的51%,其中2岁以下的猪骨占全部猪骨的85%。而黄牛遗骸的发现表明,这一地区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开始饲养黄牛,只不过还不普遍。看来,蒙城被称为“牛县”,还真牛得有理。

从这些重要发现可见,尉迟寺遗址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可以说,在苏、鲁、豫、皖大汶口文化所分布的区域内十分罕见。通过它可以看到原始社会晚期黄淮地区自仰韶文化以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这一地区原始社会发展的进程、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以及大汶口文

化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

#### 4. 玉器的王国——含山凌家滩遗址

身为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史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恰好就处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间内,根据古史记载,这一时期已是万邦林立的“诸侯”时代。但由于史书中的这一段历史多属传说时代,缺乏实证材料,以往多受到国外学者的质疑和诟病。不过近几十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前,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性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家发展过渡。文字、城市、冶金技术等文明要素的出现,说明这一时间段,中原及周边地区正逐步走向“古国”的发展模式。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由此可见,考察5000年前左右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对研究中国古代何时出现文明的曙光以及文明化进程等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放眼中国南北地区,有三个考古学文化(遗址)最为重要,它们分别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及环巢湖地区的凌家滩遗址。据碳十四测定,凌家滩遗址年代距今5600~5300年左右,与红山文化相当,又略早于良渚文化。三者之间相距甚远,却有着同样发达的玉文化,种种迹象让我们看出了三者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红山文化位于辽宁和内蒙东部赤峰一带,年代跟仰韶文化的晚期以及后边的龙山文化大体相当。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它的发展程度一定意义上比中原要高。比如红山文化的玉器就非常惊人。当时中原地区虽然有玉器,但是玉质不佳,器物造型也较粗糙。真正能和它相比的是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这三种文化中的玉器远远超出中原地区,它的精美程度惊人,几乎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几千年前的古人依靠手工或简单的机械制作出来的玉器。玉器中占的比重最大





的是祭祀用器,说明当时这个社会一定是达到了相当的发展高度,必定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有很多剩余劳动去从事此类工作;另外,玉器制作的专门化与社会的分层有关系。古人将玉作为能跟天、地、神沟通的法器来用。这些非实用的器物,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丰富,有玉猪龙、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这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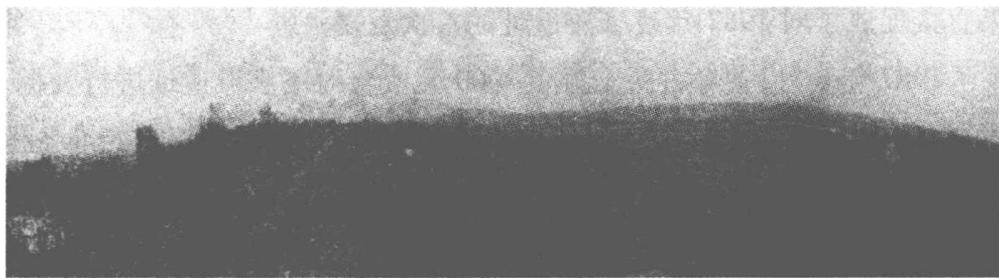
除了玉器,在红山还发现了一些大石堆砌的祭坛,占地面积非常大。祭坛之上还发现了一处女神庙,其内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以及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说明这是一处上层专门从事宗教包括政治活动的地方。

良渚文化存续时间约为距今5300年前至4200年前,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包含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其玉质之精美、品种之繁多、技术之精湛,令人赞叹不已。

良渚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器身上雕刻的神人兽面形象,可能代表巫师与神灵沟通时的形象。最大的一件玉琮重约6500克。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石英砂这时已被广泛运用,管钻法已普遍运用到钻孔技术中。根据对良渚玉器的工艺的考察,此时很可能已出现了旋转性的原始砣具。

良渚文化已发现数座祭坛,以其中一座为例,可以看出祭坛呈覆斗状,顶部平整,在顶上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做出规则的“回”字形灰土框,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了色彩鲜明的内外三重土色结构,其上埋葬数座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而且没有房屋类的地面以上建筑遗迹,因此,很自然地推测为是巫覡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更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发现了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标志着早在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太湖地区可能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凌家滩墓地全景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早在上世纪早期就已被相继发现并命名,相比之下,凌家滩却像一个初生的婴孩,稚嫩却又让人充满好奇。其独特的玉器文化、高规格的墓地、祭坛等遗迹遗物的发现,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地处环巢湖地区的这一处史前文明刮目相看。

**发掘经过** 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西北部的太湖山南麓的一片高岗台地上,周围丘陵起伏,地势北高南低,裕溪河流经遗址的南部。由于遗址主要坐落在凌家滩村内,故而命名为“凌家滩遗址”。整个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凌家滩遗址发现于1985年,遗址所在的墓葬区原为当地一处乱坟岗,现在的凌家滩遗址内也还有十几座现代坟。当年因村里老人去世,在这里挖坟埋葬时,挖出许多陶器、石器和玉器,装了整整大半蛇皮袋。这件事马上引起了村民的轰动,当时所在乡文化站的李余和得知此事后,及时保护了现场,收缴了部分文物。

李余和将收缴的文物送到含山县文管所,后上报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此前负责过薛家岗遗址发掘的杨德标会同张敬国被派至此地调查,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当地老乡说以前在这片葬坟的岗地上,犁田犁出过不少石器和玉器,不知何物,带回家里也未加保管,任小孩随意玩耍,结果许多都弄丢了。经过访问以及对陶片的分析,初步可断定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葬坟出土器物的地点是凌家滩村地形最高处,可以认为葬坟地可能是凌家滩遗址的墓葬埋藏区。这一次调查的结

果直接促成了对1987年凌家滩遗址的首次发掘。

1987年6月,省考古所安排了3000元资金对凌家滩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队一共4人,张敬国担任领队,当地领导较为重视,发掘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一次试掘选择了紧挨新坟堆的两边,准备发掘50平方米,这里是此前老百姓挖坟出宝的地点。这一次共发现墓葬4座,出土了不少重要文物,如一号墓中发现了3件站姿玉人。四号墓的发现最令人兴奋,在这座墓的墓口,首先碰到一件大石钺,正好放在墓口平面上的中央位置,重4.25千克,昭示着这座墓葬主人不一般的身份。果不其然,随着发掘的深入,墓内填土中的随葬品不断暴露,墓内出土玉器就有玉版、玉龟、玉勺、玉人头饰等,极为重要的是玉龟上下腹甲夹着玉版,这居然能和传说中的“元龟衔符”等印证起来。四号墓总共发现玉器103件,比例高达71%。在考古工作者的一生中,能有如此重要的发现,哪怕是一次也足矣。张敬国拿起相机不停地按着,仅仅玉版就拍了20多张。可是等冲洗照片时却发现只有几张可以洗出来,其余都是黑的,实在令人可惜。凌家滩出土的玉器属于透闪石玉,在发掘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碰碎,要想提取出来难度很大,最后只能将土和玉器一起提取,回去再清洗出来。可是当把沾满土的玉器放进水里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水中的玉器不断地冒着泡,过一会儿感觉手中的玉好像就没了,拿出一看,果真如此,全成了糊状。又放了一件,又是如此。这与人们脑海中玉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后张敬国改进了方法,用湿布擦拭,初步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一次的发掘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吸引了不少领导和群众前往参观。由于经费和时间较紧,展览仅进行了3天。但据发掘者回忆,当时考古队回撤的途中,在凌家滩附近的公路上遇见一辆大客车迎面而来,可能是来工地参观的,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扑个空。正是这次展览,给以后的发掘埋下了隐患。

1987年11月,凌家滩又迎来了第二次发掘,这一次参加发掘的人员更加齐备了,准备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此次发掘紧挨上一次发掘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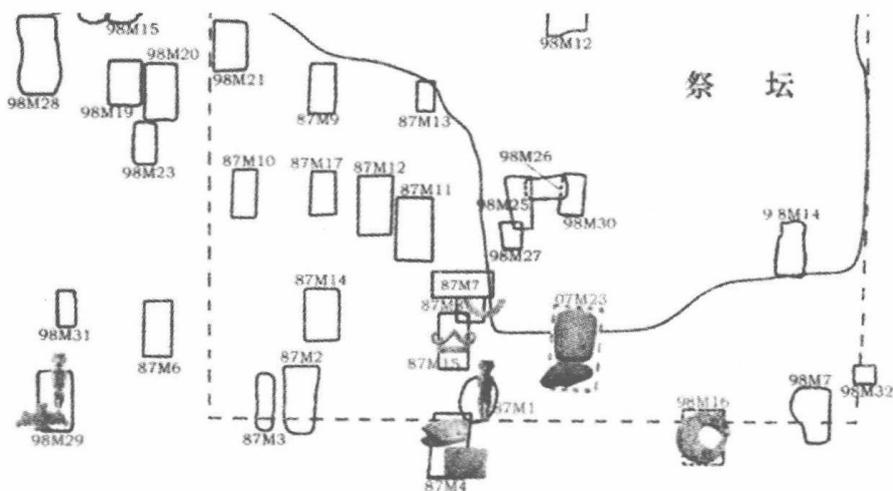
域进行,共发现 11 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由于上次发掘中当地领导和发掘人员之间的一场误会,第二次发掘实际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面积就草草收场,而且一停就是 10 年。

自 1987 年凌家滩发掘以来,许多文物贩子和盗墓贼就盯上了这里,给这里的文物保护带来了很大隐患。为了更好地了解凌家滩遗址的文化内涵,保护好这里的文物,省文物局决定于 1998 年 11 月开展第三次发掘。省局和考古所领导亲自前往含山就发掘事宜和当地各层领导沟通,将发掘之事落实下来。这一次发掘区位于 1987 年下半年发掘区北部、西部和现代坟东、南部,总共发掘 1825 平方米,共发现祭坛 1 座、祭祀坑 3 个、积石圈 4 处、红烧土遗迹 1 处、墓葬 29 座。这一次由于收获颇丰,影响巨大,顺利地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凌家滩遗址 2001 年被国务院批为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被专家列为上世纪中国 100 处考古遗址大发现之一。

时隔 9 年的 2007 年 5 月,凌家滩遗址又开始了新一轮发掘工作。第五次发掘面积约 450 平方米,此次发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墓地的北区,主要了解北区的墓葬分布状况;第二阶段在墓地的南区以东,主要了解祭坛以东的墓地布局。此次最重要的发现出现在南墓地祭坛附近。原来此区域的祭坛上存在现代坟,因此前四次发掘时未能完全揭露。现代坟迁出后,腾出了 20 多平方米的空地,本次发掘对这一地点进行了重点清理。

本次发掘主要发现凌家滩文化墓葬 4 座以及可能与制作玉石器有关的大面积石块分布场所,出土各类玉、石器和陶器近 400 件。其中,一座神秘墓葬出土玉石器随葬品达 200 多件,数量之多令人感觉“千年一遇”,可以称得上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因此也顺利入选了当年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此墓之上分布有现代坟,在探方偏东南部发现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盗洞,深约 50 多厘米,在此盗洞和现代坟之间还有一个盗坑。但非常幸运的是,它们都没有对墓葬造成破坏。

在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充分利用红外线成像、



1987年、1998年、2007年部分墓葬、祭坛分布图

(注:实线为祭坛遗迹现存平面分布图,虚线为原祭坛遗迹平面分布图)

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了环境考古、地震考古、玉器蚀变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大大扩展了对凌家滩遗址考古研究的领域。对于此次发掘,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为了保障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地成立凌家滩遗址发掘领导小组。该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任该领导小组组长,副县长和该县文化旅游局局长任副组长,另外公安、供电、公路相关部门及铜闸镇政府也包含其中,他们分别负责安全警卫、供电及道路的畅通。对于含山县政府部门所做的工作和给予的支持,就连领队张敬国都说:“这是安徽考古史上的第一次。”

**重要发现** 凌家滩遗址内包括生活区、独立的墓地以及近 3000 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初步判断可能为神庙或宫殿。

红陶块遗迹分布在凌家滩自然村内,总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厚 1.5 米。红陶块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单就红陶块本身而言,它是经过 800~1000 度的高温烧制而成的,质地坚硬,至今我们仍很难将其砸碎。中国古建筑协会会长杨鸿勋先生认定:红陶块属人类有意识加工的建筑材料,凌家滩的红陶块应是中国人类建筑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是现今我们所用各类砖的祖先。红陶块遗迹中还发现了一座当时的水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红陶块圈成的,直径 1 米、深 3.8 米。井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凌家滩的先民们此时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因为他们已知道饮用干净卫生的井水了。但从井底仅有少数陶片的现象以及井的位置来看,它应不属于一般人都能使用的水井,而是最高权力者使用的,或有重要的祭祀活动时才使用的“圣水”井。该井使用人工建筑材料和垒建技术,为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实例。

在凌家滩遗址两块墓葬区的分界处,发现了一处“石墙”。该“石墙”是一条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东北、西南走向,用小石块砌垒而成的带状建筑物,因发掘面积有限,目前对它的长度以及功能还不清楚,但就其现有建筑物本身而言,就不得不为之惊叹。该建筑物是利用石块自身宽窄、大小不等的形状,一块块相互砌垒起来的,每块石头之间没有任何粘合剂,但至今我们用手仍不易将砌垒在一起的石块拿开。这足以表明凌家滩的先民们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几何力学,并有着高超的建筑水平。

在遗址内还调查发现了三组巨石建筑遗存。据当地老百姓说,在20世纪70年代前,墓地所在的圆土堆周围散落着几十块大型巨石,有的长七八米,宽约一米,有的竖着,有的斜着。当时老百姓把这些巨石炸



凌家滩 07M23 遗物

碎盖了房子,目前仅残留几块,每块重达几吨。此外在凌家滩遗址的四周,还发现了一条大型围壕。

发掘主要集中在墓葬区,发现了祭坛和一批高等级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陶、石、玉器等文物,尤以玉器造型独树一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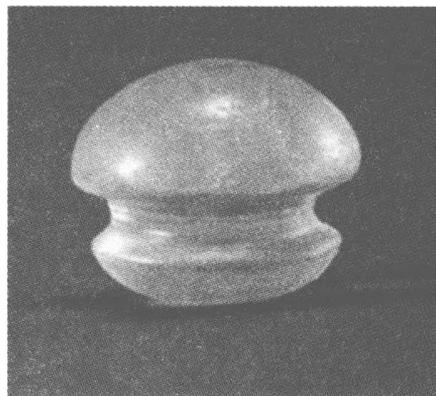
祭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 1200 平方米,建筑在凌家滩聚落中心的最高处,分三层筑成,表层有积石圈和祭祀坑。这种建筑方法和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在安徽属首次发现,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三座大型祭祀遗迹之一,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祭坛的选址及构造方式都有相似之处。这些祭坛周围均埋葬了一批墓葬,随葬大批精美玉器,表明了人们对天、神灵的无限崇拜和敬畏。

墓葬区面积约 14000 平方米,规划周密,由南自北分列八排,以第一排和第二排墓葬规格最高,不仅墓坑面积较大,随葬品也十分丰富,数量达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层层叠叠规则地放置在墓主人的两侧及身上。以 87M4 号墓和 07M23 号墓最具有代表。随葬品以玉器为主,玉器又以高规格的玉礼器为重要特征,器物有玉人、玉龙、玉鹰、玉版、玉龟、玉璜、玉钺、玉镯、玉耳珰等,其次是石器,陶器数量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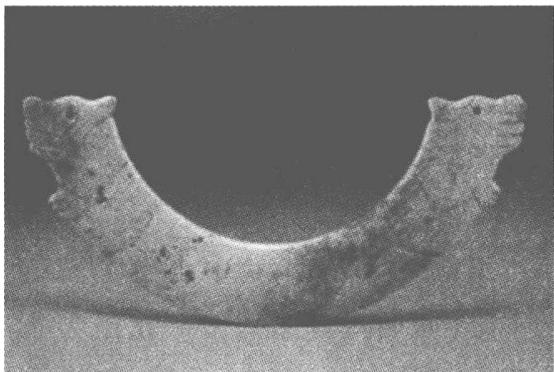
第一排和第二排的墓葬不但位置显著,而且墓坑都较大,从各墓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也不同。从两座墓的随葬玉器看,87M4 号墓主要随葬的是代表神器的玉龟、玉版、三角形饰、玉勺等和代表兵权的玉钺、玉斧,表明该墓主集神权和兵权于一身。07M23 号墓是 2007 年发掘的最大收获,这座墓葬出土器物为历年来凌家滩发掘墓葬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座,该墓与 87M4 号墓几乎相邻,墓葬的许多遗迹现象和遗物都和 87M4 号墓的相似,但规格更高。墓葬里有 200 多件形形色色的玉器、石器,而且摆放整齐有序,似乎遵循着一些特殊规则。比如墓主头部摆放着精美的玉环、玉镯、玉璜,胸部以下至脚部有大量玉钺、玉璜、石镞、石凿等,部分叠压有 2~6 层器物,在靠近脚部并排放着石凿,脚底竖立向上摆放着玉璧和玉环等,这种摆放方式可能有着特殊意义。从墓葬位置来看,07M23 号墓位于被古凌家滩人看做“登天之梯”的太

湖山正南面,其位置打破了作为祭祀中心的祭坛,这个位置是特殊而尊贵的。此外,墓葬上还压着一只独一无二的珍贵玉猪。这一切都说明这个墓葬是古凌家滩地区的中心大墓——酋长墓。

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价值。器形主要分以下几类:工具、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应是礼仪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穿戴在身上起装饰作用的镯、璜、环、玦、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别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动物或人物形象类,主要有龟、龙、凤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形制较为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这些不同种类的玉器在墓中往往成组出现,并代表一定的礼仪制度。如玉璜在凌家滩墓葬中并非单一出现,而是按照墓主的身份、地位和权力随葬不同的数量,重要的高规格墓葬一般随葬 10~30 件不等,一些远离祭坛中轴线的墓葬中甚至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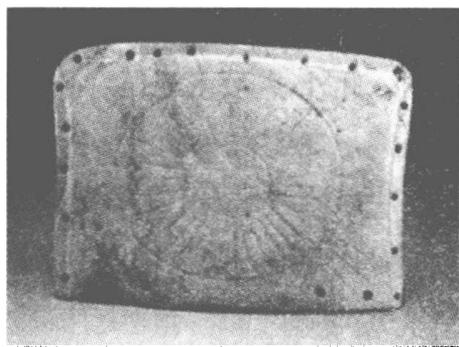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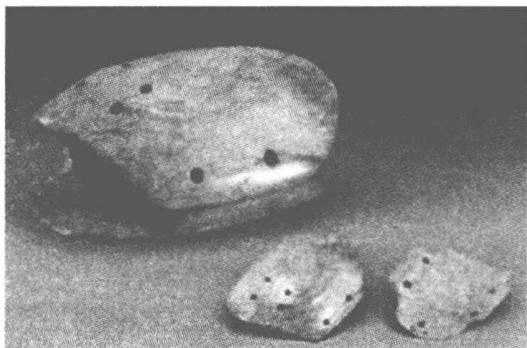
水晶耳瑯



玉虎形璜

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也令人称奇,有的孔径仅有 0.15 毫米,可谓细如发丝,这种技术就在现在恐怕也不易做到。下面重点介绍其中的几件玉、石器。

**玉人** 凌家滩共出土 6 件玉人,其中 3 件站姿,3 件坐姿,都不到 10 厘米高。玉人采用了圆雕、镂孔、实心钻孔等多种雕刻技艺制作而成,



玉龟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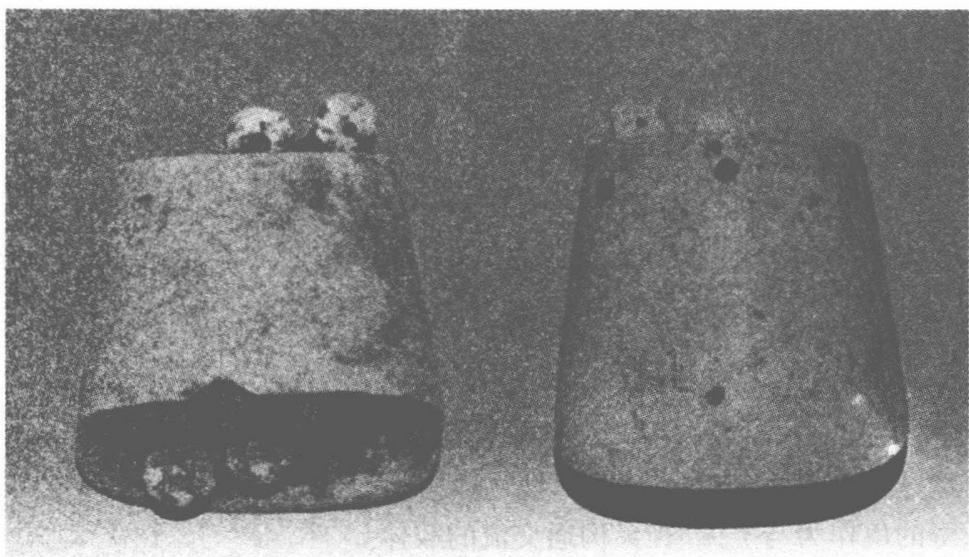
玉人整体比例协调,细部特征明显。这些玉人长方脸、头戴圆冠,冠饰方格纹,冠上中间有长三角形尖顶。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两大耳。大嘴,上唇饰有八字胡。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佩有玉环。腰间饰斜条纹的腰带。臀部宽大,腿显短。玉人的脸形和五官表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整体装束表明当时人们已有帽子,并已有纺织技术,人们已穿着衣裤,戴着帽子。



玉人

**玉龟版** 87M4 墓中出土了玉龟和玉版(原始八卦图),玉版正面为长方形,长 11 厘米、宽 8.2 厘米、厚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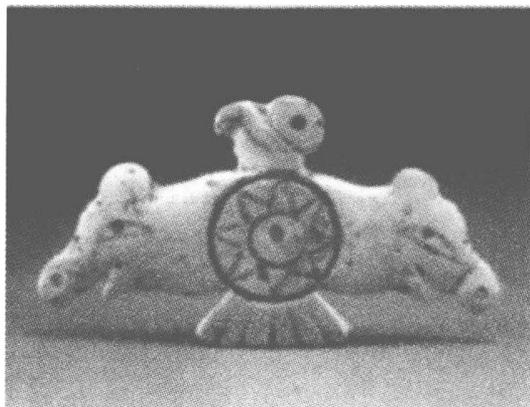
~0.4 厘米,反面略内凹。两短边各对钻 5 个圆孔,另一孔对钻 9 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各对钻 2 个圆孔。玉版中部偏左雕刻有一小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圈外雕一大椭圆形,两圈以直线平分八等分,每等分雕刻一圭形纹;在大圆外,沿圈边对着长方形玉版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纹饰。张敬国先生认为,这块玉版上雕刻的纹饰,反映了 5000 年前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哲学思想,即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小



玉龟形器及玉签

圆圈之外、大圆圈之内的 8 个圭形纹饰应是表示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大圆圈外四角的 4 个圭形纹饰应是表示维。四维和八方，可能就是《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的所谓“四维已定，八卦相望”。更令人惊奇的是，原始八卦玉片夹放于玉龟里面一同出土，玉龟中空，背甲的龟纹琢磨得十分逼真，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由孔和暗槽相连。龟应为史书上记载的龟卜，龟、版应都是占卜工具。这和文献所说“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大龟负配”如出一辙，真是匪夷所思。

在 07M23 号墓主人的腰部正中位置也发现 3 件玉龟(龟形器)呈扇形摆放，其内腔中空，共插有 5 根玉签。据初步推测，这 3 件玉龟和 5 根玉签应是一组占卜工具。把这一组占卜工具跟 1987 年在凌家滩 87M4 号墓中出土的玉龟和玉版(原始八卦图)联系起来，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原始八卦和占卜术早在 5300 年前就已被先民们很熟练地运用；同时也表明 07M23 号墓主人是当时凌家滩先民的神权领袖，其生前每天把这一组占卜工具悬挂在腰间，随时占卜每天所做之事的吉凶祸福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天体、宇宙和哲学的一种朦胧认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崇拜神灵和对神灵的敬畏，他们利用



玉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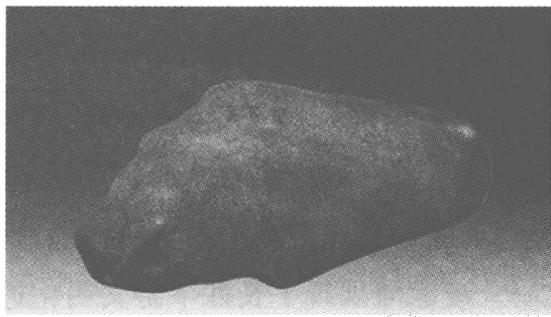


玉龙

长寿的龟作为与上天、神灵沟通交流的载体。

红山文化的玉器与凌家滩玉器有着不少共同点,如红山文化出土的斜口箍形玉器与07M23号墓的玉龟形器相似,可能也是与占卜有关的用具,这有助于解决红山文化斜口箍形器的功能和作用等问题,为研究红山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凌家滩遗址和红山文化出土的玉人都是双手置于胸前,表示一种信仰仪式。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出土器物表明,距今5300多年前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存在某种相通性,反映出中国文明起源具有多源一体的发展趋势。

**玉龙与玉鹰** 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龙文化源远流长,在红山文化和河南濮阳龙虎坡墓中都有猪龙和蚌壳砌的龙出土,但它们的形象都不及凌家滩玉龙这样完美。凌家滩玉龙首尾相接,两角耸起,显得庄重、威严,龙须、嘴、鳞等龙的要素齐备,其造型和神韵都如近人之作。5000多年的漫长时空,在这件玉龙上如此神奇地叠合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这足以说明巢湖流域是龙文化的故乡之一。凌家滩出土的玉鹰,胸腹刻有大小两圆,两圆之间刻有八角星纹,鹰首侧视,双翼展翅,神采飞扬。鸟是东夷人的图腾,玉鹰在凌家滩的出现,表明凌家滩先民可能与东夷文化有某些直接关系。玉鹰双翅做猪首形展开,是想让百鸟之王的雄鹰飞上天把牲品带给太阳神,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



玉猪



石钻

**玉猪** 这件玉雕野猪利用玉料的自然形态雕刻而成,全长约 72 厘米,宽 32 厘米,重达 88 千克,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整件器物形态逼真,吻部突出,嘴部雕刻明显,其上有两个鼻孔,在嘴的两侧刻有向上弯曲的一对长獠牙。眼睛用减地法表现,在头部上方以同样方法刻出一对向上竖立的耳朵。颈部略加琢磨,形成一个较宽而浅的半圆形脖子。在腹部的一侧,简单地琢出两条弯曲的线,形似蜷曲的双腿或带翼的翅膀。从颈部至尾部皆保留玉籽料原貌,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痕迹。

**石钻** 凌家滩出土的石器中,最有研究价值的莫过于石钻了。石钻两端都呈螺丝状,一头粗,一头细。钻头的螺丝纹饰和柄一次加工而成,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螺丝纹旋转的曲线非常流畅,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钻头工具。这充分表明,凌家滩先民已经认识到旋转力和离心力的作用,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已达到较高的水准。

凌家滩遗址自从发现的那一天起,其特殊的文化性质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就其所处地理位置而言,以巢湖为中心的巢湖流域以丘陵地貌为主,自然资源丰富,适于人类生存。这里北受淮河流域文明辐射,南与长江水系相通,南北东西交流通畅。距今 6000 ~ 5000 年左右,此地的文化逐渐发达起来,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特征,代表性的遗址

有含山凌家滩、肥西古埂等。两处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其渊源应该属于大汶口文化和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而较凌家滩遗址晚一阶段的良渚文化的玉石技术可能受到凌家滩的强烈影响。概括来说,凌家滩遗址早期阶段,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和邻近的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的较大影响,但文化性质并未改变;在稍后阶段,它与薛家岗文化有过一般的交流;晚期阶段,主要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此外,凌家滩遗址的规模、墓地和发达的玉器工业表明,这里是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凌家滩展现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的曙光,它的出现,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演化的重要一环,对长江下游文明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5. 长江下游的古城——怀宁孙家城遗址

我国城起源于什么时代,文献中有零星的记载,主要有三说。一为“黄帝说”,认为筑城始于黄帝时代。《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二为“夏鲧说”,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是始做城者。《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夏鲧作城”。此外,还有“夏禹说”,少量文献材料谓夏禹为始做城者,如《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云:“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以上三种观点哪一种更切合实际,仅靠有限的文献材料是难以作出判断的。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城址,其分布区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生和最为发达的地区。迄今所知,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城址近 50 座,范围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和内蒙古地区。

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址是大溪文化澧县城头山,始建年代接近公元前

4000年,大体呈圆形,外侧围壕沟。城内各区已有一定布局,居住区内发现多座矮台基式编竹夹泥墙的房屋、红烧土块路面、水井等,以及由数座陶窑、泥料坑、蓄水坑、小型房子和工棚等配套构成的制陶作坊区,城中偏北有一处墓葬密布的墓地。至屈家岭文化时城墙又经修筑,基本相重合而城垣轮廓略有扩大,沿用到石家河文化中期废弃。现存屈家岭文化的城头山城墙大部仍兀立在地面,城垣外圆直径325米,周长约1000米,城内面积7.6万平方米,城外环绕护城河。其他在湖南、湖北屈家岭文化的城址还有数座,一般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之后,有的在石家河文化时期继续使用。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目前只在晚期发现一座城址——郑州西山城,城垣长约300米,城外侧围以壕沟,接近圆形直径(不计城墙)约180米估算,城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位于现存10万平方米的西山遗址西北部。城内发现大量房址,均为长方形或方形的地面式建筑。城墙里和一些房基埋置小孩、牲畜或放粮的陶罐作为奠基之物。发现多座草草掩埋死者的乱葬坑,有单埋猪、牛或人畜同坑作为牺牲的专门祭祀坑。城垣内外侧附近两处墓地已清理百余座土坑墓,其中有的是成人男女合葬墓、成年男性与幼儿瓮棺合葬墓。这些都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发生尖锐分化的现象。

继仰韶文化时期在中原首次出现城堡之后,新石器末期龙山时代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新密古城寨、辉县孟庄等成批的古城在中原大地拔地而起,有的城址年代已经进入了夏代纪年范围。这些城中不同程度地发现有建筑基址、窖穴、水井,特别是在淮阳平粮台城址中发现有陶窑和陶制排水管道。另外在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还发现有铜渣和铜片。

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就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因此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

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但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城的功能并不一样。

一是防御敌人侵袭。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由于贫富分化,私有制、阶级开始萌芽,又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需求的增加,故部落之间的掠夺性战争不断发生,获取财富甚至人口的意图成为战争的基本目的。为了保护本部落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各个部落都用夯土或石材构筑坚固的城堡用于防御。文献材料中有许多部落之间进行掠夺性战争的记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时期的众多城址,应是诸部落之间相互征战记载的具体反映。

城的第二个功能是由于用于防洪。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当时时常洪水泛滥,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损失。面对洪水泛滥,人们除了进行治理之外,还采取建筑城墙的办法把居民区圈围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洪水泛滥之危害。文献材料中有许多关于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和人们治理洪水的记载。

城的第三个功能应是防御猛兽的侵袭。在原始社会,由于人口相对稀少,凶猛的野兽在人们居住区周围游荡;再加上当时战胜猛兽的能力较低下,从而造成人们惧怕猛兽的心理。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在居住区周围挖掘壕沟用于抵御猛兽,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人们有能力和技术去建造更加可靠的城墙设施,用以有效地防止猛兽的侵袭。

结合新石器时代这些城址规模来看,城垣规模与城内面积较小。一般城址城墙宽 10 米左右,城垣周长多在 400~1000 米之间,个别有 2000 米。城内面积,小者不足 1 万平方米。城址规模之所以普遍较小,是因为城主要用于居住和自卫,而其经济、文化中心方面的功能或根本没有,或处于萌芽状态。

此时城址的形状也不甚统一,以方形、长方形居多,还有圆形、梯形、扇形、不规则形等,多是因地因势所建造,并未出现后代所出现的程式化

的方形城址。就这些城址修建地点看,第一类为缓岗类。城址坐落在较平坦的缓坡、低岗之上,用夯土建筑城墙,城垣形制较规整,多为方形或近方形,其中有一些地貌条件优越的城,城外多有护城壕设施。如西山城址城外发现有宽5~7.5米、深4米的壕沟。第二类为台地类,也可称作“台城”。城建在较高的台地之上,城墙多依台地边缘峭壁而建,外侧陡直,内侧较缓,城内地面明显高于城外地面。第三类为山城类。城址一般位于山坡之上,城的平面形状无一定规则,多用石头砌墙。这在北方地区较多。第四类为水城类。城依地势而建,城垣形状不甚规则,城墙外四周环以护城河,有的城墙紧邻自然河流而建,有的河流穿城而过,多有水门设施,城内居住区一般位于地势较高的土台之上。此类在南方城址比较多见。

怀宁孙家城城址,位于长江下游的北岸,墙体主要部分不晚于龙山时代。目前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仅仅发现城址两座,其一为良渚文化古城,其次就是孙家城了,因此它的发现对探索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因为这一点,孙家城遗址入围了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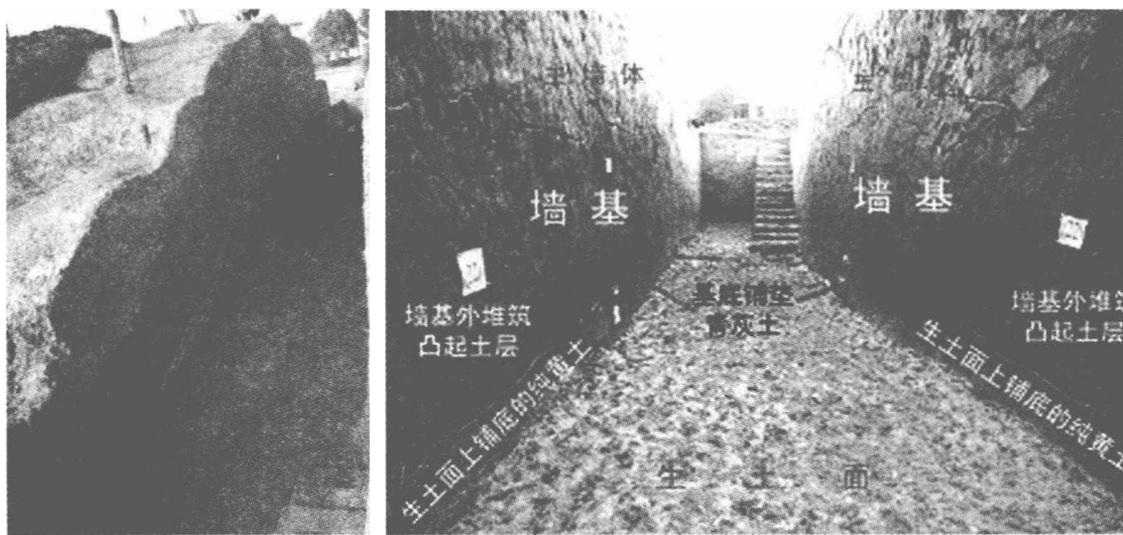
**发掘经过** 孙家城遗址位于怀宁县的最北端,在两大主古河道之一的大沙河南岸,与桐城市仅一河之隔。这一带的地名多与曹操有关,孙家城以及所在的马庙镇地名的由来也或源于此。相传三国时期,曹操在此得太子曹丕,路过境内芦峰寺抽签祷告后屡战屡胜,于是杀坐骑祭祀当地的一座小庙,后人称之为“马王庙”,现简称马庙。曹丕出生之地,一开始叫“生家城”,后来慢慢变成了“孙家城”。也有人说,该城是当年曹操屯兵的地方,孙家城宽大的城墙,就是当年曹操83万大军每人一兜土筑起来的。

调查发现,遗址东西长约750米,南北宽约430米,东端宽于北端,近似长圆形,东西南三面用黄土堆砌,一面临大沙河,河面宽100~150米。城内的文化遗存,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杨德标实地调查,已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文化层厚1~3米不等,采集的标本有石斧、

石铲、环形石器、鼎足、陶片等。2004年11月,孙家城遗址被省政府和省文物局公布为第五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家城土墙残高1~3米,底宽12~20米,顶宽5~10米。在东、西两侧和南侧外围大部分地段有洼地,宽度70~100米、深数十厘米至2米。

传说与现实的累积使得孙家城在未发掘前充满了神秘感。其发掘者朔知认为其发掘意义有三点:一、孙家城遗址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由于以前并没有对其进行过专业的系统的考证,目前所发现的器物还不能完全作为直接的证据,证明它们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哪个具体时期,也就是说无法证明它们到底距今5000年、5500年还是6000年。二、孙家城遗址距离潜山县的薛家岗遗址仅40多公里,这两座遗址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是否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专家心里也没有谱,他们更为迫切地想了解孙家城遗址的真相。此次发掘对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及其与黄河流域诸文化的关系,将有着极大的帮助和重要的作用。三、孙家城的古城址别具一格,历经数千年而没有毁损,它在远古时期是怎样构筑的,和曹操号令士兵撮土为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古代又具有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发掘来解答。

为解决这些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7~2008年,安徽省文物



城墙剖面

考古研究所对孙家城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实际发掘面积 600 余平方米,确认新石器时代城址 1 座,并发现薛家岗文化早期墓葬 1 座、红烧土坑 1 个、灰坑 2 个和早于薛家岗文化的地层堆积,出土遗物数百件,其中可修复陶器数十件,并有少量石器、玉器。

**重要发现** 史前城墙的发现是孙家城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经对南城垣进行解剖得知,城垣南坡的上层为战国以后堆积,其下为新石器时代墙体。最早的城墙系平地起建,整个墙底宽约 20 多米,最高约 4 米。大致营建过程为:在生土上先铺垫一层厚 10 余厘米的纯黄土,其上铺垫一层厚 5~10 厘米的较纯青灰土,其上堆筑主墙体。主墙体由 18 层和 20 层较厚的土层堆成,最厚达 3 米,其中 18 层单层最厚处可达 1.7 米,系用一薄层黄斑土和一薄层夹灰色淤土的红褐土相间分多次层层筑成。在主墙体之上的两侧又增加数层最终形成内外坡均较缓的城垣。实测坡度大都在 17~22 度。

由于墙体中包含少量相当于龙山时代的陶片,并发现个别明确属于龙山时代本地张四墩类型时期的夹砂红陶鼎足和夹砂红胎外黑陶片,但未发现更晚时期的陶片。还发现墙体北坡被张四墩类型(属薛家岗文化晚期)时期文化层叠压,并被同属该时期的小坑打破,由此证明墙体主要部分不晚于龙山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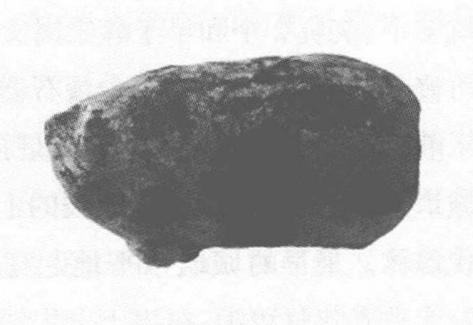
在城内发现薛家岗文化早期墓葬 1 座、红烧土坑 1 个、灰坑 2 个以及更早时期的小沟 3 条、基槽 1 条。墓葬为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 6 件、石器 4 件,年代相当于薛家岗遗址的早中期。

早于薛家岗文化的地层可分早、晚期,包含较多的可修复陶器。石器主要有斧、斨、凿,玉器有残玉璜、坠饰。其中可修复陶器主要为鼎,少量为釜等,器形基本完整,出土时呈直立、倒扣或倾斜状,但绝大多数或口、底局部残缺,或足部分残缺,个别足残断后有意摆放整齐,为少见的特殊现象。

早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鼎、豆、器盖、球(丸)、纺轮最多,鼎多为夹砂红陶罐形或釜形,足常呈弯曲状,根部饰 1~3 个圆按窝或小三角形戳



陶鼠



陶猪

印或横向凸棱,富有特点,另有少量陶塑如人像、猪、鼠形动物等。晚期陶器以泥质夹植物茎秆、壳或夹炭最多,颇具特点,夹砂陶相对较少,外红内黑或黑皮(衣)陶数量也较多,种类与早期相近,但鼎多为夹植物、夹炭或蚌末的外红里黑深腹盆形或釜形,外饰红衣,足以凹面为主。早、晚期的陶器饰红衣或黄衣较多,并有数百片彩绘陶片以及少量的厚胎夹砂白陶。

孙家城遗址上发现了 6000 年前至汉六朝时期的各时期堆积(夏时期文化暂未发现),尤以 4000 多年前和周代、汉六朝三个时期最为发达。这证明,孙家城遗址是目前整个皖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各阶段特征都较明显的一个代表性遗址,为构建这一地区的先秦时期文化变迁过程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尽管发掘面积小,但仍有不少重要收获:一、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为长江下游史前聚落变迁和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二、薛家岗文化早期墓葬及更早期文化的发现,为寻找薛家岗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早期文化相当于本地的黄鳝嘴类型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晚期到崧泽文化早中期,极富特色的鼎足、陶塑人像或动物、白色陶和大量彩绘陶为认识这一新的文化提供了新材料。三、大量的石器箭头的发现。这些石器箭头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但是打磨得非常精致,且比较锋利,目前可大致界定其距今 4000 ~ 4500 年。这一时期正是新

石器社会的重要变更期,此时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为地盘和权力的竞争,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因此需要大量的武器。孙家城遗址出土的石器箭头不仅集中,而且量大,这意味着当时已有专门生产这些武器的作坊。

## 6. 淮河流域首支史前城址——固镇垓下遗址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在垓下之围时留下的千古名篇,而诗句所描写的事件就发生在今安徽固镇的垓下。据史料记载,垓下遗址在当地俗称“霸王城”,秦末汉初属沛郡,为军事重镇,刘邦和项羽在垓下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闻名中外的楚汉战争——垓下之战,史书记载“霸王曾踞城而战”。如今在遗址内还散落着大量零碎古代陶片,俯拾可得,遗址中也曾挖到过大量的铜箭镞、铁箭镞、楚蚁鼻钱等文化遗物,说明这里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垒筑成城,而且还是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因此以往也被视作这一时期的城址。不过经过这两年的发掘,发现这座著名的古战场,始建年代实际上超出人们的推测,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晚期,是一座始建于5000前的城址,并连续使用了数千年。

大汶口文化属于我国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距今6300~4500年,主要活动于黄河下游和江淮一带。因首先发现于山东泰安的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丰富的文化遗存,显示出它与中原仰韶文化的显著差别,反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类型。大汶口文化的发现,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它不仅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且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

章丘)而得名,距今约 4350 ~ 3950 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这一时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城址的发现。如在山东、河南地区,就已发现几十座古城。龙山文化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及种类均大为增长,快轮制陶技术比较普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陶器中以蛋壳黑陶的特征最为突出,其为轮制而成,形制规整,浑身漆黑光亮。同时,占卜等巫术活动亦较为盛行。从社会形态看,当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也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大多数学者根据龙山文化存在的时间段,猜测传说中的尧、舜、禹以及夏朝可能就处于龙山文化的范围内。特别是山东省日照尧王城遗址,该地域有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龙山文化晚期有一处陶寺遗址,古书上记载尧帝的部落也生活在这附近,尧帝称为陶唐氏,而陶寺的名称是否几千年来没有变过,这让人产生了许多联想。

**发掘经过** 垓下遗址位于固镇县城东南 24 千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总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遗址主体平面形状大致呈弧角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短,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所在地势较高,四周土垣的保存程度以东、北垣较为完整,西、南垣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土垣的四个弧形拐角,尤其东北、西北角清晰可辨。因历代人为破坏和长期水土流失,土垣与遗址内地表高差明显缩小甚至近平。遗址主体被一东西向排水沟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地势北高南低。遗址主体北、西 50 ~ 100 米远处有沱河围绕,紧靠土垣的东、南面以及西面部分地段为农耕地或林地,地势明显低于土垣 2 ~ 3 米,经钻探推测为原来的城址护城河所在地。遗址地表随处可见新石器时代、秦汉时期的陶器残片、瓦砾以及砖块。

为配合固镇县濠城镇政府实施垓下遗址现代居民搬迁工程和编制遗址整体保护方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7 年春季,相关部门对垓下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资料表明,垓下遗址非普通的聚落遗址,而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城址。该城址由城墙(即土垣)、城门、护城河、道路与排

水系统、夯土建筑基址、红烧土遗迹、活动场、窑址、水井、灰坑等不同时期的多类遗迹组成。自2007年开始对遗址进行了钻探和第一次发掘，其后又于2008年和2009年连续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工作。经钻探发现，城墙外有壕沟，城内有台形基址、成片红烧土堆积、窑址、水井、沟槽等。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1000余平方米，证实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始筑、汉代增筑的城墙，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1组、台形基址1座、陶窑1座、墓葬11座；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74个、沟12条，汉代开凿大型水槽1处、水井3口，宋代墓葬2座等。出土各时期文化遗物共计约400件。由于发掘成果突出，该下遗址顺利入选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重要发现** 城墙是该下遗址发掘中最大的收获。经过探沟解剖得知，城墙结构基本一致。东城墙墙基宽约24.7米，残存高度最高达3.8米，系堆筑而成，主体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筑造，汉代可能有所增筑或补筑。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为平地起建，堆成上窄下宽的山坡形，再以其为核心，在上面顺坡逐层堆筑，使墙体加宽增高，可以分辨出至少有三次堆筑过程。城墙堆积内出土的遗物以残碎陶片为主。可辨器形有鼎、罐、鬲、觚形杯、高柄杯等，器物形态具有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较为典型的特征。

**城墙外侧发现有壕沟** 经解剖得知，壕沟紧挨城墙外侧，有新石器时代和汉代之别。东城墙外的壕沟只解剖了近墙体的局部。沟底的走势宽度约在15米左右，深约5.5米，沟内淤积物中还含有少量烧土块和大汶口文化陶片。汉代壕沟在新石器时代壕沟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宽，其外侧已被沱河冲刷，可能宽达25米以上，深约5米，沟内淤积包含较多汉代陶、瓦片。

**城墙上的排房** 在北城墙偏西的城墙顶部，发现了一组东西向排房，系顺城墙走向建造。建房前可能用了质地较细的淡黄色土对城墙顶部铺平，再于其顶部下挖形成浅穴式房屋。排房由5间连间房屋和1间

独立的附属性房屋组成,各间房屋均为长方形,五连间房屋共长约16米,每间房屋面阔2~3米不等,进深约4.45米,房屋间设有隔墙,隔墙宽度约16~32厘米。仅有3间房屋残存有墙壁,高度20~45厘米。房屋地面受到不同程度破坏,残留的地面及墙壁皆抹有白灰面,地面与墙壁交界处皆绘有红色线条,可能是一种装饰。发现北向门道,但门道很窄,仅容一人经过。位于最东的一间房屋,因与五连间房屋存在宽约0.5米的间隔,所以形成独立的一间,但与五连间在同一条直线上分布,宽度较窄。地面抹有白灰面,但非常粗糙,室内残留陶器较多,有鼎、器座、瓶、石支架等。由上述特征判断,此房间应非居所,更可能是附属性的建筑。

**台基** 在城址西北角,城内靠近城墙处发现一座台形基址,西北—东南走向,推测可能是一座毁弃的建筑基址。台基东西未发掘到边缘,已揭露部分宽约7.5米,长超过14.5米,高约1米。台基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四缘呈漫坡状,其北侧使用较纯净的黄黏土平整铺垫在台基与城墙之间。台基上发现有几条残存的基槽状遗迹,在台基顶部和漫坡周边发现数座瓮棺葬。经对台基解剖发现,台基存在两次堆筑过程,每次堆筑后在其北侧坡脚皆用黄黏土铺平,可能作为活动场所。台基北侧坡脚叠压在北城墙第一次堆筑的城墙坡脚上。从台基表面到北城墙南侧第一次堆筑的墙体表面存在一层相连的含炭灰层,推



城墙顶部排房遗迹

测可能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代表了一定的共时性。从打破台基的瓮棺葬内出土的遗物推断,台基至少不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地震迹象** 在探沟解剖东城墙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探沟西段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墙体堆积出现明显的断裂错位,经安徽省地震局专家多次现场考察并取样分析,认为可能是一次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强烈地震活动留下的迹象。城墙堆积断裂错位现象发现于2008年5月12日,当时城墙发掘至一层灰黑色灰烬层,发现灰烬层出现断裂错位现象。根据这一线索对这一片的土层又仔细刮光辨认,确定了堆积断裂错位的范围。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以及地震局专家对错位位置的取样切片分析发现,从第二次堆筑的墙体开始向下的所有地层都发生了断裂错位。错位处在平剖面上均可见宽约4毫米的裂痕,其两侧土层厚度对称,完全相合。位错高差较为平均,裂痕以西比裂痕以东高出约3.8厘米。

垓下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遗址,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其遗存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看,它具备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具有自身特点,与同区域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发现有较多类似之处,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个类型。垓下城址作为淮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中最无疑义的一个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出现在远离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南部边缘,这更是带来诸多学术上的问题,如建于城墙顶部门向朝北、内部装饰讲究的大汶口文化末期排房是一种临时性建筑,还是一种特殊的居住形式?长条形台基与城墙和瓮棺葬有怎样的联系?地震迹象是否与城的兴衰有一定关联?发掘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却又带给人们新的思索。

### 三、夏商周时代考古

安徽地处东方,既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途,也是周邻民族与地区青铜文化碰撞、交流的重要区域,自然与人文地理区位特性十分明显。史载夏禹“会诸侯于涂山”,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夏商周时期,安徽境内主要为淮夷、吴越及百越的活动地区,曾发生过“夏桀奔南巢”、商人征人方、周人征淮夷、吴越楚争霸江淮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表明安徽地区与中原三代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则含有较多的中原文化影响。这一时期安徽周邻地区文化也较为繁荣,北部海岱地区有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族文化和齐鲁文化;东南地区有以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吴文化等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南部则属于南方苗蛮与百越族的文化。由于安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古代氏族文化渊源关系,淮北、江淮、皖南三区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

实际上,早在新石器时代,安徽的地方文化就兼蓄南北方文化的浸染,具有过渡性文化的特征,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进入夏商周时期,淮北、江淮、皖南等各区域的青铜文化,一方面继承了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深受中原夏商周文化和岳石文化、湖熟文化等邻近地区同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在江淮地区有皖西、皖中、皖西南等区域青铜文化类型,皖南地区则为湖熟文化与古越族文化分布区。这些文化,既有浓厚的土著文化特点,也显示出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建立与分封制的推行,促使境内各区文化步入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在淮河两岸,以偃、嬴姓为主的宗族小国林立,出现强大的淮夷之邦,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淮夷文化和群舒区域文化。在皖南地区,随着吴、越国家的兴起,而纳入吴、越国的版

图,呈现出吴越文化的浓厚色彩。春秋以降,周室衰微,诸侯强大,方国文化兴起,吴越楚蔡争雄称霸江淮,谱写了文化交流融合的新篇章。随后楚文化东渐,逐渐统一全境,为秦汉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综观安徽境内的夏商周文化,它经历了古代民族与区域文化多元一体、互相融合的漫长发展历程,曾创造了灿烂的区域青铜文化。它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说到安徽境内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大致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30年代,军阀以及寿县当地乡绅对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发动了大规模盗掘,发现铜器和零星石器、陶器4000余件,曾轰动全国,其文物大多流失,令人痛惜。1934年,原北平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王湘曾对今寿县一带古遗址进行过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12处,并采集到一批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揭开了这一地区夏商周文化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大规模城乡基本建设的开展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不断被发现,其中不乏一些重大发现,从此开启了安徽地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大门。

## 1. 黄山脚下的西周贵族——屯溪土墩墓

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吴越文化独有的墓葬形制,主要分布于皖南、苏南、浙北、赣北、闽北等地区。它的发现最早可追溯至1959年在黄山南麓新安江畔的屯溪弈棋,第一次发现了两座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的重要墓葬,引起了考古学、历史学界的关注。该墓结构为平地堆土成墩,无墓壁、墓坑,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不封不竖、土坑深穴的墓葬结构完全不同。随葬品以青铜器、印纹陶器、原始瓷器为主,其造型和纹饰与中原地区西周文化迥异,具有南方吴越文化特色。

土墩墓的分布一般依当地地形而有一定的分布规律。一是沿河流、湖泊岸边分布。这里多为冲积平原地带或山间盆地,地势略高于周围地

面。一般这类墓葬为就地取土堆筑而成,在墓的周围往往有一池塘或有一周水塘包围。墓葬多呈散点式分布,墓与墓之间相距几十米至上百米,比较稀疏。由于经年自然环境变迁和人为作用,有的墓呈馒头状,有的为圆台形。二是沿丘陵与平畈交界的土岗坡处分布。一般这种地形坡度低缓,墓葬分布比较杂乱,多为集群式分布。由于长年雨水冲刷,有的几乎被夷为平地。三是沿起伏的黄土丘陵岗地分布。有的呈散点式分布,有的呈线形串珠状有规律的排列。

从已发现的土墩墓看,一般成群分布,或三五成群,或几十座乃至上百座连成一片,多者达数百座乃至上千座,沿冈峦连绵起伏分布,漫山遍野,十分壮观。如南陵千峰山土墩墓群分布范围达13平方千米,尽管历经2000多年的自然与人为破坏,尚存908座。这些都为古代大型墓群。

土墩墓的埋葬有两种方式:一类采用平地掩埋(无坑或有浅坑)堆土,外形成馒头状、平面成圆形的大土墩,它源于史前时期先民的埋葬方式。目前这些土墩墓的封土一般高3~5米,底径10~30米不等,也有仅高1米左右或高度超过10米的。还有的底径超过30米甚至占地达四五千平方米之大,可能超过大型的土墩墓葬了。按墓葬数量可分为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其中一墩一墓多见,一墩多墓少见。皖南土墩墓的封土基本属于此类,封土多用比较细腻、纯净的黄土堆筑,一般不施夯打,比较松软。也有少数土墩墓的封土比较坚硬,经夯打或特殊加工处理,夯层层次分明,从皖南土墩墓的规模看,主要为中小型墓,大型墓较少。

另一类土墩墓则是先在较平整的地面上构筑长弄形的石构建筑物,然后在其上面及四周堆土成墩,一般称之为石室土墩墓。石室土墩的规模大小各异,一般高3~6米,底径15~20米左右;而在几条山脉交会的高处或突兀较为显著的地方,土墩往往要比其他地方的高大。土墩墓中,少有葬具的痕迹遗存,至于尸骸也很少发现,仅个别墓葬中发现有骨粉及残牙存留,特别是石室土墩墓中,至今尚未发现任何骨质遗存的迹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南方的土壤偏重酸性。由于千百年来雨水携带的

酸性侵入了尸体骨架，逐渐中和、分解了钙质，特别是位于丘陵山区的石室土墩墓葬，地势高爽，不仅受酸性雨水的影响，也易受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经成年累月的反复变化，骨架早就无存了。

土墩墓遗存不是孤立现象，它的文化内涵与当地同期文化关系密切。土墩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器、印纹陶、原始瓷等，其器型种类与器表纹饰在一些西周至春秋遗址中都能见到。在土墩墓分布地区往往有同期遗址存在。如南陵千峰山墓群以西不到1千米的牯牛山水城遗址，两者时代相同，出土遗物特征也十分相似，两者关系十分清楚，遗址是生前生活居住之所，死后则葬在附近的高冈上。另外在南陵的江木冲等先秦铜矿遗址附近也有大量的土墩墓遗存，几乎凡有先秦古铜矿的地方都有土墩墓遗存分布，这表明土墩墓的主人曾是当时的矿冶者。

关于土墩墓的族属说法不一，有句吴说、荆蛮说、古越族说和吴越族说等。《汉书·地理志》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商周时期，今江浙及江南大部分地区为古越族分布区，号称百越。皖南地处东南，应为古越族活动地区之一。《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太王欲立季历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建立吴国。吴立国在西周时期，中心在今宁镇地区，与皖南相连。吴国之南，今浙江有越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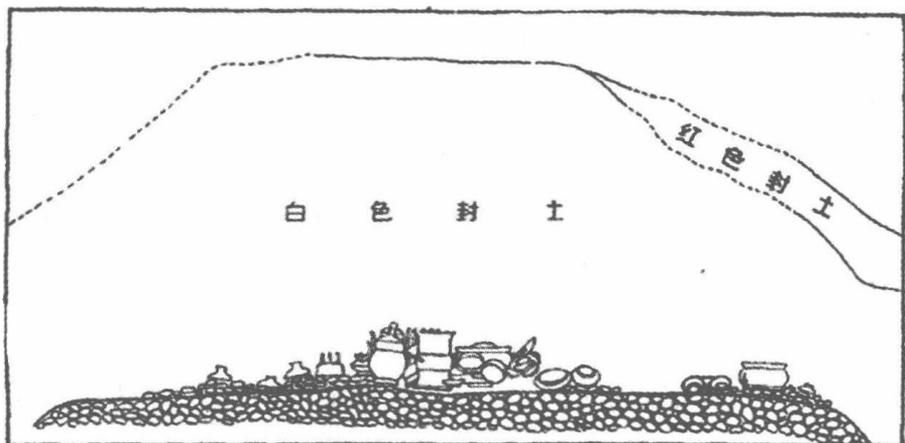
关于土墩墓的埋葬习俗在古代文献上有记载。《越绝书·吴地传》曰：“夫差冢在犹亭西卑犹位，越王侯干戈人一掬土以葬之。”这一记载说明，吴王夫差自杀身亡，越王使随从士兵每人用小竹笼盛土来葬吴王。用竹笼盛土而葬，而不提挖墓坑之事，表明是土墩墓的葬俗。《越绝书·纪策考》载伍子胥言：“吴、越为邻，同俗共土。”文献记载表明当时吴、越虽有两国之分，但其族属实为一族。从土墩墓的分布范围看，两地均有，反映了葬俗一致性。

土墩墓在各地兴盛的时间不一，尤以太湖以南地区为早，最早可以达到商代，其后这种葬俗有逐步北移的迹象，目前在宁镇、皖南一带发现

的土墩墓年代最早只能到西周时期。皖南土墩墓兴起于西周时期,在西周中后期至春秋广泛流行,至战国逐步消失。从土墩墓的流行时间和分布看其与吴越族有关,在吴国强大前后属于吴国,公元前 473 年越灭吴后,吴又被纳入越的版图。公元前 334 年,楚伐越、灭越,楚统一故吴越地区,土墩墓的葬俗也逐渐被楚国竖穴土坑墓所替代。

**发掘经过** 屯溪(今黄山市)位于安徽南部新安江上游,属皖南丘陵地区,四周山峦起伏,中为盆地,自古以来就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商业重地。“屯溪”一名大约始于东吴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在上世纪 50 年代之前,人们全然不知。1959 年由于在屯溪区西郊 5 千米的弈棋村南面约 1 千米的地方开辟民用机场,发现了两座古墓,随即进行了发掘。后经多次调查钻探,发现这里有不少大孤堆,之间相隔不远,少则数十米,多则千余米,应该是一处古墓群,通过对前两座墓的发掘得知,墓葬为一堆一墓。随着机场的扩建和当地村民烧窑取土,至 1975 年,在近 3 千米范围内,先后四次发掘土墩墓计 8 座。在这 8 座墓中,1、3、5、8 号墓保存得比较完整,其余 4 座在清理前已遭到严重破坏。同时还在周围探明 10 余座土墩墓,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及时发掘,现已被夷为平地或被压在后来的飞机场跑道下了。

1 号和 2 号墓是最早发掘的两座墓葬。1 号墓距离弈棋村不到 1 千米,地面上孤堆保存较完整,发掘后发现墓底的地面略高于当时的田畈,



屯溪 1 号土墩墓结构

墓葬是在整平墓底的地面上铺设一层约 25 厘米的鹅卵石筑成的,其上再加封土,封土较纯净,未经夯打,土质显得较松散。整个墓底是东西长、南北宽的长方形,其南、北各长 8.5 米,东西宽 4.4 米。孤堆直径 33.1 米,高 1.75 米,墓中看不见人骨架和葬具,随葬品在清理前当地群众就取出了原始青瓷器 22 件,后都一一追回。2 号墓位于 1 号墓东北 200 米处,位于一个山冈的尽头。发掘时发现墓葬已遭后代挖土、埋坟破坏,但墓葬结构与 1 号墓相似,墓底也是铺着鹅卵石。从残留的痕迹看,墓葬东西长 5.2 米,南北宽 2.2 米。幸运的是墓中还出土了几件青铜器和其他器物。

1965 年 1 月至 3 月,又断断续续地发掘了 3 号和 4 号墓。以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 3 号墓为例,3 号墓东北距 1 号墓 300 米,与后来发掘的 2 号墓也很近。3 号墓发掘前有突出的封土堆,土堆东西长 33 米,南北宽 26 米,堆高 3 米,具有相当的规模。当两座墓的封土慢慢地被揭露后,成组的器物便暴露在发掘者的眼前。墓中随葬品种类丰富,包括原始瓷、玉石配饰、青铜器、陶器等,各类器物大多摆放整齐,显然没有遭到盗墓贼的侵扰。这一发现使得发掘者欣喜万分,尤其是青铜器的发现,说明这里至少是一处秦汉之前的墓葬,而这里以前从未有过类似发现。铜器多放置于墓的东部和中部偏西的地方,玉石器放置在两组铜器之间,原来的地面上还有一片白灰痕迹,不知是何缘故。在墓底的几个角落放置着原始瓷器和陶器。从随葬品放置的位置看与当时的葬式有关,一般放在墓主的头部或足部。



1 号墓铜器出土时情景

经过统计,这座墓葬共发现青铜器 54 件、原始青瓷 89 件、陶器 16 件、玉石器 57 件。器物之丰富,令人始料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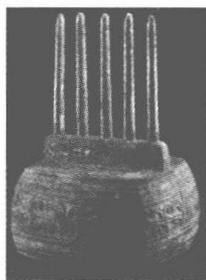
时隔 7 年后的 1972 年,又接着发掘了三座墓,编为 5、6、7 号。其中 5 号墓随葬品中以原始瓷为大宗,也有少量陶器和青铜器,在墓内的摆放和 3 号墓也较相似。1975 年又进行了第四次发掘,仅仅发掘了一座墓葬(8 号),这座墓距 5 号墓 300 米,当地人称为中门墩,孤堆高 4 米,直径 19 米。此墓外观看似较为宏大,可是随葬品却很贫乏,青铜器类的,只发现了一把青铜剑,此外还有 15 件原始瓷等器物。

四次发掘发现,这里的墓葬不仅基底是用鹅卵石铺底,封土堆中往往也混杂着鹅卵石层,有的在封土中部,有的在上层。奇怪的是,这里每个封土堆后都有一个池塘,但池塘挖于何时,当地人也不知道。考虑到这些水塘的特定位置,加之当地土层中也含有砾石层,我们猜测这些水塘可能是就地取土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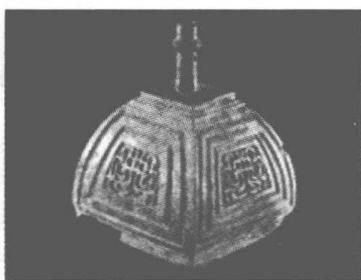
**重要发现** 屯溪 8 座土墩墓的引人注目,除了因为土墩墓将商周时期南方的奇特葬俗昭然于世外,墓内发现的大量随葬品也是世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屯溪土墩墓因有的被破坏,或资料发表不全,无法准确统计随葬品的数字。但从已经发掘的保存完整的墓看,大体有青铜器、陶器、印纹陶器、原始瓷器、玉石器等五类,此外还发现有漆皮残片。根据这些器物特征,可大致判定这批墓葬的主体年代属于西周,有的可能稍晚,但应该在春秋时期之前。各墓随葬品多寡不一,3 号墓数量最多,有 191 件,五类随葬品均有;少的为 8 号墓,有 20 件,青铜器仅有剑 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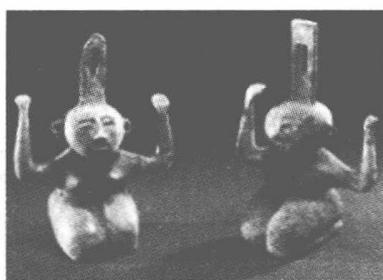
青铜器总计 107 件,有圆鼎、越式浅盘鼎、小方鼎、簋、盘、卣、尊、刀、剑、斧、戈、矛、铍及鸟形饰、五柱形器、跪人俑、兽形器等。青铜礼器还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为鼎、簋、尊、卣、盘,分属食器、酒器、水器三类,每种器型多为偶数,2 件或 4 件,多为一对。从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看,可分三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原式样,占全部礼器 60 件的 8.3%,仅为少数。与中原青铜器纹饰雷同的有兽面纹、凤纹、象首纹、蝉纹、夔龙纹、雷纹、弦



五柱形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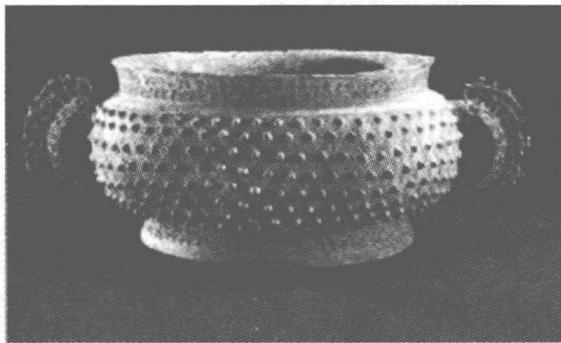
青铜插座



跪坐铜人



凤纹方铜鼎



乳钉纹铜簋

纹、圈点纹、鱼鳞纹、涡纹、四辨纹等。第二类是模仿中原式样,但也有地方特征。器型上如附耳盘、扁鼓腹尊、矮足方鼎、宽腹簋等。这类器型占全部礼器的大部分。纹饰上表现为模拟中原式样,但纹饰的整体或局部总有一些不一致或改变的地方。如龙纹、蛇纹、蛙纹、云纹、乳丁纹、直线纹、三角纹、蜥蜴以及变形的兽面纹、兽纹、鸟纹等。

第三类是完全新颖,中原及别处少见,具有地方特色。器型上如五柱形器、单柱器、牺尊、盂等。纹饰上如变形的兽或鸟纹、米虫纹、交连纹、草绳纹、网格纹、几何形纹等。综观屯溪铜器风格,除少量中原因素外,大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有些器物的功用至今也未能知晓。

原始瓷器数量最多,器类复杂,但工艺粗糙,釉色多呈褐绿色,也有青灰、豆黄及黄绿色,有的釉易剥脱。器类有尊、盂、豆、钵、罐、盃、壶等。尊有两种,一种大口、长颈、扁圆腹、高圈足,数量较少;另一种为小口,短颈折腹或圆腹,矮圈足,数量较多。盂、豆、碗类器型较多,变化较大。盃有两种,一种为盖、身混为一体,腹有短流和短鋈;另一种为提梁式,有盖或盖、身合一。壶多为小口,圆腹平底。器表装饰,尊、盃、壶、甗、尖口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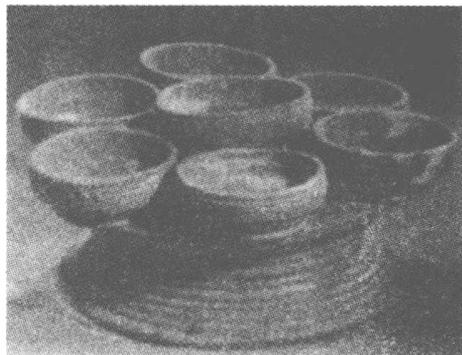
原始青瓷盃



原始青瓷尊



原始青瓷甗



原始瓷盂圆座

的器表多为凸棱纹,在一些器物的肩部或腹部多饰有折线纹、网格纹、小方格纹、弦纹等,此外还流行两个一组的圆泥饼和横装扁耳盥等贴饰。

印纹硬陶器数量较多,火候较高,器型有鼎、甗、瓮、罐、尊、壘等。鼎为高侈口,鼓腹,沿上两半环状立耳,三锥状足外撇,造型比较特殊。器表一般饰有方格纹、折线纹、弦纹、斜方格纹、菱形纹、三角形叶脉纹等。

陶器较少,多为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有小陶盂、小陶钵、器盖及菱形、算珠形纺轮等。玉器类有玉饰、圭形石料、方形石块、砺石等。

## 2. 江南水城和它的主人——南陵牯牛山遗址与千峰山土墩墓群

春秋晚期,长江下游曾出现一个显赫一时的诸侯国,它就是吴国。史载商代末年,“吴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

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文王之子武王灭商之后,找到了仲雍的后人周章,正式册封周章为吴侯。

吴国的政治中心是由宁镇丘陵地区向太湖平原地区不断迁徙的,最后在春秋晚期定都苏州。文献中记载的吴国的城址名倒有不少,像《左传》中的鸠兹城、朱方城,《吴越春秋》所载的阖闾城,《越绝书》中也有不少吴国城址名称。要探索吴国城址的存否,安徽至江苏沿江南岸地区也就成了探索的重点区域。

在这一条狭长的地带中,近几十年陆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大型城址,代表性城址有常州武进淹城遗址、丹阳葛城遗址、安徽南陵的牯牛山遗址等,2010年又在苏州附近发现了一处大型城址,这些城址当时是否为吴国都城还有待考证,不过它们所呈现的城址特征、独具的南方特色,很值得研究。这些城址中牯牛山遗址与江苏的淹城遗址是最早发现和发掘的两处,其特征也较明显。

淹城遗址的布局很特别,有三重城墙和三道护城河,将整个城址分为外城、内城、子城三部分,是目前保存最好的一处春秋时期古城,可能就是吴太子季扎所封的“延陵”。淹城的城垣均系土累筑而成,没有版筑和夯筑的痕迹,和中原一带城址建筑方式有很大不同。外城呈不规则圆形,周长2580米,墙体残高10米,底宽25~50米,外城之外还有一道外郭。三道护城河均有水道相通,并有水门供出入。除水门外,三道城垣各有一个城门。淹城四周及城内发现了大量的土墩墓,相传为淹君子女冢。历年来在这里出土过大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文化遗物,其中不乏一些精美的青铜器、原始青瓷器等,另外在内城河里还出土过四条独木舟,年代基本都在春秋时期。关于淹城的性质,目前还有争议,但从该城规模及其所在位置看,应为吴越对峙时期驻扎军队的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小城堡。在淹城附近还发现了具有同样性质的小城留城和胥城。

综合这些吴国古城看,其建筑方式独树一帜,常利用堆筑法建造,墙

体较宽,而且未挖基槽。南方土壤多湿,黏性较大,与北方黄土有很大不同,这里利用土壤自重沉降,并且加宽墙体,就能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吴国古城年代从目前发现看来,除牯牛山古城外,其他基本都属于春秋时期,尽管文献上对吴国早期都邑多有记载,然而至今也未发现一座吴国早期城址。但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后半期的吴国古城却大量被发现,这一现象与当时吴国势力强盛有关。吴国古城布局形制较复杂,既有单重城垣,也有双重、三重城垣。城的平面一般为长方形或方形。从城的位置看,既有依山傍水的,也有四周环水的,甚至有依山而建的。因为这些古城多未经发掘,缺乏相应资料,因而其有关性质只能根据出土或采集的文化遗物、城址的位置和文献资料来推测与分析。

**发掘经过** 牯牛山城址位于安徽省南陵县石铺乡先进村境内,1985年被发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外考古界专家、学者的关注,先后有多处考古研究单位的百余名知名专家和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及我国台湾的考古学者来这里参观、考察。

由于它形似浮在水中的牯牛,故而称之为“牯牛山”。因地面植被多,实地踏查难以了解其全貌,过去一直认为它仅是一般的台形遗址。1997年至199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遥感考古开放实验室、安徽省地质遥感中心合作,对南陵牯牛山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考古发掘。通过遥感调查发现,航片上显示出该遗址四周分布着由四条古水道造成的线形影像,组成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图案,在此范围内均有文化层发现。初步判断外围古水道即为当时的护城河,是一处以水为障的水城城址。航片上显示的水道现大部分已淤塞,略低于两边地面,局部有水地段现被辟为养鱼塘。护城河宽20~30米,在南部中段、西部北段和东北角各有一水口,分别与青弋江和漳河故道相通。

199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对古城进行首次发掘。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原始瓷器和石器、冶炼铜渣等百余件,标本数百件。器类主要有鼎、鬲、豆、釜、甗、罐、孟、盆等,从器形分析,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可以形成独立的考古文化

类型——“牯牛山文化”，同时它又与周围各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牯牛山城址不远处的南陵县城东葛林乡千峰、官洲两行政村内的丘陵冈垅上，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人工堆建的土墩，范围约13平方米。这些土墩坐落在一条条山垅上，排列有序、密集，数以千计。当地人以墩喻山，称这一地区为“千峰山”。千峰山上的众多土墩究竟建于何朝何代，有什么用途，曾是一个历史谜团。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地群众在兴建农田水利或建造房屋平整这些土墩时，常常出土一些古代的陶、瓷器和少量的青铜器。种种迹象表明，这里的土墩可能是古代的墓葬。

1984年10月，南陵县文物部门对千峰山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这些土墩下面埋着古代生活器物，是一种墓葬形式。同年11月，省、县文物部门配合芜南公路取土工程，发掘2座土墩墓，出土春秋时期青铜鼎1件、原始青瓷豆2件。1985年五六月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安徽大学毕业生实习，在千峰山区选择千峰林杨、吴冲村、葛林窑厂等三个点发掘土墩墓18座，出土西周时期的陶瓷器、印纹陶器、铜器等生活用具40余件。两次考古发掘，使人们对这处土墩墓群的特点、时代、族属等学术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重要发现** 1998年的考古发掘发现，古城由四个高台地组成，四周分布着四条水道（即护城河），西南有进水口，东北有出水口，形成规则的长方形，长约900米，宽约750米。最高最大的台地为主城部分，其余为辅城。每个台地之间有水道隔开，以索桥相连，水道与外围护城河相通。护城河宽约20~50米，虽然历经数千年的沧桑，部分河段已经淤塞，但大部护城河现在仍为河道或水塘，护城河与古城原貌轮廓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古城有主次之分，功能有别，说明古城设计合理、布局严谨，从而达到既可防御又可进攻的目的。古城四周有人工堆建的夯土城垣，现在仍有残垣保存。城内有大量的红烧土和炼铜铜渣、制陶遗迹以及生活遗迹，文化层厚2~3米之间，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除此之外，

还发现了炭化了的稻谷、稻草以及打鱼使用的网坠等，证明了居住在牯牛山古城的先民们依靠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和捕鱼业为生计，同时还熟练掌握高温烧制耐用的印纹硬陶器技术，也能冶炼冰铜和铸造出精美的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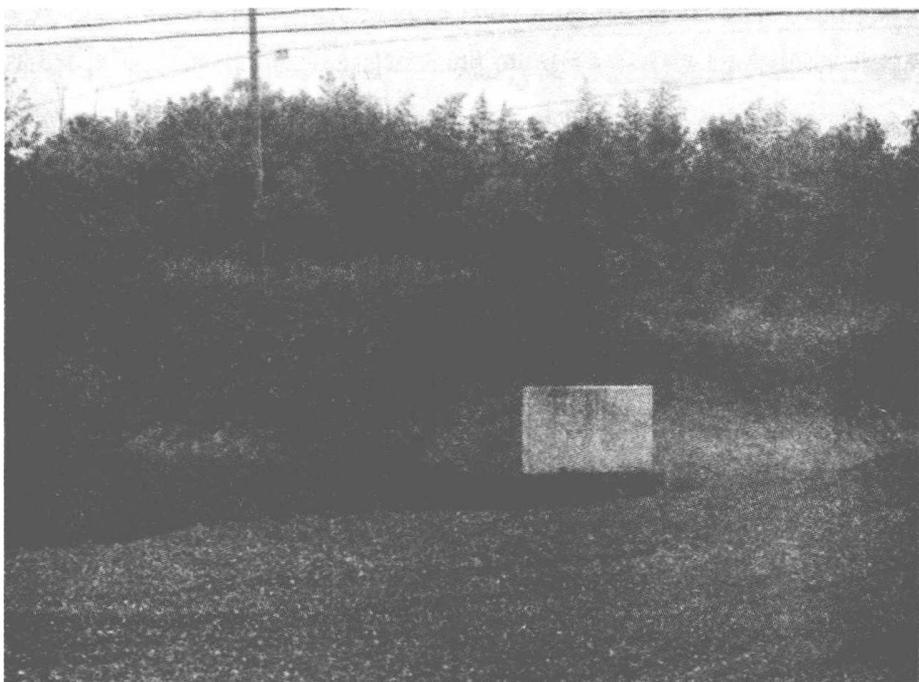
牯牛山城址是利用水道为屏障构筑的，并与当地水系相连，其构建方式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江苏淹城城址有三周护城河和城垣环绕，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而牯牛山城址仅有一周水道，且未发现城垣，这可能与城的性质和用途有关。牯牛山西周城址地处山地与平原圩区的交界地带，河网密布，交通便利，环境优越。在城址西南约 1 千米处，为千峰山土墩墓群，面积有数平方公里，分布着密集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群，与城址年代相当，出土器物特征也相同，二者应是一个整体。在城址以西约 20 千米即是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分布的中心地带，牯牛山城址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应与当时的铜矿大规模采冶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牯牛山西周古城地处山地和平原的交界地带，周围河网密布，交通十分便利。距古城西南 1 公里处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千峰山），古城以西 20 余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大工山铜矿开采遗址群的核心区域。三地皆出土了大量的生活器具，同一类器物的造型、纹饰、质地、特征完全一致，表明三大遗址为同一时期、同一行政区域范围。因此这座城址的修建应与当时大规模开采铜矿有相当的联系，可能是西周时期吴国的开采和冶炼中心。它的发现对研究吴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填补了本地区先秦史的空白，尤其是对探索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8 年 5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研究表明，土墩墓在苏南、浙北、赣北都有分布，以苏南宁镇、皖南地区最集中。这一广大地区，先秦以前属于古吴越族的活动范围，土墩墓存在的时间与吴越的兴起与衰落过程相伴始终，属于古代吴越族特殊的埋葬习俗。春秋以降，中原普遍出现墓上起冢的做法，这是受江南吴越土墩墓影响而逐渐流行起来的葬制。战国中期，楚灭越，土墩墓葬

俗逐渐被楚挖坑堆冢的葬俗所取代而基本绝迹。千峰山土墩墓群数量多,范围大,保存完整,对探索这一地区古代土著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千峰山地处南陵,繁昌地处南宣盆地的西部,西南与铜陵接壤,大工山、天门山、凤凰山等群山连绵,为先秦古铜矿遗址分布区,其他地方多为低山、黄山丘陵和平原地带。土墩墓多沿漳河及其支流分布,在南陵的葛林、五里、峨岭、戴镇、家发、麻桥、三里、烟墩、何湾、丫山,繁昌的新林、平铺、峨桥、孙村等乡镇都有广泛分布。1997年,人们运用遥感技术在南陵境内发现土墩墓群23处,初步辨认土墩墓3019座。由于长年雨水冲刷加上农田改造、平整土地,不少土墩墓外观已不明显,因此实际数字要远远大于上述数字。像南陵的千峰山、九龙凸、乔村、繁昌的万牛墩等均为大型墓群。该区土墩墓曾出土过不少陶器、印纹陶器和青铜器,如青铜器有吴王光剑、龙耳尊、鼎、剑、矛、戈以及青铜工具等,但多为零星出土,有关墓葬资料不甚完整。经过正式发掘的土墩墓主要有南陵千峰山的19座墓。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一隅



千峰山土墩墓的基本特点是：墓选建在地势较高、土层较厚的丘陵冈峦上，顺沿冈脊，密集分布。土墩的建造方式是：将地面稍加平整，放好尸体或棺木、随葬品，选用附近纯净、细腻的橙黄色土平地起堆，不加夯实。墩建后呈馒头状，墩高 1.8 ~ 3.8 米，底径 12 ~ 30 米左右。估计原墩首较高，因长期水土流失，高度降低，墩的底盘逐渐增大。这里的土墩墓基本是一墩一墓，未见棺木葬具及人骨痕迹，推测这与南陵地处红土层地带，土质酸性高、有机物难以长期保存的原因有关。在个别大墩上发现有上、下两层墓葬，是分属于两个不同时期的墓葬。土墩墓的随葬品放在墓葬中心，一般有 1 ~ 8 件，多的达 10 件以上，也有一件随葬品都没有的空墓。随葬品有陶瓷器、印纹陶器和少量的铜器。铜器种类有鼎、盃、剑、戈等。印纹硬陶器种类有罐、坛、甗等。陶器有鼎、鬲、盃、钵等。陶器和印纹硬陶器大都比较粗糙，可能是就地烧制的产品。从墓葬出土遗物分析，千峰山土墩墓群的建造时代以西周、春秋为主，距今已有 2000 多年了。

千峰山土墩墓群是当地土著居民的一处大型公共墓地。从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看，当时的社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别，但悬殊不大，尤其是供贵族使用的青铜器出土较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初步研究表明，千峰山地区偶出青铜器的大约为“士”一阶层的墓葬，绝大部分为平民阶层的墓葬，至于那些空墓，估计属于地位低下的奴隶或“凶死”的人。

### 3. 南方之金——皖南古矿冶遗址

青铜时代在考古学上是指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地，开始于公元前 3000 年。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 21 世纪，止于公元前 5 世纪，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 1500 年的历史。由于青铜资源稀缺，在青铜时代的早

中期阶段,青铜器往往显得异常珍贵,常被视为显示身份的“礼器”,而制作铜器的铜料也成为赏赐之物,当时称之为“金”。可以说,在商周时期谁掌握了青铜资源,谁就控制了政局。就目前已经发现的各代青铜器数量来看,当时制作铜器所消耗的铜料很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巨量的铜料资源来自何方,近几十年来一直是被关注的问题。

史载江南自古即是铜锡的产地。《尚书·禹贡》记载:天下九州,仅南方荆、扬两州是重要铜产地,曾“厥贡惟金三品”,北输中原王朝。荆州,即今两湖地区及江西大部。扬州,即今安徽淮河以南至江浙地区。这两个地区横跨我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铜矿资源十分丰富。《诗·鲁颂·泮水》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古人以铜为金,南金泛指南方产的铜料,表明当时南金十分著名。从我国铜矿资源分布看,南方及西北各省相对集中,约占全国3/4强。其中41%集中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和赣东北地区,其次为云南(占12.14%)、西藏(约占7.17%)、甘肃金川—白银(占6.66%)。而在黄河流域,除山西较多(占5.79%)外,陕西、山东、河南等地铜矿点甚少,且蕴藏量不丰富,铜矿资源匮乏。三代时期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其铜资源若仅靠中原地区生产难以满足当时青铜器铸造的需要,必须由外地输入。位于中原以南的长江中下游的沿江及以南地带是我国有色金属的重要蕴藏带,其北起江苏南部,经安徽、江西至湖北,延绵数百千米,主要蕴藏有铜、铁、铅、金、银、锡、锰、锌、钨等矿。该区域内的大冶铜绿山、瑞昌铜岭、铜陵铜官山等铜矿矿石品位高,富矿约占40%,而且适合古代技术条件下开采、冶炼。

目前已发现的先秦铜矿,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较少,主要有内蒙山西大井和山西中条山,大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长江中游有湖北的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等,在长江下游有安徽皖南的南陵、铜陵、繁昌及江北枞阳、安庆等地的先秦铜矿点等。就时代而言,中游地区以瑞昌铜岭的年代最早,可达商代中期;皖南区以铜陵木鱼山的年代最早,可达西周早期。从规模和时代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采冶活动不仅

规模大,而且时代早、延续时间长,应是南方重要的产铜带,即南金产地。

当时南金北输中原王朝的方式,主要有“贡金、献金、交易、馈赠和俘金”等多种途径。前四种途径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而后一种则是依靠征伐掠夺。在西周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向南方用兵征伐荆和淮夷,掠金、俘金的记载屡见不鲜。根据这些铭文记载,周王朝用兵淮夷除征服外,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打通“金道”,掠夺那里的铜资源——南金。

《禹贡》载扬州贡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此道从太湖笠泽(今吴淞江)出海,沿海北行,达于淮口,溯淮而行,至于泗水,分两道,一道沿泗水北上达黄河流域,另一条继续西行沿涡、颍水上行至中原。春秋后邗沟开通后,可由江直接进入淮。从皖南及沿江产铜区的地理环境看,西周以前走这条水路绕行路远,风险大,似乎不大可能。当时的交通最可能的是水陆并用,即由皖南矿区的大通河、秋浦河、青弋江等支流进入长江,沿裕溪河进入巢湖,再转陆路经北淝水等进入淮水,然后沿颍、涡、汝等支流上溯进入中原。此外,淮水以北为黄淮平原,地势平坦,当铜料进入淮河后,亦可经泗水或陆路进入中原或海岱地区,上古时应有陆上通道。

关于皖南古铜矿冶炼物输出路线,近年来有人从科技考古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通过对淮北地区出土的商代至春秋的铜器标本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有部分标本的微量元素含量与铜陵地区古铜矿冶炼产物所含元素相吻合,进而推定其部分铜料可能来自皖南古矿区。这为南金北输提供了依据。

皖南先秦古铜矿兴起于何,文献尚无明确记载,但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至少在西周时期该区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铜矿采冶活动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皖江铜矿的开发已进入重要发展时期。一个地区的铜矿采冶活动,一般有一个技术兴起、发展、兴盛的发展过程。既然沿江地区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大规模的采冶活动,那么在此之前应有一个兴起阶段。另外从当时的采冶技术看,至西周时期这里已经使用硫化铜—冰铜—铜工艺技术,铜矿采冶技术已比较成熟。综观世界矿冶史,铜矿的开发与

冶炼有一个从氧化铜矿至硫化铜矿的认识发展过程,同时也存在一个工艺技术发展过程。采冶硫化铜矿必须经过开凿深井、采矿、焙烧去硫、反复冶炼等多道工序,在工艺技术上比采冶氧化铜矿更为复杂、更为进步。从铜矿采冶技术的发展规律分析,既然在西周时期皖南先秦铜矿采冶技术已臻于成熟,那么在此之前还应有个氧化铜矿—铜工艺的发展阶段。皖南铜矿区氧化带蕴藏丰富,厚达 30 米左右,客观上具备了这一条件,因此皖南先秦铜矿的开发时间可能要早于西周时期。

**发掘经过** 安徽沿江地区产铜,史书屡有记述,但多为零星记载,难窥其貌。早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人们曾在铜陵的铜官山、凤凰山等地现代矿山勘探和建设中,发现过一些古代“老窿”、冶炼点和采矿工具,但因重视不够,大都遭到破坏。1984 年以来,在全省文物大普查中,先后于皖南的南陵、铜陵等地发现一批古代铜矿遗址,引起了国家和省文物部门的重视。1986 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当地文物部门合作,对沿江地区进行了古铜矿专题考古调查,陆续发现了一批先秦时期的铜矿遗址,并对其中的一些遗址进行了发掘,逐步揭开了该区先秦铜矿的神秘面纱。

这些铜矿遗址可分为采矿和冶炼两类,其中先秦采矿遗址大多因年代久远、地貌变迁而不易发现。经实地考察的采矿场、采矿井,大都是群众在开采铁矿或铜矿时发现的,当地群众俗称“老窿”、“老洞”。古代采矿场的范围大小不一,主要视矿床结构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定,面积在数千乃至数万平方米不等。一般采矿场内有成堆的废石、含有铜矿的贫矿石、坑木以及大量的生活陶、瓷器残片等。冶炼遗址因地表遗弃有大量的炼铜废渣而易被发现,一般小的仅有几千平方米,大的达数万乃至 10 万平方米以上。遗址内有成堆的炼铜废渣、红烧土残炉壁块、废矿石以及陶、瓷质生活用具残片等。南陵江木冲冶炼遗址规模最大,其坐落在海拔 80~104 米的丘陵地带,冶炼点散布在马家冲、六口塘、乔村、江木冲等区域,范围达 1 平方千米以上,遗址内炼渣估算至少有三二十万吨。

先秦铜矿遗址集中分布在今铜陵狮子山、铜官山、凤凰山、南陵大工山等铜矿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一般每个区域都有一群矿冶点,形成若干规模较大的古代采冶中心。其中尤以大工山区的江木冲时间最早。

江木冲在大工山山脚下,是一块河流环绕的荒石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这里还基本没有村民居住,因为地里面布满被当地人称为“铜屎”的疙瘩。“铜屎”就是铜矿渣,这在大工山一带并不少见。当年南陵县文物工作者来到这里,他们从在江木冲地表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陶片,推测江木冲是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址。安徽省和南陵县文物部门于上世纪末对这里进行了考古挖掘,结果发现了古窑炉十余座,其中保存了炉基的有3座。由于地表不适宜耕种,遗迹得以保存近3000年。学者们据此可以较清楚地认识到先秦古人的冶炼技术和方法。

经确认,这里是一处西周时期建立的大型炼铜遗址。炼渣堆积厚约0.5~1.5米,储量约50万吨。如果按每10吨渣出铜1吨来算的话,那么江木冲至少出铜5万吨,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在全国也极其罕见。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江木冲周代遗址中发现了10余块这种菱形铜渣。经过现代科学测试,它们是冶炼大自然中硫化铜的产品,叫冰铜锭。种种迹象说明,江木冲大型冶炼遗址的发现,是我国南方地区继湖北大冶铜绿山周代古铜矿遗址、江西瑞昌商周古铜矿遗址等发现之后又一重大考古成果。包括江木冲在内的皖南古铜矿冶遗址已于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牛洞是一处保存较好的古采矿遗址,位于铜陵县新桥镇凤凰村境内,距铜陵市区34千米,原为一小山丘,因西部山腰有一古洞而得名。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地群众不断在此露采铁矿,结果洞毁山平,进而凹陷成一个椭圆形采矿场,在西侧边坡上暴露出一些古代采矿井巷和采掘遗物。1987年以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和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先后数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多处古代采矿井巷和一批采掘生产工具,并在遗址附近相继发现不少古代采掘遗址和大量古代炼渣堆积。从清理出的古代采矿井巷结构和采掘生产工具、陶制生活器皿来



金牛洞采矿遗址

看,金牛洞遗址的年代始于春秋,下限不会晚于西汉。

金牛洞遗址仅为凤凰山古矿冶的一个采矿场,其西南面 800 余米处的万迎山上,古代炼渣遍地皆是,分布范围约 2 平方千米。另外,这一带还出土过铜锭和石质铸范,可见,凤凰山古矿区当时是一处规模较大的综合铜工业区。

**重要发现** 先秦采矿遗址主要有铜陵万迎山、金牛洞、枞阳井边等处。皖南先秦铜矿的采矿方法主要有井采和先露采再井采两种。前一种见于金牛洞。在金牛洞 1 号地点,1 号斜井和 1、2 号平巷及交叉点的上部,有一直径 7 米以上、深 8 米的大坑。这说明当时是找到矿苗后,沿矿脉下掘,先露采到一定深度后,再追踪矿脉凿井继续下掘的。井采一般为井巷联合开拓法,即找到矿脉后,向下追踪开采。井巷包括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等,掘进过程即是采矿过程。竖井口一般为长方形或方形,截面不到 1 米,深 5~10 余米。井底接巷道,巷道呈鼠穴状,弯弯曲曲,无固定的方向和水平,高低不平,一般长度在 2~10 米不等。巷道横



采矿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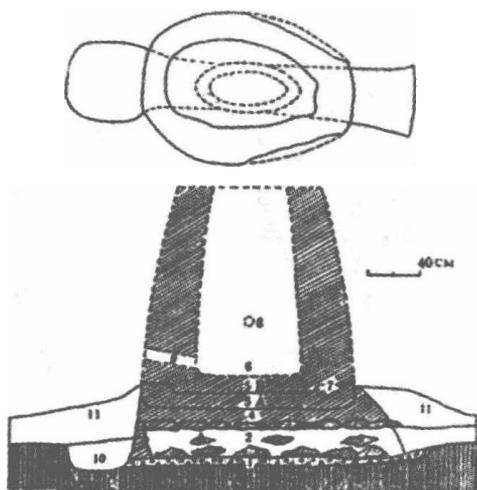
截面很小,直径在0.8米左右,仅能容身。在枞阳井边铜矿,当时最大采掘深度达50多米。

冶炼炉在南陵江木冲、铜陵木鱼山等遗址中,计发现炼铜炉遗迹10余座。这些炼铜炉结构大体相同,均为地面竖炉,但多残存炉缸以下的炉基部分,这与古人毁炉取铜有关。炼铜炉一般选择在斜坡通风处构筑,由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构成,炉体横截面有椭圆形、圆形两种。炉基有两种构筑方法。一种方法是在地上挖一条浅沟形成风沟,然后两边夯实,沟上面用土块或石块、渣块封顶,一端留有一进风孔,再夯实形成风腔,使之略高出地面形成炉基。风沟均用火烧烤去潮,有的呈砖红色,质地坚硬。另一种方法是在地下挖一浅圆坑,然后在坑中间用炼渣或石块筑成“一”字形风沟,再用渣块或石块封顶,一端留出一孔,形成炉基。炉基筑好后上筑炉体,炉缸在炉基之上、炉身底部,截面为椭圆形或圆形,缸的内径长轴为0.8米,短轴约为0.3米。炉缸以上为炉身,从江木冲等遗址倒塌的残炉身分析,原炉身高度至少在1米以上,若加上高出地面的炉基、炉缸部分,当时的炼铜炉复原高度至少在1.5米以上。炉壁厚度约在20~30厘米,上薄下厚,外壁面比较粗糙。在江木冲遗址,有的炼铜炉身内壁有一周直径约2厘米的竖沟槽,与今天的蜂窝煤炉内

胆壁十分相似,这种结构均有利于炉内通风,提高炉内温度。放渣坑一般在炼铜炉体的下方,为浅圆形坑,大小不一。渣坑底部及周边壁因受高温渣浸烤而呈黄色或青灰色。渣坑内堆积有粒度一致的细砂粒以及碎渣块。

**炼渣** 先秦时期的炼铜废渣十分丰富,大体有三种。一种是倒菌形,铁褐色,底部扁圆,上部细尖。渣体表面呈“挤膏状”,膏体直径1~1.5厘米,为滴滴痕迹,剖面多有气孔,这说明此类渣较稠,流动性差,推测是用铁矿石作为助溶剂造渣的结果。菌形渣一般直径在20~40厘米,重10~20千克,最重的达41千克,这大约是一次排渣的容积。若按1:10的铜渣比例计算,当时的炼铜炉一次可出铜1~2千克。第二种为扁平状渣,质较轻,颜色发黑,流动性好,应该是还原炉的炼渣。第三种是块状渣,灰绿色,背面弧凸,表面平整,有极细的波折纹,渣体组织结构致密,一般长30~40厘米、宽20~30厘米,重15~30千克。这种渣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冶炼水平要高于菌形渣。南陵江木冲出土的炼渣,经检测,含铜量在0.34%~1.30%之间,含铁量较多,在36.31%~64.52%之间。铜陵万迎山、木鱼山两遗址的炼渣,含铜量分别为0.43%和0.32%,含铁量为34.39%和18.49%。上述炼渣检测结果表明,当时的炼铜水平较高,有的炼渣已接近现代炼铜渣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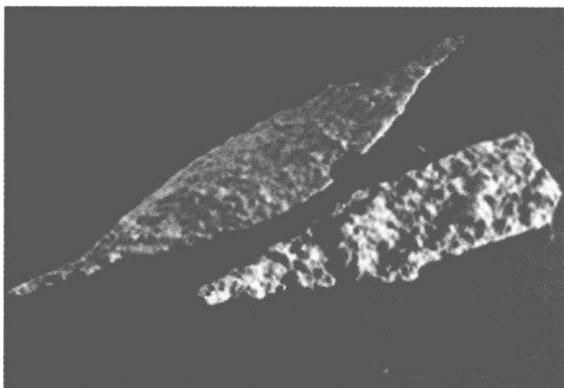
冰铜锭炼铜的最后产品形式是铜锭。目前皖南地区出土铜锭的遗址计有铜陵木鱼山、凤凰山、南陵江木冲等三处,均为铜板锭,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此外,20世纪70年代调查时,也发现过铜锭。上述铜锭均为长条菱形,表面呈铁褐色,有大块、小块两种。小块长11~26厘



冶炼炉复原图



铜渣



冰铜锭

米、宽7~10厘米,重1.1千克左右。大块长40~50厘米、宽5~12厘米、厚0.6~2厘米,重1.58~4千克。相类似的大块铜锭在贵池徽家冲战国铜器窖藏中发现7块,长78厘米、宽19.1厘米,重4.5千克。小块铜锭在繁昌马村、南陵等地的土墩墓中也有发现,计有20多块,时代为春秋。从铜锭的变化看,其时代略有差别,小块铜锭的时代可早到西周,大块铜锭较晚,可至战国时期。

这几批铜锭的化学成分以铜、铁为主,并夹杂有硅、硫、铝、砷、磷、钴、锰、镍、钼、铅、锡等多种元素。其主体成分是铜,其次是铁和锡,硫的含量都超过0.5%,研究者认为这些铜锭是利用硫化铜矿冶炼出来的产品。由此推断,在西周晚期皖南已使硫化铜矿—冰铜—铜工艺的生产工艺了。从冶金史角度看,冶炼硫化铜要比氧化铜矿更为复杂,这涉及矿石焙烧问题。一般硫化铜矿石不能直接入炉炼铜,需要在不超过800度的温度下长时间焙烧脱硫,使铜的硫化物料化为氧化物后,再投入鼓风炉中熔炼,产出含铁量较高的冰铜,再反复精炼,才能得到纯度较高的粗铜锭。矿石焙烧有平地堆烧、坑式反应式堆烧等不同方法,目前先秦遗迹中虽未发现明显的矿石焙烧遗迹,但推测当时可能已采用这些方式焙烧矿石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皖南先秦炼铜遗址中还发现有与铸造有关的遗物,如在南陵江木冲、西边冲、铜陵万迎山、木鱼山都发现过铅锭或铅块以及铸造标、凿、凿、铍类工具的石范。在炼铜遗址内发现石铸范和铅

锭,表明当时这里曾设过铸造作坊,就地利用铜原料,铸造一些简单的铜工具。其产品一方面供采冶铜矿生产之用,另一方也可能作为成品输往外地。

#### 4. 消失的古国——蚌埠双墩一号墓

两周时期,江淮之间小国林立,文献记载的就有如英、六、群舒、宗、巢、桐、州来等,有10余个之多,钟离国就是其中一个,大致位于淮河中游的南岸。

文献中对钟离国或钟离之地鲜有记载,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由于其地理位置承启东西、连接南北,是淮河中游地区的重要关隘,因此显得较为重要。据《资治通鉴》(卷一四六)记载,此城为“钟离天险”、“城堑水深”,乃为历代兵争之地。当时诸侯争霸,吴国与齐、鲁欲南北合纵,以抗楚国,而多会于钟离。

《左传》成公十五年(前576年)记载,“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魑,邾人,会吴于钟离”,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吴灭钟离,遂为吴地,战国初复为楚地。《左传》中记载的钟离国历史前后也仅有短暂的58年。

钟离国虽已覆灭,但钟离之名及其地域此后亦有因沿。秦时于钟离城置钟离县治,西汉因之;东汉为钟离侯国。三国时废,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复立钟离县;东晋安帝于县置钟离郡,又改县曰燕县。刘宋兼置徐州,萧齐因之。梁朝武帝曾命修钟离城。东魏为楚州治,北齐复曰钟离县。隋初为濠州治,后仍为钟离郡治。唐高祖武德初,改郡为州,复曰濠州,钟离县治移至城外。此后,钟离城虽不再为州、郡、县治,但钟离县名却一直沿用到元代。

钟离城建在淮河中游南岸,位于凤阳县临淮镇东2.8千米,北临淮河,颇为雄伟。城址东西宽360米,南北长380米,略呈正方形。城垣残高3~4米,四角残高5米,基宽18米,顶宽6米。四面有对称的四道城

门,现均为5米左右的豁口。墙外有护城河,现东边护城河尚存,南、北两边护城河已改为耕地,西边护城河已辟为大道。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30厘米。

城内南部地表遗物较多,有板瓦、灰绳纹筒瓦、云纹瓦当等,其他有残陶豆、泥质红色印花纹硬陶片和软陶片、红胎黑衣软陶片、平尖和锥状鬲足、鸭嘴形鼎足、陶纺轮、铜镞、古币(大泉五十、五铢)、粗瓷青釉器口残片等。近年来,征集到战国的青铜剑、铜镞、蚁鼻钱,西汉的青铜矛、铜镜、陶制“钟离丞印”、陶器等。

钟离古城选址考究,可谓“因天才,就地利”。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淮河自蚌埠以东向南形成了一“V”字形反转,钟离城恰好位于“V”字形底部,其东南有一片低矮丘陵。选址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势,使得城池易守难攻。钟离国作为春秋时期淮河中下游的交通要隘,地理位置十分显要,这可能也是当时诸侯于此会盟的原因之一。

春秋时期的钟离国究竟有多大?《吴世家》曰:“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居巢与钟离)而去(前518年)。”《楚世家》则曰卑梁为吴边邑,尽管表述不一,但卑梁作为吴楚交界确定无疑。据考证,“卑梁,春秋吴地,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如属实,钟离国东境则据钟离城至少在50公里以上。由此可以推断,春秋晚期的钟离国,其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安徽江淮地区的东北一隅,为楚国东疆之重镇。此外,一件钟离国铜器上有“东土至于淮之阳(上)”的铭文,说明钟离国东疆已达淮河之北。

不过由于缺乏实证材料,关于钟离城与春秋时期钟离国的许多细节还不为人知,一直到2007年5月的一次偶然发现。在凤阳县板桥镇卞庄的一处工地里,人们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形制特殊,为圆形竖穴土坑墓,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墓主人位于北部,南部放置随葬品。有殉人多具,以墓主人为中心,呈四周分布,每坑殉人数量不等,但均有葬具。现可辨殉人有十具。墓葬早期被盗,现存器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等。有

5件铜钟上存有铭文,为确定墓葬的国属和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一件铭文有“隹(惟)正月初吉丁亥,余口毕(厥)于之孙童丽公柏之季子康”之语,当时发掘者怀疑童丽就是春秋时期的钟离,而铭文中提到的“康”就是钟离公“柏”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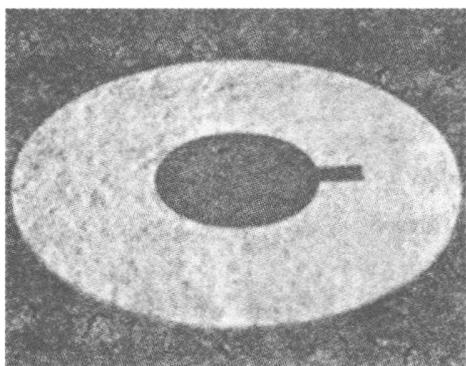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蚌埠的双墩也正在发掘一座大型土堆,规模更加宏大。这座大墓位于蚌埠淮上区小蚌埠双墩村,南距淮河3千米。当初,人们只感到墓葬封土高大,墓主生前地位很高。但它的墓主是谁,为何年代,引起人们不同的猜想。

**发掘经过** 蚌埠双墩一号墓坐落在淮河北岸的一个高出地表的原生台地上,因为这里有两座大土墩,因此这里被称为“双墩”。两座封土堆,呈东北—西南走向,之间相距80米。其中一号墓(发掘前由于不知这里的详细情况,暂称此处为北墩)所在地,解放后曾修建过一处雷达站,土台顶略被削平,墩里也被掏了一个山洞。2005年6月,土墩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利用当年的防空洞挖成的9米深的盗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盗洞并未破坏至墓底。由于这次破坏,当地政府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2006年12月开始至2008年8月结束,跨3个年头,取得重要收获。

该墓东距卞庄墓30多千米,为了弄清这里的情况,有关方面专门从洛阳请来了资深钻探高手,以了解土墩底下的结构。



蚌埠一号墓封土



白色垫土复原图



通过钻探和发掘得知,这里可能是一座墓葬,墓葬结构呈“垂”字形。但当考古人员按照这个形状发掘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墓坑边缘,让人感到很纳闷,难道这里不是一座墓?等发掘到墓道时,又发现墓道短而狭窄,而且离墓底有3米,也不符合一般古墓的形制,所以当时北墩一度被认为是祭台。怪异的北墩让考古工作者越发小心,他们边发掘边仔细记录,一层一层,小心谨慎,生怕漏掉了一丝信息。当封土被一层层推掉,封土堆下是一直径为60米的圆形白土层。紧接着,一放射形状的土层显露出来。在墓坑中间,由深浅不同的土色构成放射线遗迹,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有人说这是先秦的太阳图腾崇拜现象,有人说这是天文遗迹的象征。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更多的奇迹显露出来。2007年5月底,挖掘到北墩的第二层台时,一圈土偶呈现出来,形成一座墙,突出而壮观,但这个时候考古人员发现,发掘出的墓道口也到了尽头,但墓底却没有出现。这里到底是不是古墓?这一疑问又开始萦绕在发掘者的脑中。陌生而奇怪的墓制让领队阚绪杭没敢贸然下令进一步发掘。

随着梅雨季节的到来,考古人员不得不将精力放在修筑防雨大棚的事情上。而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令考古人员的思路更清晰了。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凤阳卞庄发现的圆形墓葬。至此,考古人员豁然开朗,判断北墩应该就是一个古墓,而且和凤阳古墓应属同一种葬制。凤阳古墓与双墩一号墓比较起来,其形制简直就是一号墓形状的“微缩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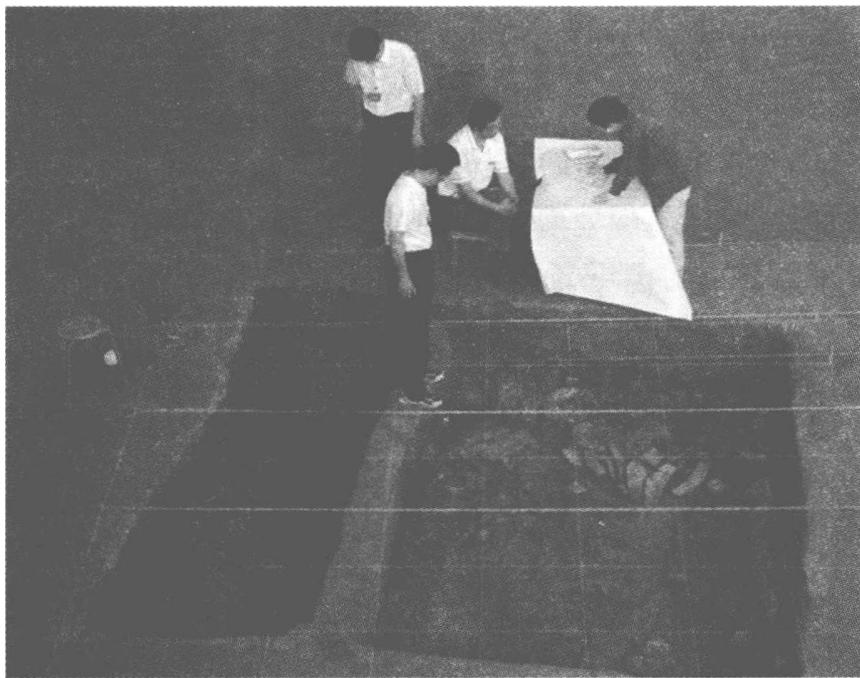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防雨大棚终于建成。由于蚌埠地下水丰富,5米以下就是流沙层,取土偶之前发生过小面积的塌方。发掘负责人阚绪杭果断停工,决定在原墓墙的内侧披上一层坚硬的水泥内衣,以达到防止塌方和保持原圆形墓型的作用。为便于以后的科学研究,在墓坑两面的侧壁各保留一块原始墓壁,包括封土的五色土和白土层,用玻璃器皿密封。到达流沙层后,渗水严重,又在墓坑的四周打了6眼水井,不断地向外排水。就这样,终于在2008年5月底清理完墓底。考古人员发现该墓坑果然和凤阳古墓一样,并出土了青铜器、彩绘陶器、石器、玉器等

共 400 余件。器物之多说明墓主生前地位之显赫。

经过近 1 年时间的发掘,蚌埠双墩一号墓葬发现国内罕见的结构独特的墓葬遗迹,也揭开了钟离国神秘的面纱。双墩一号墓也于 2008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重要发现** 在墓葬结构上,双墩一号墓的封土呈圆形,土堆底大顶小,高 9 米,底径 60 米,呈馒头形状。封土结构为堆筑,具有早期建筑特征,是目前淮河流域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墓葬封土堆之一。发掘中发现封土和墓坑内的填土均为五色混合花土,经过区分为黄、灰(青)、黑、红、白五种颜色颗粒土,其中黑色和白色土属于外来土。这种真正五色土的应用,似有一定的寓意。在封土堆底部还有一层白土垫层,较为吸引人的注意。白土垫层厚不到 1 厘米,平面呈圆形,其范围与封土堆底部大小基本一致。

该墓葬为圆形竖穴土坑墓,墓口直径为 20.2 米,墓坑深 7.5 米。墓坑 2 米下有宽 1.8 米的土台。墓坑壁抹一层厚约 3 厘米的白泥层。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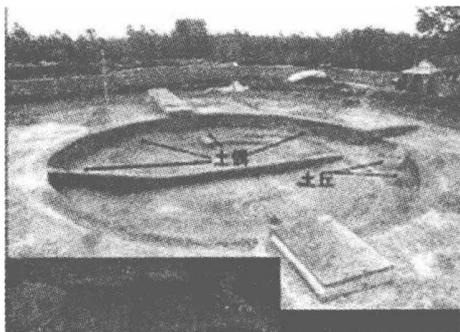


现场清理与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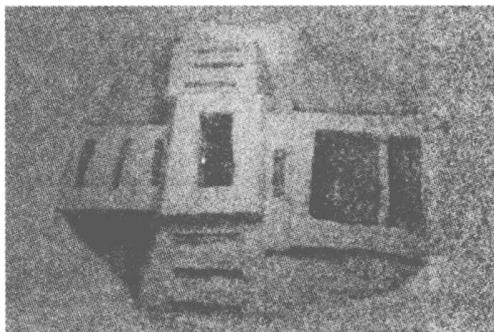
坑正东向有一条 14 级阶梯式短墓道延伸至墓坑内,墓口以外的墓道长 6.3 米、宽 3.2 米。墓道壁和底部全部用厚约 3 厘米的白泥抹平。

墓葬最值得重视的是在墓坑填土中发现极其复杂的遗迹现象。墓坑填土未经夯实,中间下陷明显,呈锅底状。在墓坑以上的填土中发现三层不同的由填土或“土偶”构成的遗迹现象,这些在填土中构筑的遗迹现象此前从未见过。由墓口至 0.7 米深的填土层中发现第一层“放射线形状”遗迹现象。“放射线形状”居中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分布,外周为宽约 2 米的深色填土带围绕。这种“放射线形状”遗迹是由深浅不同的五色混合花土构成,形状非常清晰。放射线共有 20 条,有一定的夹角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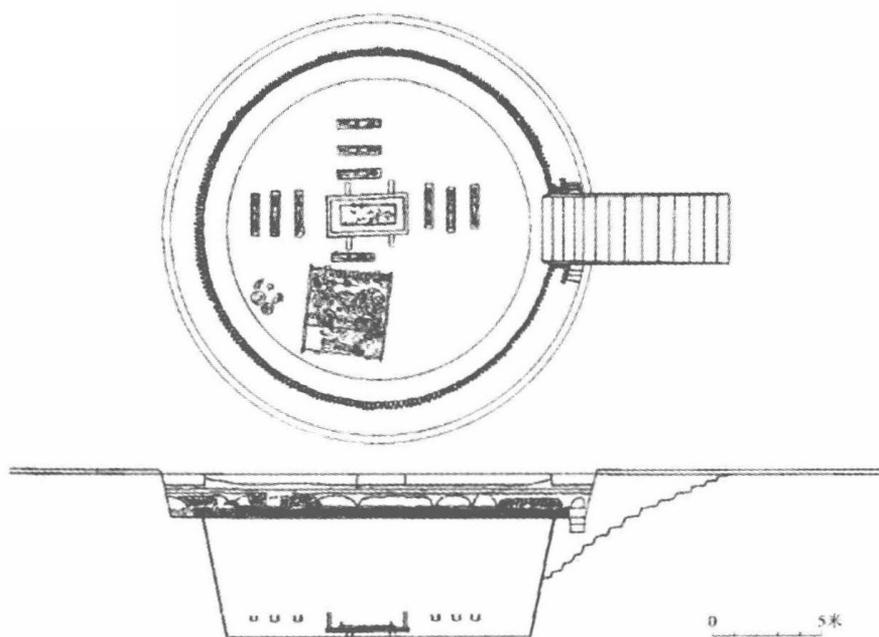
该墓的墓坑正东面有一条阶梯式短墓道,共分 14 级台阶,全长 6.3 米、宽 3.2 米。墓坑壁和墓道全部采用白泥抹平装饰,白泥层厚约 3 厘米,可看做墓壁的装饰,显得非常整洁美观而且气势宏大,加上在二层台内缘上分布有一周“土偶墙”,整个墓坑俨然一座地下宫殿。叠压在“放射线形状”遗迹层下,在距墓坑口较近的填土层中,发现“土丘”状遗迹,在该填土层中还放置有大量“土偶”。土丘是在沿着墓坑边一周约 2 米宽的范围分布,共有大小不同的土丘 18 个,基本呈馒头状,底径 1.5 ~ 3 米不等。从发掘的剖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土丘都是由中心开始用不同颜色的土逐层堆筑而成。在发现土丘的这层填土中,还放置有 1000 多个泥质“土偶”,靠近墓坑周边的“土偶”多成组分布。在距墓坑



土丘与土偶



墓室结构



一号墓平剖面示意图

口1.4~2米深的土台内缘,发现用“土偶”垒砌的遗迹,即用3~4层“土偶”垒砌成墙体形状的内壁。土偶墙与墓壁之间形成一条环行走廊,这条走廊用黄色泥沙封填,其上部平抹白泥层,与上、下方的墓壁泥层连成整体。清理掉土偶墙与墓壁之间的黄色泥沙后,“土偶”垒砌的墙体显得更加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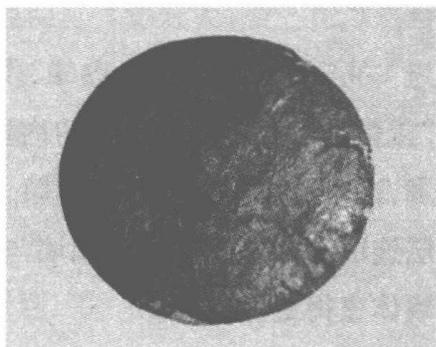
该墓葬坑深底大,圆形基底直径为14米。墓室内的葬具全部腐朽不存,发掘时仅见腐朽的痕迹。依据腐朽棺椁痕迹判断,主棺椁居中略偏北,围绕主椁室东、西、北侧各殉3人,南侧殉1人。与南侧殉人相临为南椁室,南椁室又分为南、北两个椁箱,南箱置食物(猪、牛、羊骨骼),北箱置器物。在圆形墓葬底部形成一个非常规整的“十”字形基底埋葬布局。从葬具痕迹来看,墓主为一棺一椁。在主棺椁内随葬有玉器、青铜剑、戈、戟和镞等。殉人均有较窄的木棺朽痕,多随葬青铜小刀和加工过的陶片,少数有海贝饰、骨笄等。人骨架保存较差,主棺内仅存几颗牙齿,经鉴定,年龄约为40岁。殉人牙齿鉴定年龄多在20~30岁,仅南侧殉人约40岁。因盆骨腐朽,不能鉴定性别。

**重要遗物** 该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主要放置在南椁室器物箱内,少量放在主棺椁内和殉人棺内,还有2件几何印纹硬陶器放在南椁室外的西侧墓壁处。随葬品以大量的铜器、彩绘陶器、石器、玉器为主,其他有少量的几何硬纹陶瓮、陶盆、灰陶钵、小陶罐等以及海贝饰件、金箔饰件等,计400多件。不包括另外编号的2000多件土偶和因腐朽无法记数的漆木器。铜器占大宗,包括容器、乐器、工具、车马器、兵器等。兵器中,镞的数量最多,有200多件。石器主要有石磬一组计12件,按大小排列,一端做龙首状。

出土器物中最为珍贵的当属9只青铜编钟,其上铭文清晰可鉴,均为“惟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鹿君柏作其行钟童鹿之金”,这20字可以证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钟离国君,名为柏。至此,蚌埠双墩一号墓主和凤阳卞庄一号墓主的关系也已经明确,他们是父子关系。



双墩一号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金箔

双墩一号春秋墓的发掘,是近年来先秦时期一次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

其一,墓葬的形制独特,遗迹现象复杂,是我国墓葬考古史上的重大新发现。该墓为大型圆形土坑墓,封土底部与墓坑外有“玉璧形”的白土垫层,封土和墓坑填土均为五色混合土,墓底呈现出“十”字形的埋葬布局。尤其重要的是在墓坑填土中发现了“放射线”、“土丘和土偶”、“土偶墙”等极其特殊的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从未见过的新的考古现象,是先秦考古的重大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墓葬考古研究的内容。

其二,这座墓葬的发现,揭开了钟离古国的神秘面纱,填补了有关钟

离国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的空白。过去涉及钟离古国的文献记载十分匮乏,该墓的发现,证明了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钟离古国存在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钟离国的地望和历史、钟离国君的世系以及钟离国考古学文化特征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起到了补史证史的重要作用。

其三,在这座墓葬中发现许多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现象,表明该墓是经过“精心构思、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精心施工”的一处重要遗迹。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为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形制结构和埋葬制度、埋葬习俗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对于探讨淮河中游的地域文化现象以及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 5. 最后的楚都——寿春城遗址

楚国,又称荆、荆楚,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半,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据《史记》记载,“楚之祖封于周,另为子男五十里”。这里所指的,时为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为楚君,居丹阳(今湖北省内)。虽已建国,但只能算是一个名卑地微的蛮夷小邦。然而,通过数代人的奋斗,楚国逐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随着实力的增强,楚国逐渐向北向东扩张。楚庄王时期(? ~ 前 591)更是“问鼎中原”,“一鸣惊人”,“开地三千里”之广,当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这使得楚国在春秋中期,就成了一统春秋霸业的有力争夺者。

到了楚威王(前 339 ~ 前 329)时代,楚国的版图已经是东起大海,西抵巴蜀,南起五岭,北至汝、颍、沂、泗,覆盖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楚顷襄王二十年(前 278 年),白起拔郢(湖北省枝江县城北 5 千米处“纪南城”),楚人未加抵抗就放弃本土东迁,“保于陈城(今河南省淮

阳)”。谁知这一“保”竟达 37 年。公元前 241 年,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由楚令尹黄歇(春申君)主谋,诸侯合纵。以考烈王为纵长、赵将庞煊为元帅,率赵、楚、魏、燕、韩五国联军大举攻秦。到了函谷关,遭遇秦军的埋伏和堵截。联军兵败如山倒,秦军前锋日趋逼近楚都陈郢。在此情况下,黄歇听从门客朱英之议,提请考烈士徙都寿春,是为寿郢。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以及寿春当地的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考烈王也就同意这条建议。这样,楚国在短短的不到 40 年的时间内,二迁其都。

楚立国 800 年,其间迁都频繁,据考证可能有数十次之多,其中丹阳、郢都、喏、鄢、成阳、陈和寿春等都城较为明确,若就建都时间长短和对楚国历史的影响而言,这七都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丹阳、郢为第一等级,陈、寿春为第二等级,喏、鄢、成阳为第三等级。其他别都、陪都亦可与第三等级的都城等而视之。

其中纪南城是目前考古工作做得较为充分的一个。该城址位于荆州城北约 5 千米处,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450 米,南北宽 3588 米,城内面积 16 平方千米。城垣四周现有 28 处缺口,其中 7 处为城门,已发掘了西垣北门和南垣水门。水门在中原城址中未见,是南方都城中的一个独创。纪南城内暴露在地面的台地、高地可以确定为建筑台基的有 84 处,其中东北部的纪城区有 15 座,东南部松柏区有 61 座,西北部徐岗区有 2 处,西南部新桥区有 6 处。纪南城可划分为东、西两大区。东区是王公贵族区,西区是平民生活区。城市布局与《考工记》所述营国制度符合。东区又进一步划分为三大片,中南区属宫殿区,东北区是楚官府制瓦作坊区,在这两区片之间的龙桥河沿岸,则为市场所在。其间也有一些官府作坊。但在东北区的 15 座台基遗址,规模较大,在这组台基的周围,覆盖着较厚的红烧土和红烧瓦砾层,可能是被火焚毁遗下的遗迹。由于东北区的台基遗址未经科学发掘,其年代尚不清楚,也不排除城市重心原在东北部,后经火焚毁而转到东南部的可能性。郢都是楚国定都最长的地点。城内外还分布着多处墓葬区,城内已发现 3 处,其中两处为春秋时代的小土坑墓,另一处墓葬则多为秦汉时期。城外的三

大墓区现存大中型封土堆 700 余座,多葬有楚国王公贵族,故城周围分布的墓葬更多。郢都长期是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城的规模宏大,遗迹甚多,文化堆积层较厚,特别是墓葬仅城外已发掘的就多达千座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属于战国晚期的墓葬极为罕见,这正与文献所记郢都被占,楚都迁陈的记载相合,说明郢都在公元前 278 年以后就废止了。根据记载,从公元前 689 年楚文王迁都至此,到前 278 年被秦将白起攻克,中间除一度迁都外,郢都存在 400 年左右。此城位于湖北荆州城北 5 千米,今属江陵县境。因其在圯山之南,故名纪南城。

曾作为楚都的寿县,由于年代久远,寿春故城早废,其城址问题长期以来成为考古学界专家们争论的一大焦点。按照清光绪《寿州志》卷三《古迹》所述:“寿春故城,亦曰南城,即今州城。其外郭包今之东陡涧,并淝水而北;至东津渡,又并淝水而西,尽于大香河入淮处。城中有金城及相国城。其城门有芍陂濠门、石桥门、长逻门、象门、沙门。其地绵延曲折三十余里。”事实是否如此?几十年来,考古学者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

**发掘经过** 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当时驻留于蚌埠的瑞典工程师加尔白克(O. Karlback)得到了一批寿县出土的青铜器,经由其手分售于欧美各地,楚器开始为人所知。20 世纪 30 年代,寿县朱家集(现划归长丰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经三次盗掘,出土了铜器和零星陶器、石器 4000 多件,同时,成千上万的受灾饥民在寿县城郊挖墓取宝,转卖于上海商人和外国人,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寿春及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1955 年 5 月,在治淮工程中于寿县西门之北发现了蔡昭侯墓,这是当时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其间又在这里发现了不少楚国的黄金货币和零散的高等级铜器,像这一带出土的鄂君启节、铜牛、铜量等,出土环境多不明了。这些发现虽多未经过科学发掘,但仍从多方面给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并不断向人们揭示着寿县楚故城遗址的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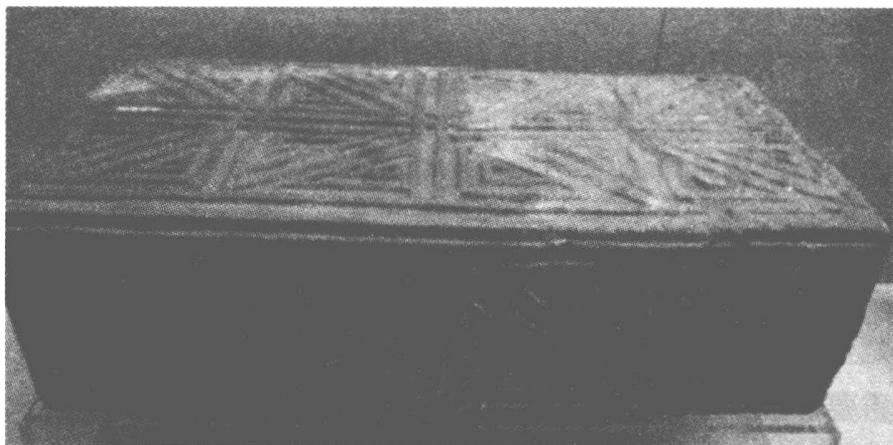
此后,安徽省文物工作者加强了对寿县的考古调查,并做了一些试

掘、发掘工作。

从1983年秋开始,调查小组在寿县城周围采用大面积钻探、小探方试掘、配合工程清理等手段了解情况。经过2年的工作,最后把考古勘探的重点放在了今寿县城南及东南、西南一带。在这个范围内,古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板瓦、筒瓦、陶器残片俯拾即是,灰坑、水井等遗迹数不胜数,金币、铜器时有出土。可是,由于2000多年来,特别是历次“黄河夺淮”引起地质地貌发生重大变化,淮河水患不断,原来的古城遗址难免遭到破坏。调查人员只能观察到部分遗迹,很难从宏观上把握全貌。

1987年,安徽省地科所遥感站与当地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利用遥感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成像的航空照片进行计算机处理和解译,然后结合考古调查,对古寿春城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空间格局进行分析。航片上部分护城河、城墙很明显。经过实地勘测,发现护城河在现在的地面上仍有反映,土质多呈黑灰色,一般地势相对周围农田低0.2~0.5米,宽30~40米,城墙被破坏严重,地表部分几乎不存,但按图像所显示的走向,仍可看出有断续的土垄,伴护城河平行向前延伸。此外,通过对航片的解析,对城址的布局、城内的水道等也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

2001~200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寿春古城址进行重新勘探、发掘。在柏家台及其南部至邱家花园一带调查钻探后,发现在柏家台建筑的西南边220米的地方也存在着一



空心槽形砖

个大型建筑,东西宽82米,南北进深约36米,略呈“中”字形。在该建筑的西南还有一些小型建筑物。据灰坑内出土的陶豆等遗存来判断,这组建筑的时代应在战国晚期。这次勘探表明,寿春城西、南两边有城墙和城外护城河,柏家台及其附近地区为寿春城宫殿区所在,而且以邱家花园为中心的寿春城偏东、偏北地区可能是寿春城的宫殿乃至府库所在地。

**重要发现** 考古资料表明,寿春城位于今寿县城东南部,平面近似方形,西、南两面的城墙外应有护城河,一般宽20米,深3米。东、北的城墙和护城河情况还不清楚。护城河水系与今天的淮河、淝河水系相通,还与安丰塘水系相接,并可能通过城门上的水门与城内水系相通,从而完成了完整的城内、城外排水系统,护城河可能是联系城内外的重要的交通途径。城址的东南、东边和北边,分别是瓦埠湖、淝河、淮河,东边有王八湖,淝河和淮河是寿春城的天然保护屏障,与城墙一起构成了寿春城东、北两边的防御系统。王八湖和瓦埠湖是后来成湖的,由于它们的破坏,现在寿春城东墙、南墙东段、北墙东段无法被发现。整个寿春城山水相接,既保证了和外界的联系,又维持了半封闭的防御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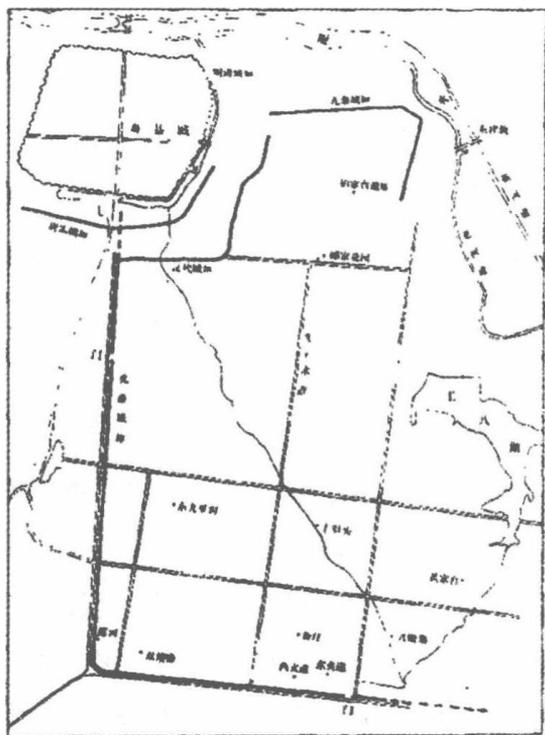
外廓城南北长约6.2千米,东西宽约4.25千米,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其城垣地面部分无存,基槽深1米、宽11米,其上夯筑墙身,有内、外护坡。外护坡底厚4米,内护坡底厚10~15米。在南垣和西垣各发现1座城门,型制基本相同,每门有3个道,门道两侧有大型夯土台基。

城内布局整齐划一,人工水道系统将城内分隔成若干个矩形区域,每个约1.5平方公里。据历年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勘探分析,城北部柏家台一带为贵族府第区,中部邱家花园和周家油坊一带可能为宫城。在城内各区,计发现29座夯土台基,大部分为长方形,也有方形和曲尺形。城内邱家花园等地陶圈井密集。城外探测到楚国墓葬区3处,城北淝水北岸至八公山南麓为小型墓葬区;城西寿西湖至双桥一带为中型墓葬区;城东南15公里的杨庙、朱家集杨公一带则为大型墓葬区。在城西西

圈一带还发现春秋晚期蔡国墓地 1 处,并发掘 3 座,出土一批青铜器和陶器,这一带稍高的岗地应该是蔡国墓葬集中发布区域。可以说,楚国的墓地是经过严密规划设计的,整齐地分布在城址的周围。

在城北的柏家台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台基。经钻探,台基呈曲尺形,东西长 210 米,南北宽 130 米,推测为一组建筑群。在台基西南部发掘 1 座建筑基址,揭露面积 680 平方米,基址总面积约 2000 多平方米。台基上外围有两排石础,每础间距 5.55 米,推测其建筑面阔 11 间。石础内侧有槽形砖和长方形素面铺地砖。基址上有大量的瓦当、筒瓦和板瓦。瓦当大多为圆形,也有少数半瓦当,纹饰有凤鸟纹、树云纹、四叶纹和云纹等。槽形砖类似空心砖,外侧模印有四叶纹、勾连山字纹和几何云纹。该基址被 4 座西汉土坑墓打破,时代为战国晚期。这座建筑物位于城址的东北部,面积大,建筑材料规格高,应该是与宫殿类似的功用,或者是祭祀的场所,这样大型的建筑物,也只有皇室才能拥有。因此,柏家台及其附近地区,很可能就是寿春宫殿区所在。围绕着东津村的邱家花园一带,几乎发现了寿春城迄今发现的所有重器,如大府铜牛、鄂君启节以及大量楚金币。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以邱家花园为中心的 地区是寿春城宫殿乃至府库所在地。

寿春城遗址的规模大于楚国早期郢都湖北江陵纪南城,在战国七雄都城中,仅次于燕下都。它的发现,对于研究楚蔡关系、楚国晚期历史以及战国都城建设格局等有着重要的价



寿春城布局图

值。由此,自然让人想到南宋嘉定年间重建的今之寿县城,“周围十三里有奇”,其规模仅及郢都的1/8略强。时至今日,人口也不达当时的一半。

## 6. 王者归来——寿县、淮南蔡侯墓

蔡国是周代一个重要封国,也是春秋时期的十二大国之一,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排列第九,位在郑、燕、吴之上。蔡国疆域最大的时候,南至大别山北麓,北至郾城县,东至安徽省西境,西至平顶山市,地跨汝(河)、淮(河)。其先祖是周武王弟叔度(姬度)后裔,西周初期始封,战国初期亡于楚,大约存在了六七百年时间。周武王克商后,封其五弟叔度(姬度)于蔡。由于古音中“蔡”、“祭”相同,两字通用。蔡叔所封之蔡原在祭,建都于蔡,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带。春秋初年,蔡国尚出兵与鲁、宋等伐郑。公元前684年,楚国利用蔡、息二国的矛盾,出兵俘虏蔡哀侯,将蔡国纳入楚国控制范围。从此,在楚的压迫下蔡国深受其害。公元前531年,楚一度灭蔡,3年后蔡平侯复国,并迁都吕亭(今河南新蔡)。公元前506年蔡国曾随吴国伐楚,并攻入郢都。公元前493年在楚国的逼迫下,蔡昭侯迁都州来(今安徽寿县、凤台一带),经五世,于公元前447年再次为楚所并。

蔡国都城曾有三迁:(1)上蔡城。自姬度公元前1045年受封到公元前531年蔡灵侯被杀,蔡在此共历十八王,共514年。上蔡的蔡国故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略短,南北稍长。城墙系夯土筑成,现存城墙高4~11米,宽15~25米,总长约10490米。城墙缺口较多,疑是城门遗址。南城墙三处,西城墙一处,保存较好。城内中部有一土台,称二郎台,面积120万平方米,可能是蔡侯的宫殿区。台上曾发现很多古井及陶制排水管道,台上台下还有许多春秋陶片和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说明当时这里有庞大的建筑。城内西南隅翟村一带,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古城西北有9个土冢,相传为蔡侯墓。

(2)新蔡城。自公元前528年蔡平侯迁都新蔡至公元前493年蔡昭侯迁下蔡,蔡在此共历三王,仅35年。新蔡蔡国故城遗址,位于今新蔡县城的西北部。故城依山临水,城南5千米有汝河,城北15千米有洪河绕城东南下,距城7.5千米,与汝河相汇。故城周长3215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最高处10米,宽50米;最低处2.7米,宽20~40米,夯土层厚14厘米,夯窝清晰可见。地表遗存大量灰陶豆柄和盘、绳纹瓦片等。在城北有蔡侯墓及古墓群,周围有72座冢。在距新蔡县城东门外北侧200米处,曾发现一处炼炉遗址,取出了春秋时蔡平侯制造楚币的制币炉渣,据传是蔡平侯由上蔡迁都新蔡后所建的。币厚4毫米,边长13毫米,呈正方形,币面铸有“郢爰”字样。楚平王都邑是在今湖北省江陵西北纪南城。蔡平侯迁都新蔡后,以铸钱“郢爰”来感念楚平王对自己的“恩赐”。

(3)下蔡城。史载“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吴人救蔡,因迁蔡于州来”。所迁之州来也就被称为下蔡。至公元前447年蔡亡,蔡在此历四王(蔡昭侯、蔡成侯、蔡声侯、蔡元侯),共47年。新中国成立后曾发现过三座蔡侯墓:一座是在寿县西门,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较多,为春秋墓葬所罕见;另外两座在邻近淮南市的蔡家岗,也出土不少青铜器。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蔡国青铜器发现,这些青铜器对蔡国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发掘经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沿淮大地上,一场治淮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由于土木工程浩大,过去许多不为人知的古代遗迹、遗物被大量发现。地处淮河南岸的寿县,也因为一座大墓的发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座墓就是蔡侯墓。1955年5月24日夜,在寿县西门城墙修复工程中,民工们挑灯夜战,现场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就在这时,在偏西一点的地段,发出了叮当一声,像是工具砸在硬物上,仔细扒开一看,原来是一锄头砸在一件形似大钟一类的东西上,周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的东西。民工们一时兴起,把这些东西都给刨了上来,一统计,居然有

30 件之多。天还未亮,西门发现铜器的消息就不胫而走,立刻轰动全城,当地群众前往围观,现场十分热闹。在接到发现青铜器的消息后,当时的寿县领导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前往保护、勘察,使得墓葬及时得到保护。5月26日,华东文物工作队会同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对这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和发掘。整个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6月12日。6月22日在寿县文化馆展出此次发掘的重要成果时,更是万人空巷,这一天共计约有12000观众来此参观,其热情不可谓不高。

这座墓葬位于寿县西门内偏北的地方,西距城墙40米,南距城门约300米,东面不远处就是当地居民的房屋。墓地周围地势平坦,由于治淮的需要,曾在这里取土,形成了一条深沟,宽10~15米,深3~4米,这座墓就位于沟的中央。

发掘后了解到这座墓南北长8.6米,东西宽7米左右,深近4米,规模在当时已发现的战国墓葬中首屈一指。墓坑口和墓底相差不大,不似一些墓葬口大底小的形制,墓底也没有发现较深的棺穴,仅在南部偏西的位置发现了一处浅坑,长1.8米、宽1.2米,从规模看,应该属于殉葬人的棺木。墓葬中发现了大量随葬品,在距墓壁1米处的位置有序放置着,而且还有一定的摆设方式。其北面一般放生活用具和乐器,东、西、南三面放置兵器、车马器以及一些贝壳,中间应该就是墓主棺木所在,这里出土了玉、珠等配饰共三组。整个墓葬仅在东南的位置发现一具残朽人骨。出土的这些器物类型十分丰富,除占主体的青铜器外,还有玉、石、骨、贝、水晶、漆器等。从墓葬埋藏形制和随葬品保留的情况看,这座墓葬应该未受到较大的盗扰,墓葬规格又如此之高,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考古发现中是极为罕见的,难道这又是一座楚王的墓葬?<sup>①</sup>这种推测使得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

另一座蔡侯墓发现于1959年。当时淮南谢家集淮谢饭店旁的公路南北有两座大孤堆,均称为赵家孤堆,相聚200米左右。两墓距寿县城

<sup>①</sup>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在寿县的朱家集就发现了一座大型楚王墓,出土遗物数千件,曾轰动一时。这座墓葬的发现情况将在下节详细介绍。

东北7.5千米,其西北3千米为八公山。1958~1959年先后清理了这两座墓葬,古墓虽然被盗掘,破坏严重,仍出土文物近百种,多为矛、戈等铜器。其中有声侯铭文,史学家认定为蔡声侯产的墓葬地。谢家集蔡侯墓的出土,进一步证明寿县蔡侯墓是昭侯,而不是声侯。

一号孤堆高4米,直径24米,1958年由于要在这里兴建饭店,孤堆遂被夷平。清理后发现,墓葬曾被严重盗掘,只遗留了一些小件铜器。二号孤堆体量上稍小,高不到3米,在封土堆上发现了古代的盗洞,洞中甚至还发现了一件半块汉砖和砺石,说明这处盗洞早在汉代就已形成。一般而言,先秦时期的贵族墓葬流行夫妻异穴合葬,在地面上看,就是两处相近的大孤堆,谢家集这里的两处墓葬应属这种情况。相比已发掘的一号墓而言,二号墓能否有更大的发现?是否能解决墓主的身份问题?在盗洞出现后,这些谜团难道又将被带入墓中吗?发掘者的心顿时紧张了起来。

**重要发现**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以青铜器最多,还有不少玉器和金饰,也有少量骨器和残漆片等。出土时多有残损,经过修复、整理,初步统计共584件。青铜器共486件,不乏一些大型容器,有鼎、簋、簠、鬲、豆、鉴、敦、壶、尊、盃等,如鼎共出土18件,既有成对的对鼎,也有大小相次的列鼎。最大的一件鼎高69厘米,有盖,鼎底呈圆形,底部有烟炱痕迹,器盖内有铭文2行6字,器腹内有铭文1字。还发现吴王光鉴2件,根据铭文记载,当是吴王嫁女于蔡的陪嫁品。发现乐器32件,有甬钟、钮钟、镈钟各一套,最大的一件79厘米,其中不少铸有铭文,表明器物为一位蔡侯所有。兵器数量也相当多,共60件,有戈、剑、矛、镞等。其中有一把青铜剑发现于墓主的腰际,表明墓主为男性,此剑应该是这位蔡侯生前最喜爱的一把佩剑。蔡侯墓中还有大量的车马器随葬,这也是商周时期贵族墓葬中常见的现象,东周时期一般象征性地将车马上的主要青铜构件放入墓中,显得稍微散乱。蔡侯墓中车器共84件,还有少量车饰件,马饰件更多,达到128件。

玉器也是中国古代墓葬中常见器物之一,这座墓中发现51件,包括



铸钟



莲瓣盖铜方壶



铜鼎



蚕形玉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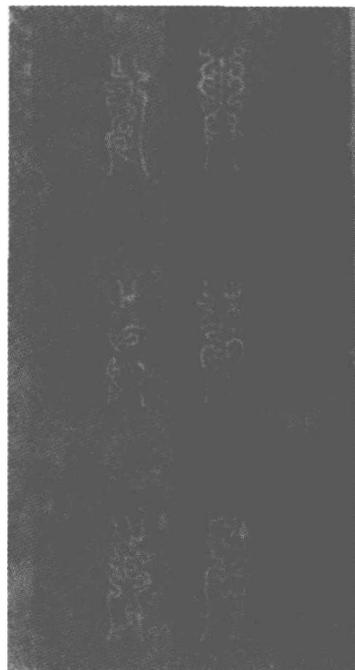
佩玉一副，有璧、璜、管形饰、龙形饰等，相当于一条硕大的项链，佩戴于死者身上。金饰共 12 件，多为压有花纹的金叶，出土时多残碎。其中墓主腰际部位出土 7 件圆形金叶，穿有小孔，直径 5.2 厘米，还有方形和三角形金叶，大小不超过 10 厘米，其用途也与前面讲的佩玉相当。还有一部分金叶发现于墓坑西部，有圆形、云形、兽面形等多种形制，多粘在漆皮上，由于过于碎小，暂无法统计数量，当时就装了满满三盒，其中较为完整的圆形金叶，直径有 10.5 厘米。这些薄金片当时应该是贴在棺木之上的装饰品。

寿县蔡侯墓的发掘，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墓中出土青铜器多有铭文，铭文有“蔡侯”字样，可以确定为蔡侯之墓。其中最长的铭文达 90

余字。这些铭文不仅说明了当时蔡国的历史,也为研究春秋晚期蔡、楚、吴三国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至于这个蔡侯是蔡国南迁下蔡后的哪一位君主,学术界也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著名学者都曾撰文就此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现在一般认为,此蔡侯是迁下蔡后的第一位君主昭侯,依据主要有二:其一,从铭文中蔡侯名进行考释,于省吾先生以为甲文、金文的“申”乃“电光回曲闪烁之形”,“按古音读舌上为舌头,故读申为电”,“据铭文则蔡昭侯本名嫫,典籍作申,系用借字,并无重名之嫌”。据寿县蔡器铭刻,蔡侯名嫫盖即昭侯之名,昭侯名“嫫”,即“臾”,被误写作“申”,殆“依肖像所改”。其二,墓中发现的吴王光鉴也为断代提供了依据。史载蔡昭侯五年,吴王光即位,蔡昭侯二十三年(前496年),吴王光为越所败而卒,可见吴王光与蔡昭侯同时,墓内蔡昭侯为大孟姬作的卢、尊等四器与吴王光为叔姬所作的鉴同出,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大孟姬与叔姬媵器埋入蔡昭侯墓中,大概是叔姬媵鉴于吴王光十年五月铸成后,即随叔姬出嫁来至蔡;而补铸以赠的



寿县蔡侯墓鼎铭



淮南蔡侯墓剑铭

大孟姬卢、尊等四器,还未来得及运送到吴,吴王光即被越所败而卒,因而器仍留于蔡,待昭侯死后,即随葬于墓中。此外,上世纪50年代末在淮南发现的另一座蔡侯墓则为该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证据。

淮南赵家孤堆二号墓,尽管多经盗扰,但仍出土不少重要文物。墓中随葬品重叠堆放在两处,南边的一处有铜镬、戈、矛、鏃、削、匕首、车马器、器盖、骨管、金叶等,靠近东壁的一处发现了一组青铜剑。青铜器一共有112件,其中剑13把,不少上面铸有铭文,其中蔡侯产剑3把,铭文均由错金工艺制成,为错金鸟篆体,其中一把剑柄空心部分用黄金堵塞。还有一把剑,根据铭文应该是吴王诸樊的用剑。出土匕首2件,匕首脊的两边上下各有阳文的“王”字。戈4件,都有铭文,有3件其上的铭文尚未通读。蔡侯产是蔡迁州来后的第三侯(蔡声侯,卒于前471年),而墓地又在州来附近,故极有可能是蔡侯产的墓葬。因为蔡、吴两国曾互通友好,吴王剑在蔡侯墓中出土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又由于蔡侯产墓出土车马器和金叶上的纹饰风格和寿县蔡侯墓一致,此也可作为蔡墓的旁证。

## 7. 楚王之陵——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

楚国自西周立国而来,曾数迁其都,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其中的几座已被确认为楚都无疑。考古调查表明,这些都城附近,均有大小不等的墓群包围,楚国不同时期的贵族乃至楚王一级的墓葬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现。目前已经证明为楚王墓的不多,除李三孤堆外,最著名的就要数坐落在淮阳县的楚都陈郢附近的马鞍冢了。

史载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顷襄王兵败迁都于陈(今淮阳县城),并把陈城作为楚都达38年之久,史书上所称“郢陈”即此。顷襄王于公元前263年病卒陈地,葬于此,故名。该墓在两座南北相连高10米的封土堆上,形似马鞍,故又称“马鞍冢”。经考古工作者发掘证实,此冢为两座战国晚期大型楚墓。其南墓平面呈

“中”字形,东西长 14.5 米,南北宽 13.4 米,5 级台阶;北墓平面呈“甲”字形,东西长 16.6 米,南北宽 15.3 米,7 级台阶。墓中文物早已被盗。两墓西 50 米处各有一座陪葬的大型车马坑。北坑南北长 55 米,东西宽 4.72 米,西侧有 2 个斜坡通道,南部葬有肩舆(轿)和沉质器物,中部葬马 24 匹、车 8 辆、猎狗 2 只。西北角埋葬有鼎、敦、盒、壶、钫、高柄壶、盆、箕等陶皿器。陶鼎高大而精致。8 辆车上的铜、铁件基本齐全。车辆上有铜车轡、铁轴承(大小铁杠),车棚上的轺、盖弓帽,车辕上的衡、环等良好。马是杀死后移到坑内的。从排列及车辕看,可以知道车的种类有安车、辒车、猎车。驾车马数有 1 匹、2 匹、4 匹不等。猎狗骨在猎车之马旁,狗颈上配有贝形玉饰。南坑长 40 米,宽 3.7 米,东侧有斜坡通道,葬泥马 20 余匹、车 23 辆、旌旗 6 面。车的种类大部分为战车,其中一辆,车厢周围安装铜板数十块,颇似现在的装甲车。有一面旌旗上镶嵌贝壳,呈梅花形,极为壮观。经考证:南冢“中”字形墓其墓主应为楚顷襄王,北冢“甲”字形墓当为其陪葬墓,即嫔妃之墓。这两座墓及车马坑是目前考古发现形制最大、埋葬马匹最多、陪葬品最丰富的战国楚王室大墓。

熊家冢墓地是近年来发现的一座楚国大墓,位于楚故都纪南城遗址西北,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陵园分布最完整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最高水平的杰出代表。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该墓墓主身份,但根据已揭示出整个熊家冢墓地的规模和结构看,其与楚王室有密切关系。熊家冢墓地由主冢(即熊家冢)、祔冢、殉葬墓、车马坑、祭祀坑等组成。熊家冢墓地主墓是一座近正方形、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土坑竖穴墓。墓口东西长 67 米,南北宽 70 米,墓口面积近 4900 平方米,深度近 20 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楚墓之一。在主冢和附冢西侧,发掘出一座 131.4 米长、12 米宽的特大型车马坑和排列有序的 30 多座小型车马坑,形成一个完整的出行车阵。主墓南边和陪葬墓北边,分别排列着几十座形制、方向、间距、规模大体一致的殉葬墓。主墓西、南边有近百个方形或圆形祭祀坑,并发现了大量当时的地面建

筑遗迹。在主冢南侧已探明大量殉葬墓，出土玉石、水晶、玛瑙等精美文物共 1000 余件，此外还有少量青铜器、陶器。

楚国高等级墓葬大都设有车马坑，并且与主墓紧密相连。主墓居中或居前，一面或两侧或前后设有陪葬墓和与祭祀相关的建筑设施，而熊家冢墓地如此完整的布局、如此宏大的规模，不仅在目前所见的楚国墓地中首屈一指，而且在 2000 多年前的东周列国墓葬中也是罕见的。

**发掘经过** 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大墓，位于县城东南方 24 千米处的朱家集附近，俗称“李三古堆”。这一带方圆百里范围内，原来古冢比较集中，在李三孤堆东北 3 千米处有一座大古堆，其封土比原来李三孤堆还要高大，李三孤堆西北约 5 千米处有一座小古堆，南面还有“斗笠古堆”。据当地人说，还有几个较大的古堆已经陷入瓦埠湖中，至于一些中小型古堆，早已被夷为耕地，当地人在开挖沟渠时就常发现古墓。

上世纪 20 年代，寿县境内常有零星文物出土，乡民偶有所得，售去可得若干利益。同时这里的文物也引起了京、沪古董商人的注意，前往此地收购者络绎不绝，甚至外国商人也涉足其中。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有些乡民视盗墓为业，并逐渐蔓延成风。

1931 ~ 1932 年淮河流域先后发生特大水灾和旱灾，寿县一带灾情尤重。许多灾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1933 年，时任朱家集国民党联保主任及伪保长以“救荒”为名，打起了李三孤堆的主意，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干起盗墓勾当。以朱鸿初、庞子平为首，参加挖掘的人计 168 名，从农历三月十九日开始，挖了 92 天，于五月二十二日始现铜器。接着越挖越多，出土的主要是青铜器及零星石器，据说不下 4000 件。

当时，这一盗“宝”事件迅即风传开来，“报章竞载，寰海喧腾”。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省政府迫于社会各界压力，不得不出面干预，下令马上封闭掘开的墓室，严禁继续再挖。因而，此次盗掘墓未完全挖尽，尚有大量遗物被重新掩埋。可是，在“政府”追缴所盗文物时，发现盗出的文物被地方豪绅和官僚、商贾争先巧取豪夺，尤其是青铜器，已有数件被来自北京、上海的文物商贩们购得运走。

这一次盗掘的文物,有一部分被前安徽省立图书馆接收,系盗墓者直接上交。这批器物原在安庆,抗战爆发后曾被运往四川,后来又被运回南京,解放前夕,又由南京被运至芜湖。1953年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又被运往合肥。几经长途运输,还算保存完好,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共712件。寿县残存64件,均为铜器,多属小件、残件,完整大器很少。这批铜器在抗战时被埋入地下,抗战胜利后被取出,存于县民众教育馆,解放后归县文化馆,1953年上交省博物馆,计30余件。盗墓者私售百件左右,确知下落者有30余件,藏于京、沪等地博物馆,其余下落不明。

第二次盗掘是在1935年,民间传闻仍是由“地头蛇”牵头,采取的是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等隐蔽方法,陆续挖出文物数百件,但还是没有挖到棺材。这次出土器物悉已瓜分散逸。

1938年,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扎寿县。据邓峙一《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该集团军总司令、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桂系军阀李品仙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既贪财又喜好古董。这年冬,他听说朱家集李三孤堆大墓没有挖出棺材,仍有余物没有取出,便把三个运输连开到朱家集,以执行“军事要务”为由,对李三孤堆大墓施行了一次扫荡性挖掘。在这一次盗掘过程中,由于原盗坑积水过深,待用水车车完后,洞口成了泥潭,人无法进入墓室。于是,只好另从封土堆上重新开掘。结果,历时3个多月,“挖了约十多丈深”,才见到棺材。墓中余物被彻底掏尽,以致连棺、椁等都被盗走。盗得“古物约150余件”,主要是铜、石乐器,全部为李品仙等侵吞,据说被运往香港,至今下落不明。



李品仙

**重要发现** 李三孤堆由于屡遭盗

掘,现在对于其墓葬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等详细情况,还要依靠当时盗掘者和调查者的记载来复原。据李景聃先生调查,1933年盗墓时是从河南请了三个善于盗墓的墓师,由墓师指导挖掘。他们挖掘的方法是先从四面寻出墓壁,然后下挖。墓坑上有封土,高出地面约2米,周长300余米,即直径90米左右。据墓师的看法,墓坑在东北、西北两边有墓道,底宽丈余。李先生听人口述坑内的情形是:“坑内中间为一大木堆,东西长一丈二三尺,南北宽约六七尺,均系四棱大木密密排比,现出者已深八尺,尚未及底,或有榫,或无榫,木缝排比极紧严,取出不易,仅去其三,一面黑漆具花纹,一面红漆之木板,即系夹于两大木间者。木堆西南、西北两角包以锡块,四面周以木头分间,或同箱笼,大小相差甚微,长与木堆相仿,宽度仅及其半,盖已腐朽;底部全系大木平铺,间隔不过二指,从木缝下探有黑泥,其下似仍为大木。南面箱子贰个,平列并有口门,内藏铜缸、铜锅等件。西面箱子贰个,亦系平列,石牛八座及其他石器多贮其中。东西箱子贰个非并列,略向南北错开,贴近木堆之箱古物最多,大部铜器所自出。其东者遗物未全取出,大体铜器已现形,惜被虚土坍塌,兼以禁令再掘,出土古物又须悉数呈缴,工人遂听其埋藏无意取出。北面箱子木墙毕现,未见遗物,似贮存衣服等类易腐物件,亦未到底。”

刘复彭实地勘察的情况是:“现古物处所占空间约有七八间房屋之大,四周架以巨木,内分三层,古物置于层间,状似库窖而非墓形。”

最后一次盗掘幽王墓,邓峙一是现场指挥者。他在《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一文中说,“有约3丈长、2尺方的木条100多根”,后被李品仙运回广西,为便于运输,被“锯成两段……每段又分锯成两块”,安徽省博物馆尚存有第一次盗掘时出土的椁木,长4米左右,厚0.3米左右。“棺材放在木条中央的大方格中,周围排列成大小不同的十字方格……棺材是朱红色的,色泽鲜艳如新。长约9尺,高约3尺,宽3尺左右。上面及四周都饰浮雕的龙。棺材没有封钉,揭开盖,里面有头发一束,全部骸骨已化成灰了。棺材只有内棺,没有外棺,重约三四百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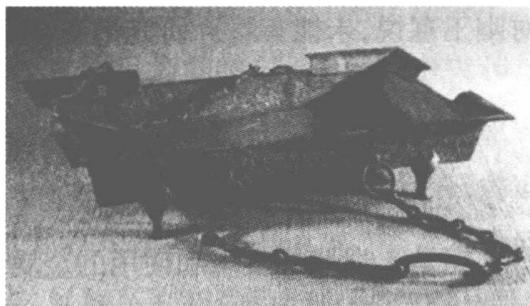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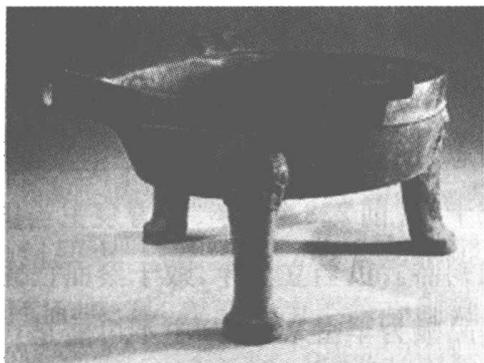
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1 年实地勘探,结果表明,该墓有一条向东的墓道,墓口东西长 41.2 米,南北宽约 40.2 米,墓口以下有九级台阶,逐层内收,台阶的高度一般在 0.55~0.75 米,宽 0.65~0.85 米。最上一、二、三级台阶为熟土筑成,余为生土筑成,墓坑底距地表深 15 米左右,坑底面积近 400 平方米。

李三孤堆出土遗物众多,1933 年第一次被盗就盗出大约 1000 余件,现在收藏的能确认出自该墓的器物均属此次出土。1938 年第三次被盗出 150 余件,主要有铜、石乐器,全部为李品仙等人侵吞,运往香港出售,下落不明。仅就第一次盗掘后被收缴的文物来看,基本为青铜器,还有少量石器,原本有漆器,由于盗掘,没有保存下来。

李三孤堆大墓青铜器,几次盗掘出土超过 1000 件,其中铜礼器就达 100 余件,多有铭文,数量相当可观。礼器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鼎,完整的有 35 件,加上残器,当时随葬的鼎当在 40 件左右,比寿县蔡侯墓多一倍。有一件鼎,器形巨大,造型雄伟,通高 113 厘米、口径 87 厘米、腹深 52 厘米、足高 67 厘米,重达 400 千克,体形和重量仅次于安阳出土的后母戊方鼎,在已发现的三足鼎中最大。1958 年毛泽东主席参观省博物馆,看到这件器物时,开玩笑地说这件鼎大得能煮一头牛。这件鼎底部有烟炱痕迹,说明应是祭祀煮牲肉时留下的。这样的大鼎原来应是两件,该墓出土的残器中发现有与大鼎相同的鼎耳和鼎足,说明另一件大鼎在出土时已经破碎了。一件匝鼎,方耳外折,直壁,平底,蹄足。腹饰凸弦纹,足根做兽首形。口沿外壁有铭文 12 字:“楚王熊肯作铸鉶鼎以共岁尝”。青铜器中的匝,往往自铭“也”或“鉶”。此鼎有流,故自铭“鉶鼎”。“楚王熊肯”经考证为楚考烈王。

鼎之外,青铜礼器中还有簋、簠、豆、甗、鬲、高、炉、俎、缶、鉴、壶、盘等。

这批铜器除了体量较为宏伟外,造型艺术也是值得称道的一个地方。像一件“飞鹰攫蛇”雕塑就较为特别,此器飞鹰展翅伸颈,两眼圆睁,粗壮的双腿利爪下抓住一条尚在挣扎的双尾连体蛇,高 17 厘米,长



李三孤堆大墓出土的青铜器

24.7 厘米。这件艺术品利用圆雕和浮雕的表现手法，置整个画面于动态之中，这一巧妙的刻画，使观者自然联想到飞鹰攫蛇那一瞬间的过程。

李三孤堆大墓出土器物中还有铜量 3 件，两大一小，大者内口径 11.4 厘米，高 11.4 厘米，属于当时的量具。楚国量器一升约在 210 ~ 215 毫升之间，这三件量器，大者为 5 升，小者为 1 升量。

这座古墓中还出土了若干铜工具，还有 3 件铁工具，包括削、刀、斧、凿、锯、铍、镰、铤等，分属农业、木工和石工工具。这些工具有些可能是制作竹木简的工具，是作为文具的附属物而随葬入土的，有些可能是下葬时所用工具遗留在墓中。

李三孤堆楚王墓珍贵文物的出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它为研究楚国文化及青铜器时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内外考古界、

史学界对此极感兴趣。半个世纪以来,对这批楚器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许多专家如郭沫若、唐兰、朱德熙等都对之发表专论,充分证明了这批楚器的重要考古价值。李三孤堆墓主究竟是谁?楚考烈王墓,据《寿州志》所载,“墓在州南九十里茶庵集西里许,冢形犹在”。其后幽王在位十年(前228年)卒,接着哀王当国2月,即被负刍所杀,不可能铸造大批铜器。负刍立5年,败于秦而亡国(前223年)。从墓的规模宏伟、随葬品极为丰富来看,墓主不可能是亡国之君。因此诸家多认为是楚幽王之墓。但由于此墓未经科学发掘,盗掘者众,器物众多,影响极大,许多器物几经转手,流落海内外,难免有混杂之嫌。也有专家从出土情况、器物排比、铭文研究以及楚国晚期宫廷权力之争的背景诸方面综合分析,对幽王墓说,未能首肯。研究仍在继续之中。

## 8. 艺术瑰宝——安徽出土的夏商周至战国青铜器

铜是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铜的使用,特别是青铜的发明、青铜器的铸造与使用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的早期阶段。

青铜指的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古代青铜主要是锡青铜(铜锡合金),也有铅青铜(铜铅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少量的青铜制品,中国的青铜文化大约也肇始于此时。这些青铜制品包括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铜刀、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遗址所出的铜刀残件、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铃等,主要以一些小件工具类为主,而少见容器。进入夏商后,以铜容器为代表的中国的青铜文化开始大量出现并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制造出的青铜器器类丰富,工艺精湛,至今仍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辉,是古代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

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青铜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青铜器在先秦时期的中国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以鼎为例，相传“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征天下九州，“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青铜器是权力的物化反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春秋时期则有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典故。到了战国后期，秦、齐更是为了争夺九鼎而不惜兵戎相见。至于九鼎的下落，众说纷纭，不得而知。据说秦灭周后第二年（前 255 年），取九鼎如秦。但到了秦一统天下后，九鼎的下落又不得而知了。

其次，青铜器也是礼制的集中反映。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颁布了一整套约束人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行为的措施，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青铜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所谓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考古发现的相关墓葬中的“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等基本证实了这一记载。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礼制逐渐松弛，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贵族用器开始出现了“僭越”现象。这一现象在墓葬随葬的青铜器种类和数量上已经得到证明，一些诸侯墓葬中甚至也出现了天子才可享有的九鼎待遇，像安徽发现的春秋晚期的蔡侯申墓就使用了九鼎之制。

此外，从技术层面上看，青铜器也承载着当时最高的科技水平。青铜工具逐步取代石制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同时，青铜采冶技术的发展及成熟也为冶铁术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安徽青铜文明与中原地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商周时期的安徽与中原王朝交往密切，在文献有大量记载，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实物资料。文献中的“涂山之会”与“桀奔南巢”，甲骨文及金文中的“征人方”、“秉繁蜀巢”、“伐桐”等都为研究中原与安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早商时期,商族势力就已向南发展达于江淮。在安徽江淮之间发掘的这一时期的遗址有10余处之多。从文化特征来看,这些遗址既保留许多原有的因素,又深受北来的商文化影响,这与文献记载中的商汤放桀于南巢,进而控制该地区的历史一致。其中皖西地区遗址出土的器物,同样在保留原有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深受商文明的影响。尽管其出土的陶器表现为较强的地方特色,但淮河流域历年出土的铜器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相比却差别甚微。

晚商时期,皖北地区继续为商文化所控制。但在巢湖和滁州一带遗址出土的器物则表明其地域性特征显著增强,说明此时随着商王朝的衰落,王朝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减弱,处于偏远地区的今江淮之间的方国部落甚至乘机摆脱其控制,发展自己的文化。

皖南地区商代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受附近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影响,有浓郁的土著特色。同时,在铜陵、马鞍山、宣城及黄山一带出土的少量商式青铜器则表明,商文化已影响到该地区。

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安徽地处荒蛮,大多为地方小国,接受了周室的分封,其中主体为徐淮夷。这个时期的徐淮夷在这一带势力进一步发展,时常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安徽的青铜器造型和纹饰地方特色在这一时期开始清晰起来,并逐渐摆脱了前期完全模仿中原青铜器的方式,出现了青铜器的创新与发展,地方型器物数量开始增多。

春秋以后,楚国势力强劲,迅速扩张,对安徽青铜文化的影响力渐强。在经历了吴楚争霸后,楚文化逐渐扎根于江淮,与徐舒吴越文化进一步融合于江淮,孕育出了繁荣的江淮楚文化。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与技术间的传播和互通有无,才促成了安徽地区异彩纷呈的青铜文化。

**重要发现** 青铜冶铸是先秦时期安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安徽本地铸造铜器的历史悠久,冶铜遗迹和遗物在诸多遗址均有发现。如在肥西大墩子、含山大城墩、孙家岗等遗址中均发现有铜渣和木炭屑,在含山大城墩还发现一件完整的商代熔铜坩埚。枞阳汤家墩晚商遗址出土多块绿色铜矿石和陶范,陶范为铸造铜容器的范模,内侧光滑,

有弦纹和云雷纹。皖南古铜矿遗址数量最多,最早的可达商末,最近在铜陵的一处商周遗址也发现了不少铸造遗物,其中包括一件铸造容器的残泥范,年代至少在西周时期。这些材料证明,商周时期安徽的青铜冶铸业起步早、范围广、技术高,而在这里发现的大量青铜器则是安徽发达的青铜冶铸业的直接证据。

商周时期的安徽人已掌握了较为娴熟的冶铸技术。对镞、刀、削、铃、戈等小型器物,一般采用两范合铸。青铜容器如罍、鬲、爵等器形的底部,均有三片范浇铸的痕迹。对一些大型铜器和较复杂的铜器,如尊、鼎、卣、铙、鬯等,则采用了分铸法,由数次浇铸而成。如阜南月牙河龙虎尊,器表作半透雕式,突出龙、虎等动物形象,器面内壁凹陷的动物形象是使用了内范花纹凸出的制作方法,并且有效地使用支钉和两次浇灌冶铸以及多范组合成型等技术,代表了该区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同一地点出土的兽面纹尊铸造技术也极为独特,由于器表采用高浮雕技术,铸造时为避免冷却时因膨胀系数不同造成器壁爆裂,制作纹饰时根据纹饰走向调整范面高低,器腹内壁形成了随器表纹饰走向的凸凹不平的现象,这种制作方法目前不见于中原地区。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铸法沿袭了殷商以来的浑铸法,一器一范,一器一式,产生了成对器物其形制相仿和大小相似,但其花纹和尺寸不完全一致的现象。屯溪的青铜器不是纯用单一铸法,如有的鼎足铜未全包,三号墓涡纹鼎的铜足内侧可观察



龙虎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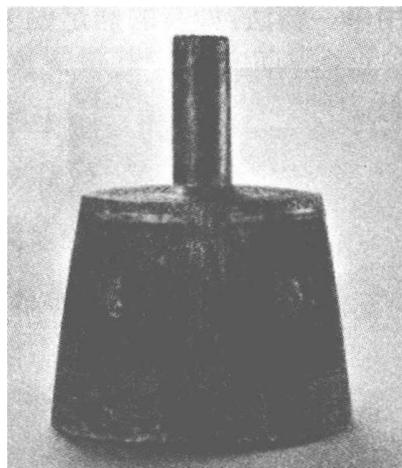
铜牛

到原来内填的黄泥,这应是鼎体和鼎足先分铸再嵌为整体的嵌铸法。到了战国早中期,青铜各项铸造工艺更趋精密和成熟,甚至出现了细工线刻工艺和首创了鎏金工艺,可以说楚国的青铜铸造工艺在当时已达到一流水平。淮南蔡声侯墓出土的铸有金丝鸟篆文的蔡侯铲、剑,在镶嵌金属工艺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金银错”工艺。长丰战国楚墓出土过一批错金银车马器和4件错金银铜戈。寿县邱家花园发现的楚国青铜牛,其眼、眉和鼻用白镏镂错而成,周身和前后蹄镶嵌成舒展卷曲的图案,嵌中有镶,把嵌错工艺结合起来,制作很是精美。

安徽发现的青铜兵器也集中反映出本地青铜铸造业的发达水平。其制作精良,棱线分明,有的至今依然寒光逼人。其中有几件矛和剑,器身遍布暗纹。据分析,这类黑色暗花纹兵器的基体是锡青铜,而黑色暗花纹处锡铁含量均高于基体,所饰暗花纹应是经过硫化处理而成。人们推测硫化处理是在铸造后特意加的,可能是将铸好并有内凹的菱形花纹的兵器全部进行硫化处理,然后将剑刃、剑身抛光,显露青铜本色,而保留其内凹菱形花纹所着的黑色。这类暗纹兵器多出土自吴越地区,皖南属于吴越地区重要的兵器铸造地之一,这种特殊的技术当为之掌握。在战国时期,皖南已掌握了复合剑的铸造技术,从外观上看,脊与色泽明显不同,这是由于为加强剑身的坚韧性,将剑脊和剑身其他部位用两种不



铜铃



铜铙

同配比的金属合铸而成,中脊含锡量较低,硬度低而韧性高,使剑不易折断;剑身含锡量较高,硬度高,可提高实战时的杀伤力。在贵池发现的一柄青铜剑就是用这种方法铸造而成的。

目前安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含山大城墩遗址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地层出土的青铜小刀。夏代青铜器发现较少,肥西大墩子遗址曾出土铜铃和铜罍各1件。这2件铜器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铜铃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形制相同,弦纹罍也具有浓郁的中原地区夏晚期的风格,在二里头遗址也仅见两三件。类似于安徽这样的发现在河南夏文化核心区外还很少见。

安徽商代青铜容器大量出现。六安发现有早商时期铜罍、觚,其形制与二里冈类型相同。在含山县、嘉山县(今明光市)发现了几批商中期的青铜器,器类包括罍、爵、觚、鬯、尊、甗等。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发现更多,主要集中在皖北及江淮之间,皖南沿江地区等地也发现数十件商式铜器。发现的青铜器有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等五类,以容器和兵器数量为最多。青铜容器种类有鼎、罍、爵、觚、觶、尊、鬯、卣、鬯、甗等,其中以罍、爵、觚、鬯最为常见。同期组合以罍、爵、觚或爵、觚为主。从用途看,以酒器为主,盛贮器次之。乐器有铙、铃。兵器有矛、戈等。其他铜器有车害、弓形器、斧、削、刀、凿和锯齿状铜镰。其中在阜南县月凡河发现的龙虎尊、兽面纹尊,器型高大,铸工精致,十分珍贵。有铭铜器也有少量发现,其中在颍上王岗征集到铜器7件,其中一件铜爵铭“月巳”二字,另一件爵铭“酉”字;在金寨县斑竹园出土2件带铭铜器,一件为“父己”铭鬯、一件为“父癸”铭爵。庐江泥河区出土的一件大铙硕大厚重,高约50厘米,出土时无任何伴随器物,埋藏方式也和南方其他地区发现的铙相同,形制和纹饰与湖南出土的铙相似,属于典型的大型打击青铜乐器。

淮河流域西周时期青铜器约与中原地区西周铜器大体相同,基本上可以划归周式铜器的范畴。主要发现有颍上县王岗郑家湾一座西周早期土坑墓,出土有鼎、爵、卣、尊、戈、镞等9件铜器,在爵、卣和尊的腹壁

均铸有族徽图案和“父丁”二字铭文。从西周晚期开始至春秋中期，江淮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显示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如云纹鼎、弦纹鼎、兽首鼎、鬲形盃、簋等，与周式铜器差别较大，风格新颖、造型独特，应与群舒文化有关。其中牺首鼎和鬲形盃是当地别具特色的器物。

西周时期是皖南青铜器的快速发展期。皖南西周青铜器种类主要有饮食器类的鼎、簋、甗和盃，酒器类的爵、斝、尊和卣，水器类的盘和匜，兵器和工具类的剑、斧、戈、矛和镞。纹饰主要有兽面纹、窃曲纹、夔龙纹、蟠虺纹、凤鸟纹、蝉纹、重环纹、涡纹、乳钉纹、圈点纹、编织纹和云雷纹等。可以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以屯溪西周墓为代表，典型器物有鼎、簋、盃、尊、卣等；北区以沿江地区的铜陵、繁昌、南陵等地为代表，典型器物有鼎、甗、盘等。其中以在屯溪飞机场先后发掘的8座西周土墩墓最为重要。出土青铜器有鼎、簋、盃、三足器、尊、卣、盘、五柱形器等107件，在整个南方都是具有标杆意义的器物群。这些器物具有一些中原西周器特点和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尊在组合中占重要地位，簋和鼎也很突出，卣和盃在组合中也显得较为重要，其余的器类还有盘、盃、壶、勺、五柱器、独柱器等。五柱器造型奇特，下为空腹鼓形方座，平面稍下凹，上有长形的脊，其上立有五根等距离的实心圆柱，其功用至今难考。另外，屯溪青铜器铅的含量一般偏高，甚而超过了锡的含量，器表的色彩青灰泛白，有的内里锈蚀严重，不似中原青铜器铜质橙黄。在青阳十字铺发现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计有鼎、尊、盘、甗、编钟、戈、矛等12件。特别是双龙耳尊、羊尊，造型新颖，具有地方特色。最近在青阳出土的一件乳钉云纹大铙，高84厘米，其形体、重量皆为东南地区最大，具有东南地区越文化的因素。类似大铙在潜山、马鞍山、宣城也有发现。

安徽春秋时期青铜器不但分布广、数量多，而且中期以后形成了这一时代特有的新风格。在江淮和皖南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出土过成批的青铜器，不乏精品和重器。其中寿县西门内蔡侯墓出土了486件青铜器，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铜器170多件，大致包括礼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等，而其中生产、生活工具明显增多，出现了诸如簠、敦、缶、炉、



蹲人耳铜簋



鬲形盃



龙耳尊



龙钮盖盃

铜镜、洗、带钩、短剑等新的器物。器物造型生动逼真，纹饰瑰丽浑厚，并具有明显而特殊的地方风格。如蔡侯昭侯申墓出土的莲瓣方壶，结构复杂、华美气派，采用熟练的分铸法，令器物别具一格、浑然天成，显示了春秋时期皖人的高超技艺。今安徽宿州褚兰平山村出土的蹲人耳簋，其造型一反商周以来的呆板，形象生动，纹饰细腻精美，为青铜器转型期的代表性器物。寿县蔡昭侯墓出土的青铜莲瓣方壶，也表现出很高的技术水平。淮南蔡声侯墓出土的3把错金银蔡侯铲，用金、银缕丝巧妙装饰，铸有金丝鸟篆文字，体现了高超的工艺。舒城秦家桥出土的2件刻纹铜壶，用细如发丝的线刻工艺制作而成，纹饰流畅，非钢刀莫能为之。

在群舒之地的舒城、庐江、怀宁等地连续出土过一批铜器，长江南岸的铜陵也有类似风格的器物出土，主要有鼎、簋、盃、匜、鉴、盘等。这些器物的风格有别于中原地区出土的器物，也不同于安徽其他地区出土的



羊首鼎



蟠螭纹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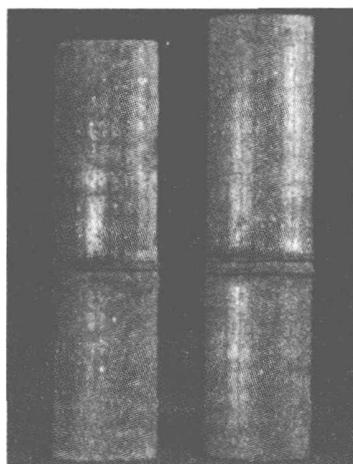
楚器和蔡器,具有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其中以舒城凤凰嘴出土的兽首鼎、凤凰山出土的龙形提梁盃、怀宁杨家牌出土的蝉纹对鼎、寿县魏岗出土的三足羊兽鼎等造型优美、铸造精良,为其中的精品。

皖南出土的铜器,有鼎、尊、盃、盘、甬钟、剑、戈、矛等,器物风格特征较明显。其中的鼎为浅腹、圆底,三足外撇,是典型的南方“越式鼎”;附耳盆形鼎、龙耳尊、牺首尊、鸟盖盃、龙纽盖盃、蟠螭纹盘等也凸现出地方文化的个性。

战国时期的安徽青铜器器具种类明显增加,生活器具出现了缶、镜、带钩、编钟,生产工具有刀、斧、开凿、锉、锯、鋸、削、铲、锄、钁等。青铜器的生产开始摆脱原先主要为宗庙祭祀和贵族服务的礼器而逐渐转向实用、坚固的生活和生产用器,并且朝着商品化方向发展。其中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李三孤堆仅1933年一次被盗器物便达4000多件,而在现存700多件中以青铜器居多。铜器中鼎有桥鼎、钝鼎、螭鼎、球形小口鼎等,另有甗、簋、壶、尊缶、缶、敦、俎、豆、盘、鉴、勺、量、箕、炉盘等,还有兵器及生产工具之类,仅有铭之器便达30余件,铭有楚王名者8件。1935年、1938年此墓又两次被盗,各掘出器物数百件,其中亦有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铸造技术大为进步,不仅采用浑铸与分铸、大焊和小焊,发展了镶嵌技术,而且还普遍使用金银错这样的尖端技艺。此墓出土的“铸客鼎”,是迄今发现西周以来最大、最重的铜鼎。造型优美,纹饰繁丽,铭刻书体苍劲俊秀,工艺难度很高。淮南蔡



鼓座



鄂君启节

家岗蔡侯产墓虽早年被盗,但仍出土各类铜器 75 件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几件有铭兵器的发现,包括蔡侯产剑 3 件、铸文 63 字的“昭侯”戈 1 件、“吴王诸樊”剑和“吴王夫差戈”各 1 件,还有越王剑 1 把。

安徽战国青铜器中发现有与度量衡有关的器物,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商业发展的水平。见于考古发掘资料的有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尺,长 22.5 厘米;寿县大铜量、淮南铜量、凤台“郢大府之口量”发现的铜量形制大小完全相同,其标准容量即为 1125 毫升。巢湖、寿县、凤台等地发现几套铜砝码,均为环形,是称量衡器的组成部分。

符节类青铜器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出现的器具,安徽发现的鄂君启节共 5 件,仿竹节制成。节是当时通关的凭证,“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根据这 5 件上的错金铭文可知,此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贩运货物的通关符节,上面清楚地记载了往返路线与时间、运输工具的数量、载运量等规定,是研究战国晚期楚国当时地理、商业、社会制度的珍贵文物。

## 四、秦汉时期考古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兵统六国,结束群雄并争局面,推行郡县制于天下,安徽分属九江郡、会稽郡等六郡,约有 25 县。秦王朝以暴政荼毒苍生,短命而亡。汉代秦后,虽治国思想与之大相径庭,但在分封王(侯)国的同时,也因袭了郡县制。西汉前期,安徽分属汝南郡、庐江郡、豫章郡、淮南国、衡山国等郡国;元封五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安徽地属豫、徐、扬三州。至公元 2 年,共有 73 县,分属七郡、三个侯国:汝南郡(治上蔡,在今河南)、沛郡(治相,在今淮北市)、九江郡(治寿春)、豫章郡(治南昌)、庐江郡(治舒县,在今庐江)、临淮郡(治下邳,在今江苏睢宁)、丹阳郡(治宛陵,在今宣州)、楚国(都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六安国(都六,在今六安)、梁国(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东汉王朝,基本沿袭西汉的行政区划而稍有变更。原本是监察区域的州,至汉末逐渐变为一级行政区划。东汉又将十三州变为九州,安徽仍属豫、徐、扬三州。豫州州治一度设在谯县(在今亳州),徐州州治曾在历阳(在今和县),扬州州治则在郟县(在今山东郟城)。安徽的郡国与县的设置亦有变化,共有 67 县,分属五郡四侯国,分别为豫州刺史部汝南郡(改治平舆,在今河南汝南)、梁郡、沛国(原沛郡改置),徐州刺史部广陵郡(治广陵,在今江苏徐州)、彭城国(原楚国改置)、下邳国(原临淮郡改置),扬州刺史部九江郡(移治阴陵,在今定远)、庐江郡、丹阳郡。

安徽境内县数从秦代到汉代大约增加了两倍,不仅反映了汉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也反映出当时该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事实上,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安徽境内确实得到了发展:江淮之间的郡国曾两度接纳由政府派官员护送而来的

饥民；丹阳郡设有全国唯一的管理冶铜的官方机构——“铜官”；寿春和合肥成为江南与中原交通贸易线上的枢纽城市。因而，新道家经典著作《淮南子》、无神论典范《新论》、第一篇五言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诞生于皖也就不足为奇了。

斗转星移，历史更替，只有埋藏于地下的“废墟”向我们娓娓叙说那曾经的辉煌，墓葬便是最好的“叙述者”之一。秦汉时期古墓葬，星罗棋布，数量众多。安徽汉墓的考古工作，大致可追溯到1955年。经过50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安徽共清理汉墓千余座，其中不乏一些重大发现，我们由此可以对安徽地区秦汉时期考古文化面貌进行窥探。

## 1. 汉初诸侯陵——阜阳汝阴侯墓

木椁墓：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在长方形土坑内构筑木椁（或不构筑木椁），内放木棺（或直接置棺木于土坑中）。有的有墓道和二层台。为了保护棺椁，木椁周围大多填炭或青膏泥，有的在炭外再填青膏泥，有的在基底垫枕木。该类墓流行于西汉，东汉前期的有零星的发现（仅在江淮之间，当时属九江郡管辖的地区），集中分布于江淮之间，江南、淮北较少。江南仅发现有西汉晚期的木椁墓。依据结构与规模，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有头厢、左右边厢、足厢和棺室，如霍山三星村 M1、M2，阜阳双古堆 M1 等；或是虽无头厢、边厢和足厢隔板，但棺的四周留出相应位置，如芜湖贺家园 M1、M3，天长杨村 M1 等。

第二类，在棺室外有头厢、边厢或足厢，如阜阳双古堆 M2，定远红山西汉墓，天长三角圩 M1，天长北岗 M6、M9 等；或没有头厢、边厢或足厢隔板，但椁内留有相应位置，如霍山三星村 M4、天长杨村 M4、天长北岗 M3 等。

第三类，棺室外只有用木板隔成的边厢，如合肥胡大墩 M2、繁昌竹山 M1、六安九里沟 M64 等；或是虽无边厢隔板，但棺与椁壁相依形成边

厢,如霍山三星村 M3 等;有的甚至无椁,而将随葬品置于棺前或两侧,但墓圻规模和随葬品规格均同于前两类,如合肥胡大墩 M1、庐江叶屯 M1 等。

第四类,有棺无椁的小墓,其随葬品往往有少量的陶器,个别有铜镜、带钩等,如淮南乳山村汉墓、定远侯家寨 M6 等;有的根本没有随葬品,如定远侯家寨 M3、M5 等。

**发掘经过** 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俗称“双古堆”,位于今阜阳师范学院西湖校区教学主楼前广场,原是一个高出地面 20 米、东西长 100 米、南北宽 70 米的双顶大古堆。

在一马平川的阜阳市,如果有一座 20 多米高的大土堆,就相当于一座小山,可以登高望远。在明朝时期阜阳城建造的奎星楼,仅 9 米多高,就能望见大别山之余脉霍山,称“望霍楼”。然而,在今天的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处,40 多年前却有一座 20 多米高的大土堆。可以遥想当年,那该是多么壮观的土山!

40 多年前的这座土山位于原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生产队。这座土山当地人称双古堆,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出现抑或是人工垒起,这些已成为历史之谜。所有的一切都静静地卧在阜阳广袤的大地上。1957 年,阜阳建飞机场取土对它进行了开挖,从 20 多米高的大土堆变成了仅仅 4 米高的土堆。1977 年,罗庄大队罗庄建砖窑厂时把 4 米高的土堆也挖平了。然而,就是这一次挖土,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大土堆下面却隐藏着一个惊天之谜:地下竟然埋葬着 2000 多年前的汉代开国功臣汝阴侯之子夏侯灶,这个大土堆就是几千年来踪影难觅的汉初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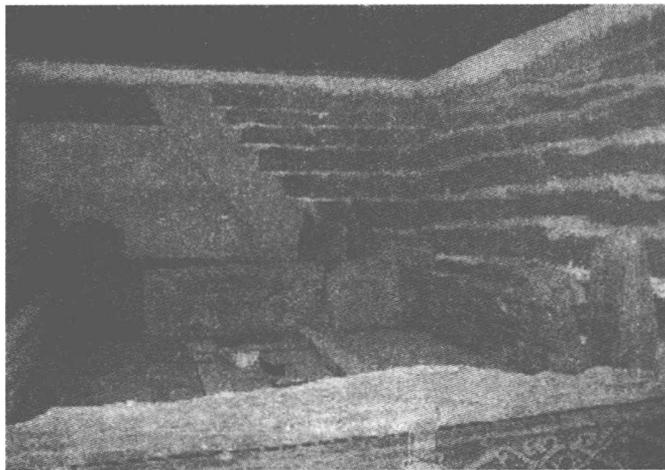
197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8 日,由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和阜阳市文化局三个单位组成的考古队对阜阳双古堆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西汉早期同坟异穴墓两座,分别编号 M1、M2。

**墓葬形制** M1 为土坑木椁墓,有墓道,方向正南。墓口南北长 9.2 米、东西宽 7.65 米,墓道宽 4.1 米。木椁外填木炭。椁壁外、椁底积炭厚度分别为 40 厘米、44 厘米,椁盖上层积炭厚度不详。木椁只有一层,

盖板断塌,上侧板朽烂,底板完好。椁板里外髹黑漆,垫条木,底板和侧板均为楠木。棺板为楸树,棺床横圆木为青檀。椁室南北长6.2米、东西宽3.8米。侧板嵌在底板上,底板与侧板、侧板与侧板用卯榫相接。东、西、北三面侧板各用两块板垒起,但东西侧板均不到头,两端各竖一板与南北壁连接。南端置两层椁板,里层椁板竖立在椁底中段,东南角和西南角各安一单扇门。外层置一层横板,横板堵住东南角门,西南角门似可以开关。椁底板用八块木板横排,平铺在垫木上。侧板外壁凿有“左侧下”、“右侧下”字样,并填以红漆。底板横头分别刻有一至八的符号。椁室内距南壁75厘米处竖一隔板,隔板两端靠侧板处各置一隔扇门。西隔扇门里放棺床,棺盖板里外分别髹红、黑色漆。椁室分为头厢、棺室、东边厢、西边厢和北边厢五部分,其中边厢内陈放有随葬器物。死者的尸骨无残留。

M2亦为土坑木椁墓,有墓道,方向正南。墓口南北长23.5米、东西宽13米,墓道长23米、宽13米。积炭厚20~25厘米,炭层外有10厘米厚的青膏泥。椁室南北长5.35米、东西宽3.3米。椁板较M1薄,结构基本相同。椁盖板腐朽,侧板用两块木板垒起,只是南端置横、竖三层板,内外层横置,中层竖置。椁室西南角设有单扇门。椁底板用六块木板横排,平铺在垫木上。垫木上篆刻有“西南”、“西南中”、“东南”、“东南中”等字样。棺床前立有隔板,两面留有扇木门。椁室内因棺床直抵北壁,所以只有头厢和东、西边厢,随葬品置于头厢和边厢内。与M1一样,死者的尸骨无存。

**重要发现** 这两座墓由于早期被盗掘,



阜阳汝阴侯墓复原图

仅出土竹简、漆器、铜器、铁器、陶器等文物 270 余件。而且这批文物，或因盗掘遭损，或因棺椁塌毁受损，完整的不多。

**竹简** 竹简出土于 M1 东边厢一木简中，因木简被砸毁及长年挤压，竹简散乱，有的粘结在木简残片上。目前，共清理出竹简 9000 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古籍。阜阳汉简现已整理出的文献典籍有《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算经》、《行气》、《相狗经》、《刑德》、《日书》、《楚辞》、《春秋事语》、《儒家者言》、《庄子·杂篇》、《荀子》、《国语》、《汉初闰朔表》等 20 余种，多系亡逸千年之久的秦末汉初的珍贵文本，其中的《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大事记》、《春秋事语》、《儒家者言》、《万物》、《楚辞》、《庄子·杂篇》等 13 种简书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珍贵古籍。

**漆器** 共 114 件，多数残破，器形主要有式盘、式盘架、盘、壶、匜、盂、耳杯、奩、匕、弓、木简、瑟等。其中比较珍贵的是出土于 M1 东边厢内的三件式盘，即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和太一九宫占盘，均为木胎髹黑漆。

(1) 二十八宿圆盘分上下两圆盘，上盘直径 23.6 厘米，边厚 0.4 厘米，下盘直径 25.6 厘米，边厚 0.5 厘米，两盘中心有圆孔相通。上盘圆孔旁有北斗七星，斗柄三星与斗上二星几乎在一条直线上。过圆心划有一轻痕“十”字漆线，一线长一线短，边缘密排一周等距小圆孔，孔如谷米大，不透穿。边缘漆皮脱落，但经推算小圆孔总数为三百六十五个。下盘周边斜面上依逆时针方向不等距针刻篆文二十八宿及其距度，度数为古度。中央作“十”字形漆线交于圆心，一线长，两端正对“角”、“奎”；一线短，两端正对“斗”、“东井”。

二十八宿圆盘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也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初测天仪器的具体实物。根据唐《开元占经》所辑，盘刻的二十八宿名称和宿度基本与战国时代的《甘石星经》相符（宿度有少数不同），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史的宝贵资料。至于具体用途，应为计算宿度。

(2) 六壬栻盘分上圆下方两盘。上盘（即天盘）较下盘（地盘）小，

圆心有小孔,孔上安一铜泡钉与下盘相通。正面周缘针刻篆文二十八宿,更于每宿篆文上作一圆点,并于营宿点、奎宿点、胃宿点等十二宿点上分别针刻十二月次(不同于十二月神或月将),正中为铜质圆钮,钮旁有北斗七星,魁西东,斗柄直指角宿。下盘正面中心有一微突的圆形。在中心圆外,有大小两个用朱线绘成的正方形,把圆外部分分隔成内、中、外三部分。在外部,按东、南、西、北四方,针刻篆文二十八宿;在中部四方,针刻篆文十二地支;在内部四方,分别针刻篆文“甲子”、“丙丁”、“庚辛”、“壬癸”。另在内部四角,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分别针刻篆文“土斗戊”、“人日己”、“天己”、“鬼月戊”。中心圆正中有一小圆孔。

在汉代,“六壬术”很盛行,这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一种占卜术。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以水为首;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中,壬、癸皆属水,壬为阳水,癸为阴水,舍阴取阳,故名为“壬”;在六十甲子中,壬有六位,即壬申、壬午、壬寅、壬辰、壬子、壬戌,故名“六壬”。当时,人们创造了一种供六壬占卜使用的工具,这就是六壬栳盘,近代考古发掘中屡次出土六壬栳盘。

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栳盘是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栳盘,当时应作占卜“天时”以趋吉避凶之用,当属封建迷信之列,但亦与天文、历法等密切相关,对研究科学史有参考价值。

(3)太一九宫占盘分上圆下方两盘,两盘中心有圆孔相通。上盘(即天盘)较下盘(即地盘)小。通过圆心划四等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针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绕圆心刻“吏”、“招”、“摇”、“也”四字。下盘在上盘槽外至边缘中间,有一用朱线绘成的方框,将上述空间分隔成内外两部。线外针刻朱描篆文四时八节(其中一半朱描脱落),冬至与夏至、春分与秋分分别相对,居四方正中;立春、立秋、立冬、立夏亦按春秋、冬夏分别相对,居四隅。在格线内,四方正中,与“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相当的位置,针刻“当者有忧”、“当者显”、“当者有喜”、“当者有盗争”;在四隅,与“立春”、“立秋”、“立冬”、“立夏”相当的位置,针刻“当者病”、“当者

死”、“当者有患”、“当者有僂”。在背面也有刻画。由中心点向四方划出四个线条，成一个“十”字形，在四等分里各划一个直角平分线图。在十字线端和直角平分线端按顺序针刻篆文：“第一子夜半冬至右行”、“第三日夏至”、“第二冬至平旦”、“第四夏至”、“第三七年辛酉日中冬至”、“第四夏至”、“第三冬至日入”、“第二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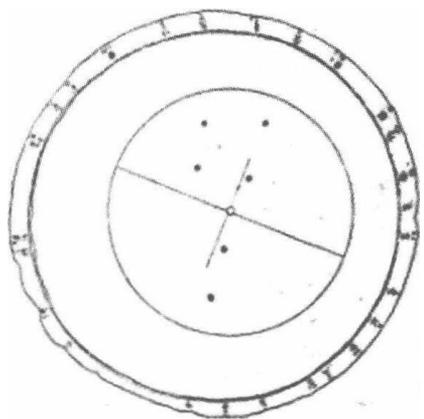
太一九宫占盘亦属首次发现，不曾见于古文献对汉初测天仪器的记载中。与六壬栻盘一样，虽非科学之类，不过其中包含的天文、历法等知识有很高的价值。

我国最早的天文记录，见于殷代甲骨卜辞，经西周发展到春秋战国之际，天文历法已具雏形。土圭测影，终于春秋，尚无器，汉初“立仪表”、“晷仪”、“转运浑天”以观天，虽有器，但具体模样早就无法见到。近年我国考古所见较早者，一为元光元年历谱，二为观察恒星记录的西汉星宿图，三为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的“五星占”。至于西汉的天文仪器，至今仍未发现。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三件式盘，它超越了文献记载最早的天文仪器年代，是我国古文献没有记载过的汉初测天仪器的具体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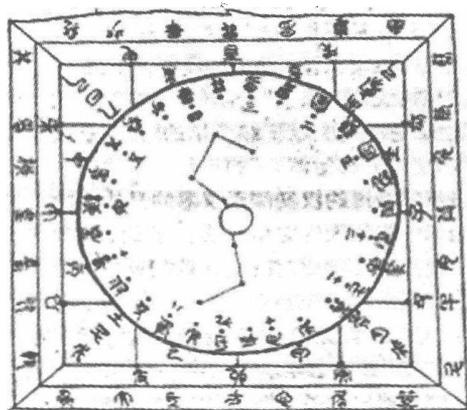
这三件栻盘均比较罕见，而且目前尚无任何依据证明它们不属于夏侯灶，它们应当与夏侯灶的爱好或职业有关，也就是说夏侯灶或为天文爱好者或为管理天文的官员。三件栻盘的结构不算复杂，但计算宿度和布算式却是比较复杂而又专业的事情。仅仅是个爱好者，若有上述能耐或多或少地让人诧异，而若是专业人士就不一样了。《汉书·王莽传》有“天文郎按式于前”的记载，可见管理天文的官员懂得式的布算等是理所应当之事。

**铜器** 铜器发现较少，主要有鎏金铜弩机、鎏金铜牌、铜印、鼎、罇、剑、矛、戈、镞、斗、铜带钩、铜镜、铜钱等。其中以 M1 出土的鎏金铜弩机、鎏金铜牌和铜印较为独特。

(1) 鎏金铜弩机有大、中、小三件。大型和小型的出土于东边厢内，中型的出土于西边厢内。大型的饰云纹和涡纹，双悬刀，郭长 16.5 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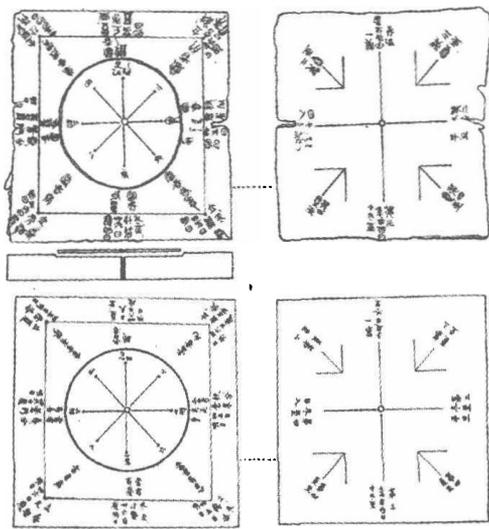


二十八宿圆盘摹本



六壬杖盘摹本

米,宽3.8厘米,高3.3厘米,度高3.1厘米,木臂已朽,残长5厘米;中型的单悬刀郭长14厘米,宽2.7厘米,度高3.3厘米,残存木臂36厘米;小型的单悬刀郭长19厘米,宽36厘米,高2.8厘米,度高3.1厘米,残存木臂长48厘米,木臂前端装承弓器。



太一九宫占盘摹本

(2) 鍍金铜牌一件。长方形,长17厘米、宽6.1厘米、厚5厘米,微有弧度。中偏左有一圆

孔,边有叶脉纹。牌面浮雕花纹:中为山林树木,山上有向两方奔跑的八头野猪,两边有下山的奔马,以下有两只骆驼相向而行。

(3) 铜印一件。印面圆形,背半球形。直径2.2厘米,背桥钮形,印面阴刻一只鹈鸟。古人认为鹈鸟是能预知天气的一种水鸟,所以古代管理天文的官员多用鹈鸟做标志,因而该印可能是墓主职业的象征。

**铁器** 铁器发现不多,主要有铠甲、剑、锤、马饰等。其中比较珍贵的是出土于 M1 东边厢东北角木筒内的铁铠甲。因穿绳朽断,已为散片,只有一小部分卷在一起。从其形状看,有1片为圆形,2片为半月

形,2片为角形,51片为舌形,其余都是抹角近似方形的。总共有3038片,里外髹黑漆,多数已锈蚀,经称量,总重量20多千克。伴随甲片而出的还有铜泡和金泡,可能是甲冑的饰件或附属品。

**陶器** M1出土的陶器有编钟、编铎、编磬和2个小陶罐。M2出土的陶器内外髹(黑色、褐色或棕色)漆,器形有鼎、盒、壶、罐、瓮、马头,皆已破碎。

另外,两墓还出土有其他物品,如银发针、石磨、铅丸、木俑、木梳、植物种、鹿角、猪趾等。

西汉汝阴侯前后传承四代共86年。第一代汝阴侯夏侯婴始封于高祖六年(前201年)十二月,因在汉中央政府任“奉车太仆”要职未就国,此后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第四代汝阴侯夏侯颇皆在汝阴就国,至夏侯颇于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因“坐与父御婢奸”而自杀国除。除第一代汝阴侯夏侯婴死后葬于汉长安城东8里饮马桥南外,其余三代汝阴侯死后皆葬于封国食邑之地。依据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如“女阴侯”、“女阴家丞”、“元年”、“四年”、“六年”、“七年”、“九年”、“十一年”等字样,参考埋葬习俗及有关史料,得知两墓为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

双古堆两座汉墓的年代明确,这就为汉代考古断代研究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铭文中记有容量、重量和尺寸,可供研究汉代度量衡者参考。漆器、铜器的自铭,可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竹简《仓颉篇》的发现。《仓颉篇》原为李斯所作,共有七章,是秦始皇用以统一文字的课本。汉初曾经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五十五章,仍称《仓颉篇》,但该书已失传。解放前后,曾在汉简中有过两次发现,但文字很少。这次出土的《仓颉篇》已清理出三四百字,对于研究秦汉时代的文字是极为珍贵的。值得注意的是M1中三件天文仪器的发现。这次汝阴侯墓出土的三件枳,形制用途各异,这在我国考古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 2. 丰富的地下宝藏——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

放王岗一号墓,位于巢湖市东郊约2千米的亚父乡亚父村境内的放王岗上。放王岗传为“商汤放桀处”,因而得名。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桀王城在卧牛山(今城区行署驻地)的东北侧,离城区约1千米,是巢伯为桀王筑建的,以方便监控桀王。不过王城的具体位置、规模已经无法考证。桀王死后被埋葬在岗上,因桀是放逐之王,故名放王岗。

放王岗一号汉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精美绝伦的器物,其中大量的漆器运用了汉代先进的漆器制造工艺。

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炆金、描金等工艺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漆器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这时期出现了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还有不少漆器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如盒内装6具顺叠、1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奩,内装5具、7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等。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的金漆,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有些漆器的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空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更是前所未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

**发掘经过** 放王岗原为桀王城,是一座南北走向、长约500米的土丘。1984年全国进行文物普查,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对该地区进行文物勘探,查明放王岗上有7座封土较高的古墓,但基于对文物的保护一直没有进行考古发掘。1996年6月18日,巢湖市东亚粮食机械总厂在厂门前左侧不到50米的土岗上兴建职工宿舍楼,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木

椁墓。随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和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三方组成田野考古发掘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历时 30 余天。

为保护好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巢湖市从 1997 年 4 月起动工修复古墓，兴建专题性汉墓博物馆，至 1998 年 4 月 16 日，墓坑原址展厅对外开放，博物馆的主体工程文物陈列大厅、文物库亦已落成。目前，巢湖放王岗汉墓博物馆是巢湖市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形制** 该墓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呈“凸”字形。整个墓坑挖在砾石层中，坑边不甚齐整。墓坑口东西长 9.2 米、南北宽 7 米。西壁正中有一条长 6.2 米、宽 2.66 米的长斜坡式墓道。椁墙与墓坑之间填塞 50~60 厘米厚的木炭。葬具保存基本完好，为双椁双棺。外椁长 7.62 米、宽 5.72 米、内高 2.04 米，西壁挡板中间设有两扇木门与墓道相通。外椁室所用木材绝大多数为楠木。坑底纵放 3 根垫木，椁底板用 16 根枋木横置其上，底板上筑四壁。除东面侧板用四根枋木上下叠置外，其他三面侧板均为立板套榫横列。外椁室内距西壁近 1 米处竖 2 根立柱和 5 厘米厚的隔板（立柱之间为两扇木门，正对西壁木门），将其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南北两侧设宽度相当于南北侧板到近立柱距离的器物架各一件，用以摆放随葬品，中间为过道。后室紧贴东壁中部置内椁，长 3.14 米、宽 1.82 米。内外椁间不设隔板，却留有头厢和南北边厢的空间。内椁底板上有一木质棺床，棺床的横断面呈“凹”字形上承棺。紧连内椁的西面设用立柱和隔板构成的一道“屏风”。内外棺均呈长方盒状，盖、墙、挡板皆用一块整板套榫制成。外棺长 2.76 米、宽 0.74 米、高 0.95 米，里、外分别髹红、黑色漆；内棺长 2.24 米、宽 0.74 米、高 0.59 米，里外均在黑漆底上加施一层红漆。死者尸骨已朽，仅有 20 余颗牙齿保存，但头东脚西的骨骼痕迹清晰可辨。

**重要发现** 由于该墓未遭破坏，棺椁保存较好，随葬品基本完好。此墓共计出土漆木器、铜器、滑石器、铁器、铅制品、玉器、角质器、陶器等文物 3000 余件，是目前安徽发掘的汉墓中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座。



前室南侧器物架上漆案及耳杯出土情况



北边厢部分铜器出土情况

**漆木器** 全墓共出土 489 件，主要陈放在前室南北两侧的木质器物架上，少数位于架下。漆器以木胎为主，还有少量的夹贮胎。木胎类漆器的制作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旋木胎，一种为斫木胎，少数为卷木胎。旋木胎漆器一般为耳杯、盘、盆类器，案、几类则多采用斫木胎，卷木胎只见樽一类器形。筒状和直壁类漆器多为夹贮胎，如奩、盒、卮类，此类器物大多数镶嵌有银扣饰。

器物种类主要有耳杯、案、长方食盒、奩、六博棋盘、卮、瑟、兵器架、车轮模型、仗、木人俑、马俑、俎、梳等。其中耳杯较多，有 255 件，件件珍品。漆器上装饰有云纹、鸟兽纹、几何纹、卷草纹等纹样，线条奔放流畅、构图严谨。人物俑造型逼真，既有立俑，也有坐俑；既有乐俑，也有舞俑。漆木器无论数量还是种类，在江淮地区的汉墓中都不多见，十分珍贵。

**奩** 内盛放有小圆盒和角质匕。圆筒状，直口，直壁，矮圈足。盖面微弧，顶中心饰黑紫色漆，内髹红漆。盖面、盖身和器壁各饰两条花纹带。在山、水、树、桥和云间朱漆绘有站立的鸟、行走的虎、猎犬和奔跑的梅花鹿等禽兽。器口内侧饰三角纹一周。

**卮** 夹贮胎。直筒状，由盖与器两部分组成。盖径略大于器身，顶部微弧。盖面的中部、边缘及下口边部皆镶嵌有银扣饰。顶中心嵌银质柿蒂纹，中有一方形纽，原有一铜环，缺失。环柿蒂纹间绘两只梅花鹿奔走于云间。盖边在两条带状银扣间绘两只鸟纹和云气纹。器作直壁，直口，圆唇，器身一侧上腹部安装一个圆环形附扁尾状铜扳手，底部嵌铜质三蹄形矮足，耳与足均鎏金。器身上口和腹部中间及底部各镶一道带状

银扣饰。内壁髹红漆,无花纹。外壁髹黑褐色漆,于三道银扣间绘几何纹、云纹和八只形态各异的兽纹。所有花纹都是先以针刻画图形,然后再以朱漆勾描,线条细如游丝、流畅奔放,造型很精致。

**铜器** 全墓共出土 2552 件(其中铜镞 2421 件),陈放于南北边厢中。这批铜器制作规整、造型别致、工艺精美。按照器物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炊煮器、盥洗器、盛储器、日常生活用具、饰件及兵器等。器形有豆、簋、鼎、鬲、甗、觚、爵、角、铙、钲、钟、鼓、钺、戈、矛、刀、剑、弩机、席镇、熏炉、灯、镜等。

这批铜器中绝大多数器物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器,出土时,鼎、壶类器物内盛装有粮食(黍)、果类、禽兽骨头,在烹饪器的底部有明显的使用时留下的刻画痕迹。器物的制作以模铸为主,少数器物锤揲而成。纹饰相当简素,除少数器物饰有凹凸弦纹和以铺首作装饰外,其余均为素面,无花纹,无文字。但有些器物如席镇、鹿盘、朱雀饰件等,不仅造型优美,而且在器表鎏金,特别是南边厢出土的一把铜剑,剑首(即剑墩,剑柄的顶部)与剑格(即剑鐔,亦称护手。指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椭圆形盘部分)以树根雕琢而成,显得十分精致华丽,它把我国根雕艺术的历史提到 2000 年前。

**铜蒜头扁壶** 口部为六瓣形蒜头状,小直口,短颈,茧形扁腹中间微



漆奁



漆卮

鼓，平底，长方形圈足外撇。腹部正背两面饰凹凸宽带状纹各一道，两侧肩部有两条粗线凹弦纹。

**提梁壶** 直口，平沿，粗短颈，扁圆腹，圆底，三矮蹄足。附盖。盖面微弧，顶中置一方形纽扣环。腹上部两侧对置一半环纽，纽上套环。中腹饰宽带纹一周。提梁作弓形，两端为龙首状，龙口衔接环与腹侧半环纽上的铜环相套接。

**席镇** 整器近椭圆形，为一只卧伏的骆驼，实心，较厚重。骆驼回首曲颈，将头伏于背部的两峰之间，眼、耳、鼻、口清晰，头部棕毛呈线状顺伏，从棕毛下至前峰间有一条线沟，平底，两前足与后左足及长尾曲于底部，右后足弯曲与前足相连，构成一个三角形孔眼，可系绳。整器鎏金，多处脱落。

**铜朱雀** 模铸。朱雀昂首翘尾做展翅欲飞状，头有犄角，喙部尖弯，张开怒吼。两足挺立于四瓣形花朵之上，羽翅振飞，尾部似流云翻卷，三趾爪坚强有力。表面鎏金，采用模铸制作。造型精致优美，形象生动逼真。朱雀的双爪下端有一个方形插榫，方榫的末端横穿一圆形钉孔。此物应是安在某种木质器物上作装饰之用。

朱雀，亦称“朱鸟”，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又称凤凰或玄鸟。朱雀是四灵之一，同青龙、白虎、玄武合称四方四神。《礼记·曲礼上》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朱雀又是中国古代天象中的四象之一，二十八宿体系形成后，由南方七宿（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张宿、翼宿、轸宿）组成的鸟象。其位在南方，是天之灵兽。这件不可多得的铜朱雀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想象奇异、技巧完美、神奇华丽，真实地再现了楚文化奇丽诡谲的艺术风格，充满艺术的灵动。

**鹿盘** 南边厢出土。模铸。出土时盘中还残留有少许白色粉状物。整器为一只卧鹿，鹿头部昂起，双眼圆睁，两耳直竖，鹿身背脊部为一略呈椭圆形的浅盘，盘口微敛，周沿弯成曲线状，四足屈伏于盘底边，平底。外底部用双线刻画出粗狂的云气纹。器表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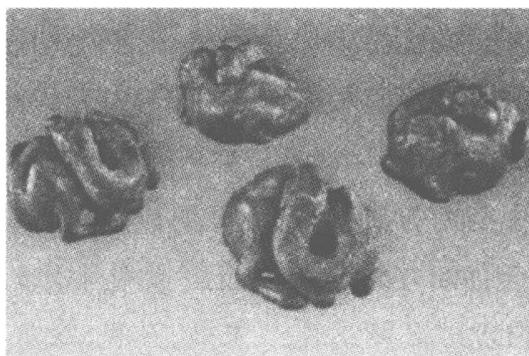
**铁器** 全墓共出土 47 件，主要为工具类和兵器类，器形有剑、矛、削、锄、铺首等。这些器物不仅代表了当时冶铁业的最高成就，还反映出当时江淮之间的生产力水平，是研究科技史的珍贵资料。



蒜头扁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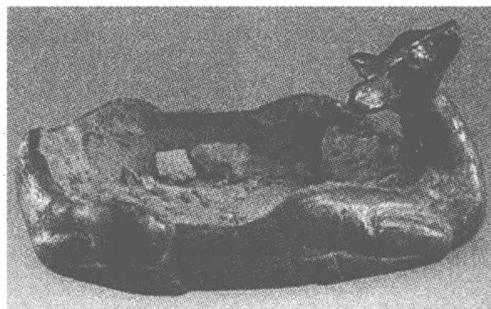
提梁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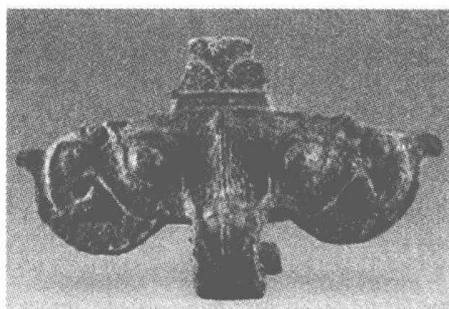
席镇



放王岗铜朱雀



鹿盘



铁铺首

铁铺首均为隔墙门上的装饰。作兽面形，顶上有两犄角，额部饰菱格形纹，双目怒睁，有凶煞之威，鼻梁中突，下端做钩状，铁环断面呈半圆形。兽面面部满饰谷粒纹，背面微凹，正对鼻梁处竖置一长方形插钉。

**铅制品** 全墓共出土 58 件，器形主要有盖弓帽、衔、当颊、泡、𦉳等，均为车上的附件或马身上的用具和装饰。这批铅器多相互叠压在一起，均模铸，小巧玲珑，制作精美，纹饰细致、繁缛，具有较高的工艺美术价值。车马器实物在我省汉墓的发掘过程中并不多见。放王岗所出虽非车马器的主体部分，但足以证明车马器随葬之事实，表明墓主身份、地位之特殊。

**玉器** 全墓共出土 16 件，多出自棺内。器形有璧、佩、环、印章、含、七窍塞、带钩、觿、玉具剑等。这些玉器质地精、雕工细，特别是一件环和一只佩，分别雕成龙形和虎形，通体雕刻细腻，一反“汉八刀”粗犷之风。另外，该墓所出玉具剑的装饰也很独特。剑鞘上和剑鞘下端镶玉饰，但剑茎顶端和剑茎与剑身之间（即剑首与剑格）却以树根雕成的动物作装饰。这是目前我省已发掘汉墓中出土文物的特例，堪称精品，弥足珍贵。

**玉璧** 两件，分两型。A 型玉色深绿，较纯正。两面均刻有谷纹，内外圈周缘雕弦线纹一道。B 型墨绿色，玉质软润。正反两面刻纹相同。璧面中间部位刻弦纹一道，将其分为内外两圈。外圈雕琢三只凤鸟纹，凤鸟低首卷尾，鸟冠及腹部线条刻画纹深宽。内圈为织蒲纹。在内外圈的边缘各刻有一周细弦纹。

**玉佩** 白玉，呈半透明状，质地较软。整器略称椭圆形，正面微鼓，背面内凹，中间有圆孔。器身似龟甲状，左右两侧透雕出相向的双虎身躯，以獠牙和四足紧抱住龟甲片，虎头、四足及尾部则采用浅浮雕的方法琢刻。两虎均做张口似吼状，双目前视，两耳伏于颈部，索状虎尾下垂，末端向内卷，正反面均用细线雕刻卷云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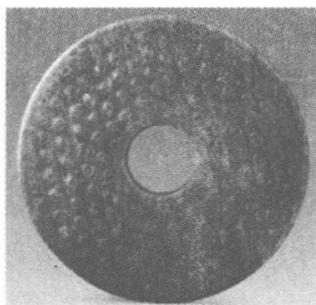
**玉环** 两件，分两型。A 型，色微灰白，质润光洁，无沁斑。两面雕刻纹饰完全相同。整器由一条龙组成。龙首回顾与卷起的尾部相连形成一环状，中间有一不规则的孔。龙口微张，两目正视。龙身用双线刻

成鱼鳞状纹，龙鳞以双线镂刻，在汉代出土玉器中极为少见。B型，青玉质，边缘微残。正反面纹饰相同，均以阴线刻两条弦纹，弦纹间饰涡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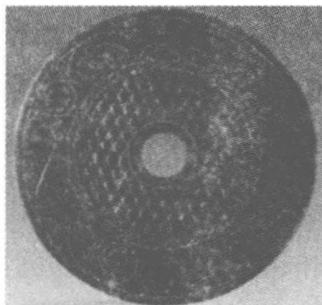
**耳塞、鼻塞、口琚** 口琚，白玉，呈半透明状，玉质较硬。器作蝉形，正面有双脊，背面较平整。两侧和下端圆弧处较薄，无纹饰。耳塞一对，白色硬玉，无杂质，呈上细下粗的柱状。鼻塞一对，玉质、玉色与耳塞完全相同。柱状，两端圆径基本相等。

**玉带钩** 青玉质，色灰绿。钩部作龙首形，青灰褐色斑块，钩身较长，作弓形，弧背，中脊刻两条凸棱线，腹下近中部有一圆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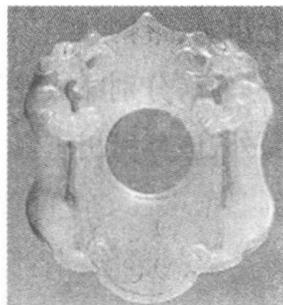
**玉印章** 出土于棺内尸体的腰部。灰白色，光洁明亮。方形座，覆斗形纽，顶端桥纽下横穿一孔，可系带。有边框无界格，印文阴刻篆书



A型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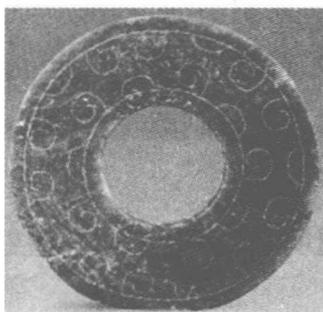
B型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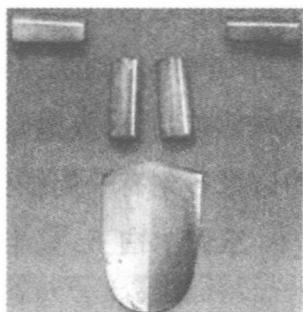
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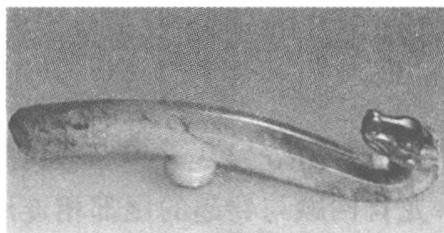
A型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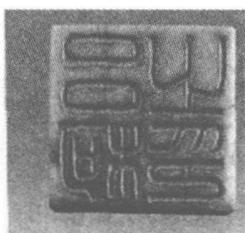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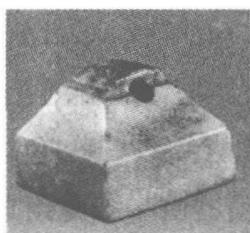
B型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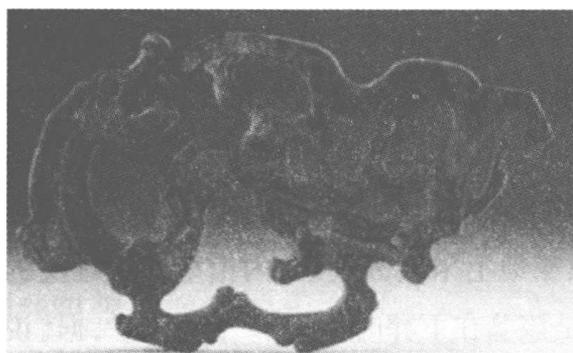
耳塞、鼻塞、口琚



玉带钩



玉印章



双龙形饰角雕



单龙形饰角雕

“吕柯之印”四字，字体工整、笔画圆润。

此外，还出土有龙形饰、笄等 10 件角质器，罐、灶等 6 件陶器以及栗、枣等植物种子等。

**龙形饰角雕** 双龙饰长 10.5 厘米、宽 6.6 厘米、厚 0.4 厘米。单龙饰长 9.3 厘米、厚 0.4 厘米。龙形饰二件，根据器型分两型，A 型为透雕双龙饰，B 型为透雕单龙饰。两件角雕龙形饰，雕刻精美，通体以自然纹理为装饰，出土于同一墓葬，为研究战国到西汉龙纹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物。

放王岗一号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唯一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是一枚“吕柯之印”的玉质印章。汉代对官印入葬有较严格的制度，一般官印是不能随葬的，按印文此章属于私人印信，不在规定之例，从印文可证该墓主人即为吕柯无疑。吕柯其人，查史无考，其生平事迹、生卒年代及其身份皆无从知晓。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曾在今巢湖地区设置居巢县，先属淮南国，景帝时改属庐江郡，武帝因之。故而该地区最高行政机构只是县级，最高的行政长官只能为县令（长），但从该墓的规模、棺槨结构以及随葬器物的数量和精美程度分析，远远超过阜阳西汉汝阴侯墓，而与长丰杨公地区发掘的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相若。战国时期的丧葬制度多与周礼不相符合，僭越现象屡见不鲜，在发掘的大量楚墓中均有较多的反映。该墓虽为汉墓，但仍保留较多的楚墓遗风，僭越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一个朝代的灭亡，并不能说明该文化的影响和人们的生

活习惯就随之完全改变。就棺椁制度而言,按《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该墓为重棺重椁即四重,按礼,墓主生前的官爵应在诸侯以下、大夫以上,或曰“上大夫”。又《后汉书·礼仪志下》云:“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梓棺,洞朱,云气画。”从该墓出土的内外棺看,外棺盖面在黑漆地上朱绘云气纹,内棺里外髹红漆的情况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特别是该墓在下葬时使用了“载柩车”,据《说文·车部》的记载,用此葬制的身份即为天子或诸侯。再者,该墓用5件铜鼎作为此墓的实际用鼎数量,根据周代用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放王岗吕柯墓暗合“大夫五鼎”,但从巢湖地区西汉时期的建置情况分析,吕柯其人根本得不到此等级、身份,所以该墓出现以上情况我们只能视为一种僭越现象。那么吕柯到底为何等身份?据推测,当是西汉中期该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或富甲一方的大商贾。

### 3. “黄肠题凑”王陵——六安双墩汉墓

“黄肠题凑”是一种葬式,始于上古,多见于汉代,汉以后很少再用。“黄肠题凑”一词最初见于《吕氏春秋》,据书中记载,天子礼葬时,用柏木堆垒成棺椁形状,外面有便房,也用柏木堆垒成,里面放有大量陪葬品。

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枌木外藏椁十五具。”三国魏人对“黄肠题凑”一词作如下注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刘昭对“题凑”一词也作过“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的注释。由此可知,黄肠题凑是设在棺椁以外的一种木结构,它是由黄色的柏木心堆垒而成。黄肠是堆垒在棺椁外的柏木,用柏木构筑的题凑即为黄肠题凑。

使用黄肠题凑,一方面在于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也

有利于保护棺木,使之不受损坏。“黄肠题凑”葬制在西汉初开始出现,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著名的有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和石景山区老山汉墓,以及保存最好、形制最复杂的江苏高邮的西汉中晚期广陵王墓。这些棺椁都是采自深山穷谷中的名贵木材如楠木、柏木和梓木等,装饰精致,制造考究,耗资巨大。如北京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黄心柏木多达15880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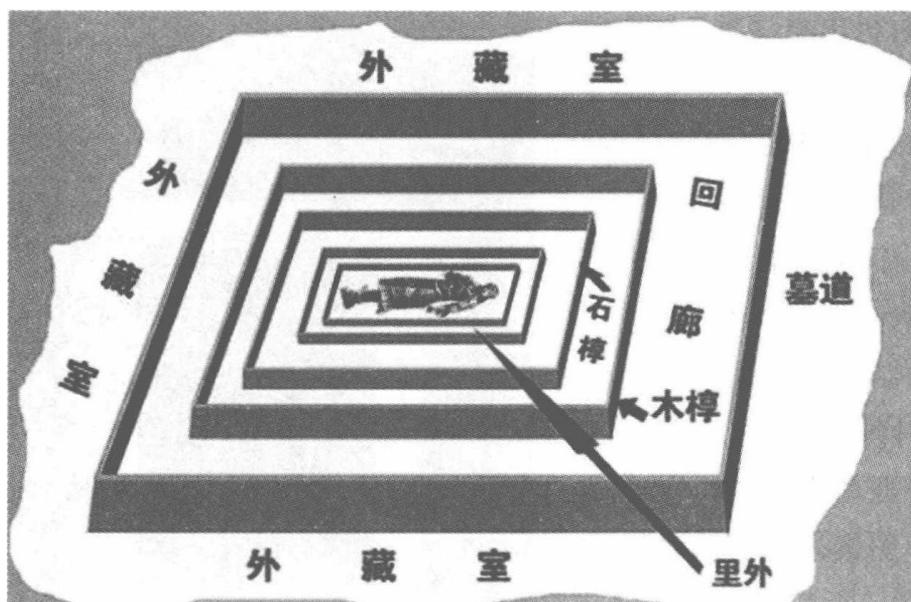
**发掘经过** 2006年3月至2007年1月,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沪汉蓉客运专用线合(肥)武(汉)段工程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六安市文物部门组成考古发掘队,对线路上发现的7处文物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六安双墩一号墓葬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重点。2006年10月中旬发现了双墩一号墓的木椁墓室和外藏室,2007年1月底田野发掘基本结束。在整个发掘期间,六安双墩一号墓的田野考古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考古学专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六安双墩汉墓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速铁路工程为此向南改道107米。



六安市双墩一号汉墓发掘前墓冢情况

**墓葬形制** 双墩汉墓位于安徽六安市三十铺镇双墩村境内,为并列的两座大墓,此外还有三座陪葬墓。在陪葬墓现场遗留中发现了盗掘器皿和工具,对盗墓工具的分析证明车马坑曾在唐代被盗。这是安徽境内第一次发现诸侯王陵,而且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

一号汉墓封土呈馒头状,底径 55 米、高 10 米。封土采用四分法和二分法发掘,封土层次较厚,有相互叠压现象,土质较松,未经夯打。一号汉墓为“中”字形土坑竖穴墓,墓口距墓底深 10 米,墓向朝东,由前后斜坡墓道、墓室、外藏椁组成,全长 45 米。其中墓坑长 17 米、宽 12 米,东墓道长 20 米、宽 7 米,西墓道长 8 米、宽 4.5 米。墓室为黄肠题凑木结构,长 9.1 米、宽 7 米,南、西、北三面用长 0.92 米、宽 0.25 米、厚 0.23 米计 922 根的方木块堆垒而成,木心向内,合缝严实,东端为对开式墓门。题凑上用四层方木料铺设做盖板,计 143 根,总厚 1 米,盖板上用两根纵向方木料压板,底部有四层方木料铺垫。题凑与内椁之间为回廊,在题凑内壁南、西和北三面均有对称的上、下两层凹槽,在西北角存有一座回廊门,推测当时的回廊内曾用小方棍分隔成 15 个小室。椁室为重椁重棺。外椁为木椁,内外均髹黑漆,长 4.6 米、宽 3.1 米、高 2.35 米,东端对开一门。内椁为石椁,长 3.9 米、宽 2.34 米、高 1.9 米,内髹黑漆,北壁上端有云纹红彩,东端为对开石门。外棺为长方形,长 2.8 米、宽 1.4 米、高 1.4 米,髹漆外黑内朱,在盖板两侧局部绘有三角形红彩图案。内棺长 2.32 米、宽 0.95 米、高 0.95 米,髹漆外黑内朱,内棺外两侧有红色云纹彩绘,棺外盖、两侧和两端装饰排列整齐的鎏金铜质柿蒂纹和菱形纹镶件,棺盖四角及中间两侧各放置一面铜镜,镜面朝上,整个内棺显得华丽、精致。外藏椁用方木料建构,围绕题凑一周呈“凹”字形,高 1.4 米、宽 1.6 米。根据盖板木料朝向和立柱排列,可分为 15 个室,东、南、北各 4 个室,西 3 个室,每个室大小不等。外藏椁未被盗,保存完好,随葬品有铜壶、陶壶以及大量的车、马、人俑等模型木器。该墓木结构复杂,椁棺板及门板普遍采用“Z”字形、燕尾形、凸凹、边搭等榫卯咬



双墩汉墓黄肠题凑结构示意图

合,有的还用“S”形铁件固定,外藏椁使用穿榫和半榫等连接立柱、横梁,非常坚实。在椁室盖板、墓门、门楣北侧等处,刻有“南方”、“北方”、“上一……上七”、“北一”等表示方向和数字的文字和符号,属于工匠建造墓室留下的记号。

在墓冢西端有3座南北并列的小型西汉陪葬墓;在墓葬西南发现一座车马坑,编号为K1;在东墓道两侧有对称分布的两座陪葬坑,编号分别为K2、K3。陪葬墓均为“凸”字形带斜坡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墓向朝东,墓室连墓道长4.95~6.26米,墓室宽2.34~2.95米,墓口距墓底深1.88~2.38米,棺椁已朽,痕迹犹存。有的墓被盗,随葬品有鼎、豆、壶、罐、钫、井、灶等陶器和五铢钱等。车马坑总长28米,由斜坡道和车马坑组成,坑内四壁用木板做衬帮并用木柱撑挡,坑底铺一层木板,均腐朽严重。车马坑唐代被盗,扰乱严重,残存8匹马遗骸和4车残迹,出土遗物有铜车马饰件等120余件。K2、K3为土坑竖穴,坑内有红色彩绘遗迹和铅质模型小车马器90多件,应为放置木马、木俑的陪葬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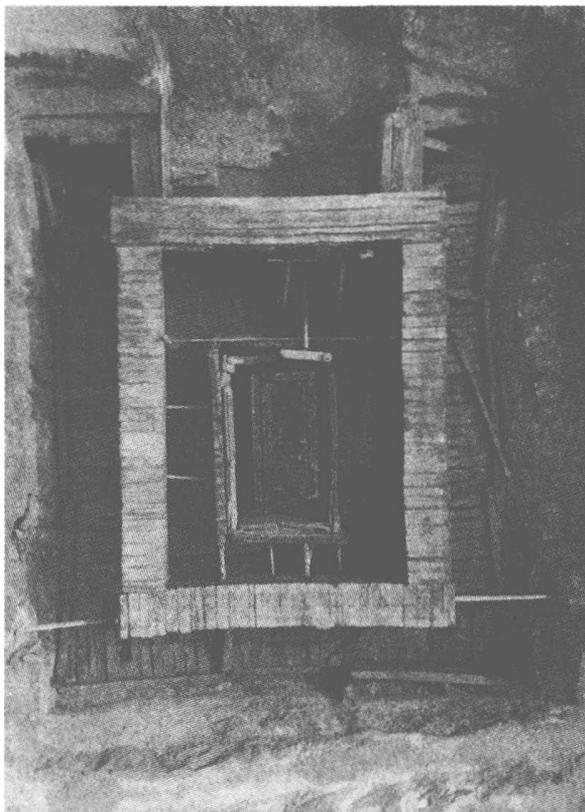
**重要发现** 双墩一号汉墓在唐代曾被盗掘,盗墓者凿穿“题凑”盖板进入主室棺椁内,将墓主尸骨拖至棺外(尸骨现已采集)。该墓虽早期

被盗,仍出土漆器、木器、陶器、铜器、铁器、车马器、兵器、铅器、玉器、封泥等 500 多件。

漆器主要出土于椁室内,大多被盗墓者破坏,能辨认的器形有盘、耳杯、奩、盒、案、片筹、饰件等。漆器均彩绘各类动物、植物、卷云、几何形图案,有的书写“日”、“吉”、“明”等吉祥文字用语,不少器物镶嵌银扣,贴有各类人物、飞禽走兽、柿蒂植物等造型的金箔和银箔,精美华丽。木器主要是车、马、人俑、透空雕花板等。木马

为头、身、腿分段制作拼装而成,马头上有马衔、马镳等金属明器饰件。俑为木段雕制,有立俑、坐俑,有的衣着长袍或身穿短衣,有的头戴冠饰,有的饰有彩绘,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木车模仿实用车制作,长 1.2 米,轮辐、辕、轴、舆、伞盖等部件齐全,小巧玲珑。

铜器以壶、镜、五铢钱为主,还有一些漆木器的腿和残铜器。铜壶 22 件,基本为素面,其中一件全身布满三角形和云气纹错银图案,工艺精湛。部分铜壶上有铭文,一类表示壶的属性、编号,如“共府第六”、“共府第八”、“共府第九”、“共府第十”,壶身造型一致;一类表示姓氏和壶的容积、自重,如“沈氏容十升重卅十斤第二”、“樊氏容十升重廿八斤十四两”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府第八”铜壶内发现有发酵的带壳稻谷,是否属于酒有待进一步检测。铜镜有十多面,均为日光镜或昭明镜,除一件较大外其余直径均在 6 厘米左右,这类小铜镜背面的钮均被



双墩一号汉墓题凑墓室木结构

砸掉,主要用于装饰内棺。椁室内还出土一些漆木器上的鎏金铜饰件,有马腿形、勾云形、兽面形等,应为器物的足、铺首和装饰件。车马器有实用和模型两种,实用器为铜质,有的鎏金;模型器为铅质明器,小而质差。兵器主要放置在石椁盖板上,有铜戈、铁戟计5件,秘和铜镞都保存完整,秘的两端绘有红色线条,此外还有弩机、木弓、竹弓和弓弦。

陶器大多出土于陪葬墓,有鼎、盒、壶、罐、钫、井、灶等,均为泥质灰陶或红陶,主墓室和外藏椁内有少量的仿铜素面陶壶。

玉器均出土于回廊和椁室内,有瑗、龙形佩、方形小印坯、玉板、圭、玛瑙璜、玉片以及玉璧的残片。有一件玉片四角有小孔,疑为玉衣或玉枕的残件。封泥见于椁室内,其中有3件模印“六安飶丞”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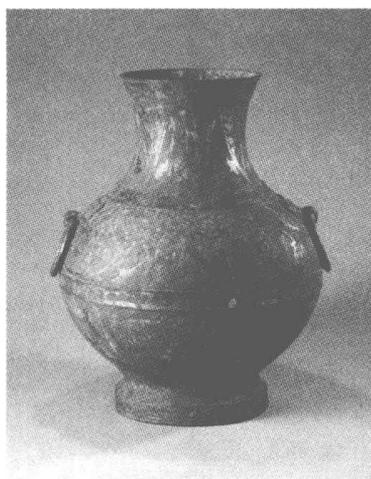
墓室内还出土不少植物种子,经现场观察有稻子、小米、红枣、板栗、杏、李、瓜类种子和果实等,有的色泽如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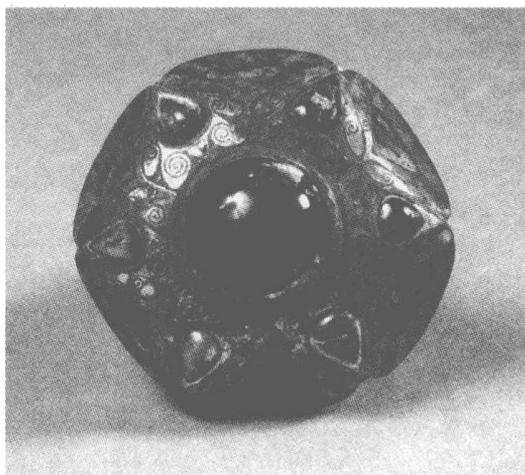
双墩一号汉墓外藏椁随葬的铜壶、木车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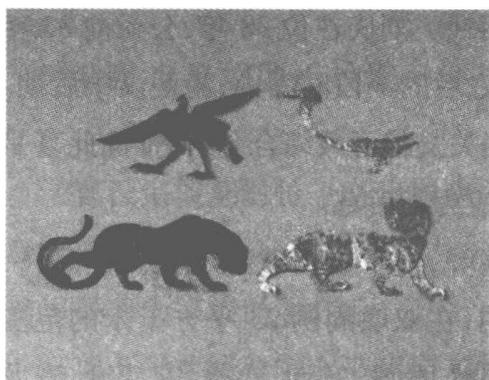
双墩一号汉墓外藏椁出土的铜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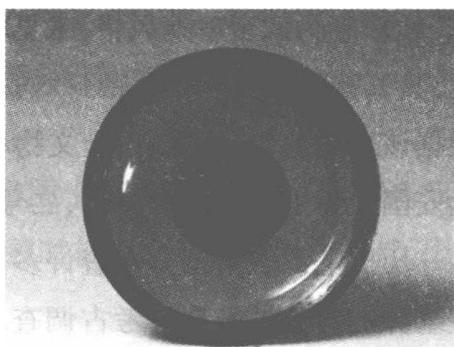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错银铜壶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错金镶宝石铜杖头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金箔、银箔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的漆盘

根据文献记载,秦朝奉行郡县制,六安地属衡山郡、九江郡。楚汉相争时发生变化,项羽封六地人英布为九江王,后英布叛楚投汉,被高祖封为淮南王。西汉实行郡国制,六安汉初属淮南国,后改置衡山国。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衡山王赐谋反自杀,国除为衡山郡。在原衡山国的地址上,武帝取六县、安风、安丰等县首字,立为六安国,兼有“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六安之名由此始。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封胶东康王少子庆为六安王(共王),历共王庆、夷王禄、繆王定、顷王光、育共五代,王莽时期灭国。

双墩墓葬为并列双冢大墓,应为夫妇合葬墓。其一,一号汉墓封土巨大,墓的椁室为黄肠题凑结构,并附有车马坑、陪葬墓、陪葬坑等,属于西汉诸侯王陵特有的葬制,这说明墓主等级很高,是当时诸侯王一级人物。其二,该墓出土的文物十分精致。不少漆、木器贴有金、银箔或镶嵌银扣和玉石,铜器多为错金银工艺,玉器精雕细琢,这些文物做工精湛,精美华丽,属于奢华物品,非王室外人能够使用。其三,该墓出土有“六安飨丞”的封泥和带“共府”铭文的铜壶。“六安飨丞”为六安国负责膳食的官员,“共府”与六安国第一代王共王庆的谥号对应。这些文字与《史记》、《汉书》中有关六安国的历史记载相吻合,表明该墓属于西汉六安国的王陵。其四,在双墩墓葬西北约10千米处有一处东故城城址,城址地表散布的遗物有蚁鼻钱、木、砖水井和建筑材料,据此推断该城使用年代在战国至汉代,应为六安王生前的居住处。其五,墓内出土的“五

铖”钱形制为武帝时期风格，未见晚期钱。刘庆在位 38 年，公元前 83 年死，其墓葬时代当在汉武帝封六安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西汉中后期。根据该墓的地望、规制、出土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综合分析，推测此墓是六安国始封王共王庆的陵墓，二号墓应为王后墓。

历史上双墩周围分布着许多古墓葬，由于农田改造、盖房、修路，一些墓葬的封土被平掉。考古调查表明，在双墩周围 23 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仍分布有 36 座大小封土堆，如琵琶墩、松墩、宴墩、小墩、玄武墩、青龙岗墩、大山墩、韩大墩、墩塘等。这些墓葬都坐落在地势较高的丘陵土岗上，小的墓冢，高 3 ~ 5 米、底径 10 ~ 20 米；大的高 10 米，底径达 50 ~ 70 米以上。其中以双墩为中心约 6 平方千米内，有双墩、高墩、马大墩、三星庙墩等四处形状相同的高大的并列双冢墓，各墓之间相距 500 ~ 1000 米不等，当地群众称之为“八大墩”。在这些墓葬附近的地表散布有板瓦、筒瓦、砖和井圈等建筑构件。上世纪 70 年代，在马大墩北冢西北边修水渠时，曾经发现过一个车马坑，结构与双墩一号汉墓的车马坑相同，出土过一些车马器，这说明该墓的等级很高。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的确定，表明这四处高大的双冢墓葬，极有可能是六安国四代王的陵墓，这一区域的古墓葬应属于西汉六安国的王陵区。

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和西汉六安国王陵区的发现是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该墓黄肠题凑木结构复杂，墓室保存十分完整。题凑内回廊分格室结构遗迹，石质椁室十分独特，内棺保存完整，装饰精致奢华，这在目前已发现的同类黄肠题凑墓葬中是罕见的。此外，该墓的外藏椁形制虽比北京大葆台、江苏扬州的黄肠题凑墓外藏椁矮小，但有 15 个室，是按照当时的诸侯王陵基本规制建造的。尤其是发现保存完整的诸侯王陵区，这在全国尚不多见，对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制度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该墓出土的文物十分精致，做工精湛、造型独特、精美奢华、时代特点鲜明，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这次考古新发现，揭开了西汉六安国的神秘面纱，对研究六安国历史和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汉代诸侯王陵制度等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 4. 乱世枭雄曹操故里——亳州曹氏宗族墓

曹氏宗族墓地位于亳州城南郊，方圆十多里地，规模巨大。亳州在汉代属沛郡的谯县，东汉属沛国，三国魏时被魏文帝曹丕定为陪都，因为这里是曹氏家族世居之地。

曹丕父曹操故宅在亳州市东郊，《水经·涡水注》记载曰：“（故宅）负郭对廛，侧隍临水。”而曹氏家族墓地则在城南，对此，《水经注·阴沟水》有明确的记载：“涡水又东经谯县故城北……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余基留存，柱础仍存。庙北有二石阙对峙，高一丈六尺，榱桷及柱皆雕镂云炬，上罍罍已碎。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长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阴又刊诏策，二碑文同。夹碑东西列两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燧道所表象马也。有腾兄冢，冢东有碑，题曰：‘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碑文中没有立碑的时间。坟北有其元子炽冢，冢道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历大中大夫、司马、长史引侍中，迁长水，年卅九卒，熹平六年造。’炽弟胤冢，冢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记载得颇为详细。文中提到的曹腾、曹嵩，文献中均有记载。《后汉书·宦者列传》云：“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腾卒，养子嵩嗣……灵帝时，（嵩）货贿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由此可见，曹腾乃曹操的祖父，曹嵩为腾之养子，为曹操之父。

**发掘经过** 曹腾、曹嵩死后，皆葬于亳州城南郊，然而文献记载的这些地面遗迹已荡然无存，但曹氏宗族墓群仍存，包括曹四孤堆墓群、马园西墓群、董园村墓群以及元宝坑村墓群等。其中曹四孤堆为4个高大的

土冢,南北向一字排列于城南三公里的马园村西,又称曹家孤堆,规模很大,历经千余年,每座墓葬的封土(孤堆)仍高约5米,方圆约2500多平方米。

1974~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城南郊曹四孤堆以北的十九里公社的元宝坑村、董园村、马园村、袁牌坊村等地清理了5座曹氏宗族墓,1982年又于曹四孤堆北侧清理了一座曹操宗族墓。这批曹氏宗族墓,由于均遭破坏又不见墓志,墓主难以一一考辨,据研究有曹腾墓(董园村二号墓)、曹嵩墓(董园村一号墓)、吴郡太守曹鼎墓(元宝坑一号墓)、曹宪(曹操长女)墓(马园村二号墓)等。但多数曹氏宗族墓仍未经发掘,包括曹四孤堆这四座大墓。

**墓葬形制** 董园村一号墓为大型砖墓,墓内长13米、宽10.4米、高3.9米,由墓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南北两个偏室组成。石门朝东,高1.49米、宽0.76米、厚0.15米。前室长4.56米、宽1.2米、高2.35米。中室南北长10.4米、东西宽3米、高3.9米。后室长5.9米、宽2.15米、高2.4米。北偏室长5.62米、宽1.76米、高2.4米。南偏室长4.5米、宽2.16米、高2.4米。顶为券顶。中室中间置一石案,偏北放三足石棺台一对,长2.27米、宽0.69米、高0.22米。石棺台周围散布玉片,出土时面部、脚底尚完整,以银丝十字花编缀。后室随葬有铜缕玉衣1件,玉片散布一地。中室墙上彩绘壁画,券顶上彩绘天象图。该墓墓砖有长方形和楔形两种,前者用于墓壁和铺地,后者用于券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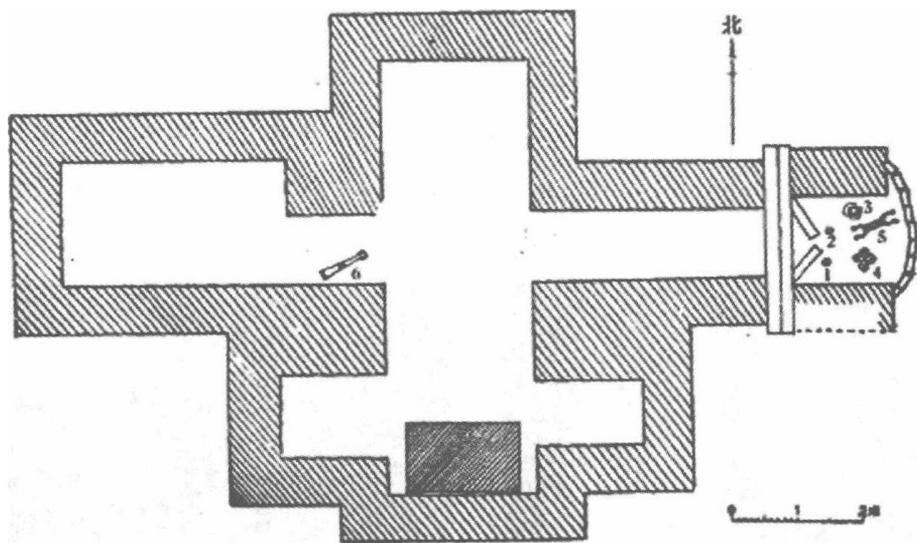
据推测,墓主为曹操之父曹嵩,但从随葬银缕玉衣看,其墓主似为被封为费亭侯的曹操祖父曹腾,该墓也出土了带“曹侯”字样的文字砖。然而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曹腾墓墓碑立于延熹三年(160年),该墓第六十七号字砖上有“延熹七年”等字样,表明该墓应不为曹腾墓。由于该墓被严重盗扰,残存随葬品中缺乏旁证材料证明墓主为何人。但从该墓同时出土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看,该墓应为夫妻合葬墓。墓砖上的“延熹七年”(164年)铭文表明,该墓为东汉晚期的墓葬。

董园村二号墓距一号墓100米,系大型画像石多室墓。该墓墓室长

15.3米、宽10.2米、高3米，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组成。甬道长2.55米、宽1.85米、高2.7米。前室长3.5米、宽1.45米、高2.23米。前室北壁有耳室一，长3.16米、宽1.69米、高2.2米。前室南壁亦有耳室一，长1.46米、宽1.45米、高1.32米。中室长8.7米、宽2.8米、高3米。中室南端对开两个偏室，其中西偏室长4.75米、宽1.72米、高2.5米，东偏室长3.1米、宽1.72米、高1.7米。后室长4.7米、宽2.45米、高2.82米。



董园二号墓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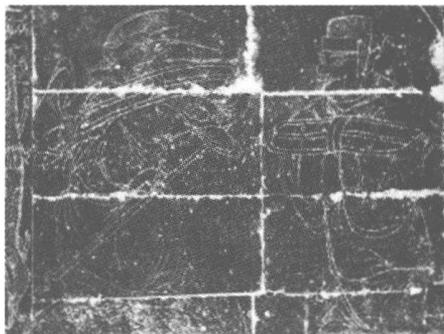


曹四孤堆附属一号墓墓葬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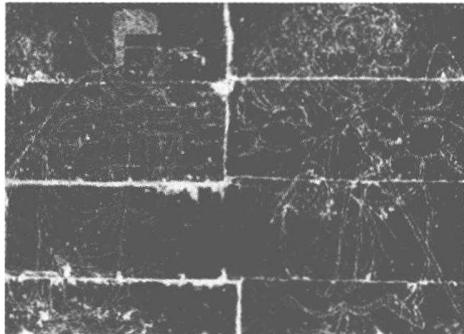
整个墓室全用大青石砌成。条石一般长2米,宽、厚各0.5米,计用条石876块。该墓墓室内的画像石上面画像保存较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甬道南北两壁阴刻对称的四个画像人物,每壁一文一武两人,高1.62~1.78米。武侍佩剑,文侍执盾,分别是“神荼”(千里眼)、“郁垒”(顺风耳)兄弟俩,人物造型浑厚逼真、刀锋有力、线条流畅。甬道外石门两边刻有神龙、白虎。石额上层刻“双凤涅槃图”,双凤在篝火中起舞。下层刻“鹿生图”,九只形态各异的小鹿依偎在口衔灵芝的母鹿旁,鹿群前后各有一身披长毛、手执连理的羽人。前室壁上涂抹一层薄石灰,其上饰以彩绘,大多脱落,隐约可见有双兽、帐篷、旌旗、芦苇等。券顶上绘天象图,三人或骑鸟或骑兽遨游天空。中室墙券在涂抹的一层薄石灰上也饰以彩绘,但大多已脱落。前后墙残存一排仕女图,仕女着长衫宽裤,裤口镶红边,脚穿软底鞋,有的手执圆方形漆黑盘,上盛放水果、耳杯。顶券上绘朱栏亭阁似仙境。该墓石刻带佛教、道教色彩。雕刻技法有线刻和浅浮雕,亦有少数高浮雕。

该墓随葬有铜缕玉衣,说明其墓主地位较高,疑为曹操祖父曹腾。但曹腾在东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根据汉代玉衣葬服礼仪应为银缕玉衣。加之该墓早年曾遭破坏,随葬品亦几乎被盗一空,残余的随葬品也无法提供墓主身份的证据,故墓主何人不可考也。

马园村二号墓为大型砖室墓,墓室长13.4米、宽6.42、残高1.82米,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六耳室组成。六耳室为前室、中室、后室各二,对称分布。墓顶为穹隆顶和券顶相结合。



南壁门吏、武士画像石



北壁门吏、武士画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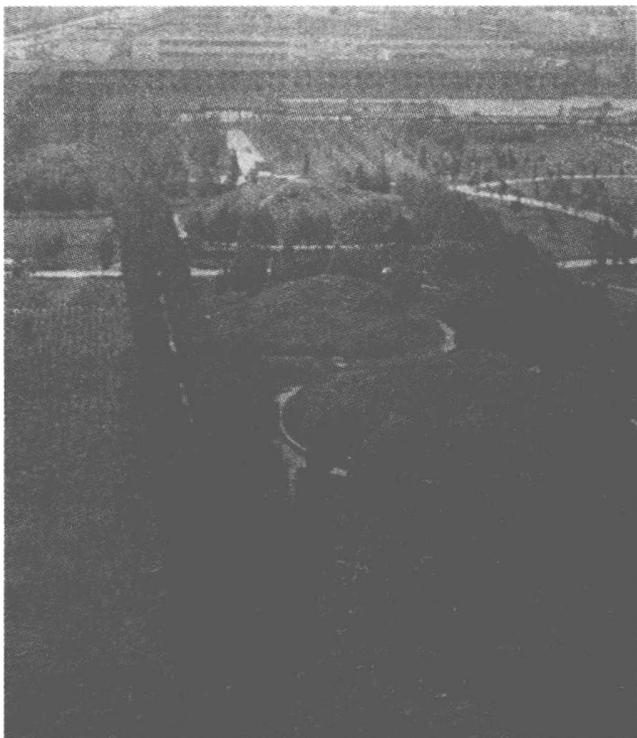
马园村二号墓出土两方铜质套印的印文,大套印文为“曹宪印信”,中套印文为“曹宪”,由此多认为该墓为曹操长女曹宪墓。

元宝坑一号墓以出土大量文字砖而著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墓为大型的砖室墓,墓室长 13.12 米、高 8.22 米,由甬室、前室、北耳室、中室、东耳室、西耳室、后室组成。该墓墓壁涂抹的白灰上残留彩绘痕迹,表明可能是一座壁画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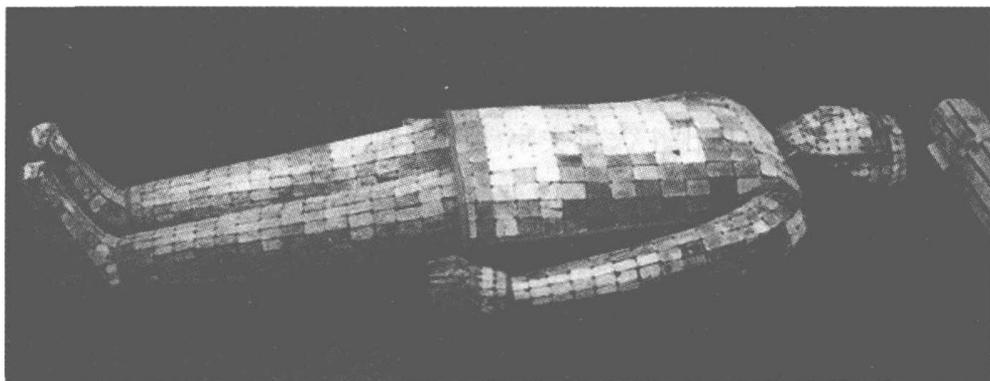
曹四孤堆附属一号墓为砖室墓,由墓道、甬道、石门、前室、中室、后室,以及中室南偏的东、西两个耳室组成,全长 14 米(不包括墓道)。甬道位于石门外,甬道外口有一弧形外封墙。石门两扉。室南端靠墙筑有一砖台。根据出土的文字砖上的铭文推测,该墓的墓主人是曹操宗族成员,可能是豫州刺史曹水或上大大夫曹某人,是否准确,有待查证。

**重要发现** 董园村一号墓残存的随葬品除金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各 1 件、金花饰 1 件、小银壶 1 件、铅锡合金耳杯 1 件、鎏金铜奩 1 件、铜弩机 5 件、大铁镜 2 件、青瓷罐 1 件、牙雕 3 件、玉猪 4 件、陶壶 1 件、石灯 1 件、聚光玻璃器 3 件以及鎏金铜铺首等 20 余件,另有珍珠 11 粒、料珠 50 余粒等。

银缕玉衣长 188 厘米、肩宽 59 厘米、厚 25 厘米,董园一号墓出土。由青色玉片和银丝缕织成人形。玉衣共用大小不等、形状不同的玉片 2464 块,玉片四角有孔,出土后按原形修复。玉衣又称玉匣、玉押,一般是汉代皇帝、诸侯王或



亳州市曹氏家族墓地曹四古堆



银缕玉衣

达官贵族死后使用的特别殓服，即用金属丝线将玉片穿缀而成的尸罩，相传可保尸身不腐，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丝缕玉衣。以玉衣作为殓服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至曹魏黄初三年废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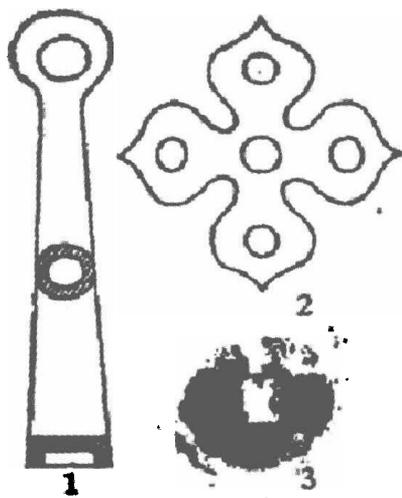
董园村二号墓至少两次被盗，墓室内并有焚烧痕迹，残存很少的随葬品，如玉枕、金属猪、鎏金铜构件、马腿、鸟爪等残件以及料珠、石雕等，比较重要的是一件铜缕玉衣。

马园村二号墓早遭盗扰，残存随葬品还有楼、磨、鸡、井等绿釉陶，一些金属饰件以及铜贝、五铢、货泉等5枚铜钱。还出土有铜质套印二方，方形狮纽。大套一方，高3.5厘米、宽2.1厘米，上有“曹宪印信”印文；中套印文为“曹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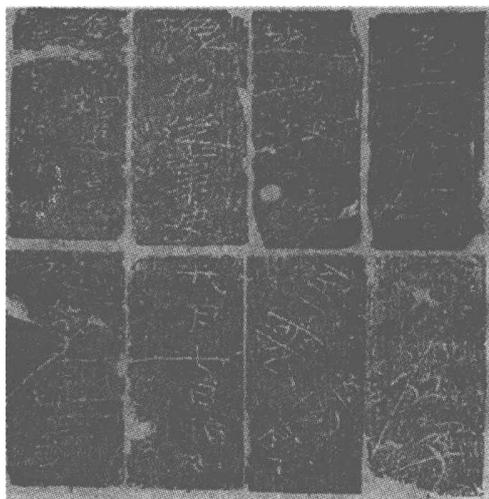
元宝坑一号墓尽管被严重破坏和盗扰，还是出土了包括象牙、玻璃、玉石器132件，铜、铁等器200余件，31枚铜贝、半两、货泉、五铢等铜钱，漆器、料珠以及青瓷、黑瓷残片等。更重要的是该墓出土大量文字砖，对了解曹操宗族的家世和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首先，文字砖印证了《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等文献中有关曹操宗族家世记载的正确性。如第十号字砖“比美诗之，此为曹腾字季兴”中的曹腾即为《后汉书·宦者列传》、《三国志·武帝纪》和《水经注》中记载的曹腾——曹操的祖父。第十一号字砖“故颍川□□曹褒□□□”即《水经注》中“颍川太守曹君”曹腾族兄曹褒，与《三国志》卷九所云“曹仁字子孝，太祖从弟也”及注“仁祖褒颍川太守，父炽侍中，长水校尉”的记载

一致。这里的长水校尉曹炽即第十二号字砖“长水校尉曹炽字元盛”。其次,文字砖部分记载了曹氏宗族曾任之官职,如前述颍川太守曹褒、长水校尉曹炽、吴郡太守曹鼎(第十六号字砖)、山阳太守曹勋(第十七号字砖)等。再次,反映筑墓者哀怨怀恨的思想感情。如第三十号字砖:“人谓壁作乐,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壁长契。”这里“壁长”(即领工)以五言诗的形式表达了作壁者哀怨怀恨的思想感情。最后,表现了筑墓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预示了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如第三十二号字砖“王复汝使瓊(或作‘我’)作此大壁,徑冤,瓊(或作‘我’)人不知也。但搏汝属,仓天乃死,当……”。该墓第九号字砖“建宁三年”(170年)一般认为是该墓建墓时间,这里的“仓天乃死”比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大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还要早14年,预示着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曹四孤堆附属一号墓早期遭大破坏,墓内铺地砖大部分被揭除,墓内文物一空,骨骼无存。残存的随葬品有货币、陶罐、柿蒂形铜花饰、铁把手式物、铜饰和77块文字砖。文字砖中有铭文字砖41块、数目字砖35块,均阴刻。市徽书写文字砖1块。刻字砖铭文多在绳纹面上,数目字多刻在砖的一头或边上。



铁把手、柿蒂形铜花饰、半两钱



墓砖拓本

在已发掘的这批墓葬中,根据残存的随葬品推测,董园村一号墓墓主身份最高,因为该墓墓主身着银缕玉衣。同时,该墓后室还随葬铜缕玉衣1件。董园村二号墓其次,其墓主身穿铜缕玉衣。汉代玉衣葬服的使用始于西汉中期或稍早,武帝时期开始盛行,这时期玉衣由许多块玉片通过金丝、银丝或铜丝连缀而成,其外观与人体形状相似。以玉衣作葬服,体现汉人认为玉能使尸骨不朽的观念。缀连的金丝、银丝、铜丝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根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不过,考古资料与上述记载有些出入,如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和河南永城芒山镇僖山二号梁王墓皆身着金缕玉衣,而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墓、江苏徐州火山西汉刘和墓皆身穿银缕玉衣,表明西汉王侯既可用金缕玉衣,也可用银缕玉衣。

## 5. 石刻汉画技艺绝世——宿州褚兰画像石墓

画像石是以石板为底本,以阴线和阳线作为艺术语言的石刻画,主要用于墓室、墓前祠堂、石阙等墓葬建筑的建造与装饰。它产生于西汉,兴盛于东汉,魏晋之际仅有个别实例,故又称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四川等地,湖北、浙江、安徽、北京、天津等地也有少量发现。

早在清代安徽省就有汉画像石出土。新中国成立后,我省文物机构配合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在进行文物保护和田野考古工作中,先后发掘、清理了近80座汉画像石墓,加上收集各地出土散置的汉画像石,数量总计近400块。这些画像石墓分布于淮南、淮北地区,目前以淮北市、濉溪县、萧县、亳州、定远县发现较多,皖西的霍山县也有发现。从目前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画像石,以及虽无明确纪年的画像石但有其他断代器物或文字资料看,安徽出土的画像石始于西汉晚期,盛于东汉的中晚期。它不仅以艺术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汉代精神和汉代思想特征,而且还包

含了思想家用文字未能阐述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不仅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还反映了墓主所向往的“亡灵生活”。显示了我们祖先非凡的聪明才智，凝聚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是研究汉代安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

### (1) 画像石墓类型

安徽画像石墓有全系大块石材构筑的石室墓和砖石结构的砖室两种。石室墓的地面上有的发现了墓垣和石祠，墓室内壁及祠堂盛饰刻画。这类墓分布在盛产石材的地点，如宿县褚兰画像石墓。砖室墓的墓壁、券顶都用砖砌，画像刻在门额、门框、门扉上，有的刻在用条石做的梁柱上。这类墓发现的较多，大都散布于淮北、淮南的广大地区，如濉溪县古城汉画像石墓、霍山县洛阳河汉画像石墓等。

由于上述两类墓葬所使用的石材数量的不同以及形制、结构上的差别，两者的画像石配置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配置上的差异又会影响到画像的布局，进而影响到画像题材内容及其表现形式。

石室墓四壁及墓顶都是整齐的板块石材，可供镌刻画像的空间较大，可以铺张盛饰画像，因而这类墓葬画像石几乎布满了四壁及至墓顶。画像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彩，大都是围绕着死者而设计、刻画的升天和继续享受人间那种尊贵豪奢的生活情景，以及辟邪除祟的灵禽神兽画像，一幅幅极尽铺陈，不一而足。淮北东部地区，这类墓葬发现的较多，如宿县褚兰画像石墓、灵璧县九顶画像石墓等。

砖石结构的墓室的墙体和券顶都是用砖砌成，可供镌刻画像的石材较少，因而画像的内容也就简洁，象征性的多，那种具体而又铺张地表现墓主人升天及享受奢侈生活的画像就显得少得多了，大都仅在墓门额上刻双龙穿壁，门扉上刻朱雀、铺首衔环等简单题材的画像，也有在门扉或门旁刻门卒画像的。淮北西部地区，这类墓葬发现较多，如濉溪县古城汉画像石墓、亳州袁牌坊 M2 等。

### (2) 画像题材

画像题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再

现,安徽汉画像的题材范围很广,花样繁多。根据目前收集和发掘所获的画像石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六类。

①现实生活类。这类题材的作品在安徽的汉画像石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内容具体有门阙楼阁、讲学、宴饮、歌舞百戏、车马出行、械斗、杂技以及纺织、庖厨、捕鱼等。如宿县宝光寺汉墓、宿县褚兰画像石墓等。

②动物禽兽类。这是仅次于现实生活类的又一大题材。动物种类有熊、猿、虎、象、牛、羊、鹿、狐、兔、鱼、鸟等。如定远灞王庄古画像石墓、濉溪县古城 M2 等。

③祥瑞辟邪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乘龙驾虎、双龙穿壁等。如萧县王山窝东汉墓等。

④自然景观类。该类题材多是以陪衬空间的身份出现,在整幅画像中所占面积不大。主要有日、月、星座、树木、花草等。如宿县褚兰画像石墓等。

⑤神话传说类。主要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河伯、玉兔捣药及蟾蜍等。如宿县褚兰画像石墓等。

⑥历史故事类。仅于宿县符离集抚琴画像石上见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琴”(原出《吕氏春秋》)一类。

⑦装饰图案类。严格地说,装饰图案应排斥在画像之外,但它不仅是汉画像石中与上述题材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几乎出现在所有的画像篇幅中,因而单独归类。这些装饰图案经辨认,大致有三角纹(又称锯齿纹)、菱形纹、十字穿环纹、云纹、联璧纹、连续涡纹、水波纹、垂帐纹、连弧纹等。

装饰图案或作为主题单独成幅,如萧县西汉晚期画像石;或穿插于上述六类之中,如定远灞王庄古画像石动物禽兽图中常穿插有云纹;或作为边饰纹样,衬托主题,装饰画像,如宿县褚兰画像石。

### (3) 雕刻技法

汉画像石的制作工序是先在石面上用墨线或朱线勾勒出画样,然后根据画样进行雕刻。因而,可以说汉画像石是绘画与雕刻两门艺术完美

结合的产物。但就成型技术而言,其艺术形象是由雕刻塑造的,而且给人的印象更深的是其空间质感。因此,对画像石造型艺术的研究主要是探讨雕刻技法(至少目前是这样)。安徽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有四种:

①线刻。指物象和石面为同一平面,物象的轮廓线和细部都用阴线的刻法。根据对石面处理的不同,可细分为糙面线刻、凿地纹线刻、平面线刻等四种。安徽的线刻技法属于平面线刻,即将图像刻在平整磨光的石面上,如亳州董园村 M2 甬道人物像、灵璧九顶墓画像石等。

②减地平面线刻。指在平滑的石面上,将物象轮廓线外减地,使物象轮廓内石面较“地”为高的刻法。根据减地方法和物象细部表现形式的不同,可细分为剔地平面线刻、深剔地平面线刻、铲地平面线刻、凿纹减地平面线刻等四种。在安徽省出土的文物中,大减地平面线刻技法仅见凿纹减地平面线刻,即物象轮廓外减地留下平行细密的凿纹,如定远灞王庄墓画像石等。

③浅浮雕。指介乎减地平面线刻和高浮雕之间,物象轮廓线外减地,轮廓线内物象呈弧状凸起,物象各部不平整而有高低的技法。根据减地方法和物象细部处理的不同,可细分为凿纹地浅浮雕和平剔地浅浮雕。前者将物象轮廓外围减地留下或横或总的平行凿纹,后者将物象轮廓外剔成较光平的石面。安徽的浅浮雕技法多为后者,如宿县褚兰画像石、灵璧“阳嘉三年”石祠正壁画像石等。

④高浮雕。物象轮廓线外减地较深物象呈弧状浮起特高,西部层次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有的虽不减地,但物象呈状凸起很显著。该类技法仅见于萧县东汉晚期画像石(墓)中。

在上述四类雕刻技法中,以线刻、浅浮雕两类最为常见,其中线刻多见于濉溪县、亳州等地,浅浮雕多见于宿县、灵璧等地。淮北东部多拟浮雕式画像石,淮北西部多拟绘画式画像石。

**发掘经过** 1956年春,原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获悉宿县褚兰镇“九女坟”古墓遭到破坏,电报通知安徽省文物管理委

员会,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调查。安徽省博物馆专业人员也到褚兰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保护措施。

鉴于这两座画像石墓很重要,必须尽快进行发掘清理,安徽省博物馆于当年秋天,派胡悦谦、王步毅对褚兰一号墓和褚兰二号墓进行发掘。两座墓葬均遭盗掘,被洗劫一空,未发现随葬器物。

野外发掘工作结束后,文物部门对两座墓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 M1 墓室基本保存完好,且比较坚固,故原地进行保护,并于 1961 年被列为省级保护单位;M2 的墓室破坏严重,故将此墓的石祠和墓室中的画像石全部运回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墓葬形制** 褚兰镇位于宿县东北部,距县城 67.5 千米,距江苏徐州市仅 30 千米。该镇东、南、西三面冈峦绵延,北面地势平坦开阔。传说中的九女坟,实为一座规模较大的汉代画像石墓。该墓坐落在镇子西南的墓山孜上,离镇约 1.5 千米。九女坟在山顶的中部,地位高敞,墓冢突兀。褚兰镇共发现两座画像石墓,地面都有遗存,均为石室墓。

M1 是由地面上的石祠、墓垣和地下的墓室三部分组成,皆以青石构筑,石材硕大。墓室由双甬道、横前室、双后室和一个耳室组成,有斜坡式墓道。前室呈长方形,南北横直,北端有一近正方形的耳室,东西并列两个长方形的后室,西面并列两个墓门,各设甬道。此墓应为夫妻合葬墓。

前室室顶为叠涩四级的长方藻井,上面平铺两块石板作为顶盖,地面平铺厚石板。此室是画像石最集中的地方,藻井、四壁、横额和基石均刻满画像和图案纹饰,整个前室装饰得极为华美。两后室并列于前室之东,结构相同,大小一致。各设一门一窗通前室,门槛为延伸过来的墙基石,没有装置门框、门窗。窗户为透雕的直棱窗。两后室间的隔墙是用条石卧铺叠砌,其余墙壁用厚石板立砌。室顶长方形,叠涩三级,顶上用大石条铺盖。地面平铺厚石板,四壁满刻图案纹饰,上半部为联璧纹饰,下半部竖分拦格,于格内刻磨齿纹,整个墙壁如同华丽的隔扇,颇为美观。两室后壁,于正中各刻一幅画像,好像壁挂。耳室四壁用四块石板

立砌,顶部叠涩两级,地面铺石板,四壁无画像。墓门两个,并列于前室之西,各有甬道通前室。甬道的墙壁为整块石板立砌,顶为长方形,叠涩二级,石板铺地。墓道为斜坡式,有阶,不规整。

M2 也是由地面上的石祠、墓垣和地下的墓室组成。石祠仅一间,房顶已失,仅存墙壁下部和基座。石祠两侧残存墙垣与山墙相接,形成一个整体。墓室由前室、后室、双侧室组成,也有斜坡式墓道。墓门在前室之西,无甬道。整个墓室的平面呈“凸字”形。前室近正方形,不见墓顶。四壁用大石板立砌,地面平铺大石板。墓壁满刻画像,墙基刻车骑出行图。后室在前室之东,长方形,四壁和室顶均荡然无存,仅存墙基。地面为生土底。两个侧室分设在前室的南北两侧,结构相同。墙壁用整块石板立砌,地面平铺石板。侧室内均无画像纹饰。墓门设在前室之西,偏于北侧,无甬道。

**重要发现** 这两座墓葬均属中等规模,形制结构大体相似,共出土画像石 32 块。这些画像石有的一石刻多幅画像,有的二石、或三石、或四石连成一幅画像,少数为一石刻一幅画像,因而画面有 60 余幅之多。画像石的题材大多相同,其艺术风格、雕刻技法极为一致,有的画面仿佛出自一人之手。两墓的画像石画像密集、装饰讲究、刻工精细。祠堂和前室是画像石集中之处,壁面和墓顶均刻满画像,有神仙人物和祥禽瑞兽,有表现世间官吏富豪的社会活动和享乐生活的情景,也有除崇辟邪等物象。用于壁面的每块画像石基本采取分格式,自上而下分成数层,每层一幅画像,只表现一个主题。但作为额枋和墙基的画像石,都是数石横接,贯连成一长幅画像,有如手卷。还有少数画像石是一石只刻一幅画像的。这些画像井然有序地布置在适当的部位,使人一目了然。每块画像石还配上菱纹、水波纹、连续涡纹等边饰,室内四壁还雕饰大面积的联璧纹,整个墓室被装饰得分外华丽。

画像石为剔地浅浮雕,即在磨平的石面上将物象轮廓之外的空白减低铲平,使物象浮起,用稍粗的阳线勾画出物象的造型,再以细线条表现出人物的衣着和鸟兽毛羽的质感。人物的面部与鸟兽的头部为阴线。

其风格和雕刻的技法,属徐州地区东汉晚期典型的作品。以下仅列举几块典型的画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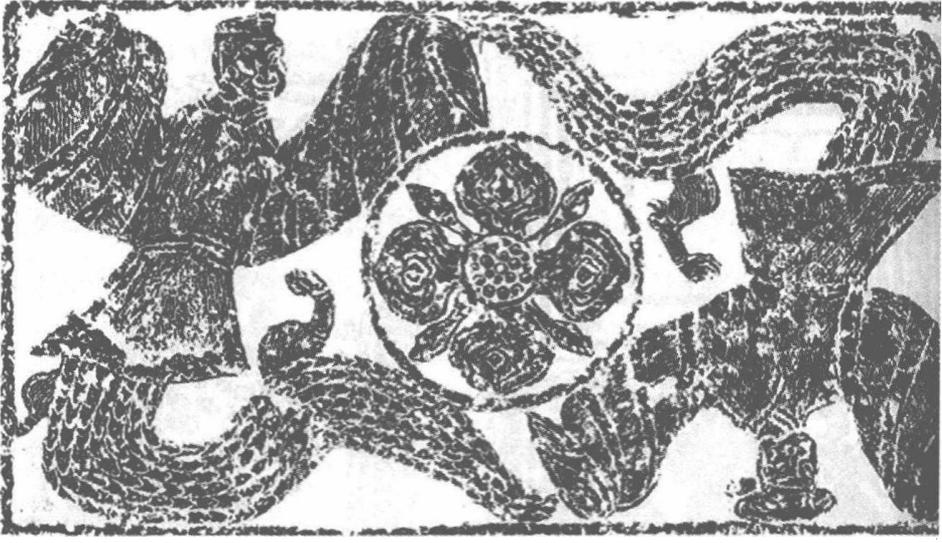
1 石(M1 前室藻井的顶盖)画面较为典型:中心为一圆圈,内刻一朵盛开的莲花。圈外为伏羲、女娲,其形象均为人首龙身,有鳞有爪。伏羲戴进贤冠,女娲梳髻簪饰,皆着花边衣,束腰广袖,环绕中心莲花,翩然起舞,神态优美。

4 石上格画面:加幡轺车三辆,一骑者前导,一戴武冠者拱手相迎。车为双驾,二、三两辆为单驾。舆内皆一御者与一乘者。马皆彩头结尾,缰上彩带飘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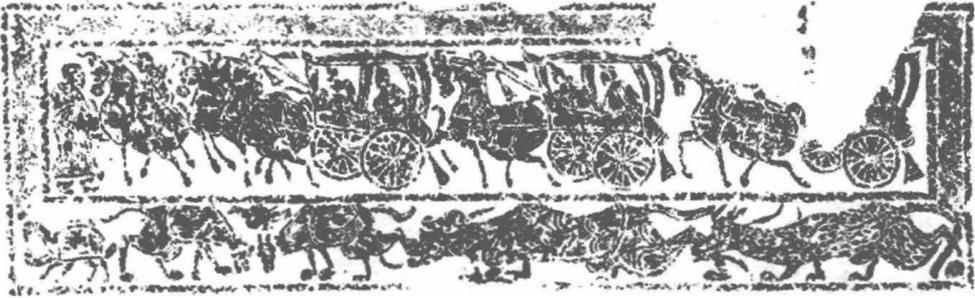
8 石画面:M1 前室东壁之南端。上半部透雕直棂方窗,窗下分为两格,上格刻女子5人,皆侧身向左,宽袖长裙,束腰,手执鞞,作舞姿。下格男子5人,皆冠服,侧身左向,双手秉乐器。鞞舞因舞人持鞞鼓而舞得名。所谓鞞鼓,其大者实与鼗鼓(类似货郎鼓)为一类,其小者则形如团扇,安柄可握。鞞舞源于民间,比较早地进入宫廷燕飨乐舞中,汉章帝还亲自创作《鞞舞曲》5篇。鞞舞舞姿豪迈奔放,只以建鼓伴奏。

18 石第二格画面:一伟男子,高冠华服,愤怒暴跳,须髯倒竖。一女子跪于前,一人被捆翻在地,一人执灯烛,似有多人在旁。这一场景与《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的“黄帝惩罚贰负之臣”传说相吻合。

19 石第四格所绘:正中为墓主人胡元壬的墓碑,碑左为歌舞百戏,图中树建鼓,跗为伏兽,鼓上有两层圆幢,上承华盖,羽葆披拂,一男一女坐鼓侧执桴击鼓。另有管弦伴奏,一女子抚琴,一人拍掌,一女吹排箫。在鼓乐声中,一人做跳丸之技,两手抛弄七丸,随势腾挪。两人表演技巧,一人倒立,一人翻腾于倒立者足上,做翻转动作。一舞女翘袖折腰,舞姿轻盈。碑右,一人执曲柄华盖,两人执幢,一女子随后。华盖之下立一矮男子,此人戴冠,长袖及地,系绶带,似尊贵者,有多人向他跪拜,跪拜者也都宽袖长衣,戴进贤冠,秉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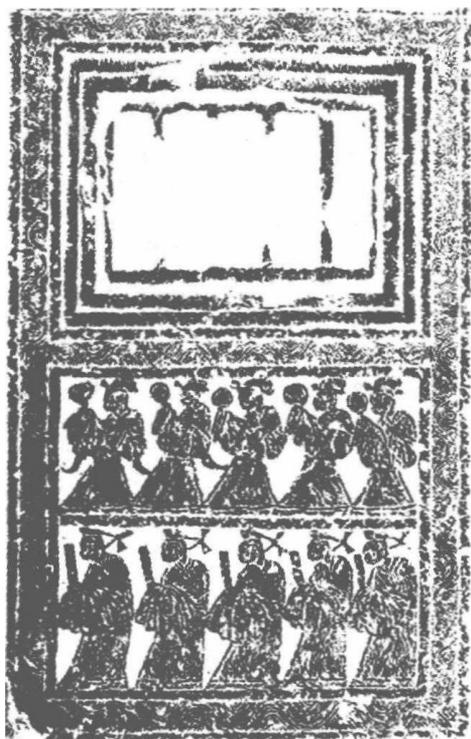
第1石拓本:伏羲、女娲画像



第4石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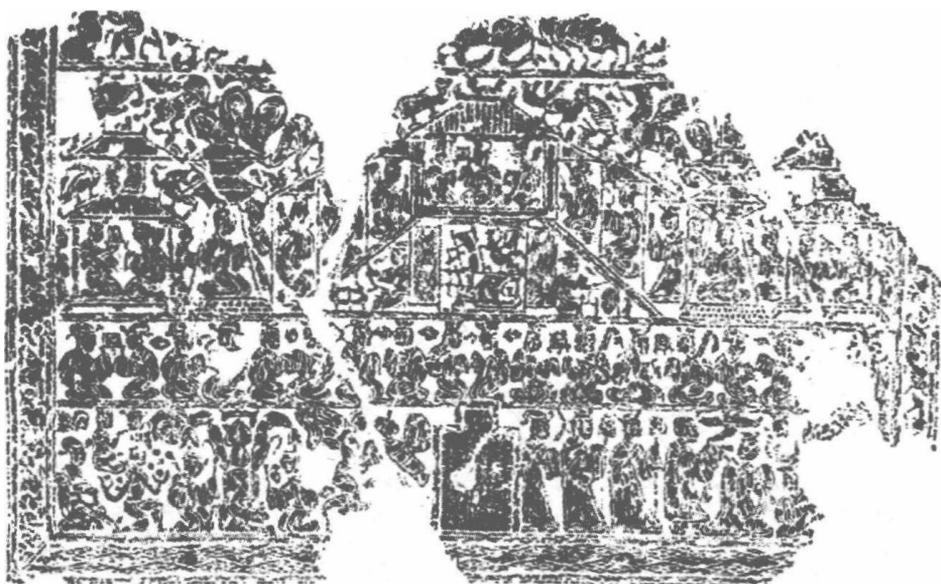
第21石第四格和第五格



第 8 石拓本



第 18 石拓本



第 19 石拓本

21 石第四格与第五格(两格合为一幅)所绘:一板桥中段平直,两头斜坡及岸,桥上未设栏杆,桥下中间立柱,柱头之上以栌斗承托桥身。一辆牛车正在过桥,车上坐着一人,一人牵牛,一人奋力推车。车前后有多名女子,手中皆执有兵器。桥下横一条渔船,一群人正在兴致勃勃地捕鱼,有广髻少儿,也有飘须老者,有的用罩,有的用叉,有的用网,有的徒手,还有鱼鹰疾追鱼儿。

褚兰两座汉画像石墓的发掘,使我们获得一批有关墓室结构、墓上建筑设施、画像石配置等考古资料和 32 块珍贵的画像石。尤其是墓垣、祠堂和墓碑同时出土,在全国鲜有发现。墓碑的明确纪年使这两座画像石墓成为研究安徽、徐州、山东等地同类墓葬的典型材料。根据二号墓碑文的记载,该墓建于东汉建宁四年(171 年),一号墓建墓的时间也不会相距很远。

一号墓未发现可以说明墓主身份的资料。二号墓虽然出土了一方墓碑,但也只是记载了墓主胡元壬的姓名、籍贯,没有提到他做官享爵之事。从以往出土的墓碑、墓志看,凡死者生前有过官职的,均在墓碑、墓志上标明,似无例外。胡元壬以巨资建墓、设祠、立碑,在祠堂和墓室中再刻画出相当四百石县令的车骑出行图,极尽夸耀之能事,但碑中却偏偏没有提到他的官职,看来胡元壬生前确实未做过官吏。他究竟是什么身份?这个问题应放在东汉桓、灵之际政治非常腐败的社会背景下来认识。当时皇帝、贵族、官僚的生活极尽奢靡,商人、地主富豪的奢侈僭于王侯。据相关史书记载,东汉末年,这些有钱有势的富豪,丧葬逾制,奢华过礼,已经不受礼制的约束了。画像中反映墓主生前的社会活动和享乐生活等情景,是为亡灵安排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理想生活,未必是生前真实的写照。由此看来,胡元壬很可能是当时郡县中的富豪之辈。

## 6. 西汉广陵国桓氏家族墓——天长三角圩汉墓群

我国古代印章,有两大系统:一种是以实用为主的古玺印,另一种是

以艺术欣赏为主的明清篆刻家流派印。古玺印是古玺(先秦印章)、秦汉印章、隋至清官私印章的总称。这类印章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流派印主要是让人得到美的享受,是艺术品。

印章早在商周就已经出现,几千年延续不断,现发现的数量众多。这些古代印章对研究我国古代官制的演变、地理沿革、汉字发展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印章在商周时期仅作为个人凭证,春秋战国时期才用于公文的封印。当时的印章均称为“玺”,是官员权力和身份的象征。王拜某人为某官,就要发给他相应的官玺。同时还有罢官收印、辞官交印的制度。

秦朝统一六国后,对用印制度进行了调整。它规定皇帝的印章称为“玺”,百官之印统称为“印”,这是官印名称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后世各朝多沿袭秦制,只是有的朝代制度略宽,王印也可称玺。秦朝对印章的管理非常严格,凡是官府发出的公文必须加盖印章,未加盖印玺或加盖印章的公文均被视为“伪书”,凡丢失、私制或盗用官印者都要依法严惩。

两汉时期的用印制度更加详细,如名称、质料、钮制、绶色代表着哪一身份等级,都有严格的制度条文。公文加盖印章已经成为定制,同时还要求经手官吏及办理人员按官称等级序列在公文末尾签署官职及姓名,重要的公文还要使用封泥缄口。两汉时期有殉印的习俗与制度,因而发掘出土的官印,数以千计,居历朝官印首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用印制度基本沿袭东汉制度,不过一些方面也有适当改动。如在刘宋以前,官员离任,印章也随身带走,新官必须重铸新印。刘宋时期,官印移交成为定制,官员更替均以接印作为权力移交的标志,只有印章“年深久远,印文元蔽”者才能换铸新印,并且对换铸新印的手续也作了严格的规定。

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用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态完全改观,名称、使用方法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武则天将“玺”改名“宝”,从此御玺就不再称玺而称“宝”。在公文用印方面则更加细致、严格。公文经主

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秘书人员誊写、校对后，凡应用印者，鉴印官考其差谬，然后盖印。印要盖在官署或官衔落款的文字上面，严禁先钤印后书写文字。唐代规定“一文一印”，一件公文如有两页以上的公文纸，则要在首尾纸缝间盖“骑缝印”。

宋朝，公文用印制度又有了新的变化。州县官署及长官以上官印称“印”，县长官僚属如县尉以下官吏用印均称“记”。在印章的大小尺寸上，官阶越大，印章也随之越大。对印章的使用，宋代也有严格规定：首先，明令禁止用官印加盖私人信件。其次，用印必须严格登记，并以文书中文字和印章的墨、朱先后来辨真伪，还规定“诸官文书皆印年月日及印封”。此外，对多页首尾连粘，规定了加盖骑缝章的要求。

元朝官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字印两类。汉字官印主要用于八思巴字颁行以前的元代早期。元朝官印都统一由中书礼部的铸印局铸造，其质地、形式均有一定的制度。元代用于文书的印章有两种，一种是官印，一种是在文书上签押的刻名印（即现代的手印、签名章）。

明朝御宝制度较前期又有变化，数量更多，内容更广泛。明初御宝有17种，至嘉靖十八年又新制了7种。各种御玺都由尚宝监女官掌管。每次用玺均要记录。明代内外各衙门的印信，由该衙门首领官收掌。不过首领官用印要受到佐贰官的监督。对于用印不当或盗用印信者都有严格的法律制裁。

清朝皇帝对官印十分重视，因而清朝对官印的铸造和管理都比历朝严格。清朝官印统一由礼部的铸印局铸造，每铸一印都经过吏部、礼部、兵部批准，并且铸成后都要登记在册。清代皇帝玉玺共计25枚，视行文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宝玺。各级官府用印不仅要登记，而且印泥颜色也有规定的区别。宗人府、六部、大理寺、光禄寺等衙门，盛京五部、奉天府、各省总督、巡抚等衙门，来往文书，用印颜色为紫色。其他文武各衙门，皆用朱色印泥。

**发掘经过** 天长市位于安徽东部，汉代处广陵、江都国腹地。三角圩汉墓群位于城东北3.5千米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县文物

管理处于1991年12月和1992年4月先后两次对天长县三角圩水利工地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西汉墓24座。其中西汉早期墓8座,即M6~M8、M12、M13、M18、M21、M22;西汉中期墓13座,即M1~M5、M9~M11、M15~M17、M19、M20;余下3座曾遭破坏,空无一物,具体时期不详。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群被列入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墓葬形制** 24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多保存完好。按形制与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土坑竖穴单人葬小型墓,随葬品较少;二是土坑竖穴木椁葬,有棺椁,椁内分头厢、棺厢、边厢或足厢,既有单人葬,也有夫妇合葬的,随葬品较多。墓坑四周均填塞厚10~30厘米的纯净青膏泥,方向都在1~10度之间。

M1为夫妻合葬墓,坑长4.8米,宽3.5米,棺椁封闭严密,保存完整。椁室内双棺并列,有头厢、无边厢和足厢,棺和头厢内随葬器物质地有铜、铁、漆、角、玉、玛瑙等,不见陶器。此墓是这批墓葬中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墓。男棺内随葬5枚印章,刻字分别为“桓平私印”(2枚)、“桓平之印”、“臣平”、“广陵宦谒”,从而可确认墓主人名桓平,为西汉广陵王刘胥近臣,但不见于文献记载。1号汉墓内随葬1套保存完整的铁质手工工具,共25件(一说28件),包括铲、斧、扁铲、凿、锉、刨刀、齿锯、细线锯、齿钻等。这些工具品种齐全,功能各异,刃齿锋利,完好如新,有一些工具为首次发现,堪称稀世珍宝。1号墓还出土大、中、小规格不同的3套铜蒸馏器,每套均由甑、釜组成,这说明我国在汉代即已掌握蒸馏技术,纠正了蒸馏器是元代才从阿拉伯引进的说法。

**重要发现** 21座墓共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玉器等文物730件,种类十分丰富,为安徽汉墓的研究积累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陶器** 共出土121件,绝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釉陶占一半以上,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物仅上部施有青釉,下半部露胎,釉色主要是青绿和青黄两种,以青黄居多。形制大都仿青铜礼器,主要有鼎、盒、壶、罐。泥质陶主要有灰陶和红陶两种,火候较低,质地较软,破碎者甚多,主要

有鼎、盒、壶、罐、仓等。此外，还出土有杯、钵、豆、勺、灶及马、牛、羊等动物模型。

**铜器** 共出土 168 件，有鼎、洗、壶、钫、钟、锅、釜、熏炉、博山炉、三足炉、灯、舟、耳杯、弩机、短剑、勺、带钩、铜镜、印章、五铢钱等实用器物。

**鼎**：有盖，子母口，盖上立等距离三个鸟形钮。圆腹，附方形耳，圆底，三兽蹄足。腹中部饰凸弦纹一周。**甗**（甗、釜配套，出土时甗置釜上）：大小有别。甗腹部和釜肩部各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大甗底为长条形算眼，中甗底为长条形和圆形算眼，小甗底为圆形算眼。**壶**：形制相同。口微侈，长颈，圆腹，平底，高圈足。腹饰凸弦纹三周，上部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钫**：平口，方形，长颈，深弧腹，平底，高圈足。腹部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染炉**：炉由镂空椭圆形支架、镂空长方形炉身、四个兽蹄足与长方形托盘组成。简报认为该器物只用于温酒，因而称之为“温酒炉”。实际上，这种器物是筵席上的加热器具，既可用于温酒，也可用于暖羹、加热调料等，因而专称“染炉”。铜镜既有西汉早期流行的蟠螭纹镜，又有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的昭明镜和星云纹镜。

**印章 3 枚**。2 枚龟钮，文曰“桓平私印”；1 枚桥钮，文曰“臣平”。证明墓主姓桓名平。3 枚印章均为私印，“桓平私印”为墓主生前的图记用章，“臣平”为墓主生前向王（即广陵王，后文将有提及）报请的专用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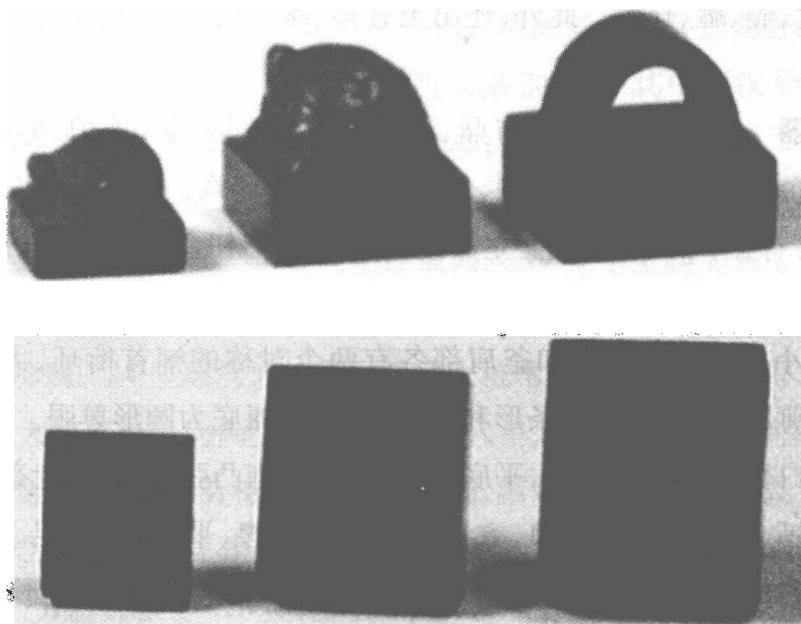
**“桓平私印”**：通高 1.7 厘米，边宽 1.8 厘米。龟钮，龟站立昂首，四肢及尾部和印身相接，腹下呈桥状孔，背铸多边形几何纹作为龟甲，印文按两分格布局，字体工整，线条流畅。

**“桓平私印”铜印**：通高 1.1 厘米，边长 1.3 厘米。方形，龟钮，龟首前伸，站立做爬行状，腹下呈一桥状孔，背饰涡纹。印面布局精巧，空间匀满，笔意粗圆遒劲。

**“臣平”银印**：通高 1.7 厘米，边长 2.1 厘米。方形，印面平整规矩，庄重浑穆。

**镂空柄短剑**：剑身长 28.7 厘米，茎长 7.1 厘米，剑宽 3.5 厘米。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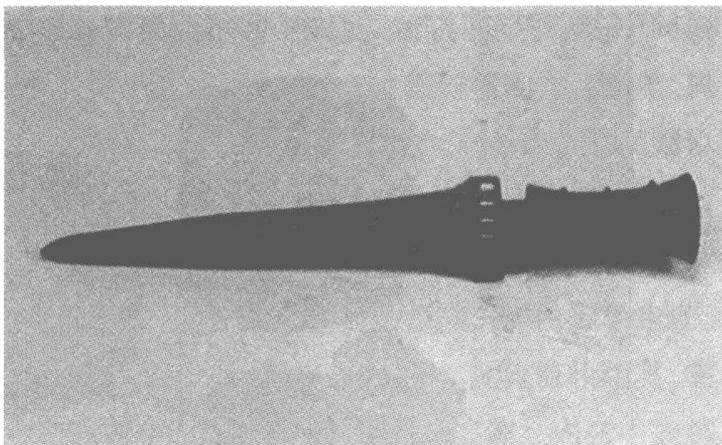


“桓平私印”铜印和“臣平”银印

剑是青铜兵器。剑茎断切面呈椭圆形，镂空条状棱，束腰，铸三道箍，条形剑格有六个长方形穿孔，剑身起脊，斜从较窄，双面刃，锋锐利。剑属冷兵器，是古代贵族和士兵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的武器。剑始于何时，尚无确切的考古资料可证，但是西周早期的剑已相当成熟，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最盛行的时代，汉代铁剑流行以后，青铜剑逐渐被淘汰。剑一般由剑身和剑把两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各有其专名。剑身部分，前段的尖突称作“锋”，中央一条凸起的棱称作“脊”，脊的两旁称为“从”，从两边的刃称为“锷”，脊与两从合称为“腊”。剑把部分称作“茎”，茎和腊连接处呈“凹”字形或条形物起护手作用的部分称为“格”，又称为“鐔”。茎末端圆形内凹部分称为“首”，绕在茎上的绳称为“鞞”（箍）。此剑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不是北方中原民族的风格，具有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此剑出土于长江流域的汉墓，对我们研究汉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铁器** 共出土 78 件，有釜、削、刀、匕首、剑、矛、戟、铲、斧、凿、锉、锯、刨刀、钻等。其中比较珍贵的是 M1 出土的装在一个漆盒中的一套

完整的木工工具，计 28 件，包括：  
(1) 断木、剖木用具，如斧、锯等；  
(2) 平木用具，如铲、刨刀等；(3) 雕刻刻挖用具，如凿、钻、锉等；(4) 木工辅助用具，如磨石、案形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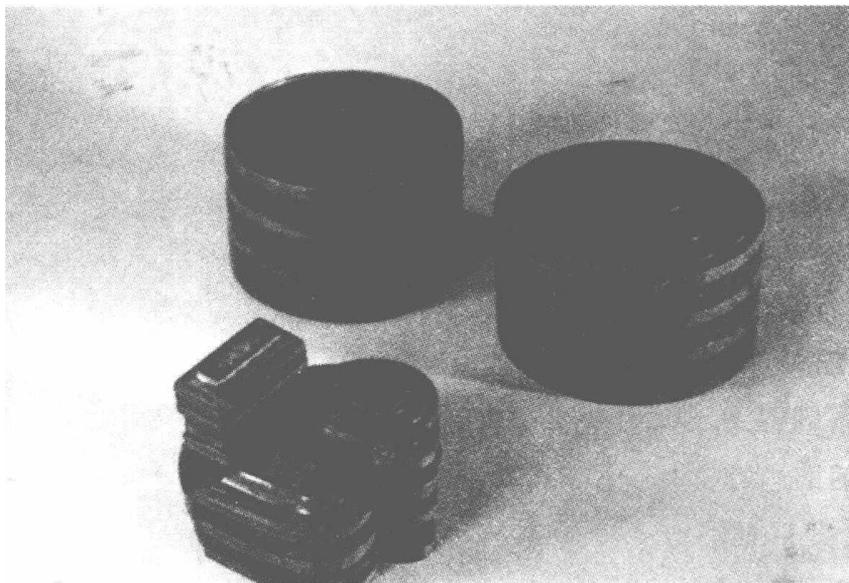


镂空柄短剑

这套工具不仅种类齐全，而且每一种工具又分成形状不同、功能各异的若干种，如凿有凹凿、方凿、尖凿、花凿等。另外，这套木工工具铁质如钢，刃部锋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套细作木工工具。那么，它对研究汉代手工业乃至科学技术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墓葬中随葬木工工具，在战国墓中发现过，但终归还是比较特殊。因此，这套木工工具可能与桓平生前技艺有关。

**漆器** 三角圩出土的漆器，是安徽省历年来发现汉代漆器数量最多、质量规格最高、保存最好的。漆器色泽光亮如新，彩绘精美生动，制作工艺精细，器形别致奇巧，有的一套多件，一件多层，有的镶珠嵌宝，描金扣银。彩绘则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系汉代漆画上乘之作。共出土 179 件，以 M1、M10、M19 出土较多，保存最好，其余墓葬出土的漆器部分已破碎。大多是夹纆胎，少数大件为木胎。器表、器内分别髹黑漆、朱漆为地，其上分别朱绘、墨绘各种变化的云气纹和形态各异的龙凤、鬼怪等。也有少数为素面。有的器物内外口沿用风格各异的线条绘制图案，别具匠心，生动活泼。有的器物或装饰银扣，或贴金，或镶珠，显得格外富丽华贵，工艺价值极高。器形主要有盒、奩、案、匱、虎子、六博具、洗、钵、盘、印等。其中盒最多，有 67 件，形式多样；奩次之，有 14 件。

**虎子**：漆器。目前发现的漆虎子年代最早到汉代，可能是汉代新出



天长三角圩出土西汉漆器

现的漆器品种。汉代漆虎子实物极少见,完整的更难见到。M1出土的虎子比较完整,通体黑漆,五官朱绘,背上有弯柄(已残),下有四足,昂首卧伏,张口做吼状,造型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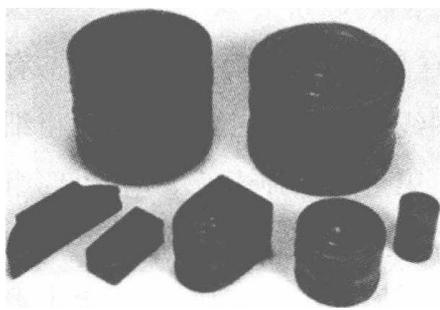
六博具:六博具实物在马王堆 M3 也有出土,不过三角圩 M19 所出的这套博具形制与其有所不同。该套博具呈正方形,边长 42 厘米,下面有四条腿,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抽屉,内装 18 件银质筹码。盘面刻六博纹,朱绘变形云气纹,四方各绘席地而坐的对博人物一对(一壮年男子,一老翁)。

银扣彩绘描金漆奩:高 14.8 厘米,径 15 厘米。该奩成圆筒状,由盖、身套合而成。奩内置有大、小圆形,长方形,半月形和马蹄形五只子奩。整体器表髹赭色漆,内髹朱漆。盖顶成穹形,盖壁为覆筒状。器身为圆形直腹平底。盖顶嵌有银柿蒂纹饰,蒂叶间对置朱绘四禽兽图案。器盖银扣六道,器身银扣四道。银扣之间赭色漆地朱绘云气纹和描金装饰。这套由五子奩组合的漆奩,结构奇巧独特,装饰精美,图案生动,风格和谐统一,反映了汉代制漆的高超技艺,是汉代漆器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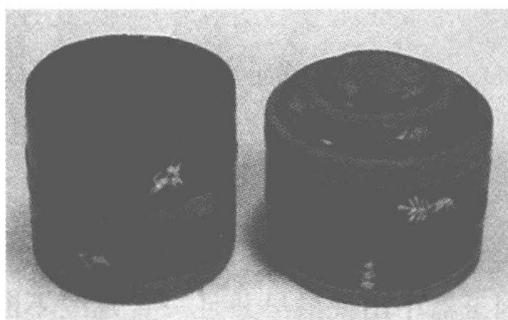
银扣贴金银漆盒:通高 9.5 厘米,径 10 厘米。夹纻胎,圆筒形。直

腹平底,盖、身套合。整器外髹黑漆,内髹朱漆。盖顶面呈弧形,中间嵌柿蒂形银饰,外饰凸弦纹三周。弦纹之间有金、银箔剪贴的虎、鹿、羊、凤等动物图案二圈。内圈四只动物图案为金箔,外圈八只动物图案则以金、银箔相间排列而成。盖壁与器身各有银扣三道,银扣之间黑漆为地,朱绘云气纹两周,云气纹上嵌金、银箔动物图案。每周八只动物,以四金四银间隔排列,这些动物或直立张望,或奔跑跳跃,姿态各异,形象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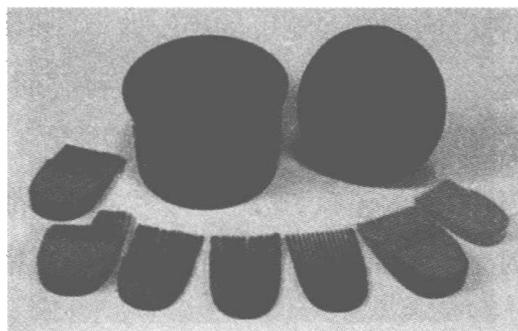
银扣彩绘梳篦漆奁:通高 14 厘米,径 14.2 厘米。古代梳妆用具,夹纹赭色器,内髹朱漆。盖顶隆起,饰有两周凸弦、两周银饰。内弦中嵌柿蒂纹银饰,蒂心出嵌一圆形珠饰,每片蒂瓣上亦各嵌有一桃形珠饰。蒂纹间绘有云气纹、几何纹和对置双禽双兽图案。器盖、器身各饰银扣三道。在扣间赭色底漆上,均用红、黄两色绘云气纹和禽兽纹。盖内顶端绘一四爪独角游龙,器身内底部满绘卷云纹。盖、身内口沿处饰黄线一周、黑线两周,黑线间填绘几何纹。整个器物图案生动活泼,线条简洁流畅,色彩也十分协调。尤其是盖内顶绘游龙,器身内底绘卷云,更使整个



银扣彩绘描金漆奁



银扣贴金银漆盒



银扣彩绘梳篦漆奁



漆匜

器物上下遥相呼应,内外统一完美,创意新颖。

**匣:**木胎,平底弧形,一侧有长流,一侧有铜铺首衔环。外髹黑漆,内髹朱漆,朱绘鸟兽及云气纹。

**玉器** 共出土 90 件,有璧、璜、环、龙、凤、龙形佩、凤形佩、印以及带钩、玉具剑、九塞玉等,多为和田玉料制成,雕琢精细,造型别致。下面选择璧、九塞玉和玉具剑作简要介绍。

**玉具剑:**即在剑和剑鞘上镶玉之剑。一般不作临阵之用,而是作为显示墓主身份和地位的仪仗器。三角圩 M1 出土的玉具剑上的四种玉饰齐备,剑首、剑格、剑卫和剑珌的纹饰题材和雕琢技法一致。出土时,玉剑卫上还残留一截丝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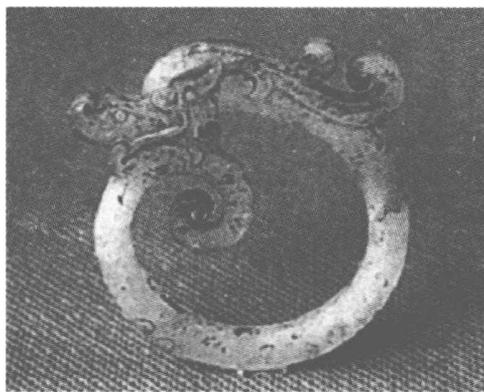
**璧:**11 件。大小不一,器形规整,质呈深绿色或乳白色。两面纹饰基本相同,多为平面镂雕,局部加以细线刻画,少数局部透雕圆孔。除传统的蒲纹和涡纹外,流行着分为内、外两区的纹饰,一般内区为涡纹或蒲纹,外区为蟠螭纹。这类纹饰组合始于战国,盛行于秦汉。

**兽面纹玉璧:**外径 23 厘米,孔径 4.6 厘米,厚 0.55 厘米。玉璧呈深碧色,局部黑褐色沁斑。体扁圆形,中心有一圆孔。两面纹饰相同,共有五组图案。分别是:第一组和第五组饰阴线刻纹一周,第二组采用粗细阴线刻四组形式相等的一首双身兽面纹,第三组饰绳索纹一周,第四组是在满饰蒲纹的锦地上加饰涡纹。玉璧为我国传统玉制礼器之一,是中国玉器中出现最早并且一直延续不断的品种,其使用年代之久、出土地域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玉器无法比拟的。璧在古代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礼器,用来祭天地、祭祖先和事鬼神。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又具有馈赠、佩戴、殓葬、辟邪等多种用途。玉璧发展到汉代达到鼎盛时期,无论是选料还是制作工艺均为一流,花纹装饰丰富多变,使用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兽面纹璧是汉代常用的体裁,这种纹饰组合始于战国,而盛行于两汉时期。该璧出土时位于死者的胸部,制作规整,雕琢精细,应为墓主人生前所爱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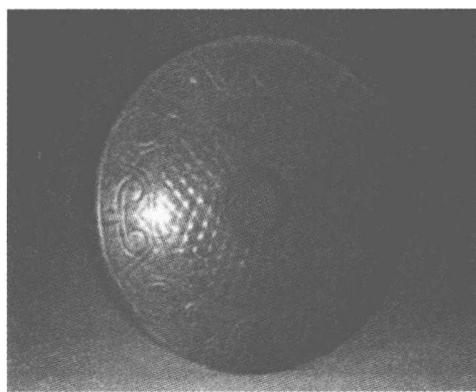
**环形玉龙:**最大径 5.3 厘米,厚 0.4 厘米。青白玉质地,局部有黄褐

色沁痕。玉龙张口露齿,上卷唇,杏眼带梢,颈部有短小阴刻线将头部与躯体分开,背部有短小阴刻线将头部与躯体分开,背部有两股一长一短的鬃鬣向上翻卷,尾向内弯卷,口衔其尾部,自然卷曲呈环形,龙身除有两道阴刻云气纹外光素无纹。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大的一种神物,几千年来和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号称是龙的传人,龙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神灵,是吉祥的象征,是人们想象的一种崇拜物,因此,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出现了形态各异的龙。玉雕龙形佩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玉龙佩到了汉代身躯已经没有战国玉龙的华丽装饰,只用一些简单的阴刻勾勒其各个部位和轮廓。该环形龙玉佩,整器琢磨精细,线刻简单而又凝练,线条流畅,姿态优美,栩栩如生。

S形玉龙:长6.9厘米,宽3.84厘米,厚0.24厘米。玉龙佩,白玉,头部呈浅褐色。龙体呈S形,蜿蜒曲折,粗壮刚健。玉龙昂首挺胸,张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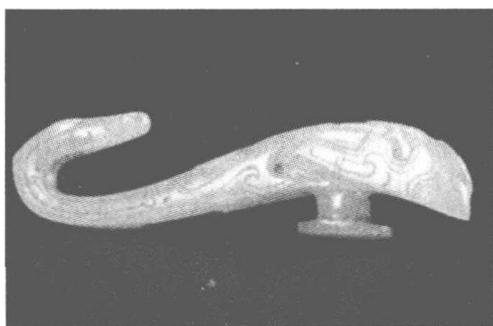
环形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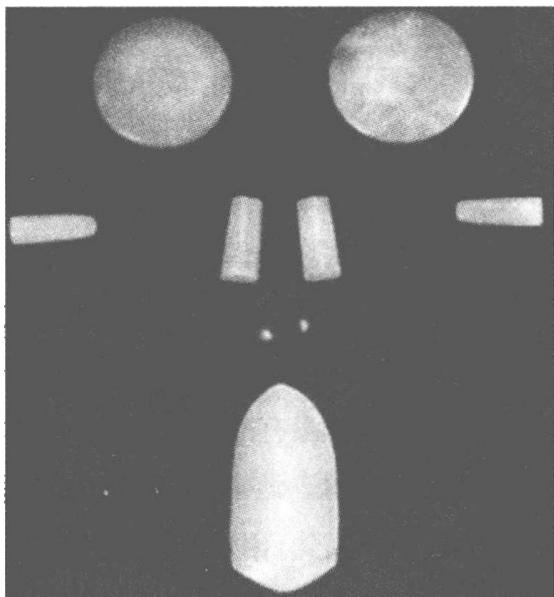
兽面纹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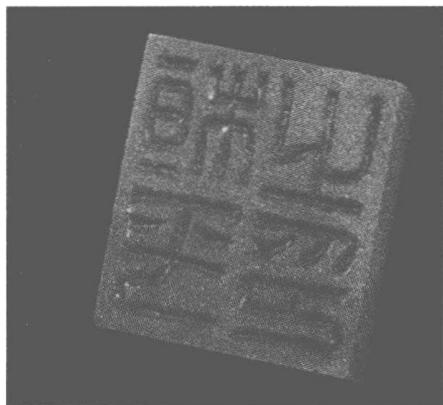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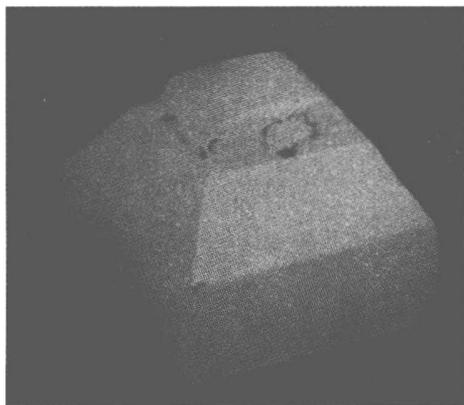
S形玉龙



云纹玉带钩



七窍玉塞



“桓平之印”玉印

露一利齿,眼睛是用阳文刻出的眼角,用一钻孔表现眼珠,炯炯有神,又可以系挂,十分巧妙。龙角粗短上翘贴于颈部,身上点缀着阴线刻的二字纹、柳条形纹、云气纹等。位于龙体的两个弯曲部位分别雕两个类似角的装饰,而龙尾则用两条阴线分割成分岔尾巴。

云纹玉带钩:长 7.03 厘米,高 1.12 厘米,宽 0.9 厘米。和田白玉,玉质洁白温润。钩首扁似鸭首,钩身浮浅雕云纹,在主纹饰的轮廓边缘雕琢短小阴刻线,这是汉代玉雕常用的技法之一,在不少汉代玉兽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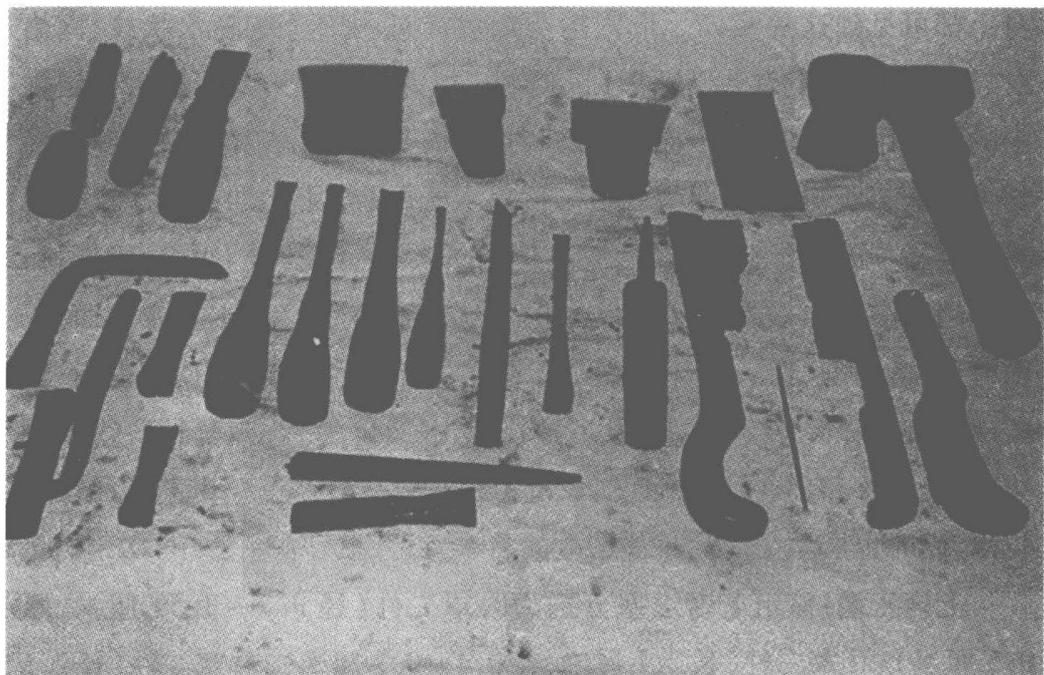
身上都可见到这种装饰。带钩的两侧装饰有阴刻长形滴水状纹、网格纹、长S纹。腹下有一椭圆形钮，阴刻三组涡纹。带钩是我国古代服饰上的一种用品，是束在腰间皮带上的钩，具有实用和装饰的多种功能。据考古资料所知，我国最早的玉带钩出土于良渚文化。带钩到了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尤其以玉质的带钩最为珍贵，比较注重选材，造型趋于多样化，纹饰也更加丰富多彩。古代带钩造型主要有兽面型、曲棒形、禽鸟型、琵琶型、长条形、螳螂型等。该云纹带钩玉质优良，整器雕琢精细，集阴线刻、浅浮雕等多种技法于一体，造型美观新颖，线条挺拔，抛光度好，有较强的玻璃光泽，充分体现了汉代制玉精湛高超的雕刻技术，同时也展示了汉代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

**七窍玉塞：**该组七窍玉塞分别为眼罩二件（径3.7~3.51厘米，厚0.5厘米）、耳塞二件（长2.1厘米，径0.4~0.7厘米）、鼻塞二件（长2.1厘米，径0.85~0.95厘米）、口琫二件（玛瑙珠：直径1.7厘米；玉蝉：长5厘米，宽2.4厘米）。其中眼罩玉呈青灰色，受沁严重部位呈黄褐色，扁圆体，正面微微鼓起，经过抛光，反面平直，未抛光。耳塞、鼻塞均为白玉，形制相同，为圆柱体，一端略小，通体抛光。口琫一件为白玉蝉，玉质温润，洁白无瑕。薄片扁身。蝉头呈三角形，简单的两条斜线勾画其眼睛，背部起脊，其上削平一小三角形，腹部素平，中心稍厚，边缘薄，通体抛光。刀法极其简练，但刚劲有力，寥寥几刀即雕出蝉形，也就是俗称的“汉八刀”，玉蝉是专门用于含殓之物。另一件为玛瑙珠，呈赤、黑双色，中部有一穿孔，通体抛光。这组七窍玉塞为丧葬用玉，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头部。汉代人用玉蝉作为口琫有着深刻的寓意，因为蝉是蜕壳再生的，古人将玉蝉放入死者口中以求精神不死或死而复生。

**“桓平之印”玉印：**通高1.4厘米，边长2厘米。方形，覆斗形桥钮，穿孔呈弧形。印面不带界格，未破边，整体布局匀称而舒适，印文的笔势方圆结合、疏密相应。

此外，还出土有木器、角器、琉璃器、石器等。

天长汉墓出土遗物以精巧著称，裹金丝的剑柄、嵌金玉片的漆盒等



天长市三角圩西汉墓出土木工工具一套

都表现了这一特色,玉器也是如此。三角圩汉墓出土玉器近百件,主要有玉璧、玉佩、玉璜、玉龙、玉凤以及眼罩、鼻塞、耳塞、口琚等葬玉,均出自1号汉墓。玉器构思奇妙、风格别致、纹饰精美、雕工精湛,重于神而简于形,令人赞叹叫绝。天长汉墓出土玉器以其资料完整、时代准确、器物精美、数量众多而闻名,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另外,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

(1) M1 出土的印章除文中提及的三枚铜质的之外,另有一枚玉质的、一枚木质的,分别刻有“桓平之印”、“广陵宦谒”字样。通过这五枚印章可知桓平应为广陵国时期的谒者属官,为广陵国王刘胥的近臣。

(2) 三角圩 24 座汉墓集中分布在近 10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均埋葬在黄色土层中,而且墓与墓之间无打破或叠压关系,距离也大致相同或接近。另外,除 M1 墓主身份明确外,从 M19 出土的“桓盖之(印)”木质漆印看, M19 墓主应为桓盖。因此,三角圩这批西汉墓应当为桓氏家族墓。

## 五、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考古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安徽由于地处江淮之间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的缘故,除了西晋(265~317)短暂的统一以外,其余时期一直为南北政权所割据,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220~265),以淮河和长江为界,曹魏占据淮河以北地区,孙吴则占据了长江以南地区,两国在江淮之间的南部展开了拉锯战。到了东晋时期,淮河以南地区成为东晋的辖区,以北地区则为北方政权所控制,然江淮之间的谯郡(今亳州)、寿春(今寿县)、钟离(今凤阳)、合肥等地在东晋时期成为东晋与北方的后赵、前燕、前秦争战之地,时而为东晋控制,时而又易手于后赵、前燕、前秦,长江以南则为东晋完全控制。到了南北朝时期(420~589),安徽大体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基本上是北方交替的北魏、东魏、北齐的辖区,以南则为南朝的宋、齐、梁三国先后控制。南朝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江淮地区的淮河以南各地为北周所陷,南朝陈仅据有长江以南地区。直到隋灭陈,安徽南北分裂的局面才告结束。

由于具有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徽南北墓葬分布地点就显得相对复杂。亳州、颍上发现了三国时期曹魏的墓葬。亳州在秦汉时称谯县,东汉时属沛国,为曹操故乡,在这里发现了曹操宗族墓群。东吴的墓葬则集中发现于长江南岸的马鞍山市以及皖南的繁昌、南陵、青阳等市县。另外,江淮之间的全椒也有发现。安徽西晋墓葬则从淮北到江淮之间,到江南地区都有发现,以长江南岸和皖南为多见。淮河以北地区发现地点有凤台等地,江淮地区有合肥、和县、巢湖、寿县等地,江南地区有马鞍山、当涂、芜湖、南陵、青阳、广德、宣城、郎溪等地,这种分布状况是安徽西晋时期南北统一的体现。安徽东晋时期的墓葬集中发现于长江南岸邻近建康(今南京市)的芜湖、马鞍山、当涂等地,

见于报道的有近 20 座。迄今为止,安徽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很少发现,见于报道的只有淮南一地。

安徽三国时期东吴墓葬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相继发现的,公布资料的有 10 多座,以距南京不远的马鞍山发现最多。级别最高的当属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另外,在马鞍山的佳山、盆山、东苑小区等地也发现了东吴墓。马鞍山以外的东吴墓有南陵麻桥赤马八年纪年墓、繁昌新潮东吴墓、青阳东吴墓和全椒卜集东吴墓等。

隋初,国内一片混乱,隋文帝对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大加整饬,使之从大乱后达到大治。隋唐时期,安徽发展显著。以大运河为契机的水利运输和农田开垦,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区域之一,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安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了本地区文化教育的兴盛。

由于隋唐时期安徽地区形成统一治理局面,所以该时期安徽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统一。南、北方地域文化特征在安徽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安徽隋代墓葬经过发掘并公布资料的有 10 多座,均发现于长江以北地区,分布于合肥、亳州、六安、五河、蚌埠、全椒、无为和萧县等。墓葬均为砖室墓,平面形制,有“凸”字形和长方形两种,以前者居多。安徽唐代墓葬在全省不少市县均有发现,从皖北的宿州,皖中的淮南、寿县、合肥、肥西、巢湖、和县、无为、望江到皖南的南陵、青阳、歙县、郎溪、东至等地都有发现,且有正式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20 余座。这些唐代墓葬可分为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大类,砖室墓又可分为双室砖墓和小型单室砖墓,其中前者多为出土有墓志的唐朝中下级官吏或豪绅的墓葬。

### 1. 勇猛善战大都督——马鞍山朱然墓

朱然,字义封,汉丹阳郡故鄣(今浙江安吉)人,生于汉光和五年(182 年),卒于赤乌十二年(249 年)。他原本姓施,13 岁时过继给舅父

朱治,后改姓朱。朱治为吴国武将,曾担任过吴郡太守、安国将军、毗陵侯,历仕孙坚、孙策、孙权三代。因而朱然少年时期可以与孙权一起读书,两人也结为好友。

孙权管事之后,任命当时 19 岁的朱然为余姚长,后来命他为山阴令,加折冲教尉,统督五个县。孙权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很快又任命他为临川太守。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朱然因与潘璋在临沮擒关羽有功,升迁为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吕蒙死后,孙权又命朱然镇守江陵,接替吕蒙的职务。黄武元年(222 年),朱然率 5000 人与陆逊合力抵抗刘备的进攻,刘备败走。朱然因军功显赫,被任命为征北将军,封永安侯。江陵之战(223 年)时,虽然魏国大兵压境,朱然军队多为老弱残兵,兵力差距较大,但他仍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指挥得当,成功击退魏兵。于是朱然的名声大振,威震敌国,改封为当阳侯。247 年,官拜大都督。

在三国争霸时期,朱然北抗曹魏,西拒蜀汉,屡立战功,最后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他是参与孙权政治、军事的最高决策人之一。朱然一生功名显赫,终年 68 岁,死时孙权为他素服举哀,极为悲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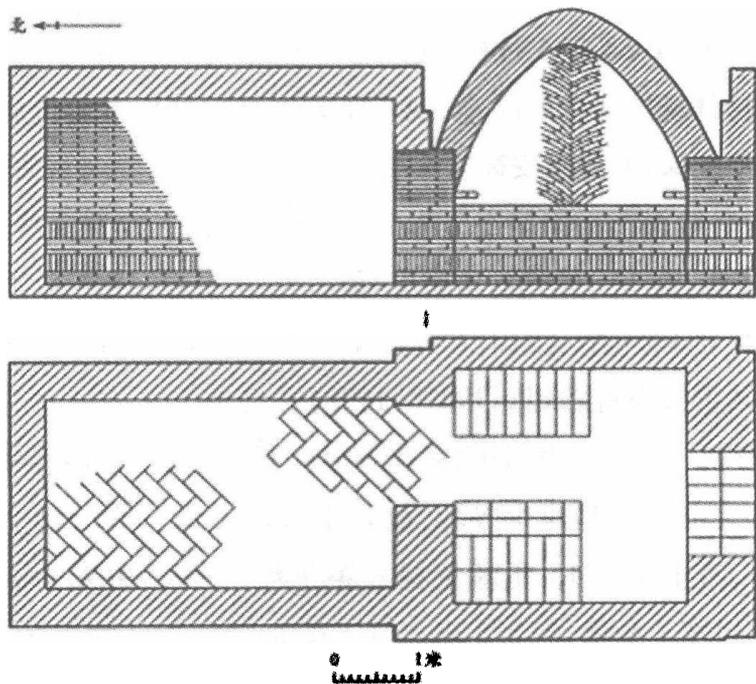
**发掘经过** 1984 年 6 月初,安徽省马鞍山市沪皖纺织联合公司在雨山乡安民村林场扩建仓库时,发现一座土坑砖室墓。市文化局得知后,通知工地停工保护,并报安徽省文化厅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派员,会同马鞍山市文物普查工作队,对墓葬进行了发掘。野外工作自 6 月 9 日开始,至 23 日结束,历时 15 天。

朱然墓为 1984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收入宿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一书中。

**墓葬形制** 朱然墓由封土、墓道、墓坑、墓室四部分组成。地面原有封土,清理之前已在基建中毁坏,故封土范围不详。残存封土厚 25 厘米,经夯打,夯土层厚 15 厘米左右。墓道为阶梯式,长 9.1 米、上口宽 2.15 米、下口宽 1.8 米、深 3.3 米。位于墓坑正南、封土之下的墓坑形状不规则,南北长 9.52 米、东西宽 3.62 米。墓室位于墓坑中间,用砖砌造,由南到北由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长 8.7 米、宽 3.54 米。甬道

内垒砌封门墙,甬道长 0.82 米、宽 1.26 米、高 1.54 米,上有半圆拱券顶,墓门顶部之上砌有挡土墙。前室平面近正方形,内长 2.76 米、宽 2.78 米、高 2.94 米。前室后部左右两侧有用两层砖砌祭台各 1 座,前室顶为四隅券进式穹隆顶。过道位于前后室之间,在前后室相连的壁上辟券顶门而成,很短,长 0.64 米、宽 1.20 米、高 1.64 米。后室平面长方形,内长 4.08 米、宽 2.3 米、高 2.25 米,双层拱形券顶。顶上两侧有四个用以加固支撑的砖垛,后端有拦土墙。墓室底作双层砖“人”字形铺砌,墓壁三顺一丁砌法,前后室各置一黑漆木棺,两棺形状相似,大小稍有不同,后室棺稍大一些。

朱然墓墓室与湖北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227 年)纪年墓、莲溪寺永安五年(262 年)纪年墓等东吴时期墓葬在形制上有共同点,如均为双室墓,前室平面为方形,后室则呈长方形,前室门前筑有较短的甬道,前接斜坡墓道。但也有不同点:一是武昌东吴墓前后室之间另砌的过道比朱然墓的长;二是武昌东吴墓前室左右两侧各设一小耳室,朱然墓则无;三



朱然墓平、剖面图

是武昌东吴墓前后室顶均为券顶，朱然墓则前室为新出现的四隅券进式穹隆式顶，后室则为券顶。总之，武昌东吴墓继承了中原东汉末和曹魏墓葬的形制，而朱然墓与中原地区典型的墓葬形制不同，是东吴至西晋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墓葬形制。

**重要发现** 朱然墓后室券顶正中有一早期盗洞，盗洞内填塞土中有六朝板瓦、筒瓦残片，据此可推测封土之上原来可能建有享堂之类建筑物。墓室内的随葬品经过扰乱破坏，原葬入位置及器物组合已不可知。尽管被盗过，朱然墓仍出土残存随葬品 140 余件。其中漆木器就达 80 件之多，且器类繁多，制造精美。其次是青瓷器，共出土有 33 件。另外还有陶器、铜器以及 6000 多枚铜钱。漆器填补了汉末至三国漆器空白，其上的绘画亦填补了这一时期美术绘画的空白。由于该墓有确切纪年，出土的青瓷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随葬的大量铜钱对于了解汉末六朝初钱币流通情况具有重要价值，部分钱币还纠正了关于这些钱币铸造时间上的传统的错误说法。

朱然墓出土的漆器均为生活用具，包括案、盘、羽觞、榻、盒、壶、樽、奩、勺、凭几、砚、虎子、屐、扇、梳、尺、匕、刺、胝等。漆器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装饰工艺有描漆、戗金锥刻、犀皮漆以及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等，不少漆器上还镶嵌金铜扣，大件器形多彩绘人物故事。彩绘用色有朱红、红、黑红、金、浅灰、深灰、赭、黑等。从部分漆器底部的“蜀郡作牢”铭记看，应产自蜀郡（今四川成都地区）。随葬大量漆器沿用的是东汉的旧俗，同时也说明孙吴时期漆器使用的普遍。漆器上的彩绘内容丰富多样，有描写贵族生活的宫闱宴乐，有反映封建礼教道德的“季札挂剑”、“百里奚会故妻”、“伯榆悲亲”等等，是三国美术绘画史的重要资料。

**宫闱宴乐图漆案**：漆案呈长方形，长 82 厘米、宽 56.5 厘米。四缘略突出于案面，缘上镶嵌铜皮，铜皮上鎏金。背面原安有四个矮蹄足，出土时已残。案面绘有宫廷宴乐场景，整个画面描绘的是皇帝宴请诸王侯及其夫人观赏百戏的场面。画面共有 55 个人物，有皇帝、后妃、宫女、侍从

及一些高官贵妇,他们或嬉戏交谈,或观看演出,表情生动,形态逼真。这些人物依照其不同身份,大致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皇帝、皇后、王侯及其夫人,分布在画面的最上一列。第二组人物即为表演乐舞百戏的艺人,分布在画面中间。第三组人物为侍卫人员,散布于帷帐前及画面左、右两下角。整个画面布局合理、形态各异,尤以第二组生动逼真。古代以杂技艺术为主的各种表演艺术通称为“百戏”,画面上表演百戏的艺人,或跳跃,或倒立,或旋转,或奏乐,有弄丸(手技抛球)、弄剑、鼓吹等。寻幢(竿技)场面为一大汉扛一高竿,竿端置一横竿,竿顶有一转盘,一伎在盘上作“腹旋”表演,横竿两端各有一伎双脚反钩于横竿上,头朝下倒挂着,令观者惊心动魄,拍手称绝。这是一个为宫廷演出的杂技班子,其演技已相当纯熟。这幅漆画使今人目睹 1700 年前精彩的杂技艺术,其文化价值自不待言。整件漆案形制规整、画面生动,堪称我国古代漆器艺术的瑰宝。

季札挂剑图漆盘: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春秋时吴王第四子季札出使鲁国途中,路经徐国,受到徐国国君接待。徐君喜爱季札所佩的宝剑,虽有所流露,但未明言。季札心知其意,愿意奉赠,但因使者必须佩剑,当时不能将此剑献给徐君,决定完成使命后,再行赠剑。待季札返回徐国时,徐君却已去世,季札乃将自己的佩剑挂于徐君墓前树上,以示不违背心诺之意,体现出重信守诺的美德。朱然墓出土的季札挂剑图漆盘生动地表现了挂剑场面,画面主要人物鲜明,只见季札身着红袍,双手做祝祷状,对死者沉痛的哀悼并倾诉心愿的神情呼之欲出。其身后两从者正在对话,神态各异,在四目相视中表达了对季札的称颂。画面的上方有山峰,山与人之间用云气隔开,渺茫空濛中两只野兔在坟前奔跑,烘托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更增苍凉悲怆之感。

犀皮黄口羽觞(耳杯):犀皮漆是古代漆器工艺中高超而精致的髹漆工艺之一。关于它开始出现的时间,文献记载众说纷纭,成为漆器工艺史上的不解之谜。朱然墓出土的一对古代饮酒器——犀皮黄口羽觞(耳杯),拨开迷雾,使疑团顿解。器身正面黑漆,花纹不显著;背面黑、

红、黄三色相间,属“黑面红中黄底片云斑犀皮”漆工艺,表面光滑,花纹回转如旋涡,自由流畅,匀称而富有变化,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器物保存完好,证明耐腐蚀性能极强。这对耳杯的年代,比有关犀皮漆最早的文献记载早 600 年,比现存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早 1300 多年,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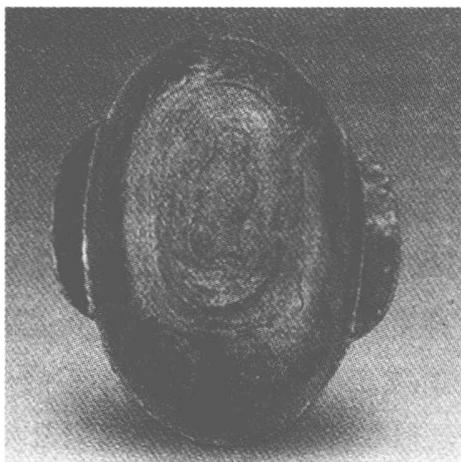
贵族生活图漆盘:直径 24.8 厘米、高 3.5 厘米。平沿直口,浅腹平底,沿与腹下各有一道鎏金铜扣。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画面五人。中间一豆形器,内有一勺,左边一男一女当是主人,一侍女立于旁,右边是两男宾;下面为出游图,画面二人,一人骑羊,一人跟于羊后,羊前有一山丘;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



宫闹宴乐图漆案



季札挂剑图漆盘



犀皮黄口羽觥(耳杯)



贵族生活图漆盘

侧为梳妆图。

成熟瓷器产生于东汉晚期，三国时期瓷器大量使用，这在朱然墓中出土的青瓷器中得到体现。该墓残存青瓷器达 33 件之多，以日常实用器为主，如碗、盘、盏、盆、卣形壶、盘口壶、双耳罐、香熏、勺、灯等。瓷明器很少见，只有困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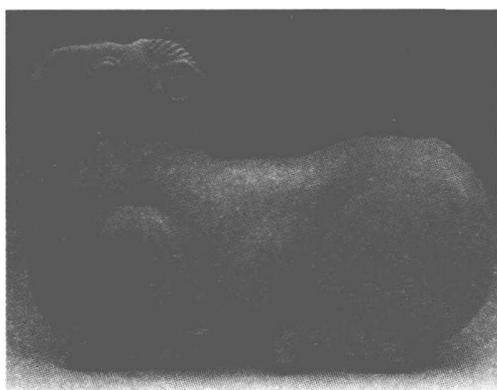
青瓷卣形壶：高 22.3 厘米，口径 11.4 厘米 × 10.3 厘米，底径 12.8 厘米。此壶器型仿青铜器中卣的造型。椭圆口，短直颈，颈下有一椭圆形平台。扁圆腹，最大径在下腹部。圈足外撇，底内凹。肩部饰四组压印纹饰，自上而下分别为连珠纹、菱形网格纹、连珠纹和锯齿纹。每组纹饰之间均以弦纹相隔。在圈足上亦饰一组菱形网格纹，肩部四周有对称的两对铺首。其长径方向的铺首在耳下，兽头较大有双角，为圆雕羊首形。短径方向铺首较小，为模印兽首堆贴而成。在六朝青瓷中，这种造型的器物非常少见。此壶胎色灰白，瓷化程度较高。通体施青釉，发色纯正、均匀，应为浙江省上虞、绍兴一带生产的六朝青瓷精品。六朝青瓷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而吴则是六朝中的第一个朝代。此壶出土于吴国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朱然墓中，因此可以明确其是早期六朝青瓷的断代标准器物。同时，其作为当时国家上层统治集团少数核心成员所使用的器物，表现出来的造型独特、装饰精美、烧造质量高、数量稀少等特点也是自然而然的。

青瓷羊形插器：东吴时期的典型器物。器身通体施青色釉，匀净无瑕，光洁晶莹，头顶部有一圆孔，可以安插蜡烛。自古以来，羊都是人们喜爱的一种动物。人类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与羊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性情温顺的羊成为人们生活和平、安居乐业的象征，羊也代表善良、美好。《说文》中记载：“羊，祥也。”古时，“羊”字与“祥”字相通。此羊体态丰满，造型敦厚淳朴，神情平静安详，融吉祥富贵、沉稳简洁于一体，极富艺术观赏性。品味这厚实凝重的富贵，于朴实中接纳雍容大气，于平静中感受祥和安康，此乃大吉祥也！

陶器大多为明器，计 18 件，包括罐、盆、井、磨、鸭、猪、鏹斗、釉陶罐



青瓷卣形壶



青瓷羊形插器

等仓厨明器,家畜家禽模型仍沿用东汉旧俗。陶质为泥质灰陶,胎厚重,火候低。青铜器残存6件,有炉、熨斗、鍮盃、水注、镜等。

铜器数量较少与三国时期铜原料缺乏不无关系。朱然墓随葬铜钱达6000枚之多。在大型墓葬中随葬大量铜钱习俗,两汉时就有,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随葬有2317枚铜钱,东汉至三国时期仍流行这种习俗,朱然墓也不例外。该墓随葬的铜钱绝大多数为汉钱,如半两、五铢,其中五铢钱占全部铜钱的97.5%,且多为东汉五铢,另还有新莽的货泉、大泉五十等。属三国时期的钱币有蜀汉的直百五铢,孙吴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以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其中太平百钱过去被当做西晋末赵钦据蜀时建元太平(300~301)所铸,定平一百钱则被认为晋、十六国时李雄据蜀建大成国宴平年间(306~310)所铸。朱然墓发掘之前尽管纪年墓葬否定了旧说,朱然墓出土这两种钱再次表明这两种钱应铸于汉末至三国,不晚于赤乌十二年(249年)。通过对朱然墓出土铜钱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国东吴时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前代的旧钱,甚至西汉初年铸造的半两钱和东汉前的新莽钱币仍在流通,而三国时期的钱币很少流通,且蜀汉的钱币也在东吴境内流通。

马鞍山朱然墓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掘的300多座吴墓中墓主人的身份最高。作为东吴最高统治集团一个成员的墓葬,其形制、规格、随葬品等,为我们研究东吴墓葬提供了一个标尺。朱然墓出土的漆器是一

次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汉末至六朝时期漆器工艺史上的空白,漆器上的绘画为我国美术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 2. 军事堡垒——合肥三国新城遗址

三国时期(220~280,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说),是中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分裂对峙时期,有曹魏(魏国)、蜀汉(蜀国)、东吴(吴国)三个政权。在这60年期间,三个政权不时发起战争,扩张版图。

据嘉庆《合肥县志》记载,曹魏将军满宠为抵御孙吴的军事进攻,在合肥西三十里修建新城并大量屯兵。合肥新城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始建,青龙元年(233年)基本建成。曹魏视其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和“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是曹魏抵御吴、蜀的“桥头堡”。孙吴曾于公元230年、233年、234年、253年共四次进攻合肥新城,均未取得胜利。

233年,新城刚刚建成,孙权即发兵进围。孙权以为曹魏刚刚迁移新城,屯兵于此,准备不够充分,因而要带领士兵上岸炫耀兵威。满宠对于孙权自大的性格比较了解,故派遣6000步骑埋伏于淝水隐蔽处守株待兔。等到孙吴军队上岸,魏军突然杀出,使孙吴军队措手不及。由于远离水道,吴军不敢贸然下船进攻,孙吴军队只好撤退。满宠创造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战例。

魏青龙二年(234年),孙权亲率10万兵力再次猛攻新城。敌我军队实力悬殊,满宠担心寡不敌众,打算放弃新城,退守寿春。曹魏军营中一片惶恐,士气低落。魏明帝曹睿亲御龙舟东征,迎战孙权。曹魏军队一扫低落士气,斗志昂扬,誓保新城。满宠艰苦守城,募招壮士,火烧吴兵攻城的器具,乱箭射死孙权之侄孙泰,最后迫使孙权撤围而走。

由于合肥新城的地理位置(南守襄阳,西固祁山)重要,其必然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魏嘉平五年(253年,孙权死后第二年),吴太傅诸葛恪统率大军20万进军淮南,连续数月围攻合肥新城。而此时守城魏军

仅 3000 人。魏将张特深知众寡悬殊,遂坚守城池,不与吴军正面交战。诸葛恪却指挥兵士沿城垒筑土山,决心破城。张特眼见新城将要沦陷,便冒险前往吴营诈降。吴军便停止攻城。这也给曹魏军争取了时间,连夜修补城墙,顽强死守。当时为高温天气,吴军由于长期攻占,疲惫不堪,大半士兵都生病,军营中一片唉声叹气,士气低落。等到魏军的援兵赶到,诸葛恪不得不率众撤退,未能攻下新城。

三国新城存在近 50 年。至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晋灭吴国,才废除新城,迁回原址。被《三国志》多次提及的合肥新城是一座固若金汤的英雄城。它存在的 50 年,是可歌可泣、流光溢彩的 50 年。

**发掘经过** 嘉庆《合肥县志》记载,新城遗址“在今鸡鸣山北(北应为东之误),有故址,围三里,共一八墩,在城西北”。上世纪 80 年代初,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对新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420 米、东西宽 210 米,地表有 14 个土墩和连续的墙基,四角及南北墙中间 6 个土墩最大,高约 15 米。墙体为夯土版筑,墙外有护城壕。

2004 年 8 月,考古工作者又对城址进行了调查,发现城址由四周土垄和 10 余个土墩连成一周不规则的长方形,四周城墙上 6 个缺口,其中东面城墙上的 2 个缺口和西面城墙上的 1 个缺口为城门,南、北城墙上的 3 个缺口为近现代挖开。

2004 年,考古工作者对城址进行了考古钻探,钻探面积达 10 余万平方米。经钻探了解到,新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四周墙基每一面均不成直线,多处出现外弧现象。墙体为夯筑,直接建在原始地面上。为寻找城门遗址,工作者还对四面城墙上的 6 处缺口进了钻探,发现其中 3 处应为当时的城门位置。环城墙外有一条护城河。同时,考古工作者对城内的建筑布局、道路、水系等进行了钻探,对文化层厚度、大面积夯筑基础、西门北侧的夯土台基和城内东北角附近的一些红烧土堆积作了一般性的勘察。

为配合“三国新城遗址公园”建设,经安徽省文物局同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合肥三国新城进行了全面钻探与发

掘。发掘工作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发掘从2004年10月13日至2005年元月20日,主要发掘了三座城门,解剖了西门北侧的夯土台基、铸造作坊遗址(红烧土堆积处)以及南墙内侧地层保存较好的区域,发掘面积近4600平方米。2006年3月2日至6月20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旨在了解城内的布局、道路和水系情况以及城墙外弧部分是否与马面有关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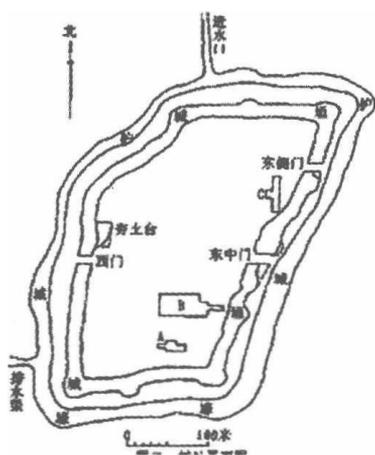
新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内有大面积夯土建筑基础,还有房址、铸造作坊、夯土台、车道和马面等。出土遗物主要为板瓦和筒瓦,其次为铁镞、铜镞和礮石。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出土遗迹、遗物分析,三国新城应为军事城堡。

**遗址概况** 合肥三国新城城墙为夯土版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60米,东西宽240米。周围显露地表14个土墩,以四角及南北两边中间的6个土墩最大,高10余米,系望楼、马面的遗迹。

三国新城遗址城垣经过多次增筑。整个墙体有的地段增筑两次,有的地段则增筑三次。主墙体底宽10.5米,残存高度达3.1米,采用黄土和较纯净的白土相间夯筑,层次分明,极有规律。前两次增筑部分主要是在墙体内侧,第一次增筑使墙基部分增宽了2.5米,第二次增筑的土方量是第一次增筑的3倍,墙基增宽到20米左右。最后一次增修于城



遗址位置示意图



遗址平面图

墙外侧,只在外墙基处堆积了一些黄花土。有关专家推测,这个时候的新城可能失去了初建时的重要军事作用。但从多次增修城墙的情况分析,总体上说明当时该城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

发掘工作前的钻探认为三国新城原设有四座城门,除东城墙上的两座门外,西、北面各设有一个门。四座城门遗址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重点。然而考古专家在发掘后发现,原设想的北城门的位置上是一条穿墙而过的水沟,现水沟上已被挖河清淤土堆积厚达1.5米左右。水沟两边的墙体夯土层没有被破坏,且分期增筑界线很清楚,不见任何与城门遗址有关的遗址现象。发掘说明北城门原本不存在,三国新城只设有三个城门。

在西城门遗址北侧约10米处,考古专家发现处长32米、宽20米夯土台,台面高出城区地平面60~80厘米。夯土台除西边与城墙相连处未遭破坏外,另三面都被后期挖掘破坏。考古专家除在夯土中发现少量的碎砖瓦外,没有见到其他遗物和遗迹。有关专家推论,夯土台不是建房的台基,应该是供练兵用的指挥台。

在位于城区内东北角附近的耕土层下,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约50平方米的红烧土,红烧土呈葫芦状。土中含有不少铁渣、木炭和炉灰,并有散落的铁箭头。在红烧土的周围分布着两个圆形和一个长方形的坑,另有一条水沟,每个坑底部都有5~6厘米厚



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东侧门外礮石坑

的淤泥土,于其中出土了300多枚铁镞。据推测,此处遗址应是当时用于炼炉铸造兵器的作坊遗址。不过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窑址,该处遗址不具备作为窑床的一些条件,没有发现窑底面和窑壁,且没有发现一块炉壁和模具。

东西城门间的道路是夯筑的路基,土色灰白,内含较多白灰颗粒,应是为增加路面硬度掺和的白石灰粉,土质坚硬。路面存宽4.5米。路面上东西向平行分布有4条车辙印,辙印呈弧形内凹,两壁光滑,硬度较高,车辙印间距90~110厘米。

**重要发现** 三国新城遗址出土遗物中以瓦片数量最多,其次为铁镞和陶器,再为礮石、铜镞及铁撞车头,此外还有铁斧、夯、刀、锛以及砺石和青灰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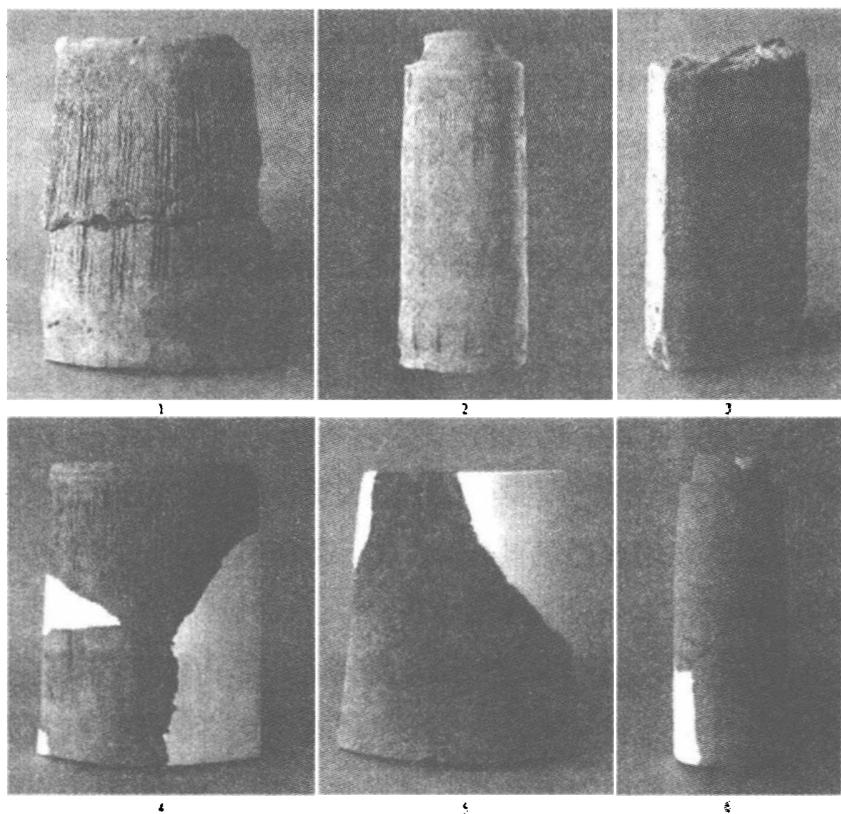
陶瓷器按用途可分为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建筑材料主要有瓦和砖。板瓦以泥质灰陶为主,均为梯形板状带外弧;外面多饰绳纹,部分饰篮纹,少数素面,内面有麻布纹;模制,制作比较粗糙,多数有切割、刮削和压印痕迹。有三种大小。筒瓦多为泥质红陶,器形比较规整,呈半圆筒形,一般上端筒径略小于下端筒径;模制,烧制火候较高,敲击声音清脆;器表均饰绳纹,内面饰麻布纹。砖出土较少,均为青灰砖,分楔形和长方形两种。楔形砖均垫于柱洞底部作柱础用。砖的一端模印有纹饰,常见纹饰有几何纹、花草纹和半圆重环纹。

生活用品以泥灰陶为主,有少数夹细砂;器表以素面居多,其余施纹饰,常见纹饰有绳纹、弦纹、方格纹和水波纹等;均轮制。器形有盆、罐、钵、碗、盏、缸、澄滤器、盘、锅及盂等。

铁器出土时均腐蚀严重,有些器物如刀、锛等只能识其器而不能复原;器形有镞、撞车头、矛、斧和夯等。

铜器共出土14件,有镞、凿等。

石器有礮石和砺石。礮石多为青灰石,近圆形,绝大多数打凿不规整,表面凹凸不平,有片状棱角。砺石有青灰石和砂石两种,多数不规整。



1、4、5：板瓦；2、6：筒瓦；3：青灰砖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记载：“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从新城的布局看，新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四面城垣均不在一条直线上，而且多处出现外弧现象，这与省内已发现的两汉三国时期的古城址均不相同，尤其是整座城只有3座城门、南北两侧不设城门的做法更是特别。但若作为军事城堡，这样则能达到易守难攻的目的。另外在城内发现的夯土台基、铸造作坊遗址、空旷场地和车道等，均与军事城堡有关。600多平方米的夯土台，没有任何建筑，可能用于军事指挥。在铸造作坊处只出土铁、铜镞等，这种专造兵器的作坊在一般城市中不常见。虽然这座城总面积只有8万多平方米，但城内设有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的空旷场地（这只是已发掘部分面积），可能是练兵场。城内虽然发现几处房址，但面积都不是很大，而且在每个单元中都设有烧煮食物的灶。出土遗物中，除建筑材料和日常生活用品



外,最多的为兵器。铁镞和礮石在城内地层中随处可见,而且数量很多,达2000多件,因此,这批出土遗物应与“屯兵于此”的史实相吻合。故而,三国新城遗址的用途应与军事有关,它曾是一座军事城堡。

### 3. 运河考古的首次大发现——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征伐不断,为保证军事行动所需之大量粮草的运输,在水运尚占有主导地位的年代,沟通南北水运、开凿运河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便于当政者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时,也有着追随帝都的属性。

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完善、不断扩大的上千年的过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统一中国后,人民在安定的社会条件下从事生产,经济逐渐恢复。隋文帝于584年命宇文恺率众重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千米,名广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但是,大规模的修造,还是在隋炀帝杨广登基以后。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通济渠分东西两段: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洛河和谷水入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引黄河后,循汴水(原淮河支流),经商丘、宿县、泗县入淮河。同年又改造邗沟。6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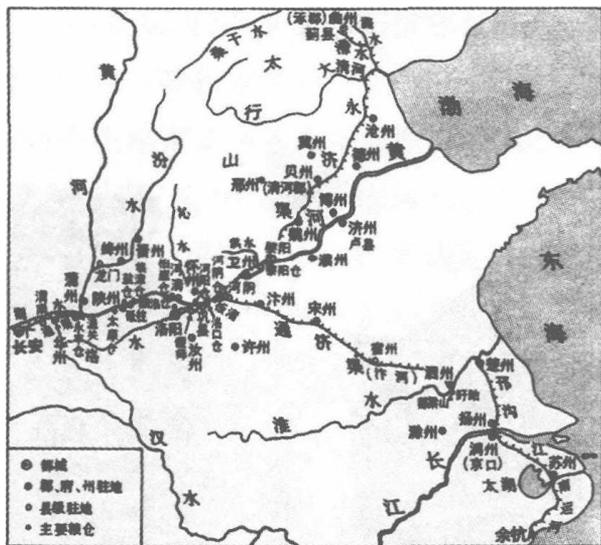
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永济渠利用沁河、淇水、卫河水源,引水通航至天津,继溯永定河通涿郡(今北京)。610年继开江南运河。开通镇江至杭州段,长400千米。这样,从首都洛阳到江都、到浙江杭州的全长1700千米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畅行无阻。

至此,以首都洛阳为中心,以通济渠、永济渠为“人”字状两大撇捺延伸,并通过邗沟和江南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主航道全长2700千米,沟通中国南北和东部、中部的的水运大动脉已经形成。

柳孜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边上的一个镇,它因运河的开通而繁荣了500年,成为运河岸边的军事与商旅重镇。通济渠从黄河至洪泽湖入淮,是隋朝开凿的大运河的其中一段,由黄河过开封后折向东南,经河南永城后进入安徽的柳孜、国桥等城镇,再从由洪泽湖入淮河,新开河道400千米,南宋时淤塞废弃。通济渠(唐宋时称汴河)流经淮北市濉溪县境内的长度有40余千米。

**发掘经过** 1999年春,在拓宽宿州至永城公路柳孜段的施工中,发现大量陶瓷器。同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市、县成立联合考古队进行发掘,在深6米的河道内发现唐代大型木质沉船8艘、运河岸边石构建筑基址1处,出土各种瓷器1000多件。

此次考古挖掘被确定为1999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柳孜码头也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精品进入了淮北市博物馆,陈列在一个专门的分馆里。类似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的考古挖掘于2007年在安徽省宿州市也有过两次,运河遗址的考古也逐渐引起考古界的关注。

**遗址情况 石构建筑** 石构建筑打破唐—五代地层。石构建筑的顶部平面已被严重破坏,其四周东西长14.3米,南北宽9米,北立面存高5.05米,顺河道方向而建,方向36度。石砌建筑依南堤而建,为长方形立体建筑,沿河道南堤挖一个向水面延伸略带斜坡状的大于石砌体的坑,在石砌体建成后,将坑壁与石壁间空隙填实,空隙大的地方加夯。石构建筑遗迹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沉船** 在900余平方米范围内发现8艘沉船,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这是我国运河考古的重大发现。8艘分别位于东、西两个发掘点,其中东侧发掘点有5艘,西侧发掘点有3艘,均埋藏在大运河南侧河底,顺河道方向沉没,头西尾东,少数例外。沉船分布比较密集,有互相挤靠、叠压现象,船体沉没前均遭受过损坏或严重损坏,船板木质有一定程度的腐朽、炭化。

1号沉船位于东部发掘点南侧中部,河道南岸边河底,石构建筑物



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吊装古船

西南角。沉船顺河道方向头西尾东，船体为木板结构，平面呈长方形，船身存长 9.6 米，包括拖舵共存残长 12.6 米。船头和前舷板，舷顶纵桁板缺损不存，右舷板和舷顶纵桁散落在船的右侧，船的底板、后舱、拖舵保存较好。现存船体由两段木材板拼接而成，拼接处木板为两层斜面叠接，用双排铁铆钉固定，缝隙间填有油灰。船板拼对之间使用叠接法，内底及内壁均有肋骨加固。底板厚 6~7 厘米，由四块板组成，板宽分别为 40 厘米、30 厘米、38 厘米、52 厘米。船底与壁板弧形对接。舷板厚 5~7 厘米，由两块板组成，板宽分别为 20 厘米，舷板纵桁较窄，宽 14 厘米，厚 6 厘米，船体保存部分宽 180 厘米，舱内存深 41 厘米。拖舵形制特别，像个大扫把拖在船的后面，尾舱横梁上有三档舵杆限位木桩可调节船的航向。拖舵长 430 厘米，由三叶三角形木板拼接而成，上叶最宽 45 厘米、长 260 厘米，下叶最宽 54 厘米、长 230 厘米，叶板均厚 5 厘米左右。中间为舵杆，前端圆形直径 8.5 厘米，头部有一个 8 厘米×5 厘米方形通孔以装柄。舵杆尾端扁平为舵的中叶，厚 8 厘米，最宽处 25 厘米。舵尾部最宽处达 124 厘米。

2 号沉船位于东侧发掘点中部北侧，船体东端被石构建筑叠压，南距 1 号船约 4 厘米左右。2 号沉船是一艘独木舟，是用一棵硕大的原木整体雕凿而成。2 号沉船出土时头西尾东顺河道方向沉没，船口向北倾斜，船体保存较完整，附件均损毁不存，长 10.6 米。船体两头窄，中间宽，近尾部舱宽 122 厘米，头宽 52 厘米，尾宽 80 厘米，舱内腔深 70 厘米。船体呈大半个圆弧形，舷板厚 6~7 厘米，头和尾的底部上收，面部稍上翘。船头为实体，有两个 10 厘米×15 厘米插装方木立桩的通眼，船头前缘还有两排 5 个小方孔，其中也有的为通眼。尾部有装舵或桨的竖形凹槽孔，凹槽长 89 厘米、宽 43 厘米、深 13 厘米。在船口部有三种不同的槽孔，一种为“凹”字形，在沿面中间向下凿长 10~15 厘米、深 4~6 厘米不等共 3 处，相互间距离 3 米左右；再一种为曲尺形，在沿面内侧凿去 1/2，长 5~6 厘米、深 3 厘米，共 9 处，相互间距离 40~130 厘米不等；另一种为牛鼻形，在沿面开口向外壁贯穿，孔上大下小，上口宽 2 厘

米、长4厘米,下口宽2厘米、长6厘米,共5处,相互间距40~110厘米不等。这三种槽孔均为两侧船口对称分布。船尾中间加板帮衬,采用叠接法用双排铁铆钉固定。在船头的左侧壁与尾舱的两侧有修补现象,修补是用木板从外贴上加铆钉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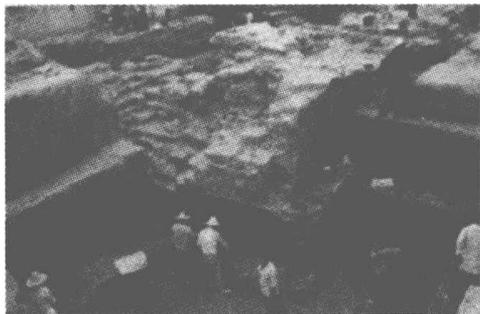
3号沉船在2号沉船东端南侧,船体被石构建筑砌体叠压,船的两头与2号沉船南侧壁板有挤叠,其位置略高于2号沉船。3号沉船是一艘破损严重的独木舟,船口朝上,船体东西向顺河道埋藏,其周围还有残破船板挤叠现象。该船是取2号沉船拆石构建筑砌体时发现,已暴露部分约3米,其余部分仍叠埋在石砌体下,未进行发掘。船体呈半个圆弧形,直径65厘米,舱内腔存深30厘米,壁板厚5.5厘米。

4号沉船位于东侧发掘点南侧,在1号沉船北侧东端,船体为木板结构,头西尾东顺河道方向沉没。其船头与1号船后舱壁板相挤靠,船体东临近石砌体壁下,未能全部发掘出土。头宽128厘米,底板厚12~13.5厘米。头的底部上收,面部有两个方形通眼,头与体相接处为上下叠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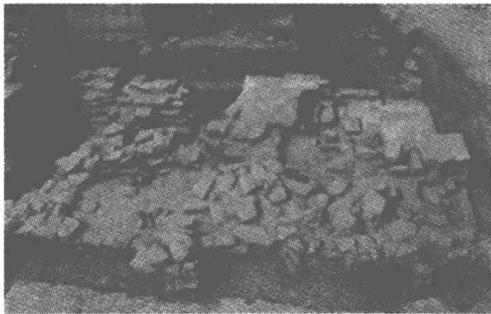
5号沉船位于东侧发掘点西侧。船体为木板结构,船口朝上,南北向沉没埋藏。船口宽180~190厘米,舱内腔深60厘米,舱内有肋骨结构。

6~8号沉船均位于西侧发掘点,船体在沉没前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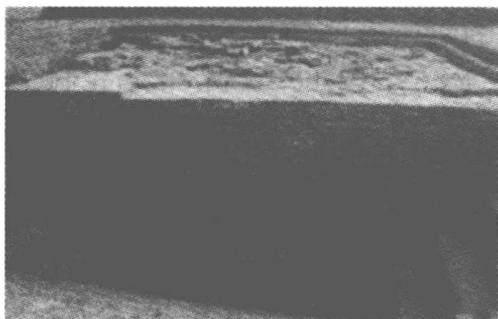
这批沉船为研究运河的漕运,船的年代、种类、用途以及造船技术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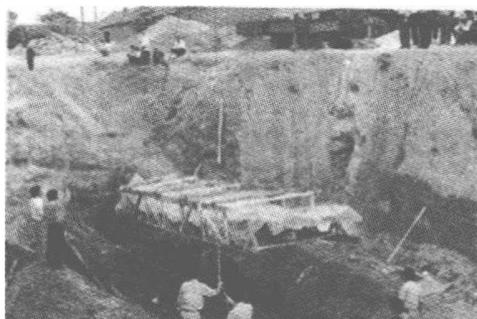
石构建筑发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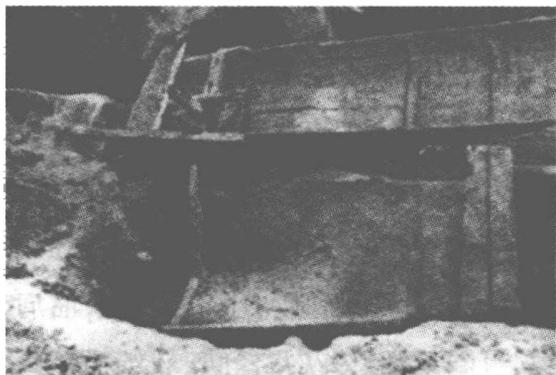
石构建筑顶部



石构建筑北立面



1号沉船包装吊装现场



4号沉船头部



6号残存船体

**重要发现** 柳孜大运河遗址出土有瓷器、陶器、石器、骨器、铁器等文化遗物。其中以瓷器数量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瓷器器形有碗、钵、盘、盏、盆、罐、壶、瓶、坛、灯等。瓷器釉色有黄釉、青釉、白釉、酱釉、黑釉、彩釉、外酱内白釉、白地黑花、影青等,多数釉色深浅不一。其中黄釉最多,次为青釉、白釉、酱釉、黑釉等。釉质也不一,黄釉绝大部分显粗,釉层显厚且厚薄不均,有积釉和垂泪现象。青釉、白釉、黑釉等一般釉质较细,釉层也较薄。施釉方法为蘸釉,多数施釉不到底,也有少数施满釉的。多数瓷器釉下施一层化妆土,胎釉结合较牢,极少数有脱釉和飞釉的现象。器表多素面,极少数有点彩、彩斑、三彩、窑变釉斑、模印贴花或贴花彩斑,有的外表出筋呈银线纹或金线纹,还有少数模印花纹、刻画花纹、白地黑花等饰纹。在少数器物上用文字装饰,如题一首诗、记下使用单位的名字等。

瓷器的胎土大多没有经过筛滤,特别是黄釉等为夹砂瓷胎,器壁粗厚,吸水性强,火候也较低。胎色不一致。瓷器的制作方法多为轮制,极少数为轮制与手制相结合。烧制方法是多数采用支钉或垫饼叠装露火烧制,少数为匣钵烧制。

**茶叶末釉双系罐:**敛口,口沿下竖装坠式双系,鼓腹,小平底。胎体灰中泛黄,较细。褐棕色釉,釉色匀净,较光润,内外均施釉,不及底。

**三彩三足炉:**圆唇,侈口,卷沿,球腹,圆底,三兽足。白灰胎,细腻。施黄、绿、白三色彩釉,釉面无光泽,厚薄不均,有流釉现象。彩釉分上下四组,口沿为黄色,肩部为绿、黄、白三彩色,用彩釉画出莲瓣形,上腹为白色,下腹及足部为黄色,施釉不及底。腹饰两组凹弦纹。

**执壶:**喇叭口,口沿外卷,短颈,颈部饰对称的片状双系,肩部有流,口沿下至肩部装片状柄,腹中部圆鼓,饼足,底微凹。棕褐色酱釉,釉较有光泽,口、肩部釉蓝灰色,器内半釉,器外施釉至下腹。

**白黑釉墨书“仁和馆”款四系瓶:**金代。圆肿唇,小口,束颈,溜肩,颈肩部竖装片状四系,橄榄形长腹,直圈足,胎体灰褐泛黄,较细而坚致,釉色白灰泛黄,光亮,器内施白釉,下腹施黑褐色釉,底足无釉。肩部用棕褐色彩书写“仁和馆”铭文。



茶叶末釉双系罐



三彩三足炉



执壶



白黑釉墨书“仁和馆”款四系瓶

柳孜大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年代自隋至宋,代表了运河的开挖、使用的年代至运河废弃的年代之间的瓷器特征。经初步鉴定,能确认窑口的有安徽的淮南寿州窑(隋—唐)、萧县白土窑(唐—金)、淮北新发现的南宋时期的烈山窑、宣州芜湖县东门渡窑(唐),浙江的越窑(唐、五代、北宋初),江西的吉州窑、景德镇窑,福建建阳建窑,湖南长沙窑,河南鹤壁窑、巩县窑、钧窑,陕西耀州窑,河北磁州窑、定窑等。柳孜大运河遗址出土了隋、唐、宋时期全国南北方 20 多个著名窑口的瓷器,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它为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史,制瓷业的生产、运输以及外销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柳孜运河码头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大运河遗址的首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解决了通济渠流经地点和路线这一历史悬案。出土沉船、石码头和大量陶瓷器物对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通济渠上“公家漕运、私家商旅、舳舻相继”。这一发现为当时的漕运制度、水利交通史、造船技术、陶瓷生产、商贸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其考古工作一直属于空白,这次发掘弥补了历史上的一大空白。

#### 4. 唐代名窑——寿州窑遗址

瓷器是一种由瓷石、高岭土等组成,外表施有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型要在窑内经过高温(约 $1280^{\circ}\text{C}$ ~ $1400^{\circ}\text{C}$ )烧制,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大约在商代中期,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即原始瓷。因为瓷器具有不透水、外形美观、成本低廉等优点,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也渐渐成为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逐渐取代陶器、漆器。

瓷器在唐代使用非常普及,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也较前代有改进。茶具、餐具、文具、乐器等各种日常器皿使用的都是瓷器。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六大名窑。

**邢窑** 位于唐代的邢州(今河北邢台),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邢窑的瓷器胎体较薄,玉璧底,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轻巧精美,器壁扣之音脆。邢窑生产能力强,数量多,除为宫廷使用外,还畅销各地,为天下通用。唐代邢窑白瓷作为传世品尚未见到,但作为出土文物,在全国各地唐代遗址中却发现不少。发掘出土的邢窑瓷器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

**婺州窑** 位于浙江金华地区,在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衢县、江山等地都有遗址。唐代属婺州,故名婺州窑。婺州窑始烧于汉代,盛行于唐宋时期,结束于元代。瓷器以青瓷为主,还烧制黑色瓷、褐色瓷、花釉瓷、乳浊釉瓷和彩绘瓷。婺州窑青瓷使用白色化妆土,釉层滋润柔和,釉色青黄带灰或泛紫。唐代时创烧乳浊釉瓷,釉中有星星点点的奶白色,也出现在釉层开裂处,这是婺州青瓷最独特之处。婺州窑的历代制品均属一般民间用瓷,主要生产盘口壶、罐、碗、盆、碟、水盂、盏托、瓶等日用器皿。婺州窑瓷器装饰简朴,均为刻画花纹,风格文雅大方。

**寿州窑** 窑址在安徽淮南市上窑镇、观家岗、余家沟、外窑等地。唐代属寿州,故名寿州窑。寿州窑始烧于隋代,繁盛于初唐和中唐,衰亡于

唐末。寿州窑主要产品有碗、盏、杯、钵、注子、枕、玩具等。寿州窑早期瓷器胎质较细，吸水率低，多着淡青灰色釉、青釉，釉层薄而透明，腹下部及底足不施釉。盛期瓷器釉色以氧化焰烧成，有蜡黄、鳝鱼黄、黄绿釉等。釉下施泥质胎衣，釉层呈玻璃状。

**洪州窑** 窑址在距南昌南郊 30 公里的江西丰城市境内。唐代属洪州，故称洪州窑。洪州窑始烧于东汉晚期，繁盛于初唐和中唐，终于五代。洪州窑主要烧制青瓷，釉色较淡，青中泛黄。还有黄褐釉瓷和青绿釉瓷，釉汁均匀光润，色泽稳定纯正。洪州窑瓷器造型朴素大方，制作精良，品形品种繁多。器类有罐、壶、钵、盆、盘、碗、盏、碟、杯、砚等日常生活用具。有些器形具有仿金银器的风格。图案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镂空等技法；纹饰以莲瓣、梅花、蔷薇、牡丹、柏树、宝相花、水波纹居多。产品达到了当时瓷业的较高水平，运销京师及中原地区。

**岳州窑** 位于湖南湘阴城关及县内的其他地区，人称湘阴窑，而湘阴在唐时属岳州辖地，所以唐代称为岳州窑。岳州窑始烧于东汉，一直延续到唐代。岳州窑瓷胎在唐、五代时较为轻薄，胎色早期呈红色或米黄色，晚期为灰白色。釉色以青绿色为主，也有青黄色。釉面有不规则的细小冰裂纹，玻璃质感强，但有流釉现象。器物种类繁多，有碗、盘、瓶、高足盘、四系罐、八棱短流壶等。碗的足以圆饼形和玉璧形为主，高足盘、八棱短流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器物纹饰以印花为主，并配以刻花。器物肩、腹部通常装饰着由团花和卷叶纹组成的带状纹饰。

**鼎州窑** 至今尚未发现确切位置，文献记载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内。鼎州窑主要烧制青瓷，釉色碧绿光洁。产品适宜作为茶具，可以增益茶色。

**发现经过** 寿州窑在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可知其分布于唐时寿州，但窑址的具体位置不明。1960 年，安徽省淮南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淮南市上窑镇和洞山等地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在淮南市上窑镇的管家咀、马家岗、余家沟和洞山地区的三座窑、徐家圩等地发现窑址。于此之后又陆续在李嘴子、费郢子及泉山等地发现唐代窑址。尤其以上窑镇最

为集中,从马家岗到余家沟、外窑、沿窑河两岸一带形成长达2千米的大窑场。1979年安徽省考古所在泉山发掘了一座属寿州窑的龙窑基,出土了大量的匣钵和一些釉陶片。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古工作,对寿州窑的情况终于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窑址情况** 临泉寺瓷窑址:位于凤阳县武店区临泉寺东南的山坡上,于1983年12月发现。窑址的堆积层较薄,瓷片和窑具标本甚少。瓷器主要有盏、钵、豆和盘等,窑具有圆形多足支托、三岔支托等。

上刘庄瓷窑址:位于凤阳县观塘乡上刘庄东郊、小沟渠西岸,发现于1983年12月。器形主要有钵、钵、罐和盘口壶等,窑具有圆形多足支托、三岔支托等。

管家咀瓷窑址:位于上窑镇南,发现于1960年2月,后又进行过六次田野调查。此处窑址历经湖水的冲袭和农耕的翻土,后又因为在窑址的中心开挖水渠,故窑址破坏严重,采集的标本极少。器形有罐、盘口壶、高柄豆、矮柄豆、高足杯和钵等,窑具有三岔支托和四岔支托等。

大刘庄瓷窑址:位于凤阳县观塘乡大刘庄的东部,发现于1983年12月。器形有罐、钵、钵、壶和杯等,窑具有三岔支托等。

余家沟瓷窑址:位于上窑镇北窑河东岸,发现于1960年2月,后又进行过三次田野调查。器形有罐、钵、盏、注子、瓶、钵、枕、碾轮等,窑具有匣钵、支棒、托钵、三岔支托和支钉等。

上窑镇瓷窑址:位于镇南郊约0.5千米的高塘湖的东岸,发现于1960年2月,后又进行过四次调查。器形有罐、钵、盏、碾轮、多足砚等,窑具有匣钵、支棒、三角支托、三岔支托等。

外窑村瓷窑址:位于上窑镇北约2千米处,窑河的东岸,发现于1960年2月,后又进行过两次田野调查。器形有罐、钵、钵、碾轮、注子、柱础等,窑具有匣钵、支钉等。

马家岗瓷窑址:位于上窑镇南约1千米处高塘湖的东岸,窑址全部被破坏。

泉山瓷窑址:位于泉山西区铁路南和公路两处,面积约1500~2000

平方米。于1960年2月发现,后经四次调查,为寿州窑保存较好的两处窑址。1979年2月,配合基建工程,在铁路南发掘一座残窑址,仅存部分窑门、火膛、火道和窑室。残长7.2米、宽2.7米,门向为北偏东36度。壁厚34厘米,用耐火土做成的土坯(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7厘米)砌成,拱券顶,窑室地面用方砖(长20厘米、宽18厘米、厚4厘米)铺墁,火道两侧的门垛临时堵砌,厚约34厘米,外侧平滑,内侧为弧形。火膛底部的火槽被两条火埂分为三份。火槽内留有较厚的木炭灰、扁圆形的支钉和碗坯等。火道内侧的铺地砖上,发现“开元通宝”铜钱一枚,背面有“鄂”字符号。

**三座窑瓷窑址:**位于淮南市洞山北区铁路北与公路南的中间地带,发现于1960年2月,后经两次田野调查。地面瓷片和残窑具标本较少。现因新建铁路,窑址被推平。

**重要发现** 寿州窑始烧于隋代,繁盛于初唐和中唐,衰亡于唐末。寿州窑位于淮河南岸,背依上窑山区,面临窑河、高塘湖,这一良好的地理位置,是寿州窑建窑及发展的基础。寿州窑所需的原料,包括瓷土、釉料、化妆土、燃料等均为当地所产。淮南市上窑镇附近丘陵地带蕴藏着丰富的瓷土矿,釉料则采用山上、河中的“山釉”、“河釉”制造,化妆土的原料亦是当地生产的“焦宝石”。这也为寿州窑的大量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来源。

寿州窑的产品在早期以烧造青釉瓷器为主,唐代改烧黄釉瓷。唐代寿州窑虽然以烧黄釉为主,但到了唐代中晚期也兼烧黑釉和少量绛红釉。

早期由于釉层的薄厚不均、烧造技术的不稳定、窑膛气温不均匀等原因,青釉的色调呈现为青灰、青黄和青褐等。到了隋代由于烧造技术的提高,窑温控制适中,釉色比较匀净,呈青色。

唐代寿州窑技术上也有创新。精致的产品需装在匣钵中再入窑烧造,从而避免了窑中高温烟火对胎釉的直接熏染,使釉色纯净光亮,提高了产品质量。产品釉色呈现出黄、蜡黄、鳝鱼黄、黄绿、黄褐等不同几种,

往往在器物转角积釉较厚的部位,呈现翠青色的窑变釉。

寿州窑瓷器的胎体总的来说胎坯较厚重,质粗,坚硬,少有光泽,击之清脆有声,吸水率低,耐火度为1200℃。但早期青釉产品的胎体比唐代中晚期的黄釉、黑釉产品的胎体要细。中晚期黄釉和黑釉器的瓷胎显得粗涩,呈淡红或黄红色,胎泥一般未经淘洗,含有少量的白色或铁黑色砂粒,形成大小不等的气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匠师们在器物的胎胚上先施一层瓷衣(一种质地白腻的白色瓷土),即化妆土,再在瓷衣上施釉料,使表面光洁,增加了器物的美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寿州窑是较早使用化妆土的窑口。

唐代寿州窑主要器形有碗、盏、杯、钵、盂、盆、注子、枕、四系壶、小口罐、玩具和琉璃瓦等十几个品种,基本上满足了当时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器多为平底,有的底心微凹。碗、盏、壶一类器足的边棱用刀削去。钵类器物,体形较高,敛口圆唇,腹壁微曲。注壶为唐代流行式样,喇叭形口,圆唇、长颈,壶柄为带形曲柄,壶嘴为多棱形短嘴或圆柱形短嘴,平底。枕类器物为长方形,平底,棱角作圆形或方形。壶多为浅盘口,颈、肩部常饰有凸弦。壶、罐往往都有系,壶有四系、六系,罐有四系、八系。碗、盏为平足,敞口直唇。

寿州窑瓷器的装饰手法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早期寿州窑瓷器仅在瓶、罐和壶上加以装饰,装饰方法主要有划花、印花、贴花和绳纹四种。划花有单弦纹、复弦纹、弧纹、波浪纹及莲瓣纹等。贴花有卷草纹。绳纹是制作成绳子形状的泥条,当胎坯还未干时,用泥浆水贴在器物面上,组成各式纹样。一种器物也往往兼用几种装饰,组成带状或团花状图案。唐代寿州窑的纹饰除保留早期的装饰方法外,又增加了几何纹、叶纹、云龙纹、鸟兽纹、云气纹,附加凸弦纹、凹弦纹,还有少量的漏花纹等。

在安徽省境内发现不少寿州窑生产的瓷器,产品分布在广大地区。比较典型的产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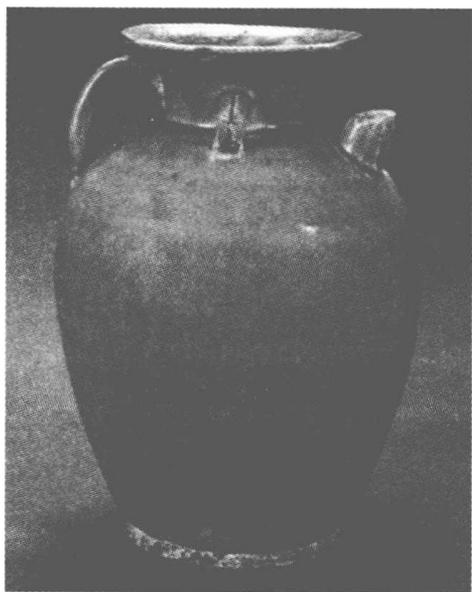
寿州窑黄釉注子:1959年安徽泗县出土。高23.2厘米、口径10.4

厘米、足径9.6厘米。圆鼓腹，造型简洁流畅，釉面均匀光滑。注子是唐代较为流行的酒具。寿州窑黄釉注子除造型工整、制作精美外，其最具特色的是纯正蜡黄的釉色，且釉面光滑匀净。这是由于使用了化妆土补胚法，因此寿州窑的黄釉产品在唐代的瓷器中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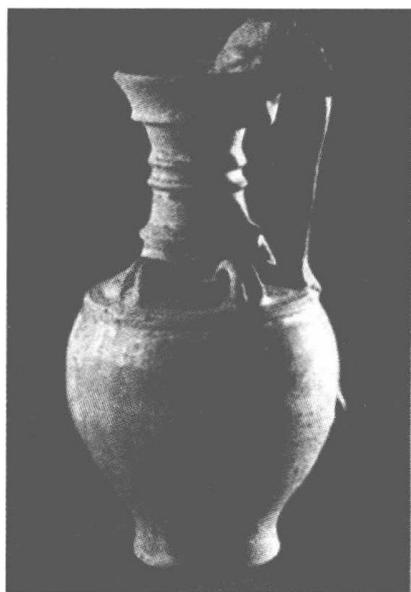
**寿州窑青瓷龙柄壶：**隋代造，通高32.2厘米、腹径11.4厘米，1974年安徽省长丰县孙庙乡出土。胎色灰白，胎质厚而坚。青釉，积釉处呈绿色，下腹有蜡泪痕，局部脱釉。肩上有四系。龙形柄，龙张嘴衔住壶口。颈部和肩上均饰凸弦纹。

**寿州窑黑釉双系罐：**现藏于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通高16.2厘米、口径8.8厘米、腹径12.6厘米、底径8.1厘米。喇叭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平底外撇。肩部饰对称的两系。外施黑釉至下腹部，底部露胎处胎质坚硬。釉面光亮，造型工整、秀丽，为唐代寿州窑典型的黑釉产品。

**寿州窑青釉坛：**现藏于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通高22.4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13厘米。敛口双唇，束颈，溜肩，圆鼓腹，平底微内凹。肩部竖装对称双系，肩部以下饰网格状拍印纹。内施釉至口沿处，外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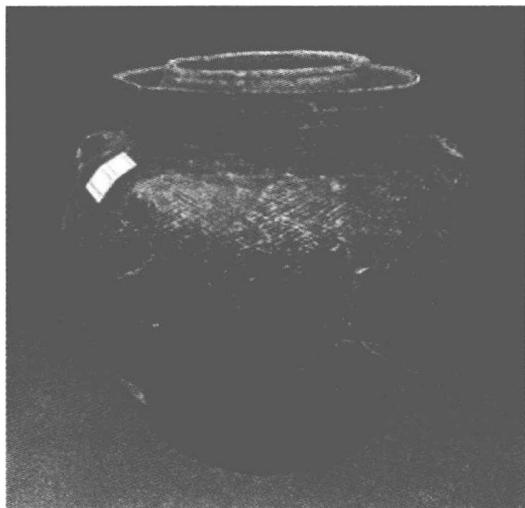
寿州窑黄釉注子



寿州窑青瓷龙柄壶

青釉至腹中部。有积釉、流釉现象。

寿州窑产品通过窑河、高塘湖转运淮河，畅销整个淮河流域。考古材料证实，在皖、苏、豫广大地区均有寿州窑黄釉瓷器出土，甚至隋唐时期最繁华的商业都市、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扬州，也大量出土寿州窑黄釉瓷器。寿州窑作为隋唐时期的民间瓷窑之一，在 300 多年间，在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物质生活的需要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唐代名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寿州窑青釉坛

## 六、宋元明时期考古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市东北)发动兵变,轻易地夺取后周政权,定国号为宋,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虽然封建经济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力量较弱。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南宋灭亡。两宋王朝都曾在安徽地区进行行政设置。北宋时期,江淮地区属淮南道,江南地区为江南东、西道。南宋时期,在其疆域淮河以南地区先后设置51个县、2监。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由于元朝幅员辽阔,除河北、山东、山西这些腹里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元朝在地方设置10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安徽地区属于江浙行中书省,淮北地区设16县,涉及2路的7州。

元朝末年,各族人民由于不堪元朝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全国上下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反抗元朝的统治。1368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明朝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安徽地区在明代直属南京政府,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废除江南行省,建立南京,所属府、直隶州由中书省直接管理,作为京畿直辖区。

安徽两宋墓葬在全省都有发现,经过发掘且有正式报道的有200座以上。出土地点以江淮之间最为集中,包括合肥、肥西、全椒、无为、来安、舒城、定远、怀宁、六安、霍邱、望江、宿松、太湖、安庆、霍山、潜山等市、县。淮河以北的濉溪、萧县、宿州、灵璧、五河、凤台等地以及江南的

芜湖、繁昌、黄山、歙县、休宁、郎溪等地也有发现。

安徽元明时期墓葬发掘数量不多，经过科学发掘且有正式报道的只有数十座，出土地点有安庆、合肥、蚌埠、歙县、六安等地。元代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和明代开国功臣汤和墓出土了不少精美的器物，是研究元明时期手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实物资料。

## 1. 包拯家族寻踪——合肥包拯家族墓

包拯(999~1062)，字希仁，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合肥)人。天圣五年(1027年)中进士。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

宋景祐四年(1037年)，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在任期间判决了许多陈年积案，获得了清官的好名声。任满后，升任端州(广东肇庆)知府。在这个端砚的故乡，包拯以身作则，从未收过一块端砚。任满后，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任监察御史，为言事官，主要负责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进行弹劾。皇祐二年至三年(1050~1051)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担任了谏官的职务，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任职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到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为开封府知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把一向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包拯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及时惩办无赖刁民。

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

包公去世以后，皇上感念他的功勋，使他的子女在朝为官，后又赐了

一位“恩生”，专门负责管理包公祠、包公墓和有关文物、文史资料，接待来访客人。恩生是世袭的，本人临终前，一定要按照立嫡、立长、立贤的原则确定好继承人。恩生一般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便于打扫包公祠。

包公墓旁有官府赐予的数亩祭田，免于征收赋税，由世袭的守冢户（恩客）耕种。守冢户平时管理墓地，禁止在此放牧牛、羊，游客来时供应茶水。清明时节，包公子孙前来扫墓，便供应午餐两桌，鸡、鸭、鱼、肉八大盘，另加白酒和挂面，以充当租课。这也给守冢户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北宋时期，每年春、秋二季，庐州府学的校长和合肥的县长都会率领师生前往祭扫包公墓。由于这项活动深受师生们的喜爱，便形成了一种惯例，经久不衰。即使经过元、明、清的多次改朝换代，这项活动也沿袭未改。

由于包拯的廉洁受到官府的重视和人们的拥护，包公墓大多受到了重要的保护。但在这几百年间，包公墓仍遭到几次破坏。1129年金兵占领庐州，所到之处对辽、宋贵族墓大肆发掘，摧毁他们的统治权威，掠夺墓中财宝。包公墓被金兵从上方掀开，墓中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南宋初，包拯墓为金兵破坏，棺木和墓志被移至西北30米远处。

不过，包公墓总的来说还是被历朝官府加以维修和保护。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淮南西路官员误将包拯夫人董氏墓当做包拯墓重新修葺，并修筑围墙，供人瞻仰。直至建国初期，整个墓群尚保持原貌。“文化大革命”时期，因邻近的合肥钢铁厂扩建厂房，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发掘。

**发掘经过** 1973年的春天，合肥二钢拟在安徽省合肥市大兴集建石灰窑，便于《安徽日报》上登出了一则通知，限时迁走已有974年历史的宋包孝肃公（包拯）墓，逾期将按无主坟墓处理。当时中国的国情是重经济发展，对于文物的保护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只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准备对包拯墓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当时专业的考古人员较少,只能应急地从省博物馆、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合钢二厂以及包拯后裔中抽了十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整个发掘时间为1973年4月11日至8月11日,省、市文博部门联合对包拯家族墓进行了抢救性田野考古发掘,共发掘了12座墓葬,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文物资料,并有发掘报告发表。

在整个发掘期间,难题接踵而至:据史料记载,包公是在病逝后的第二年从开封归葬在合肥市大兴集的。由于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为防止这些恶人对包拯焚尸碎骨而后快,当时包公的家人做了21口同样的棺材,从合肥当时的7座城门同时往外出殡,让人真假难辨,因而对包拯墓的具体位置并不清楚。

鉴于眼前的困难,发掘小组先是耗费了不少时间把整块墓地范围内各个大小墓的范围、深度等情况摸了个底,选择一个最小的墓来进行发掘以摸索经验,然后再扩大范围,发掘其他10余座大墓。此次发掘,揭露了包拯及家族墓葬情况。

**墓葬形制** 包拯家族墓地东西长64米、南北宽52米,北高南低,其间分布着10余座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封土,中间的一座封土高达5米左右,其余高2~3米不等。共清理发掘了12座墓,有4座出土墓志铭,墓主有确切文字可考,即包拯夫妇迁葬墓(M1)、其长子包缙夫妇墓(M7)、次子包绶夫妇墓(M5)及包拯孙包永年墓(M4)。另据推测,M8为包拯原葬墓,M6为董氏原葬墓,其余6座即M2、M3、M9~M12墓主已不可考。

包拯家族墓在布局上是有一定规律的,包拯原葬墓(M8)及其妻董氏原葬墓(M6)位于中轴线的北部,其余墓地居其东南和西北分布。东南处有6座,自西向东,居北的一排为其次子包绶夫妇墓(M5)和1座无名墓(M9),居南的一排为其长子包缙夫妇墓(M5)、其孙包永年墓(M4)以及2座无名墓(M2和M3)。西南处有4座,其北偏东为包拯迁葬墓(M1),其南自西向东为3座无名墓(M12、M11、M10)。

根据墓葬建筑材料和结构,包拯家族墓发掘的 12 座墓葬可分为石室墓和土坑墓两种形式。

石室墓的墓室用条石砌筑而成,包括包拯原葬墓(M8)、董氏原葬墓(M6)、包缙夫妇墓(M7)以及无名氏墓(M3)等 4 座。其中包拯原葬墓(M8)规模最大。

包拯原葬墓是一座平面近正方形、四周带斜坡墓道的石室墓。东西长 5 米、南北宽 4.8 米,墓底距地面深 4.16 米,墓道在墓室南部正中,长度 12 米。地表封土已不存。石室建在一个东西长 9.8 米、南北宽 8.7 米的近正方形、四周带斜坡的土坑中。因早年被盗毁严重,石室已不太完整,仅剩部分东西壁,墓顶结构已无法复原。东西两壁偏北处均残存 0.96 米的石墙一段,系用条石平砌而成,条石长 1.2 米、宽 0.3 米、厚 0.19 米。南壁基石尚存,北壁基石则不存,南壁设墓门,墓底不见铺地石,据研究是被盗走了。墓室南部正中砌筑一东西长 2.15 米、南北宽 1.3 米、高 0.33 米的正方形砖台。砖台北部东、西两侧残留两个石门座,均长 0.31 米、宽 0.25 米、高 0.17 米。门座上分别刻有一圆形或椭圆形门窝。门窝上还有断残的石门砧各一,石门已不见。墓道位于砖台的南面,其剖面呈上大下小的梯形。上口宽 5~9 米,底宽 2.85 米。墓底不见葬具和遗骨。随葬品仅见木雕男俑 1 件。

包拯原葬墓(M8)墓道南口紧接着董氏原葬墓,其墓葬形制为带一斜坡墓道用条石砌成的拱形石室墓,南北长 4.44 米、东西宽 4.4 米、高 3 米,墓道残存 2.4 米。整个墓室用条石砌成,以红砂石为主,少数青石,条石外表有当时开凿的细条形凹痕,墓底尚存部分铺地石板,砖台在墓室的西南角。该墓早年也曾被盗毁,墓室内遗物也被盗掘一空。墓道填土中出土有墓志盖的一角。

包缙夫妇墓亦为石室墓,是用条石砌成的具南、北两室的夫妇合葬墓。据随葬墓志铭,北室为包缙墓室,南室则为其妻崔氏墓室。北室较大,长 4.24 米、宽 1.84 米,其南壁与南室的北壁共用一墙,南室长 2.85 米、宽 1.1 米。两室均为红糙石砌墙,青石做盖板,墓底亦用条石平铺而



成,两室均尚存棺木碎片以及遗骨碎片,早年均被盗。北室残存1件漆果盆、3件陶器碎片和4枚铜钱。南室残存1枚北宋元丰通宝铜钱。另南室墙外立有崔氏墓志一盒。

无名墓 M3 为“工”字形石室墓,东西长4.3米、南北宽1米、高1.17米,墓顶以条石平铺,墓底用石板铺地。该墓不带墓道,早年也曾被盗,仅存几十块陶器碎片。据推测,墓主可能是包永年三个妻室中的一个。

包拯家族墓中,土坑墓有8座,包括包拯夫妇迁葬墓(M1),包拯次子包绶夫妇墓(M5),包拯孙包永年墓(M4)以及无名墓 M2、M9~M12,以包拯夫妇迁葬墓(M1)和包绶夫妇墓(M5)规模为大,其余规模较小,基本上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包拯夫妇迁葬墓(M1)东北距包拯原葬墓32米,地面有一底径约7米、高约3米的半球形封土堆。该墓为平面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长3.38米、宽2.12米,墓底至上口深2.3米。东西两壁略向内倾。坑内置一全长2.4米、北端宽0.76米、南端宽0.64米的楠木棺,大都腐朽,棺上6个铁环尚存,棺内残存头骨和肢骨的碎片。棺北端外为包拯墓志和董氏墓志各1盒,不见其他随葬品。

包绶夫妇墓,亦为竖穴土坑墓,平面近长方形,长3.42米、南宽1.68米、北宽1.5米,除南壁外,其他三壁均向内弧。地表有一底径约5米、高约2米的半球形封土。墓坑内置东、西两棺,根据出土的墓志铭推定,东棺是绶妻文氏之棺,西棺为包绶之棺。西棺较东棺要长,但不及东棺宽,两人的墓志置于各自棺南端外。该合葬墓随葬品尚存一些,西棺棺内出土影青瓷碗、香熏、黑瓷四系罐、砚台、铜印、铜镜各1件以及64枚铜钱等。东棺出土灰陶壶1件、水晶珠4件以及铜钱等。

包永年墓(M4)东与 M3 西壁紧连,西距包绶夫妇墓(M7)1.5米,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长3米、宽1.1米,与 M2、M3 共一封土堆,堆高约3米,葬具一木棺和遗骨部分尚存。棺外端置墓志一方。棺内随葬品有影青瓷钵、碗、黑瓷碗、铜镜各1件以及88枚铜钱。

M2 以及 M9~M12 等5座无名土坑墓规模较小,均为长方形竖穴土

坑墓。其中 M2 坑长 2.9 米、宽 1.3 米, M9 长 2.5 米、宽 1.1 米。M2 与 M3、M4 共一封土堆, M9 封土高约 2 米。M10 ~ M12 位于墓地西南侧南部, 自东至西相隔 6 米排列, 地面各有 1 封土堆。这几座墓棺木以及遗骨残存部分, 随葬品以 M2 较丰富, M11、M12 两墓不见随葬品, M10 仅发现一件灰陶坛, M9 仅存 1 枚铜



M8 墓葬形制

镜, M2 棺内随葬镶银口黑瓷碗 1 件、镶银口影青莲瓣形瓷盒 1 件、莲瓣形银盒 2 件、银饰 3 件、银厌胜钱 1 件、铜镜 1 件、水晶珠 9 件以及铜钱 125 枚等。

**重要发现 木雕男俑** 高 34.5 厘米, 包拯原葬墓出土。头部戴道冠状帽, 帽正面刻一“王”字, 帽顶部平坦, 正中有一圆形小洞。身穿方领外衣, 腰束宽带, 双手叠置胸前, 做持物状, 手中有一圆孔, 脚部稍残。据研究, 当为宋制二品以上官员死后随葬的十二时神之一。

**董氏墓志** 盖与铭均长 1.13 米、宽 0.85 米、厚 0.1 米。志盖中部阴刻篆书“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志铭 24 行, 满行 35 字, 共 773 字。

**包拯墓志** 志盖长 1.23 米、宽 1.22 米、厚 0.13 米, 四周有斜坡, 中部阴刻篆书“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16 字。志铭长 1.26 米、宽 1.25 米、厚 0.14 米, 刻文 51 行, 每行 59 ~ 63 字, 共约 3200 字。其较《宋史·包拯传》为详, 除叙述包拯生平事迹外, 还记录了他的世系、病丧以及埋葬地点。

**崔氏墓志** 出土时两面文字吻合并立于崔氏墓室西墙之外。志盖

长 1.25 米、宽 1.18 米、厚 0.16 米，阴刻篆书“宋节妇永嘉郡君崔氏墓志铭”12 字。志铭长 1.24 米、宽 1.26 米、厚 0.14 米，刻文 23 行，满行 30 字，共 653 字。

**包绶墓志** 两面文字相合直立于棺外南端。志盖长、宽各 98 厘米，厚 15 厘米。正方形。阴刻篆书“宋朝奉郎包公墓志铭”9 字。左右两边线雕姿态各异的 6 只仙鹤舞于云中，上下两边线雕缠枝牡丹，纹饰优美，刻工精细，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刻文 32 行，满行 50 字，共 1223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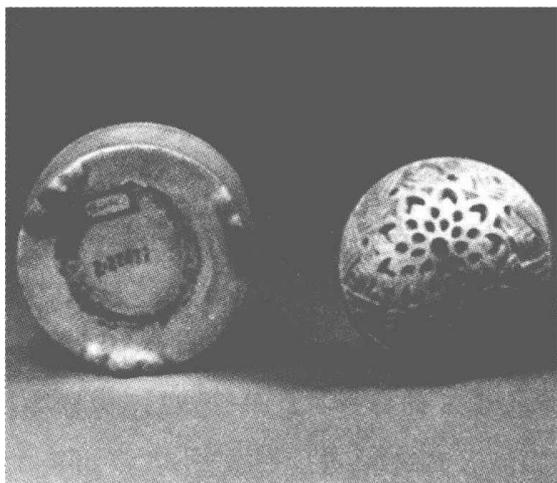
**影青瓷香薰** 通高 11 厘米、口径 11.4 厘米，包绶墓出土。盖部半球形，满镂花纹，布有高低起伏的山峰，山峰之间等距离地镂空两排共 16 个圆孔，盖顶为一菊花纹，花瓣之间也镂空。纹饰构图简练生动。底部高 5.6 厘米，口沿外周向上突起，平唇、直壁、平底、三矮足，底部有一圈烧制时留下的露胎痕迹，整个器物内外施釉，釉色青白莹润，质地细腻坚硬，釉面滋润光亮。

其家族墓中共出土了 8 件瓷器，其中有黑釉兔毫碗，黑釉四系罐、碗，影青瓷钵和包银影青莲瓣形瓷盒，另外还伴出有砚台、木桶等随葬品。

包拯家族墓的发掘对于我们了解北宋家族墓葬的布局等制度有重要价值。其中出土的包拯墓志、董氏墓志、包绶妻崔氏墓志、包绶墓志、



木雕男俑



景德镇窑影青瓷香薰

文氏墓志、包永年墓志志文共 7300 字，是我们研究宋史以及包拯家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这一家族墓地是从北宋仁宗嘉祐癸卯年埋葬包拯开始，接着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 年)葬董氏，哲宗绍圣二年(1095 年)葬崔氏，徽宗崇宁二年(1103 年)葬文氏，徽宗政和六年(1116 年)葬包绶，最后于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 年)葬包永年为止，长达 57 年，这是有墓志可考的十分确切的时间。其他规模较小的墓葬，根据墓葬结构及出土遗物特征来分析，这些小墓有的可能葬于宣和二年之前，有的可能葬于在此之后。因此这一墓地相对的延续时间应比 57 年长。

## 2. 北宋名门望族墓——合肥马绍庭夫妇墓

马绍庭，为北宋太师舒国公之孙、天圣年间合肥名臣马亮之子。马绍庭的妻子吕氏为北宋丞相吕蒙正的后代。

马亮(957 ~ 1031)字叔明，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中进士，有智略，在官场如鱼得水。

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后又改任芜湖县县令。任满后升迁为殿中丞、常州通判。为官期间，对百姓非常严厉，对于上级官吏善于应酬。后官至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工部尚书、太子少保。去世后，朝廷追赠尚书仆射，谥号“忠肃”。马亮家族是北宋合肥第一家族，可考为官的有十几位之多，与宰相辛仲甫、吕蒙正、吕夷简、王珪等都有姻亲。

**发掘经过** 1988 年 1 月 8 日，安徽合肥市 32 中两名同学向安徽省合肥市文物管理处提供了一个重要消息：合肥郊区域城南乡五里冲一村民在住宅后院挖鱼池时发现一座古墓。次日，合肥市文物管理处派人前往察看，并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这座古墓就是北宋马绍庭夫妇墓。

**墓葬形制** 马绍庭夫妇墓位于合肥郊区域城南乡五里冲，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 3.75 米、宽 2.1 米、底深 2.89 米。圹内并列

放置两口棺木，两棺间相距仅0.3米。棺板均为整块楠木所制。1号棺内的骨骼较长，骨骼粗壮，为成年男性。2号棺内骨架稍短，骨骼较细，为成年女性。葬式为头南足北仰身直肢葬。棺内底部铺垫5厘米厚的石灰，头部左右用大块石灰填实。

**重要发现** 马绍庭夫妇墓共出土漆器、瓷器、金银器、铜器等生活用品和文房用品共65件。除墓志和两件釉陶罐放置在棺木南端外，其余随葬器物均放置棺内。

墓志侧卧置两棺南端正前方，镌刻楷书4行38字：“政和戊戌三月甲申，宋太师舒国公孙马绍庭同妻大丞相文穆公孙吕氏墓，男滂沔注汲谨刻记。”墓志用来记录墓主人的生平、世系、卒年、墓地等有关情况，到了宋代无论从形制和内容上均成定格。但作为北宋名门望族的马、吕两家第三代马绍庭夫妻的墓志，无论形制还是内容竟如此简单、草率，这可能由于北宋末年政局不稳、时势混乱，草率入土安葬，或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新、旧党之争，马、吕家族衰败、破落所致。

1号棺内出土器物32件，除围棋子和一锭墨散置在头部左侧外，其余大部分集中放置在胸部和胯部。漆器共发现4件，奩、粉盒、镜盒、葫芦盒各1件。瓷器共发现7件，包括碗6件、盏1件。铜器有钵、方盒、印章、耳杯、盏托等。文房用具有砚台和墨。除此之外，还出土了一些木器和500多枚钱币。这些钱币最早的为唐开元通宝，最晚的为宋政和通宝。

歙州黄山张谷墨：据墓碑记载，该墨入土年代为宋徽宗“政和戊戌（1118年）三月甲申”。该墨在出土时碎为十余块，部分已坍为齏粉，后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胡继高先生修复。墨锭近似长方形，两端呈圭角形，正面中部有细线双道栏框，栏框两端呈圆弧形，栏框内残留阳文篆书铭文，字迹清晰可认的有“歙州黄山张谷”6字，下部字迹模糊不清。碎块拼对后，墨锭长25厘米，平均厚度1.4厘米，修复后重158.8克。墨质似为松烟墨。“歙州黄山张谷”墨为墨模制作，形体硕大。大墨制作时难度也大，工艺上稍有不当，墨锭极易开裂，故古代墨工“不喜

为厚大”，《墨法集要》中说“大墨最难搜和”，因此，这是一锭十分珍贵的难得的古墨。张谷其名，见录于《墨海》外辑卷二：“张孜、张处厚、张谷，黟川人。”黟川今属安徽黄山地区。《墨史》卷上载：“蔡君谟谓，世以歙州李廷珪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据此可知张谷为张遇之子。书中又载：“谷制墨得李氏（廷珪）之法，而世不多有。”歙州黄山张谷墨的出土，证实了《墨史》中张谷为“黟川人”的记载，而张谷墨又“世不多有”。该墨是首次发现的宋代有名款、尺寸最大的模制墨，故在墨史研究上有重要意义，被称为“稀世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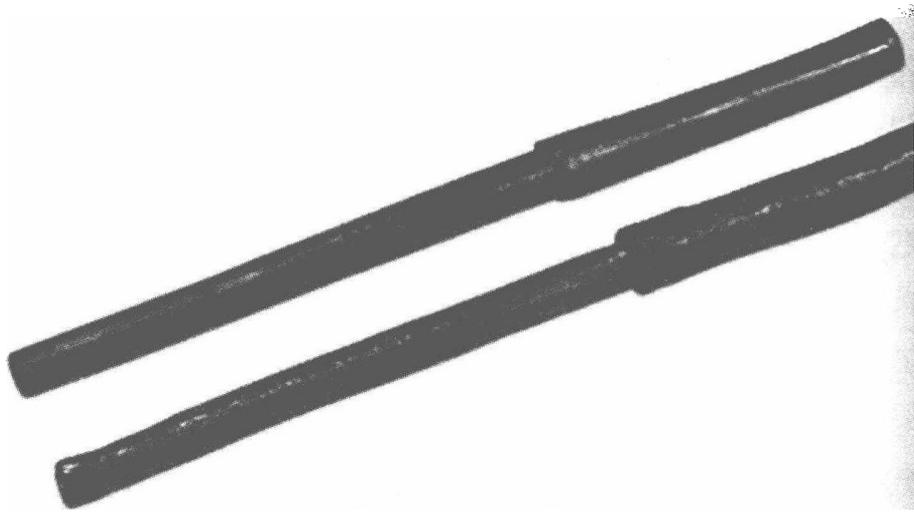


歙州黄山张谷墨

2号棺内出土器物30件，其中包金木梳、金耳杯、漆砚盒在死者头部周围，漆奁放置在腿部，其余大部分器物集中放置在胸部和胯部。漆器有奁、粉盒、碗、盘、钵、文具盒、砚、砚盒、筷子等。瓷器有粉盒、盂。文房用具有毛笔、墨、砚台。还出土了金耳环、银簪、木梳和600多枚钱币。这些钱币最早的为唐开元通宝，最晚的为宋圣宋元宝。

竹管毛笔：两支，笔管、笔帽均为竹制，笔毛已朽，仅残留笔芯，也已炭化，呈黑色，似以硬毫与麻纤维为柱心，软毫为披，属于长锋柱心笔。唐代，安徽宣州已成为全国制笔中心。宋代笔工巧匠辈出，制笔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笔杆的雕镂技术也达到了精妙绝伦的程度。北宋崇宁以后，宣州制笔匠诸葛高改进笔毫，以一种或两种兽毛参差散立而扎，其毫长半寸，并存一寸于管中，一笔可抵他笔数支，称“散卓笔”。这两支竹管毛笔处于柱心笔到散卓笔的过渡阶段。

九华朱觐墨：据墓碑记载，该墨入土年代为宋徽宗“政和戊戌年（1118年）三月甲申”，墨模制作梭形，未曾使用，保存较完整，出土时断为三截，右上角边缘处有小块残缺，后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胡



竹管毛笔

继高先生粘结修复。墨正面中间有阳文楷书铭文“九华朱觐墨”5字。背面中部枣核形线框内有凤形花纹，线框两端处各入圆形印纹，圆圈内各有一阳文楷书“香”字。墨锭长21厘米、中部宽3.4厘米、两端宽1厘米、厚0.7厘米。湿重69克，干后重39.2克，修复后重47克。墨色近似油烟墨。朱觐，安徽九华山人，与滕元发、苏东坡为同时代人。明《墨海》、元《墨史》均记载：其人做墨“善用胶，做‘软剂出光’墨”。《墨海》辑录苏东坡评墨段字：“孙叔静用剑脊墨，极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盖少室间道人也，卖墨收其赢，以起三清殿，墨甚坚黑，近世善墨惟朱觐及此。觐，九华人。”“九华朱觐墨”是首次发现的宋代有名款、墨锭完整、尺寸较大的模制古墨，是珍贵的宋代墨模制墨的标本，在墨史研究上有重大意义。

从墓中出土的墓志得知，墓主人是宋太师舒国公孙马绍庭同大丞相文穆公孙吕氏。马绍庭为北宋太师舒国公之孙、天圣年间合肥名臣马亮之子。吕氏为吕蒙正的后代。马、吕家族为北宋名门望族，据《宋史》记载，马亮的女婿为吕蒙正的侄儿吕夷简，此次马绍庭夫妇合葬墓的出土，又为我们提供了马、吕家族新的联姻关系，反映了当时官宦之间通过血缘关系编织封建网络的状况。

墓中出土遗物均为死者生前实用器物,而此墓又有确切的纪年,因而为宋代考古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标准器物,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生产习俗、各类器物生产工艺水平和流通状况的重要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砚在墓中同时出土,特别是完整的两锭徽墨,虽在尸水中浸泡长达870年之久,但质地、形状基本未变,模印的文字、纹饰清晰可见,当是我国古墨中的珍品。墓中出土的瓷器除1件为黑釉瓷外,其余均为青白釉瓷。此墓出土的青白釉瓷器在胎质、釉色、造型、装饰技法上具有北宋湖田窑的典型特征,应为湖田窑产品。

### 3. 长江下游龙窑——繁昌柯家冲窑址

“窑”字来源于古代烧羊制佳肴的“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已经有烧制陶器的穴窑。商周时期,又出现了升焰式的圆窑和方窑,但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与印纹硬陶是同窑烧制。随着制瓷业的不断发展,出现专门烧造瓷器的窑炉。

窑炉按形制划分为馒头窑(圆窑)、龙窑、阶级窑、葫芦形窑、蛋形窑等。馒头窑与龙窑沿用时间较长,最为常见,北方的平原地区多使用馒头窑,而南方的山区、半山区则多依山建造龙窑。

馒头窑大约出现于西周晚期,一直沿用至今,是北方平原地区流行的窑炉形制。馒头窑由窑门、火膛、窑室、烟囱等部分组成,火膛与窑室构成一个馒头形的空间。馒头窑适合焙烧胎体厚重、高温下釉黏度较大的瓷器,因为馒头窑容易控制升温 and 降温速度,保湿性较好。但由于馒头窑形制的局限,火力供给慢,升温、降温缓慢,烧成时间相对较长,且窑内温度前后、上下分布不够均匀,所以容易出次品。

龙窑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一直沿用至今,在南方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均广泛采用。龙窑是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成一长隧道形窑炉,因其斜卧似龙而得名。窑室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龙窑一般长约20~80米、宽约1.5~2.5米、高约1.6~2米。

窑炉约与地平线倾斜 10~20 度,窑头角度较大,约 20 度,中部约 15 度,后部约 11 度。龙窑采用自然通风方式,以杂柴、松枝等植物为燃料,窑内火焰多平行窑底流动。因而龙窑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影青、黑釉瓷等大都是在龙窑里烧成的。但由于龙窑内温度和气氛波动较大,烧制大件产品和比较致密的工业陶瓷容易发生冷裂,影响成品质量。

**发掘经过** 繁昌窑位于繁昌县城南部和西部的丘陵山地,有柯家冲窑、新塘窑、半边衙窑、西门窑、骆冲窑等组成。其中,柯家村窑址最大,在县城西南 1.5 千米处的笠帽顶与锥子岭之间,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繁昌窑在古代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1955 年,安徽省博物馆葛绍棠先生首先发现繁昌柯家冲窑遗址。1958 年 4 月,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柯家冲窑址进行了第一次初步的调查,并做了一次小规模试掘,发现残龙窑窑炉一座,所获遗物多为瓷器残片,能辨认器形的只有碗一种,此次调查与试掘揭开了繁昌窑研究的序幕。1978 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在柯家冲进行了一次试掘,但可惜未发表过正式试掘报告。1982 年 6 月和 1983 年 5 月,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先生先后两次对柯家冲窑遗址进行了调查。1983 年,安徽省博物馆胡悦谦先生又对繁昌柯家冲窑进行了一次试掘,但也没有发表试掘报告。1987 年 4 月,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对繁昌柯家冲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2002 年 9 月至 11 月,安徽省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和繁昌文管所联合对柯家冲窑进行了科学发掘,共布方 32 个,实际发掘面积 516 平方米,发掘出北宋龙窑窑址 1 座、作坊遗址 1 处,出土了大批的瓷器标本及窑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窑址情况** 在繁昌柯家冲发掘清理了一座较完整的北宋龙窑,头东尾西,依山顺势而上,水平长 53.5 米,斜长 57.5 米,头尾水平高差近 20 米。整个窑可分为窑外工作面、操作间、火塘、窑室、窑尾、窑门几部分。该窑的窑头保存得罕见地完整。操作间里尚有成摞的匣钵,有的匣钵内还有尚未取出的瓷碗。火塘两侧窑墙保存高达 1.4 米,窑壁上有一层烧成琉璃状的窑汗。底部可以看见明显的黑色灰烬堆积。这是长期烧烤

形成的硬结地面,摸上去如岩石。罕见的斜坡状弧形窑门,门道上发现多枚铁钉,显示可能使用了门框木结构。从龙窑的结构来看,柯家冲古龙窑已经非常成熟,已经具备现代龙窑的各项功能特征。

此外,在窑南部山间平地上发掘出作坊遗址1处,包括成型作坊1座、过滤池2座。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带回廊的成型作坊基地,并且作坊内还保留有4段残墙遗迹连着前墙,间距0.5~2米,这种遗迹现象在其他的遗址中

还很少发现。一个大的方形过滤池中套着一个小的方形过滤池的现象也比较少见,这些对于研究瓷器的制造工艺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重要发现** 繁昌窑是长江下游专烧影青瓷的窑口,考古证明,其初始烧造年代应为五代,兴盛于北宋,废毁于南宋。

柯家冲瓷窑遗址出土遗物有瓷器和窑具等。瓷器均为青白瓷,釉色以青白色为主,部分偏白、偏黄或偏青。晚期白胎的胎色多偏灰。器形有碗、盏、杯、碟、盆、盘、盅、盂、钵、瓶、罐、盒、炉、执壶等,其中以碗、盏类最多。还出土有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匣钵分为漏斗状和筒状两种,以漏斗状为主。从窑旁的大量废弃堆积观察,其中绝大部分为匣钵碎片,瓷片很少,表明该窑成品率较高。

出土的碗的数量最多,可分为叠唇碗、卷唇碗、尖唇碗、花口碗等几种。花口碗的造型比较别致,为五缺花口,口沿外撇,唇面较平,腹微弧,腹



繁昌县柯家冲宋代龙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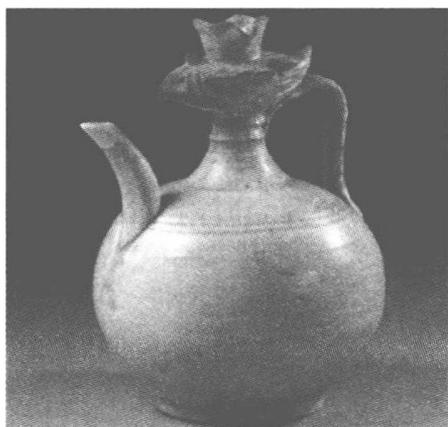


繁昌柯家冲窑址瓷器叠放情况

身有五条瓜棱线,内底下凹,圈足外直内斜,内有旋削痕迹。青白釉施至圈足上部。盏有叠唇盏、花口盏和尖唇盏等。花口盏圆口、尖唇、敞口、弧腹,内底平,腹身等距离分布棱线七条,高圈足外直内斜,有旋削痕迹;白胎,青白釉施至腹下部近圈足处。碟有葵口形、花口形,造型美观,引人喜爱。盘口壶形制优美,制作精细,是繁昌窑的典型代表作。

繁昌瓷器釉色以影青为主,亦有白釉。因烧造火候的高低和还原焰的不同,瓷釉呈现各种不同的青黄色。瓷胎色有白色、白中泛黄、白中泛青灰和土黄色几种。白色胎的胎质坚硬细腻,釉色光亮莹润,是繁昌窑的上品。白中泛黄、白中泛青灰和土黄色的胎,是繁昌窑的普通产品或次品。柯家冲窑与景德镇石虎湾、湘湖、湖田窑在瓷胎、釉色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器物造型有自己的风格。该窑瓷器大都有细而匀的开片,烧造火候也普遍较景德镇窑为低。

通过对柯家冲窑瓷胎与制瓷原料元素组成的对比分析,发现以柯家冲古窑址为代表的繁昌窑采用了当地原料加高岭土混合制胎的“二元配方”的工艺,成功烧制出高质量的青白瓷。一直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首先发明“二元配方”工艺的是江西景德镇窑,时间在元代初中期。



繁昌窑北宋影青釉凤头壶



繁昌窑北宋影青釉盏

而繁昌窑兴盛于北宋,中国陶瓷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工艺“二元配方”诞生年代据此提前了300多年。

安徽古代瓷业自北朝晚期淮南寿州窑和宿州曹村窑开始制瓷器,唐和五代获得迅速发展,发现了淮南寿州窑,萧县白土窑,宣州卫东窑、新河窑、里桥窑,芜湖县东门渡窑,泾县琴溪窑,歙县辣口窑,休宁岩前窑等一批瓷窑址。五代至北宋时期瓷窑场发现了20多处,在皖南、江淮、皖北都有分布,这说明安徽古代瓷业在北宋中晚期达到了鼎盛,但自此又迅速地衰退。

繁昌窑不见于史志记载。相传有柯氏两兄弟在此始烧,以“柯大柯二”碗而著称。繁昌窑在五代时期有过短暂的繁荣。该时期的繁昌县在南唐国境内。南唐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地反映出那个时代贵族们生活的常态,人们听歌观舞,饮酒作乐。繁昌窑的研究者们偶然注意到,这幅画一共描摹了32件瓷器用品,而这些瓷器用品竟然与出土的繁昌窑青白瓷十分神似。无论是荷花托盏、花口碟,还是葵花口温酒壶、执壶等等,无一不呈现出繁昌窑青白瓷的明显特征。《韩熙载夜宴图》隐藏的秘密,更佐证了繁昌窑青白瓷的烧制年代应该是五代时期,也更加证明繁昌窑生产青白瓷要领先于宋代才开始生产青白瓷的景德镇,从而,繁昌窑很可能是中国青白瓷的发源地。但是繁昌窑发展到北宋、南宋时期,距离繁昌不远而各

方面条件更加优越的景德镇窑迅速崛起,同时期繁昌高质量的瓷土资源却逐渐枯竭,以至于最终从历史上消失,隐藏在深山厚土之下。

从五代到南宋,繁昌窑延续了前后 300 余年,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有一定的影响,至今仍有宋代墓葬出土其产品,为研究当时南方窑业史和青白瓷的烧造工艺等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 4. 安徽元将——安庆范文虎夫妇墓

范文虎(? ~ 1302),南宋降元将领,殿前副都指挥使。

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防重镇。蒙古忽必烈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襄樊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元将阿术率军长驱直下,围攻襄阳、樊城3年,贾似道一直封锁消息。咸淳六年(1270年),南宋以李庭芝为将援助襄樊。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对于南宋军队苦战视而不见。咸淳八年(1272年)三月,樊城外城被元军攻破,宋军只好退守内城。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张贵与范文虎约定在龙尾洲两面夹攻元军,范文虎竟违约,致使张贵战败被杀。襄樊因为孤城无援最终沦陷。襄樊之战后,范文虎仅降一职,出任安庆知府。

至元十二年(1275年),范文虎以城投降元军。在元朝统治期间,范文虎曾担任过两浙大都督、中书右丞等职,负责招降或攻战沿江南宋州军,对原来的同胞异常凶狠。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任左丞。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日本行省右丞领兵十万随忽必烈第二次征日本,史称“弘安之役”。在这场战役中,范文虎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

仅仅过了一年,范文虎又东山再起。其后,范文虎在官场上一帆风顺,频频升官。元大德六年(1302年),大元朝的尚书右丞、著名的常败将军范文虎在享尽了一生的荣华富贵之后,寿终正寝。

**发掘经过** 棋盘山在安徽省安庆市东郊区迎江寺东，南面紧临大江，是一个长方形土冈。面积约40平方千米。冈上大半是明、清及近代墓葬。1956年4月，安庆糖厂建筑厂房起土时发现古墓一座，安徽省博物馆得到消息派人前去清理时，墓已遭到破坏。

**墓葬形制** 墓为砖室券顶，夫妇合葬，全长4.5米、宽5米，中有界墙一道，分为东西两室。男棺在东，女棺在西，头北足南，女棺略向西偏3度。

东室墓顶下有弧形大木板，一块板下是木椁。椁长2.5米、厚0.8米、宽0.9米、壁高0.81米，四面有榫拴，外有竖柱四根，直撑大木板。椁盖去后现出木椁，靠棺一面有三角形木柱四根，平面对称支撑椁盖，如屋中竖柱。棺形如长柜，朱漆颜色如新。盖用推榫，外加铁钉封合，左三右四。棺长2.75米、高0.70米、前宽0.70米、后宽0.61米、壁厚0.06米、盖厚0.09米、底厚0.07米。棺里用麻布贴好后加漆。

椁与棺之间、椁与墓壁之间空处，皆用松香灌实。椁前有圹志一方，高0.86米、宽0.36米。刻文两行，中行是宋体字，上半剥蚀约7个字的位置。其字可识的为“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通惠和稻草韵事范文虎之圹”22字，“文虎”二字真书侧写。右边一行真书“大德五年六月吉日立”9个小字。

圹志西侧有短木一块，长约0.3米，横结圹志。西边有瓷罐一个，内有北宋铜钱10枚、小竹刀1把。东有铜炉1件，鼓腹圈足，底有穿钮，腹部纹饰极细，内满贮香灰和炭灰。

木椁外有砖砌小方台3处。棺底有大木板1块，上面涂满松香，板上有大小不等的木条100多块，组成三角形图案，棺材放在图案上。大木下面四角有铁牛4只，均俯足北向。前面两铁牛之间有铁猪1只。

墓主骨架完整，躯干甚大。在腿部尚残存有花绸。在胸前有漆纱羹头1只，腰骨下有方玉8块、圭形玉1块、半圆形玉带头1个，能组成一条长带。玉的背面四角均有斜形穿孔，并印有布的纹痕。骨架右侧有木质朝笏1件，上圆下方，微作弓形，由下向上，逐渐窄狭。在笏旁有玉印



1个,青色虎钮,刻朱纹押字,外套木质印盒。此外有鎏金带头1件。有玉尊、鎏金铜盒、佛珠、残梳、残镜、小铜佛、玉环、小方玉等。

西边墓顶下有大木板4块,板下平铺灰砖两层,有鹅卵石1层,下面即是朱漆棺,棺的四周空处均用石灰米汁混合土灌注,棺尚未损朽。棺前有墓志一块,高0.89米、宽0.34米,楷书三行,中行为:“先妣太夫人陈氏之墓”,右行为:“命系丙戌年正月十七日戌时建生于”,左行为:“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四午事倾世”。

棺内有金冠、金花、金饰和银钏等。棺底用长短不等的木条组成图案,与男棺同。在图案上放长方形生铁五块,上面加10厘米厚的石灰米汁混合土。木条如新,带有香味。木条下有一层极薄石灰,再下用桐油石灰混合打成坚固基地。棺盖用铁钉封合,打开时满棺清水。棺内前部有木枕一,横置棺中,平面挖有圆洞,下有缺口,枕底用两块偏木垫起,头骨枕在圆洞上。旁有金花1件,在金饰附近有银饰1件,在手腕骨上有银手镯1对,小腹上有茄形玉佩1件,右腿骨上有圆形帽子1顶。

**重要发现** 该墓中清理发掘出一大批金、银、玉器等文物,还出土了3件瓷器。

这3件瓷器分别为罐、罇和碗。出土时,碗盖在罇口上。碗小圈足,敛口,体外饰细莲瓣纹,釉色为影青,应为元代景德镇窑产品。另两件瓷器窑口不清。但该墓不见枢府釉瓷和元青花瓷器。

玉器,有白玉贯耳盖瓶、白玉绞丝纹环、小玉饰、桃形玉饰、玉带板、玉押印等。这批玉器玉质均为精美的和田白玉或青白玉,通体温润光泽,除白玉贯耳盖瓶外,大多为素面,造型浑朴简单又不失规整细致,表现出元代的风格。

白玉贯耳瓶:通高7.1厘米,口径2.75~3.25厘米,盖径2.76~3.22厘米,厚1.11厘米,器耳孔0.2~0.25厘米,器盖孔0.3~0.6厘米。玉白色,晶莹温润,为优质和田玉,微有瑕疵。瓶体扁圆,浅浮雕一只蟠虺盘绕曲折于瓶盖面,生动而灵气。蟠虺两只前腿上举,后腿弯曲成弓形,在四只腿外部均刻有排列整齐的短阴刻线。齿弯曲内卷,螭身的中部有

一道阴刻线,两边还刻有“节纹”表示脊背骨骼。器盖两侧各有一个穿孔,瓶的颈部为双贯耳,耳的中部各有一穿孔。宽扁圆腹,圈足底外撇。口腹之间饰四圈突出的弦纹。该器表现出古朴素雅的风格,系仿古铜器造型制作,属于仿古玉类型。此件玉瓶器型规整,雕琢手法细腻精致,为元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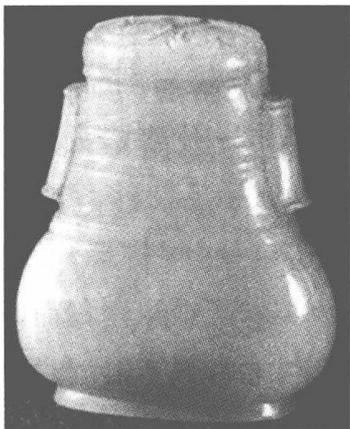
玉押印:玉质青色,虎形钮,刻朱文押字,外套木质印盒。玉押俯视为正方形,侧视由三部分组成:一、印面画押突起,为剔地阳文画押,十分简洁,其他部分均切割整齐,打磨平净,画押字边与印体呈直角状。二、印体侧视为横长扁体,光素无纹。三、印体上端左右横卧一个匍匐虎形钮,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虎首与虎身平齐,虎背身为褐黄色沁,属于“俏色巧作”。四肢匍匐,前爪用两道阴刻线表示,虎头较大,下颌与腹部挖成洼形以表示形体。虎头两眼圆睁,大鼻,口部划一阴刻线,头顶雕饰突耳与纹饰。虎身上刻有两两对称分布的二字纹表示毛发,长尾卷曲到一边。虎身下有一半对穿圆孔,用做系绳。据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载:“元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以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能用。”根据元代森严的等级制度,此玉押印应为朝廷特赐之物。青玉伏虎钮,虎头顶与背部保留铁锈色玉皮,富有真实感,但做工已趋简略,可反映元代朝廷玉器的特点。阳文押字不可识。

心形活环玉坠:通高 8.6 厘米、宽 5.55 厘米、厚 1.22 厘米。玉坠扁平状,上有活环,下坠心形。心形周边突起称为窄边,外缘呈圆弧状。坠中间部分鼓突,向外呈弧形渐低,与窄边构成台阶,坠中间厚于窄边,两面形制相同。此套吊坠玉饰分成三组构件,可分可合。心形坠顶部磨平,镌有一梅花孔。坠与活环之间由一梅花形栓坠连接。活环本身由两个圆形环连接,下环底部打平,琢出一梅花孔,以便于梅花形栓柱相连接。全坠打磨光滑,素面无纹。玉质致密,油性极好,白色温润,细腻剔透,活环构思极为巧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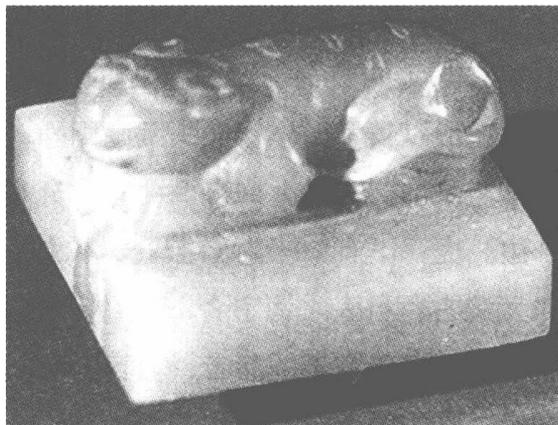
金冠:高 4.4 厘米、长 13.7 厘米、宽 8 厘米。椭圆形,用大小 5 块金

片压模扣合而成。金冠顶部是一块中间长方形、两端类似如意形的薄金片，再用两块云状形金片镶在两旁，两头各镶一块小金片，有穿眼，系固定发髻用的，底面有大方洞，是套发髻用的。顶部及周身均篆刻缠枝花纹，内填珍珠纹，每朵花的中间镶嵌一珠宝饰物做花蕊，镶嵌饰物虽已脱落，但痕迹尚清晰可见。制作考究、华丽，是一件很好的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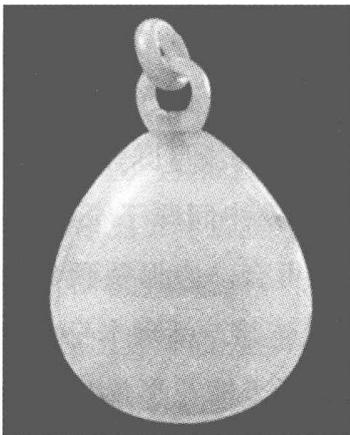
根据墓志可知，该墓墓主人为范文虎夫妇。范文虎墓志上的铭文全文应为“尚书省右丞商议枢密院事提调诸街屯田通惠河道漕运事范文武之圻”29字。陈氏墓志中的“并须年”应是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以此推断，陈氏卒年应为7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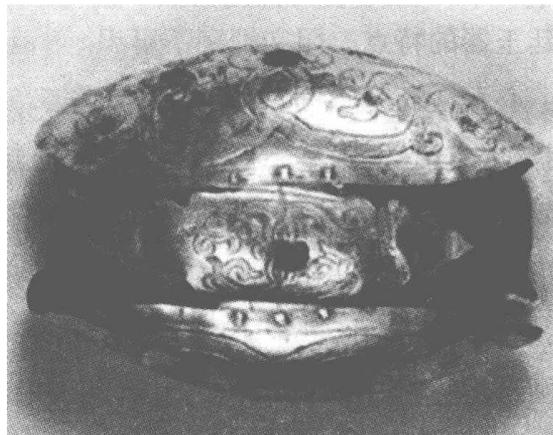
白玉贯耳瓶



玉押印



心形活环玉坠



金冠

## 5. 最早的明皇城——明中都城遗址

朱元璋(1328~1398),原名重八,后改名朱国瑞,濠州人(今安徽省凤阳县东)。

朱重八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兄长在其幼儿时均死于瘟疫。朱元璋孤苦无依,只能投身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以求温饱。入寺不到2个月,因寺院不能维持,朱重八只能离乡四处化缘,直到至正八年(1348年)重新回到皇觉寺。

元朝末期,社会动荡,汉族人民在种族歧视政策下,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国上下,不断出现起义军队,反抗元朝廷。朱重八在其好友汤和的劝说下,也参加了起义军,并改名为朱元璋(意思为诛灭元朝的璋)。25岁时投入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旗下,以反抗蒙元暴政为己任。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经常率兵出征,屡战屡胜。郭子兴爱才,便将其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负责统帅郭子兴的军队,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为吴王。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明太祖朱元璋即帝位以后,建都南京,而以临濠(今安徽省凤阳县城的西北隅)为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兴建,至洪武八年(1375年)停建。由于兴建和使用的时间短暂,未形成政治中心,但它在城市规划上的某些布局,包括宫城内的宫殿布局,却影响了明北京城的规划。该址在1949年以前,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造过程** 1369年,朱元璋为显示其新王朝的威势,开始在全国调集百工技艺、军士、民夫等,数以万计,大兴土木,在凤阳营建中都。“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以《宫皇图》为模本,设置“行工部”,其“规模之大、规制之盛、工艺水平之高,实冠天下”。建筑所用木材都是本国

“天下名木”和尚未归入图籍的附属国的“求大木”，建大社坛的“名山高爽之地”的青、黄、赤、白、黑等五色土竟然取自直隶应天（今南京）等府并河南等 10 多个省，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做基础，上面砌大城砖（一般长 40 厘米、宽 20 厘米、高 11 厘米，重达 20 千克；共分为地方烧造砖、军队烧造砖、字号砖和刑狱砖等四种类型），承造城砖的单位有 22 个府 70 个县及中都各卫所。砌筑时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作浆，关键部位“用生铁熔灌”。所有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石构建筑“华丽奇巧”，雕镂的图案精美绝伦。

明中都的营建首先是宫阙的建造。明中都宫阙基本上沿用了吴王新宫（1366 年，当时还只是吴王的朱元璋在应天营建的宫殿）的格局。

洪武三年（1370 年），建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这是三个并立的全国最高级别的行政、军事、监察机关。明太祖一反元大都中央宫署分散于城内各处的格局，把它们集中分布在宫阙午门前的东西两翼。这样的格局，既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精神，又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办事效率。洪武四年（1371 年），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坛和太庙。洪武五年（1372 年），定中都城基址，建中都城隍庙。洪武六年（1373 年），建开平王（常遇春）庙，同年十一月又在它的西边建历代帝王庙。洪武七年（1374 年），营建中都城土城。洪武八年（1375 年）三月，在历代帝王庙相对称的位置上建中都国子监。

洪武八年（1375 年）四月，中都城营建工作即将完工，明太祖朱元璋踌躇满志地亲自前来“验工赏功”。不料，明太祖到凤阳后，遇到的却是工匠们发起的集体示威斗争。工匠们积劳成疾、怨声载道，气氛十分紧张，以致明太祖自认处事失当。五个月后，明太祖“罢中都役作”。

洪武十六年（1382 年）首先拆中都宫殿的建筑材料修建龙兴寺，天顺三年（1459 年）又拆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 500 余间建筑重修龙兴寺。此时，中都宫殿已仅存遗址，中央官署也仅存中都留守司了。但在皇城东侧，从天顺以后却陆续修建了 5 所“高墙”，专门囚禁皇族宗室罪犯。这是明中都城中很特殊的建筑，崇垣深壕，望楼敌台，犹如郡县

城郭。“高墙”遗迹至今尚存。后因历战火等原因，城墙及宫殿被大量毁坏，至上世纪70年代初，仅剩残存的午门、西华门台基及1100米长的城墙，但察其规模布局和遗物、遗迹仍十分壮观。现正在陆续修复中。

**城址布局** 中都城平面近方形，东西7760米、南北7170米，西南角的凤凰嘴向外突出。外城周长约30千米，设九门，每座城门以内都有一条笔直的干道，纵横交错。皇城（明代称“禁垣”）位于全城的南部稍偏西，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160米、东西宽1860米，有4个城门：南曰承天门、北曰北安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禁垣以内为宽约80米的护城河，被护城河环绕的才是宫城（明代称“皇城”），在皇城中央稍偏南处，周长3.68千米，平面近方形，规模比北京故宫还大10000多平方米。宫城亦有4个城门。宫城墙高15米，全为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1厘米的特制大砖所砌。宫城内尚存奉天殿、文华殿和武英殿的基址，而以午门墩台保存最好，门洞内石须弥座上的雕刻尤为精美。宫城北为苑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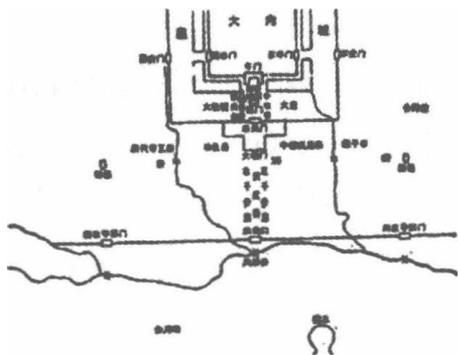
在中都城内十分明显地存在着一条纵贯全城南北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南起外城的洪武门，北到外城的正北门（未建成），全长近7千米。中都城内的各种建筑无不规整、对称地排列在这条中轴线的两侧。居中者为三大殿，其左、右分别为东、西二宫，向两翼分别为文华、武英二殿。其前为奉天门，后为后三宫。宫城午门以南，左为中书省、太庙，右为大都督府、御史台、社稷。

中都街坊的设计，都是东西相对、南北相称的。其主要街道，东城有穿过鼓楼南达左甲第门的南北大街左辅街，有东出东华门、东安门，对直向东德大街的东华街；西城有穿过钟楼南达前右甲第门的南北大街右弼街，有西出西华门、西安门，直达涂山门的東西大街西华街、涂山街。

圜丘建在南郊隆起的高地上，是祭天之所，台二层，呈圆形，以象征天。方丘建在北郊大泽南岸的丘岗上，是祭地之所，台二层，呈方形，以象征地。朝日坛建在东郊，夕月坛建在西郊。圜丘、方丘南北对称，朝日坛、夕月坛东西对称，都与古代《周礼》规定的原则相一致。山川坛建在



明中都城城墙外貌



明中都午门以南设计建筑平面图

南郊,是祀岳、镇、海、渎、山、川之所,共建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先农等十三坛。

**重要发现** 历经 600 多年沧桑和数不清的战乱洗劫,中都城往日的巍峨壮丽仍然可见一斑。至今,都城内外,殿宇基址势如山峦,门阙台基高若岗阜;白玉石街、内金水河、金水桥等基址和故道尚存;故宫井等几口大井仍可使用;护城河宽达七八十米;中都城北垣和东垣的土垣高出地面 10 米;皇城的西墙全部、南墙西段 1100 米基本保留着昔日的宏伟气势;午门和西华门仍可见当年的恢弘气魄。特别是午门基部须弥座浮雕及城内石雕,更是我国都城中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珍品。

午门平面呈“凹”字形,分城楼与城台上下两层。城台高 14.52 米,北面东西总宽 142.4 米,中部南北进深 41.5 米,南门中间空当东西宽 70.8 米,东西两翼城楼台南北内侧均长 47.5 米,外侧南北均长 89 米,南侧东西各宽 35.8 米。台基正中开三个门洞,东西两侧的左右臂掖处又各开一个门,称左掖门、右掖门。这两个掖门从正面分别设在两翼东西内侧北端,相相对立,而门券各伸进城台之中,然后折向北拐穿过城台,最后从城台北面东西两侧显露出来。这样从背面看是五个券洞,而从正面不易直接看到掖门,所以建筑上把这种做法称为“明三暗五”。

午门正券两侧及楼台基部四周,总长 500 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连续不断地浮雕着龙、凤、鹿、象、麒麟、双狮绣球、牡丹、芍药、荷花、西番莲、云朵、方胜等。西华门、东华门和玄武门三券门洞两侧基部砖砌须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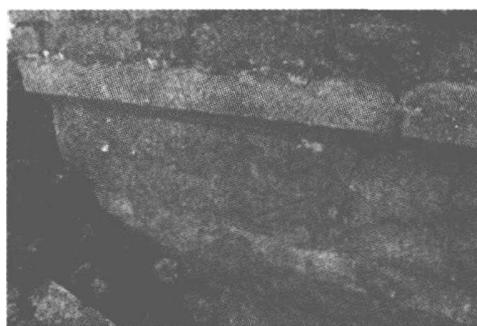
午门遗址正面



午门遗址背面



午门遗址门洞



午门西侧须弥座浮雕



午门正中券洞须弥座龙纹浮雕



午门正中券洞须弥座云纹浮雕

座上,镶嵌着模压的花卉、方胜等。南京和北京的故宫午门基部须弥座上,仅嵌有少量花饰,相比之下,中都城午门浮雕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殿址上已发现的7块蟠龙石础,每块2.7米见方,础面半浮雕蟠龙一圈,蟠龙圈高凸出平面15厘米、宽32.5厘米,外圈直径1.9米。圈外础面上雕有翔凤。北京故宫太和殿石础直径仅为1.6米,且是素面,不像中都宫殿石础那样“双龙五凤杂云气,巧匠一一穷雕镂”。

明中都由于兴建和使用时间短,未能形成政治中心,但在城市规划上的某些布局,特别是宫殿布局,却为后来改建南京都城宫殿和营建北京都城宫殿绘制了蓝图,制作了样板模式。另外,其“左祖右社”制度的建立、中轴线空间序列及对称布局的高度完善、对都城建筑承上启下的

过渡性特征、皇城建筑特色等,无不彰显了它的历史意义、文物价值及在明清都城建筑史上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

## 6. 明朝开国元勋——蚌埠汤和墓

汤和(1326~1395),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明朝开国元勋,军事家。

汤和自幼是孤儿,和朱元璋经常一起玩耍。成年后,他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抗元武装红巾军,后升任千户,便邀请朱元璋参加义军。在朱元璋统率红巾军期间,他一直追随朱元璋打拼天下,后因军功升任统兵元帅。其后又因攻打金坛、常州的军功晋升为御史大夫。

明王朝建立后,汤和仍坚持在战场,为明朝政权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洪武元年(1368年),汤和任征南将军,平定浙东。洪武二年(1369年)攻占大同、宣府,汤和被晋封为中山侯。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官拜征西将军,率大军进攻四川,攻克重庆,伯颜帖木儿投降,消灭了夏国。汤和被晋封为信国公。

汤和于洪武十七年(1388年)至二十一年(1392年),三次赴东南沿海指挥军民英勇抗击倭寇侵扰,他所修建的59座卫所、要塞,为后来戚继光抗倭创造了有利条件。

洪武十八年(1389年)汤和告老还乡,明太祖赐其居住在中都(今安徽凤阳)新府第。汤和回归故里后,便将所得赏赐分送故交。汤和一生戎马,可谓功勋卓著,但从居功自傲,晚年时,每见朱元璋,态度仍然非常恭敬。1390年汤和患病,1395年8月汤和病逝,享年70岁,朱元璋追封汤和为东瓯王,谥号“襄武”。

**发掘经过** 汤和墓位于安徽蚌埠市东郊曹山,1951年文物调查时发现。地面坟冢略有起伏,因受雨水冲袭,面积不能确定。1973年11月,因修建公路,文物部门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发现该墓早年已被盗,棺木遭到破坏。虽然绝大部分随葬品已失窃,但还是出土了墓志铭和一批陶瓷

器、木俑、铜器、金银器及玉器等。

**墓葬形制** 汤和墓为大型单券式砖石结构,分前后两室并一右侧室,共38.5平方米,前有斜坡土墓道。墓室整体凿山而建,在前室拱门两侧,还可见裸露的山体大石。

墓南神道,长225米,前端有高达6.35米的大型神道碑,碑额篆书“敕赐故东瓯襄武王神道碑铭”,碑文字迹多不清。神道两侧有石马(高1.5米、长2.7米)2匹,侧立牵马士;跪羊(高1米、长1.7米)1对;坐虎(高1.2米、长1.7米)1对;文臣(高3米)2人,拱手执圭;护卫甲士(高3米)2人,一手按剑、一手下垂。另有望柱柱础件,方形(边长75厘米)。

该墓封土残存7层,自上而下,第一层碎石加砂,厚90厘米;第二层黄土,厚70厘米;第三层碎石加砂,厚37厘米;第四层黄土,厚150厘米;第五层碎石加砂,厚40厘米;第六层黄土,厚80厘米;第七层为白灰泥。

墓室砖壁厚88厘米、高1.53厘米,用长方形青砖平砌,券顶用青砖平立交叠砌,用白灰浆浇口。

前室:内宽3.87米、进深2.59米、高3.6米。前门拱门两侧用长方形青砖平砌门垛,封门砖平砌,堵塞两门垛中间,方形铺地砖平铺。

后室:置棺室,内宽3.99米、进深6.2米、高3.6米,较前室宽大。两扇石门,上下有枢纽,包铜环,门上安装铁铺首,横串一把银锁。方形石墓志斜置在门外的中央,盖和底用两道铁箍封合。左、右、后三壁各砌壁龛一个,左右壁龛为壶门式。后壁龛为拱券形。铺地砖与前室铜,券顶后部有两个方形盗洞。室中偏后用方条石砌成长方形棺床,上面铺木板,板上置棺。

右侧室:在后室右壁前部依山开凿,有一方形门通后室,仅建造石门额和门颊,无门扇,左右壁部分用长方形青砖平砌。室内置一女棺,已腐朽残破。

**重要发现** 据专家考证,汤和墓墓室在历史上至少两次被盗,但仍



清理出上百件精美文物,其中有陶瓶、白瓷罐、木俑、金银器、铜镜玉器、琥珀珠等。陶瓷器有陶缸、陶罐、白瓷罐和青花瓷罐。铜器有葵花铜镜和圆铜镜。金银器有金花、金钱、金簪等一些饰品。还有一些散乱的玉佩件和30多件木俑。其中一件青花双兽耳大罐最为珍贵,是研究元明之际青花瓷作品的重要实物,出土的金贴花、银壶、银香炉、银锁及玉佩件等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青花双兽耳大罐:**又称“僧帽盖钮青花罐”。高47.5厘米、口径16.6厘米,是景德镇窑元青花瓷中一件难得的大器。青花是一种传统的釉下彩瓷器,是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的重要成就。这件埋藏地下650余年仍完好无损的青花瓷罐,造型浑圆俊秀,纹饰绚丽多姿。侈口直颈,斜肩鼓腹,肩腹交界处置对称双兽耳,下为矮圈足。通体绘有花纹六层。盖子绘莲瓣和金钱纹各一周,颈绘海浪纹,肩部饰连续的仰莲瓣纹,瓣纹中填绘杂宝。肩、腹交界处绘二方连续花卉缠枝纹,腹部主题纹样为缠枝牡丹,以六朵盛开的牡丹大花为中心,枝叶缠绕其间,婉转多姿。下腹绘卷草和仰状莲瓣纹。通体纹饰富丽繁密、层次分明。青花色泽浓艳,釉面肥厚莹润。

**神道碑:**位于墓前神道的最南端,高6.35米。但令人费解的是,原来刻在石碑上长达数千字的碑文已被人逐字凿去。究竟是何年何代何人所为,至今仍无定论。业界的看法是:碑文的作者方孝孺在建文帝在位时曾任翰林侍讲博士,深得器重。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命他起草登基诏书,他掷笔于地,拒不受命。朱棣用灭九族来威胁他,可他回答说:“虽灭十族,亦不附乱!”结果被杀,除灭九族外,还杀他的学生,以成十族,株连至死者870余人。《明史》本传中明确记载:“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因而当年由方孝孺撰写的碑文也要凿去……而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则是此乃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所为。当时汤和墓周边区域均为凤阳府属地,李自成起义军在这里的破坏活动频繁,而且汤和墓周围的明代墓碑也有类似被凿去碑文的现象。

对品官的埋葬制度、居丧之礼与丧服之制,明政府作了详细、严格的



元青花双兽耳大罐



神道碑



神道两侧的石羊



神道碑雕花碑额

规定。在埋葬制度方面,明统治者不但对品官墓地的大小、坟高及墓碑的形制有具体的规定,而且对葬具和随葬物品也有严格限制。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如一品官墓地为 90 方步(240 方步合一亩),二品为 80 方步,三品为 70 方步,四品为 60 方步,五品为 50 方步,六品为 40 方步,七品以下为 30 方步。同样,坟高也尊卑有别:一品为 18 尺,二品为 16 尺,依次递降类推,七品以下为 6 尺。再如墓碑的制作上,明代统治者更把墓碑的形制作为体现墓主身份的重要标志,规定更为细致:一品为螭首龟趺,二品为麒麟首龟趺,三品为天禄、辟邪(传说中的两种神兽)首龟趺,四至七品为圆首方趺,圆首的碑又称碣。

碑身、碑首的高度、宽度以及跌座的高度也都有等级差别,其中最高级的墓碑能高达1丈6尺。原则上庶人墓前不许立碑碣,但此项禁令并未被严格遵行,故一般人死后墓前大多立有石碑,只是体小制陋且无跌座而已。对棺槨,明政府规定,品官棺用油杉朱漆,槨用杉木。随葬所用的陶质、木质明器(即鬼器),明代规定公侯为90事(各类随葬品合计总件数),官员一、二品为80事,三、四品为70事,五品为60事,六、七品为30事,八、九品为20事。

明信国公汤和作为功臣封王者享受了臣子的最高规格,由此可以看出明太祖朱元璋对汤和的信任和重视。

## 参考资料

1. 尹焕章. 从发现的文物中谈华东区古文化概况. 文物参考资料, 1954(4)
2. 殷涤非. 安徽地区四年来发现的考古材料. 文物参考资料, 1954(4)
3. 安徽省文管会、安徽省博物馆编.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 科学出版社, 1956
4. 胡悦谦. 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考古学报, 1957(1)
5. 裴文中. 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地理划分. 古脊椎动物, 1957(1)
6. 白冠西. 安庆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 文物参考资料, 1957(5)
7.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 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59(4)
8.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 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 考古, 1963(4)
9. 李发林. 略谈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及其分期. 考古, 1965(4)
10. 亳州博物馆编. 亳州凤凰台一号汉墓清理简报. 考古, 1974(3)
11. 蚌埠市博物馆编. 明汤和墓清理简报. 文物, 1977(2)
12. 殷涤非. 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 考古, 1978(5)
13. 严敦杰. 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和占盘. 考古, 1978(5)
14.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编.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78(8)
15. 亳州博物馆编. 亳州曹操宗族墓葬. 文物, 1978(8)
16.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编. 安徽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 文物考古工作

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17. 俞伟超. 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18.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编. 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 考古,1979(4)

19. 安徽省博物馆编. 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葬发掘报告. 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0. 贾兰坡. 科学上的“珍贵”. 百科知识,1981(2)

21. 吴汝康,董兴仁. 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 人类学学报,1982(1)

22. 黄万波,方笃生等. 安徽和县猿人化石及其有关问题的初步讨论.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3)

23. 吴茂林. 1981年发现的安徽和县猿人化石. 人类学学报,1983(2)

24. 王业友. 合肥出土寿州窑早期产品. 文物,1984(9)

2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6(3)

26. 许闻. 怀宁黄龙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 文物研究,1986(12)

27. 郑龙亭. 安徽地区古人类及其生态环境的探讨. 史前研究,1987(2)

28. 陈铁梅等. 安徽和县和巢县古人类地点的铀系法年代测定研究. 人类学学报,1987(3)

29. 李德文. 朱家集楚王墓的形制与棺槨制度.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 武汉:荆楚书社,1987

30. 亳州市博物馆编. 安徽亳州市发现一座曹操宗族墓. 考古,1988(1)

31. 胡悦谦. 谈寿州瓷窑. 考古,1988(8)

3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 考古,1989

(3)

3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 1989(4)

34. 韩自强. 阜阳汉简《庄子》. 文物研究(第六辑). 合肥: 黄山书社, 1990

35. 杨鸿霞. 安徽省繁昌县平铺土墩墓. 考古, 1990(2)

36. 李德文. 南陵县乔村土墩墓.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37. 孙祥宽. 凤阳明皇陵及其石刻研究. 东南文化, 1991(2)

38. 张国茂. 安徽铜陵地区先秦青铜文化简论. 东南文化, 1991(2)

39. 丁邦钧. 寿春城考古的主要收获. 东南文化, 1991(2)

40.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编. 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 文物, 1991

(3)

41. 张敬国.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 文物研究(总第七期). 合肥: 黄山书社, 1991

42. 李学勤. 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 中国文化, 1992(1)

43. 郑龙亭. 安徽繁昌发现中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古脊椎动物学报, 1993(2)

44. 王步毅. 安徽省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 考古学报, 1993(4)

45. 韩立刚. 安徽旧石器时代与古发现, 研究与展望. 文物研究, 1993

(8)

4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安徽天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 文物, 1993(9)

47. 杨立新. 安徽淮河流域的原始文化. 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48. 王化民. 宿县宝光寺汉墓石祠画像石. 文物研究(第八辑).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49. 杨立新. 安徽沿江地区的古代铜矿. 文物研究(第八辑). 合肥:



黄山书社,1993

50. 汪景辉. 安徽古代铜矿考古调查综述. 文物研究(第八辑). 合肥:黄山书社,1993

51. 黄培华,梁任又等. 和县猿人年代的研究. 人类学学报,1995(3)

52. 方成军. 安徽两晋墓葬的类型和分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53. 朔知. 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概述. 华夏考古,1998(3)

54. 金昌柱,郑龙亭. 发现于安徽繁昌早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活动证据. 第四纪研究,1998(4)

55. 方成军. 安徽隋唐至宋墓葬概述. 东南文化,1998(4)

56. 安徽省志·文物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57. 任晓明. 曹操宗族墓群与魏武帝陵. 文物研究(第十一辑). 合肥:黄山书社,1998

58. 王步毅. 安徽画像石概述. 文物研究(第十一辑). 合肥:黄山书社,1998

59. 安徽省文物局编. 五十年来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60. 张森水. 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 人类学学报,1999(3)

61. 方成军. 安徽东吴时期墓葬初探. 安徽史学,1999(3)

62. 朔知. 安徽淮河流域早期原始文化略说. 东南文化,1999(5)

6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考古,1999(11)

64. 金昌柱,郑龙亭等. 安徽繁昌早更新世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及其哺乳动物群. 人类学学报,2000(3)

65. 张森水,韩立刚等. 繁昌人字洞旧石器遗址1998年发现的人工制品. 人类学学报,2000(3)

66. 张敬国等. 凌家滩发现我国最早红陶块铺装大型广场. 中国文物

报,2000

6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凌家滩玉器.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68. 郑龙亭,黄万波等. 和县人遗址. 北京:中华书局,2001
69. 郑龙亭. 安徽旧石器时代. 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
7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7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考. 考古,2002(2)
72. 蒋英炬,杨爱国.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7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潜山薛家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74. 朔知. 皖江区域考古的意义:文物研究(总第十四期). 合肥:黄山书社,2005
75.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皖南商周青铜器.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76. 张敬国. 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77. 杨玉璋,张居中. 试论安徽繁昌窑——2002年柯家冲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华夏考古,2006(2)
7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安徽省繁昌县柯家冲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2006(4)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 蒙城尉迟寺.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 巢湖汉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1. 中国文物报社. 发现中国:2006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82. 阚绪航. 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下). 北

京:科学出版社,2008

8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 考古,2008(12)

8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双墩1号春秋墓发掘成果重大. 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19日。

85. 刘金毅,金昌柱. 安徽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86. 翟艳艳. 繁昌窑的兴衰. 东南文化,2009(3)

87. 唐杰平,贾庆元,胡锐,王志. 安徽省固镇县垓下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 中国文物报,2010

88. 徐少华. 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两座墓葬年代析论. 考古,20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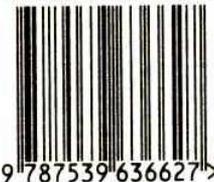
8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六安市文物局. 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研究(总第17期).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

本书是安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安徽地域文化的大型丛书，重在阐释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奋斗精神。丛书以经济、历史、考古、文学等学科或研究课题为主题和切入点，分门别类地叙述和解读从古至今安徽文化的框架、内涵、传承轨道和发展趋势，力图从微观和专业的层面上反映安徽省的社科成就，让热爱安徽文化的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和理清安徽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

ISBN 978-7-5396-3662-7



9 787539 636627 >

定价：26.00 元